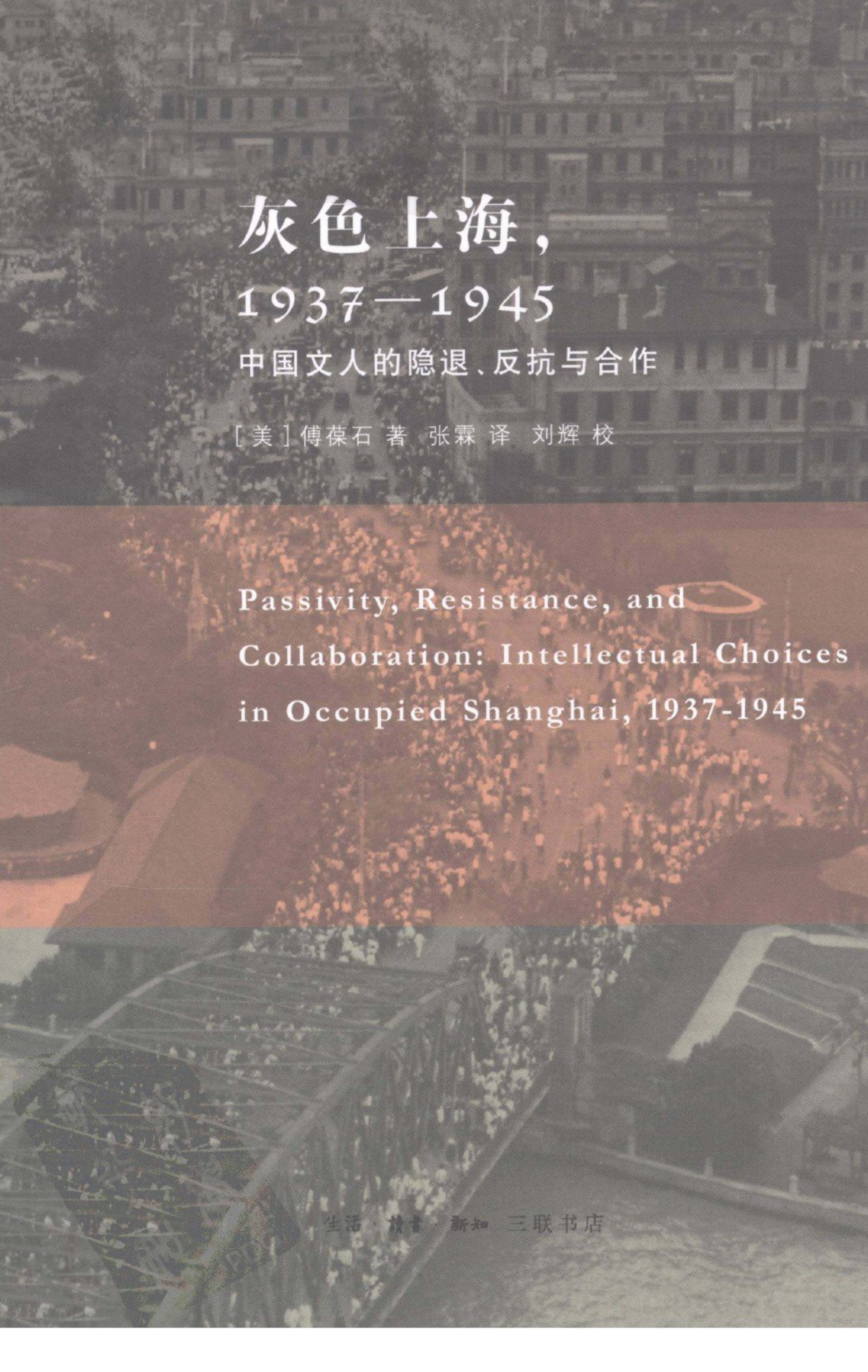




灰色上海， 1937—1945

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

[美] 傅葆石 著 张霖 译 刘辉 校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灰色上海， 1937—1945

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

[美] 傅葆石 著 张霖 译 刘辉 校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灰色上海, 1937~1945: 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

合作 / (美) 傅葆石著; 张霖译, 刘辉校.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8

ISBN 978-7-108-04082-4

I. ①灰… II. ①傅… ②张… ③刘… III. ①知识分

子—社会生活—研究—上海市—1937~1945 IV.

①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5068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8月北京第1版

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6

字 数 189千字 图15幅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35.00元



中译本序

对我这个平凡不过的人来说，1989 年是极不平凡的。这一年，我在斯坦福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接着便顺利获得了教职以及收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送来的出版合同。这便是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由我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1993 年在美国出版。

我读书时，对身处历史大变动的现代文人的生存状态、文化认同和观念矛盾很感兴趣。80 年代初的美国校园，二次大战欧洲大屠杀研究，正好非常红火。我读了很多像 Primo Levi, Elie Wiesel, Aharon Appelfeld 与 Werner Rings 等幸存者传诵一时的作品，深深觉得其中一些论点和视角，特别是否定传统的二元道德对立观，强调个人在面对危机处处、暴力重重的极端处境下的暧昧多义性，有助于重新检视抗战八年中国文人的困境和抉择。

我便开始认真阅读抗战史。自战后以来，国内外的抗战史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甚少触及战时的人文处境，而且不同程度地都受到了冷战意识的影响。抗战中国的政治空间一分为三，研究焦点却集中在国民政府主政的西南大后方（国统区）和共产党控制的西北边区（解放区）。日军占领的沦陷区成了抗战研究的边缘。

我素来对边缘情有独钟，又刚好有一个机会去上海收集资料，于是决定聚焦研究日占时期（包括孤岛和全面沦陷）上海

的人文处境。80年代中，上海开放不久，百废待兴，档案资料不易看到。幸运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正在整理出版“孤岛文学”资料，我得以读到一批当时的文学作品，对这些作家的困境和挣扎有了初步的认识。不过，最大的收获是有缘认识到30年代享誉文坛的作家许杰，以及通过华东师大钱谷融教授的介绍，与德高望重的散文家柯灵先生建立了一段长达三年的鸿雁之交（其中部分书信收录在《收获》上）。两位前辈文人在历史面前胸怀坦荡，无畏无惧地向我述说日本统治下上海的复杂情景和他们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言行深深感动了我，也加深了我对日军铁蹄下求生的中国文人的了解。

我也在香港的几所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些资料。1986年我回到了美国，一头便栽进了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我发掘了很多在当时少为人知的重要史料，包括《上海生活》、《新申报》、《风雨谈》、《古今》和《天亮前的孤岛》等书报杂志。这些资料让我得以重构抗战时期上海复杂多变的历史场景，以及因各种原因未能逃入大后方的中国文人，在日敌高压统治下险狭困顿的生存处境。我运用思想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的方法，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分析，从历史阅读文本，重塑作者的心灵困境和思想挣扎，把当时文人在乱世求生与民族气节的道德夹缝中做出的种种抉择和承担，标出三种主要形态：隐退、抗反与合作，并分别以小说家王统照、戏剧家李健吾，和《古今》杂志的小品文作者群（包括文载道）作为代表。这些作家不是文化名人或是文学大家。他们没有振臂一呼领袖群伦的才情，他们社会资源有限，却因此多了一份亲和感和平凡气。他们代表了日据上海的大部分文人（以及民众）所身处的“灰色地带”。不管他们是大隐于市以沉默宣示反抗，或是不甘屈服参与深藏抗争意味的剧场演出，又或是有愧于心专写远离现实政治的风花雪月，他们的困境和抉择充满了暧昧

性。究竟沉默代表什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究竟有多少话剧观众看懂深藏剧中的反抗意味？究竟谁是汉奸？谁决定谁是汉奸？近百年来中国战乱不断，在沦陷区惨淡求生的中国人负荷了历史的重压，承受了战争的苦难。我们需要以宽容、谦卑的态度重新梳理这段复杂沉重的历史，重新注视他们的挣扎与尊严。

《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是我写的第一本英文书，也是我的第二本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中文书。我非常感谢张霖的坚持不懈，她为了翻译尽心尽力。陈建华多年来对翻译出版这本书非常关心，刘辉了解我的学术思路帮忙修订，他们的友情弥足珍贵。我希望《灰色上海，1937—1945》能为读者带来新知识新视角，答谢大家的美意。

傅葆石

2011年1月

孤島上海

柯灵题

柯灵先生为本书
英文版所题书名

PDG

绪 论

本书研究的内容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侵略时期面临的道德和政治抉择。欧美学界已经对纳粹侵略欧洲时（例如法国的傀儡维希政府）人们的生存处境做出了卓著的研究，同样，中国史学界也对同时期沦陷区人们的生存问题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不论在大陆、台湾还是西方，当前关于中国沦陷区的历史研究都不免有偏隘的政治化色彩。要么是傀儡政府问题，要么是个别汉奸的“迷思”：为什么汪精卫或周佛海要为日本人工作？傀儡政府产生的政治/外交背景是什么？蒋介石和汪伪政府的关系怎样？或争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之间，到底谁领导了抗日战争，谁领导了沦陷区的抵抗活动？〔1〕

〔1〕 关于汪精卫政府的最著名英文研究是 John Boyle 的著作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1972)，这一研究特别重视汪政府对日本的想法及其与日本的关系。也可见 Gerald 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ese War* (Cambridge, Mass., 1972)。在中国大陆，由于汉奸和汪精卫政府与共产党的关系等问题的政治敏感性，相关问题的认真的历史研究直到 1980 年后才得以进行。在开创“汪伪政府研究”这一新领域方面，上海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直到 1984 年，在主编黄美真教授的大力推动下，计划七卷本的汪精卫政府档案资料《汪伪政权资料》中的三卷出版了，其中两卷是由黄美真和张云合编的。基于这些资料和一些还活着的上海、南京的附逆者的个人采访，很多关于汪政府的重要书籍在 1980 年代出版了。比如，黄美真、石源华、姜义华著，《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然而，在台湾，还远远没有关于“二战”期间投降问题的共同研究成就或书籍出现。至于台湾学者对汪政府研究的成

唯一的例外是耿德华（Edward Gunn）的先驱著作《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 - 1945*），提出北京和上海的沦陷区文学独具“反浪漫”的讽刺品质。他的兴趣点集中于沦陷区文学的历史定位问题（另外，书中有大量两地政治状况的介绍），但有关沦陷区文学作品和历史背景之关系则没有涉及。因此，日据状态下上海文化人的道德立场及不同的个人心路历程至今为止仍不为人所知。^{〔2〕}

上海是沦陷区中最重要的文化、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汪精卫政府控制的最大城市，本书关注的中心是上海知识分子的生活，通过理解他们面对日本侵略产生的道德和政治心理嬗变，修正历史研究视野的不平衡。这一研究所考察的，不是历史中一群个别的、难以理解的知识分子；相反，他们代表了理性的知识分子对其历史境遇的自觉把握。换言之，他们的生活和想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中探究沦陷上海的普遍情绪和精神状态。为了突出这一点，我选择了“作家”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能用生动的想象把自己的情感和内在

（接上页）就，可见陆宝千著，《论汪兆铭之叛国事件》，载《抗战救国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5，939—960页。

- 〔2〕 在上海，与历史学家对于附逆合作的新兴趣相应，文学批评家业已开始对沦陷文学有所关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已经成为这一研究行列中的主要力量。尽管目前尚未有系统的上海沦陷文学研究出现，但两部非常有用的研究资料集：《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和《上海孤岛文学选编》已经出版，题名为《上海孤岛文学资料丛书》的多卷本科项目的卷2和卷3也将分别陆续出版。这些资料只涉及那些被中国共产党称为“同志”（如阿英和于伶）和“朋友”（如郑振铎和柯灵）的反抗者，那些与中共无甚关系的作家则被略去不谈。另一方面，在台湾，研究东北文学的学者刘心皇已经出版了两本关于战时中国的附逆文人和抵抗文人的书籍，尽管这两本书内容非常翔实，但基本上是沿着狭义的“爱国”分界进行分类的资料汇编，而且其道德和意识形态色彩过于强烈。

感受清晰地表达出来，并给人以美的享受。由于深受文以载道传统的影响，危机时代的作家们自视为中国的良心和痛陈民众疾苦的道德精英。因此文学作品成为一种介质，使我们能够探究沦陷上海发生的人情冷暖。^{〔3〕}

1937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的三个月战争后，上海落入日本手中，直到1945年8月15日才得以解放。这座城市的沦陷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到1941年12月，第二阶段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这一分期取决于上海的空间政治结构的变化。上海位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黄浦江向东流入长江口。这是一座华洋杂处的城市，由华界和外国租界两个区域组成，由不同的政府管理，行为依据各自的法律，并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水平。

因为西方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自称中立，所以其管理下的上海外国租界（英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保存完好。而上海的华界（由320平方英里组成上海特别市政府，包括江湾、闸北、南市、杨树浦和浦东）及其腹地在1937年11月被日本占领。这座外国租界组成的小城，北至苏州河（仅距日占区55米左右）、向南以南市徐家汇为界、西至无明确分界的越界筑路区，虽不足10平方英里，却为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逃往英属香港或无法进入未占领地区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这个由外国提供的避风港通常被称为“孤岛”，即被占领大都市中的

〔3〕 关于中国作家的社会角色的讨论，见 Rudolph Wagner, “The Chinese Writer in His Own Mirror: Writer, State, and Society - the Literary Evidence,” 收入 Merle Goldman、Timothy Cheek、Carol Harmin 编,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1987), 183—232 页；另见 Ezra Vogel, “The Unlikely Heroes: The Social Role of the May Fourth Writers,” 收入 Merle Goldman 编,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Cambridge, Mass., 1977) 145—160 页。

一个享有特权的地区。与“二战”期间同样经历过沦陷的欧洲和亚洲其他城市相比，“孤岛”上海拥有了特殊的体验。但必须说明的是，尽管“孤岛”摆脱了日本直接（和间接）的控制，自由表达的空间仍旧是有限的。在整个沦陷时期，这座城市卷入日本特务部门和国民党地下机构所操控的黑社会恐怖活动中——暗杀、绑架、敲诈勒索，爱国者与汉奸的生活都很危险。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孤岛”消失，上海的这一局部沦陷的情况很快就被打断了。

偷袭珍珠港之后的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上海外国租界。自1843年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来，全城再次被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然而这次却是异族的统治。这次统治带来了沉痛的后果，全面镇压和银行倒闭使上海变成了人们所说的“黑暗世界”。这一情况直到1945年8月14日下午，南京路跑马场广播裕仁天皇投降之后才得以改变。

八年沦陷中，上海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置身于个人生存与公共道德的两难抉择中：一方面是活下来、照顾家庭、追求自我利益；另一方面是爱国责任和尊严。大多数留守上海作家为苟活在敌人统治下而感到羞耻，他们恨自己未能背井离乡，没能到经济落后的自由内陆地区去应对新的不确定的生活，这一道德困境深深地折磨着他们。他们应该继续妥协吗？他们怎样才能在日本的侵略下逆势而动，维护人格和爱国理想？要是妥协不可避免，他们又该做什么？

在战后中国，日据时期的各种道德选择被简化为界限分明的两极，类似摩尼教的世界——英雄对抗恶棍，无私反抗者与无耻汉奸的斗争。然而事实上，沦陷上海种种道德选择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不同于这一简单的模式化观念。在极端的恐怖中，只有模糊暧昧的反应才是自然真实的，这就是普里默·莱维（Primo Levi）所谓“灰色地带”（grey zone）的生存方式：

软弱、不可避免的行为不一致，甚至某种程度的妥协，还有尊严和道德勇气，这种状况是任何一个试图面对敌人而幸存下来的人都经历过的。^{〔4〕}只有少数的上海作家公开反抗，但他们同样经常害怕、犹豫和动摇。相反地，许多附逆文人在战争后期始终生活在良心的责备和悔恨中。故此，本书主张将知识分子在日本占领中的“灰色地带”分成三种模式，以取代战后的二元模式化观念。

仿效传统文人在历史上道德与政治动乱时代的三种行为——“隐”、“忠”、“降”，^{〔5〕}沦陷上海的作家们做出三种反应：消极抵抗、积极反抗与附逆合作。每种选择都代表了一种哲学理念、一种人物原型、一种历史对比，都源于个人生存和爱国理想的两难抉择。这一历史回响不应该被解读为“历史的倒退”或者“传统的复活”。相反，它是阐释学上的对话——即过去与现在的相互交流。换言之，两个时代间的融合意义大于对立的意义：现在被过去的光所照亮，而过去又只能根据人们现在所共有的忧虑和设想去理解。事实上，沦陷上海出现的这三种传统反应模式具备了后“五四”文化语境中独有的意识形态意义。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人为的建构并非历史的真实。这三种模式仅仅是启发性的概念和描述性的分类，它们并不能穷尽沦陷上海知识分子在选择上的模糊性。有益的一面是，三种模式有助于避免战后的僵化道德观念，不至于陷入愚忠和是非

〔4〕关于“灰色地带”见 Primo Levi,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Raymond Rosenthal 英译, New York, 1989, 特别是 36—69 页。

〔5〕这些类型在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关于明清之际的研究《洪业》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2 卷本, Berkeley, 1985) 中有精彩的论述。

不分的后结构主义式的错乱中。通过一些文学作品的考察，减少刻意的人为区分、填补历史空白——如同萨义德（Edward Said）所形容：“仿佛存在于一个抽离历史时空的文本世界里。”〔6〕要了解人的特定角色，应面对其形成的特殊历史困境，即充满困扰和道德不确定性的情境，我的三分法不仅使价值判断成为可能，而且敏锐地保留了莱维所提到的异族统治下反应的复杂性。

为了能够平衡道德判断和历史相对论两个方面，三分法能够最灵活地分析知识分子，提高我们对于所谓道德模糊“灰色地带”的认识。可以据此推论，许多作家选择隐遁的生活协调个人生存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冲突。消极隐退成为他们一种象征性的抵抗态度，一种不用牺牲太多理想就可以保存性命的“有尊严生存方式”。而另外还有一小部分积极反抗者，能在“忠”的英雄传统下不顾个人利害为民族气节而战，进而呼吁大众的觉醒。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虽然这种态度也无法保证言行统一）。而另一方面，许多附逆文人则想办法减轻他们的道德负罪感。他们强调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把自己描绘成遗民，以与现实完全矛盾的生存方式，在怀古中表达他们感情的疏离。这样，在消极抵抗者选择退隐以保全人格

〔6〕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1983, 39 页。关于后结构主义者对于战时通敌的研究，见 Vicente' Rafael, "Anticipating Nationhood: the Philippines Under Japan"（未刊论文，1990），尽管我不同意后结构主义的去政治化倾向，但它那扬弃了理论上的过度一体化（over-totalization）和与之相关联的普世超我观（transcendental ego）的世界性视野（cosmopolitan），肯定各种生存状态的具体多元性，对于学术研究是大有裨益的。见 Mark Poster,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structuralism: In Search of a Context*（Ithaca, N. Y., 1989）的相关主题；也可见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l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收入 *Social Theory Today*, A. Giddens 和 J. Tuner 编（Stanford, 1987），195—223 页。

的同时，积极抵抗者则以道德的反抗界定人性，而附逆者则辩护他们想要活下去的意愿是人之常情。

在本书中，知识分子的这三种反应，分别以作家兼诗人的王统照（1897—1957）、戏剧家李健吾（1906—1982）和一群在附逆杂志《古今》写作的散文家为例说明。他们在沦陷上海的经验勾勒出这一研究的叙述框架。本书的序言是对沦陷前夕上海知识分子生活的介绍，描绘1937年8月到11月淞沪会战期间知识分子的激情和挫折感。全书主体内容分为三个章节，每一章节论述一种沦陷时期的反应模式。每一种作家体现出知识分子选择的复杂性和模糊性，象征性地展示了沦陷上海的生活。

这一传记式的研究方式颇具典型意义。之所以选择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派，并非由于他们在哪些方面上有多少突出的成就，而是因为他们 在沦陷时期的生活经验具有知识分子不确定性的典型特点。他们中没有谁是绝对的无私或者无耻，也没有哪一类能左右了沦陷时期的政治图景。王统照的消极是一种爱国反抗的表达，其背后隐藏着自我隔绝和政治逃避的潜台词；李健吾的生活充满了学术追求和反抗的冲突，他坚持以剧院的艰苦生涯作为抗敌斗争的阵地，而戏剧也成为当时沦陷后期最重要的抗日文艺形式；另一方面，《古今》的散文家们既拒绝对沦陷当局的颂扬，却又享受妥协所带来的回报和特权。因此，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们所代表的正是在黑暗的沦陷时代下，为了生存而导致的道德模糊“灰色地带”。

我选择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派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们从事着不同形式的写作：散文诗、短篇小说、现代戏剧和抒情随笔。这些文学形式的风格和意识形态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消极抵抗者耿济之也可以是剧作家，积极抵抗者柯灵

也会在随笔领域一试身手，但是不同文学形式中的批评方式最能体现作者的道德和政治选择，也为我们理解沦陷状况下上海知识分子的生活提供了特别的维度。

走笔至此，已表明了我对战时文学的态度，研究文学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性象征活动”入手的，文学作品成为对特定历史情景的表现和象征方式。^{〔7〕}通过对特定历史背景下文学作品的定位，我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成为对相关历史的重建，确定作品生产的“相应历史情景”。这种情景包括写作和出版的社会政治条件、作家的生活和（自我）感知，写作过程中设定的价值观念、历史和文学的再次描述及其艺术创作时特定的人际关系网。^{〔8〕}

这一阐释方式与我们对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认识相吻合。这些文学作品多具有伪装的外表，藉此躲避可能的政治迫害，而伦理主题、政治弦外之音、个人（甚至自传式的）的痛苦体验成为其主要的形式特征。当然，对大多数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作家来说，文学语言微妙的象征性和符号化特点精确地描述出当时局限的“社会空间”，如同詹姆士·司各特（James Scott）所说，在侵略强权下的空间中，“不公开的异议”是能够被安全地表达出来的。如同下文将要讲述的，这些异议不仅仅出现在公开反抗敌人的作家作品中，而且也出现在一些附逆文人的作品中，拒绝自己的文字沦为宣传工具。因此，在本书中贯穿着我的一个有效的假设，那就是本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应当被视作“潜文本”（hidden transcripts），是婉转的表达“经

〔7〕 见 Frede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 Y., 1981, 1—82 页。

〔8〕 见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1983, 特别是 1—53 页和 158—225 页。

过掩饰的思想反抗”，是面对恐怖和死亡时呈现出的一种“遮蔽的批判方式”。总而言之，这一反抗和妥协的复杂性所展现给我们的就是日据上海知识分子的选择模糊性。

目 录

中译本序

1

绪论

1

序言 沦陷在即

1

第一章 隐退：王统照和“抵抗的启蒙观”

25

第二章 反抗：李健吾的戏剧抗争

85

第三章 合作：“《古今》派”的遗民文学

141

结语

205

参考文献

218

译后记 张霖

236

新
平
社
解
讀
PDG

序言 沦陷在即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中国业已到了民族危机的时刻，国内局势正是“内忧外患”一词的写照：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内战，日本加速侵蚀东北。国民政府一方面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缓和政策，另一方面为集中兵力对付共产党，再三在领土问题上对日本做出让步。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不赞同这一做法，认为在战场上赶走日本侵略者才是结束民族危机的唯一方法。

自 1931 年 9 月“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关东军占领满洲，紧接着在 1932 年 3 月以武力和阴谋手段建立了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傀儡政府，这一系列事件使中国城市知识精英的反日爱国热情迅速高涨。他们抗议国民党软弱的对敌政策，数以万计的爱国学生在 1935 年“一二·九运动”中来到北京天安门示威，以最强烈的表达方式请愿，要求全力以赴抵抗日本侵略。^{〔1〕}学生的反抗迅速在其他主要城市得到响应。国内各地的知识分子为学生们的勇气所鼓舞，联合工商界和工人阶

〔1〕 有关“一二·九运动”的讨论，见 John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1966。

层组成救国会，为发动民族保卫战而向政府施加压力。1936年5月，来自全国18个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70名代表聚集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大楼，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协会”，发表宣言批评国民党所继续推行的内战方针，呼吁各党各派停止军事冲突，组成“强有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2〕}

为了遏止这股高涨的主战的民族主义潮流，蒋介石政府的镇压活动日渐加强。这一暴行主要针对新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协会”中七位坦率直言的领导者——沈钧儒、史良、王造时、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和李公朴。他们曾在鲁迅的葬礼上组织反日群众大游行。游行队伍经过上海市中心，对设立在沪西、浦东、杨树浦的7个日本纱厂的5万工人的罢工给予了支持。此后不久的1937年11月，七人因强烈抗议政府而遭到逮捕，当时的报纸称他们为“七君子”。^{〔3〕}不过，这一对峙因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戏剧性地绑架而得以缓解。同样具有戏剧性的是蒋介石的获释为国共之间稍后建立第二次统一战线铺平了道路。1937年7月“七君子”获释，象征两个夙敌紧张关系的缓和。最终，这一结果为中国带来了共同抗日的契机。^{〔4〕}

〔2〕 出自 Lyman 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1967, 68—69 页；深入了解这一运动，见沙千里，《漫话救国会》，北京，1983，1—15 页；也可见 Parks Coble Jr.,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al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 Cambridge, Mass., 1991，第8章。

〔3〕 沙千里著，《漫话救国会》，30—35 页。也可见唐振常编，《上海史》，上海，1989，717—726 页，和《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集》，上海，1987。

〔4〕 Lyman 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92—180 页。

淞沪战役

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的战役成为中国八年抗战的序幕。对知识分子而言，这场战役同样给他们的心灵带来了惨烈的冲击。^{〔5〕}淞沪战役从闸北工人区开始，当时日本海军陆战队欲跨过淞沪铁路攻击在北站附近八字桥和宝山路驻防的中国军队。战斗迅速向江湾、浦东、杨树浦和虹口（又称“小东京”，日本侨民聚集区）蔓延，数百万战区平民涌向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区寻求避难。正如《字林西报》的通讯员罗德斯·法莫（Rhodes Farmer）亲眼所见，战争之初民众大批逃难的场景相当令人恐惧：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次长途跋涉是如此悲惨……密集的人潮缓慢地蹒跚前行，人群被冷酷地向前推，好像往牙洞里填东西一样。前面传话回来说，带刺的钢丝圈和日本的岗哨封锁了所有通往上海的道路，只留下外白渡桥，以至于这二十码宽的渡口下的苏州河成了一条垃圾泛滥的河流。正午的骄阳无情地照耀着，这还是大暑节气……人群以蜗牛的速度向那座生命之桥推进。我的双脚在血泊中打着趔趄。有六次，我知道我踩在那些被人潮吞没的孩子和老人的身体上，他们已经被无数的脚踩扁了。一群海军陆战队员和日本浪人站在远离外白渡桥的两边的日本岗哨

〔5〕 目前，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已经被正式认可为抗日战争的开端之日。而许多当事人证明，在那时看来，“卢沟桥事变”和“九·一八事变”一样，都是一个地方性事变。直到上海爆发持续战争的时候，观察家们才得出结论，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证据见，张一望著，《沦陷前后的上海》，汉口，1938，1—58页。

上。他们中的一个人用刺刀挑起一个老人，把他抛到了河里。^{〔6〕}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逃往上海市区的难民们等来的却只有死亡。8月14日星期六，上海遭到台风袭击，日军旗舰“出云”号停泊在正对着外滩的黄浦江上。一架没有完成炸毁“出云”号任务的中国轰炸机，在返回途中出于绝望将炸弹投到租界区。头两枚炸弹击中了位于公共租界商业区的外滩和南京路拐角处的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700余人当即毙命。

在街角处，躺着一个被炸得身首异处的印度锡克教警察，他的手臂伸着，好像还在指挥交通。

黄色的、浓重的炸药烟雾正在缓慢地消散，显露出（南京）路上的恐怖景象。火苗从燃烧的汽车上蹿起来，把被打得满身窟窿的车主尸体烧成灰烬。在华懋和汇中饭店的门口及其辅楼处，无数死伤难民被胡乱地堆积成山，他们蓝色的苦力衫渐渐变成了红色。头、胳膊、腿和被炸毁的躯干离得很远。两边的建筑、人行道、汽车道上，长长的一段路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尸体。

我始终能闻到一股又黏又甜的血腥味儿，那味道如此浓烈，甚至于我几乎能尝到它。^{〔7〕}

〔6〕 Rhodes Farmer, *Shanghai Harvest: A Diary of Three Years in the China War*. London, 1945, 42—43 页。

〔7〕 同上书，46 页。

另外两枚炸弹落在挤满难民的法租界虞洽卿路和爱多亚路交叉路口——也就是大世界游乐城外，凑巧的是这里在一天前刚改做难民营，因而导致了多达 3000 余人的更为惨重的伤亡。这景象仿佛人间地狱，到处“血流成河”，到处堆着从烧焦的、炸烂的尸体上散落下来的手指、胳膊、腿和人头。沿路都是被毁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让上海好几天都像一个“停尸房”。如一个法国救援工人所说：“那以后的一个星期我都无法进食。”^{〔8〕}8月14日就是著名的“血腥星期六”，它彻底粉碎了租界区会刀枪不入的神话。^{〔9〕}上海被卷入了一场全面的战争，谁也无法逃出它的魔爪。

当时，大多数上海人认为这些轰炸是在闸北、虹口和杨树浦的巷战中失利的日本人犯下的恶行。在战争的前两周，用大刀和手榴弹武装的中国军队曾多次迫使敌军退回江边，但只因日军战舰的炮火控制着黄浦江，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为了打赢这场战役，日军不得不改变战略。8月23日，在松井石根大将的命令下，大批援军抵达上海，他决定利用日军

〔8〕 Harriet Sergeant, *Shanghai: Collision Point of Cultures, 1918-1939*. London, 1991, 301 页。

〔9〕 许多学者认为（正如当时在外国人的小圈子流传的那样）爆炸并非偶然。相反地，是蒋介石命令飞行员轰炸租界，其目的是要把美国卷入抗战，而美国除了对日本的无故侵华表示谴责以外，并不想卷入中日冲突。见萨金德的著作。关于外国势力的态度，见入江昭（Akira Iriye），*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New York, 1987）。外国租界曾得到过“刀枪不入”的美誉，因为在全国的几次民族危机中，比如 1850 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时华人第一次涌入租界，1911 年的辛亥革命等等，租界都能幸免于难，甚至保持繁荣。甚至在淞沪战役前夜，外国商会仍然以为，就算是开战，战争也只会限制在华界。见 Marie - Claire Bergère, “The Other Shanghai: Shanghai from 1919 to 1949,” 收入 Christopher Howe 编, *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 Metropolis*, Cambridge, 1981。

的海、空优势，从杭州湾和吴淞江方向包围上海。9月初，随着日军在狮子林、炮台湾和吴淞登陆，战争前线从闸北一路上至浏河，向北延伸了40英里。日军的飞机和战舰不断地轰炸前线；届时已有20万日本海军加入战斗。为抵抗日军，除2.5万德械师的精锐部队外，50万装备简陋的中国士兵（蒋介石和顾祝同领导下的第三战区）英勇奋战，死守防线；即使在失去战略要地（如罗店和宝山）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利用日本海军炮火没那么密集的夜间，以白刃战的方式夺回阵地。尽管如此，日军还是在10月下旬跨过了吴淞江，拿下了位于江湾和闸北西北的仅有8英里的一个战略小镇——大场，中国防线被突破了。防御上海的最后时刻到来了。11月5日，日本第10军战舰分队在杭州湾的金山卫、全公亭和金丝娘桥三处策划了突然登陆，进而包围了法租界和华界的分界线——南市。上海腹背受敌，于11月12日陷落。

尽管中国的英勇抵抗失败了，但淞沪战役也粉碎了日本在中国速战取胜的妄想。与日本所夸耀的可以在几个月内以30万军队就拿下整个华北不同，日本被迫动用25万军队和数百架战机和战舰才拿下上海前线一地。^{〔10〕}

〔10〕 本书关于战争的叙述根据宋瑞珂著，《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实》和顾高地著《我所知道的八·一三战役片段》，《抗日风云录》（上下），上海，1985，下，34—73页和74—90页；《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1987；Rhodes Farmer, *Shanghai Harvest*, 34—95页；和《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1986，3—98页。正如Farmer所叙述，1937年日本公报报告，在10月25日到27日两日间，“850架飞机在前线投下了2526枚炸弹，百万难民流离失所”（78页）。当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金山卫之际，他们在小镇中无恶不作，进行了三天的肆意烧杀抢掠，而且，在他们去南市的途中，在相邻的罗店村，杀害了2244名村民。

救亡工作

开战初期，当子弹与流弹弹片横飞的时候，当巴士和电车贴着号召支援抗战的海报通过上海市区主要街道的时候，当苏州河对岸的中国士兵正狠狠打击侵略者而侵略者无休止地轰炸将华界变成一片废墟的时候，一个英雄主义的新时代似乎在中国渐露曙光。这一令人振奋的情绪被小说家巴金记录下来：

那第一声炮响是我盼了许久的。它终于意外地走来了。许多朋友在那天早晨感动得疯狂似的跳起来，称这为“神圣的炮声”……上海的炮声扫除了无数人的疑惑。有人甚至想大翻身的时候到了。打碎镣铐争取自由，这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我们居然活到了这一天。以前的一切顾虑束缚都没有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大街上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仅用口，而且用行动来表现这个意思。^{〔11〕}

上海知识分子的言谈和行动都有了更大的舞台，他们从敦促军事行动迅速转变到支援全民抗战。用词从“救亡运动”改为“救亡工作”，语言的转变上可以看出他们重新界定了自己的活动——这意味着救亡活动已从言语的争论转向了实际的行动。这种转变带给知识分子价值感和力量感，在民族危机的时刻重新树立精神的信念——而这正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知识分子们一直寻觅的。他们从疏离和自我怀疑中“解放”出

〔11〕 巴金著，《控诉书》，福建，1985，45页。

来，他们的救亡工作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框架中得到承认，这一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国民党政府要求的，或至少是国民党政府所容许的。

1937年8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要负责动员后方支援上海周边军事行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工作要求后方地区完成，包括出版宣传品，为前线筹款、募捐、慰劳伤病员，以及为城里的数十万战争难民提供救济。为了负责这些工作，国民党上海党部重组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而该组织之前正是为了纪念战争开端的“卢沟桥事变”在1937年7月成立的。新后援会联合了各种社会背景和政治色彩的活动家，由上海国民党部门政要和商界领袖共同控制，^{〔12〕}总部设立在保持中立的租界区，组织结构呈伞状，其下各种委员会（如筹募、防护、供应和宣传）管理着上海的500多个政治、社会团体。^{〔13〕}作为上海全市最大的救亡组织，后援会的宗旨是指导民众战争工作的方向，重点在两个领域：为前线提供军需和为伤兵提供医疗服务。^{〔14〕}凭借其“半官方”的优势，后援会变成一个中介组织，协调各抵抗团体和租界当局的关系，领导租界内的抗日活动。例如，上海工部局曾要求所有在公共租界的政治团体在1937年10月之前登

〔12〕“后援会”的主席团由九位委员组成，其中的两位是潘公展和童行白，他们是国民党部门政要。另外七位是与中国总商会和上海市地方协会有交往的商界领袖，包括杜月笙和钱新之。见《档案与历史》卷1，第3期（1986年3月），2页。

〔13〕所有的成员团体在登记之前必须填写申请表。表格内的问题，像成员数目，以何党派或政府组织登记，见《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第7994号（1937年11月）；“后援会”的组织结构和政治重要性，也可见吴开先著，《抗战时期的杜月笙》，《大成》，167期（1973年10月），15—16页。

〔14〕姜豪著，《上海市各界后援会概要》，收入《抗日风云录》（上下），上海，1985，上，239页。

记，而后援会就告知这些团体不要理会这个规定，并以他们已向中国政府登记为由提出抗议。而且，当后援会了解到上海工部局意图在11月初加强抵制抗日宣传，它号召所有成员“在法律和秩序允许的范围内”继续宣传工作。^{〔15〕}总之，正是通过后援会这一渠道，上海大量的民族救亡工作才得以进行。

1937年7月29日，国民党组成了一个新的协会，招募知识分子加入宣传工作。这就是作为后援会附属组织的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文协”）。该组织的83位理事中，有作家茅盾、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国民党官员潘公展和电影制片人周剑云。9月，该组织自称拥有121位文化名流和大约5000名知识分子。文协的组织结构类似于后援会的等级制：当它对募捐的目标做出决议的时候，每个成员就要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给定的份额。大部分成员来自战前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救亡团体。^{〔16〕}其结果是，尽管文协是国、共两党分享权力的统一战线组织，但从基层看实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家所主导的团体。比如，文协的机关报《救亡日报》牢牢控制在共产党作家手中，他们成功地将这份报纸转变为政治论坛。新闻编辑夏衍、阿英和巴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机关的干将，他们规定，报纸将不刊登来自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的官方新闻；取而代之的，它要扮演公众监督的角色，着重在政治揭露和文学批评上为活动家提供指导，并达到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使之坚持抗日的目的。^{〔17〕}

除了出版，文协投入极大精力组织艺术家和学生戏剧团体

〔15〕《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第7994A号（1937年11月）。

〔16〕同上。

〔17〕夏衍著，《记〈救亡日报〉》，《新闻研究》，卷3（1980年5月），23页。

在上海街头、难民区和医院演出，宣传支援抗战。9月，两个慰问服务团组织了25位青年艺术家访问前线（由著名作家郭沫若带领）。而且，共有13个剧团通过文协建立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领导人是于伶。^{〔18〕}

这些戏剧被恰当地称为“街头剧”，它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种实验戏剧形式，用来传播民族救亡的信息。它们都很短小，一般由一段情节组成，只需要简单的道具和几个演员。由于这些戏剧针对的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平民，因而传达的信息都非常直白。作为战争宣传，这些戏剧都劝诫人民不要忘记日本侵略者对国家的蹂躏，不要为了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沦为汉奸。他们对观众大声疾呼，不要再幻想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得以自保。没有人能够如此。演员几乎不化装，只穿简单的戏服，很难把他们和观众区别开。这种戏剧形式加强了观众和“舞台”之间的互动，表演也带有直接感，这是正式的剧场演出所缺乏的。^{〔19〕}

最著名的街头剧是《放下你的鞭子》，是共产党作家陈鲤庭在1931年创作的一部独幕剧，旨在动员上海工人革命。1932年到1937年间，为适应抗日宣传的需要，许多左翼戏剧家（包括崔嵬等）成功地修改了该剧。这场戏的场景非常简易：一个老头为了强迫她的女儿在街头卖唱谋生，扬起了手里的鞭子，她哭着哀求。一个青年工人从观众中走上前来，大喊：“住手！放下你的鞭子！”父亲的脸上流下了羞耻的泪水，他声嘶力竭地解释道，他们是在东北沦陷后逃到关内来的难民，没有别的办法谋生。青年人而后转向人群，喊道：“穷朋

〔18〕 唐振常编，《上海史》，782页。

〔19〕 关于“街头剧”的生动描写，见杜云之著，《回忆抗战时期上海的话剧》，《大成》，第3期（1973年2月），44页。

友，咱们‘不打不相识’。现在既然在这儿碰头了，咱们就得一伙儿去，向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人算账去——这才有我们的生路！”当观众中有人怀疑中国军队实力的时候，青年人就回敬他：“拳头也是我们的武器呀！……只要大家齐心，团结起来，这力量比什么都大。”在这个时刻，观众如此感动，也加入了演员们，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20〕

舞台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情感认同使街头剧成为上海三个月激战中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宣传方法。当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上海及其郊区大批戏剧团体普遍地积极演出，也是街头剧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据原始资料记载，在三个月的战争中共出现了110个戏剧团体。〔21〕鉴于大多数新剧团缺乏经验，文协派出短期顾问帮助他们提高组织和表演能力。〔22〕总之，文协是知识分子参与救亡工作的神经中枢。

在后援会的监督和协调下，很多名为“救国会”或“战地服务团”的抵抗团体被派往后方服务。其成员有不同的职业背景，有的团体由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人数大概在30人到1000余人之间。〔23〕其他的团体包括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来自商业或实业公司的白领职员（如银行雇员、公用事业的技术员等等）、教育家和公务员，以及按职业组织起来的作家和演员

〔20〕 田汉著，《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经历和展望》，《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上下），北京，1985，上，3—12页。剧本见《生活知识》2，第9期（1936年9月）。这个戏剧有许多版本，内容稍有不同，变化通常在每次演出中形成。

〔21〕 于伶著，《默对遗篇吊阿英》，21页。

〔22〕 《救亡日报》，1937年10月19日。

〔23〕 例如，飞轮救国团（45名成员），属文化界救国戏会，成员多为学生，各领一部脚踏车，四出查奸商；民众救亡演讲团（31名成员），其成员大多数是高中教师和大学生。见《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第8039A号（1937年10月）。同时，上海教育界救亡协会，其成员800余人，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有40个团体成员。见唐振常编，《上海史》，784页。

(如电影业、京剧业和报业)。如上所述,他们的活动彼此相仿,并且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方针。有两个实例可以证明这一点。

蚁社,成立于1936年,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左翼色彩的有力的抵抗组织,隶属于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由1000余名在校大学生、青年白领工人和商店雇员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文协的成员。在上海之战中,蚁社的工作始终以宣传、难民救济、慰问伤兵和为前线募捐为中心。比如,由李伯龙和共产党员张庚领导的蚁社通俗剧团“蚁队”及其著名作曲家冼星海领导的合唱队,曾在周末访问急救医院和居民巷弄,表演街头剧和演唱爱国歌曲。9月,许多蚁社成员自发组成流动剧团,把宣传带到内地。^{〔24〕}同月,据《救亡日报》报道,蚁社在租界筹备建立两个难民中心,活动家们在此组织识字班和布置难民服务工作。而且,蚁社还为前线下来的伤兵建立了一所有50名医务人员的医院。通过文协和军队上层的安排,蚁社主办公众人物的演讲和讨论来鼓舞士气,还为前线募集14000件冬衣和上千件急救包。^{〔25〕}

青年救国服务团,也是一个巨大的抵抗团体,共有2000名成员,宣称其宗旨是“动员各行各业的青年投身战时服务”。^{〔26〕}该组织的领导成员与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有联系,因而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凭借这一关系该团体能进入前线,否则青年志愿者难以进入封锁的前线。10月,该团体派遣了约660名成员建立防御工事,向后方运送伤员。^{〔27〕}另一方面,在上

〔24〕《救亡日报》,1937年10月19日。

〔25〕同上。见唐振常编,《上海史》,783页。

〔26〕《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第8039A号(1937年9月)。

〔27〕《救亡日报》,1937年10月15日。

海，该团成员致力于筹集捐款和进行反日宣传。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中的一些人深入到舞厅、妓院和电影院向客人们募捐。他们也在不同的难民中心上演街头剧，以劝告观众不要见利忘义。他们挨门挨户分发小册子，号召抵制日货，抓捕叛徒，提醒上海市民保持警惕。在晚上，他们成功地拘捕可疑分子，并把这些人直接送给中国官方，而不是送给对叛徒过于宽大而遭到诟病的租界警察。^{〔28〕}

除了日常的慰问和医疗服务之外，后援会和文协还在许多纪念日发起各种宣传活动。后援会的大部分活动不免让人有政治仪式之感，好像这些活动就是为了表露对国民政府的忠诚，并号召上海市民支持政府的战时政策。例如 1937 年 10 月 10 日，日军越过吴淞河、攻占大场才三天，后援会发起了一个“和平示威宣誓仪式”，纪念二十六周年国庆。据租界警察情报报告，参加示威的有千余人。^{〔29〕}

这次示威就是一个精心安排的活动，期间几乎没有暴力和混乱发生。当天夜里 12 点，在公共租界通往外滩最繁忙的南京路和西藏路交叉路口的高楼大厦上，高音喇叭广播着国民党的赞歌和本地政党要员的讲话。该官员敦促公众以抵制日货和认购国民党发行的“救国公债”的方式宣誓效忠。广播一开始，就有数百名早就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大楼附近的参加者，逐字逐句地重复广播讲话。当广播停止的时候，一个由 18 辆出租汽车组成的队列驶到抗议人群的站点附近，从这些汽车里冒出许多青年人，他们每人挥舞国旗，分发小册子并高呼抗日口号；与此同时，抗议人群也高唱爱国歌曲，而后这些人转眼就

〔28〕《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第 8038A 号（1937 年 11 月）。

〔29〕《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第 7994A 号（1937 年 11 月）。

消失了。路人也被这爆发的爱国激情所感染而加入进来，高呼口号。所有的这一切只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巡捕房迅速施行逮捕，然而示威者和旁观者都已散开了。^{〔30〕}此类政治仪式很多，但对动员平民积极抗战则鲜有作用。

文协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宣传运动中表现得更加敏锐和富有思想性。他们更清楚文化的象征力量，指出了当前的民族抵抗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他们把历史上的类似事件编纂起来，构成坚贞的革命神话，并藉此有力地支持他们的观点。历史上的日期和名称都被转化为一种符号，被赋予了民族国家的象征意义。过去与现在融为一体，呈现出中国为民族解放而不懈斗争的想象图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和作家鲁迅的逝世。

比如，同样在1937年10月的国庆节，包括《救亡日报》、邹韬奋编辑的《抗战》三日刊，及由茅盾和巴金编辑的《烽火》在内的文协有关出版物，都发行了纪念特刊。所有的撰稿者一致认为，自1911年推翻满清以来的这二十六年是悲惨的“国耻”时期，数千烈士为保卫国家的独立而战斗，但他们都失败了。现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正是要实现烈士们未完的使命。^{〔31〕}

作家杨东莼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象征意义。他在《文化战线》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对现代中国而言，辛亥革命乃好坏参半之事。尽管它没能将国家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罪恶中拯救出来，但是，它已经成功地开辟了一个

〔30〕《救亡日报》，1937年10月11日。

〔31〕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简要叙述之例证，见郑振铎著，《武昌起义的故事》和潘汉年著《从辛亥以来的抗日运动到今天的全民抗战》，《救亡日报》，1937年10月10日。

英雄革命理想主义的时代。杨认为，这种理想主义为创造自由独立之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事实上，在杨看来，包括北伐（即1926年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反军阀战役，它在1927年为中国带来了名义上的统一）在内的历次革命运动之所以流产，就是因为没有能够发动大众。而现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它要么变成能让日本帝国主义者偿还43年血债的“巨人”，要么亡国灭种。杨宣称，中国生存的关键就在于民众动员，正如孙中山在1911年后反复强调的那样。^{〔32〕}

鲁迅是20世纪最著名的中国作家。1936年，在他葬礼上所发生的大规模的反日抗议就是另一个象征性的文化抗争案例。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郭沫若和郑振铎号召上海的文学界为发扬鲁迅的精神遗产而出版纪念书刊、组织公众集会。为了形成宣传攻势，文协颁布了被称作《鲁迅逝世纪念会宣传大纲》的文件，把鲁迅的一生描绘为从一个反封、反帝的战士到一个积极的抗战支持者的艰苦历程。^{〔33〕}据该文件记载，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前，鲁迅是一个反对封建礼教的斗士，并相信封建礼教是中国奴性的内在根源。1931年后，鲁迅变成一位号召以武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忠诚爱国者。那么，鲁迅最卓著的遗产不仅是他的爱国主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不妥协精神”。鲁迅因他对中国道德的不懈批判而得到赞誉。他将永不放弃反帝、反封的战斗，直到

〔32〕 杨东莼著，《纪念辛亥革命与当前的抗战》，《文化战线》，第5期（1937年10月），9—11页。

〔33〕 见《救亡日报》，1937年10月18日。关于中共在战争中官方所创造的鲁迅崇拜的系统研究，见David Holm, “Lu Xun in the Period of 1936-1949: the Making of China's Gorki,” 收入 *Lu Xun and His Legacy*, 李欧梵编, Berkeley, 1985, 152—179页。

敌人屈服为止。所以，即使中国缺乏大炮和飞机，但文协作家们坚持认为只要像鲁迅那样不懈地战斗，就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因此这份文件在最后号召所有中国人学习鲁迅的“不妥协精神”，以赢得抗战的胜利。^{〔34〕}总之，鲁迅与辛亥革命成了象征系统，其核心是强烈的乐观主义，只要民众被动员起来，中国必将取得战争的胜利。

然而，乐观主义很快就被失望情绪压倒了。在“救亡工作”的激情和行动中，痛苦感和疏离情绪迅速在上海知识分子中蔓延。他们为“救国无门”而焦虑，^{〔35〕}这些焦虑与知识阶层在战前的表现极为相似。只不过，在战前知识分子是因为厌恶传统思想而焦虑，或者为国民党政府不愿领导国家（和他们自己）抵抗日本侵略而愤慨，但现在他们为无法参与动员民众的政治工作而灰心丧气。

羸弱的知识分子无力扛枪上阵，因此他们在后方的作用在于发动群众，这是同等重要的。因为这是一场全民战争，需要全社会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组织能力和教育专长就像前线的武装斗争一样重要。文协的积极分子张我舟认为，战争中的文化工作就是民众教育和民众组织。^{〔36〕}上海的知识分子急于在抗日的“大时代”中做出贡献，但在开始的几个月里，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政治工作可做。因此，他们抱怨国民党敌视民众动员。比如，国民党反对把每个里弄（或村子）组成一个自治体，也反对建立新渠道来促进发表有关国家问题的民主言论。从这个角度看来，正如一个作家讽刺的那样，国民党已

〔34〕《救亡日报》，1937年10月18日。

〔35〕这一词语的使用，见钱俊瑞著，《还乡工作运动》，《抗战》三日刊，第8期（1937年9月）。

〔36〕张我舟著，《战时的文化工作》，上海，1937，7页。

经为“恐汉奸病”所折磨，而这种病是政治的精神错乱，它把草根的能动性等同于谋反叛乱，就因为这一能动性可能会引起政局的不稳。因此，国民政府仅仅把“民族救亡”工作看作为军事服务的“工具”。^{〔37〕}这就把所有民族救亡团体限制在“边缘的”、“机械的”工作范围内，像是募捐、难民慰问和医疗救助，而具有政治关怀的群众动员则是被禁止的。此外，这些批评家还说，大多数民族救亡团体和国民党一样敌视草根政治，担心这样的活动可能招来政府的不悦，暗中破坏了国家团结。所以，这些民族救亡团体不信任激进的知识分子，并且竭尽全力排斥他们。知识分子谴责这一满怀敌意的状况，认为被剥夺了为满目疮痍的国家服务的机会。而且，当战争在10月进入高潮的时候，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离开了战区（跟随其他战争难民一起）到上海来寻找安全和自由。大批爱国青年的不断涌入，加剧了“救国无门”的问题。^{〔38〕}

《抗战》三日刊的编辑邹韬奋收到众多表达这种不平情绪的小说和信件，他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许多人没有饭吃，没有工作做。要救亡不知如何入手，因抗战而引出的问题无法解决……要工作做，几成了一般的呼声……在全国动员方面，还是一句空话。”他告诉读者不要再写信要求找工作或者发牢骚，因为他也无能为力。^{〔39〕}另一方面，胡绳以些许自怜的语气说出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感受：“炮声一响，文化无用。”在这样的挫折下，知识分子们失去了作为民族抵抗之精神领袖的信心。虽然他们保家卫国、抵抗日寇的希望得以实现，但是他们非但

〔37〕 例如《民众动员问题》，《文化战线》，第4期（1937年10月）；钱俊瑞著，《还乡工作运动》。

〔38〕 例如邹韬奋著，《一连串的问题》，《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26日。

〔39〕 邹韬奋著，《短笺》，《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29日。

没有当上“圣战”的英雄，反而再次感到自己被迫沦为了一个旁观者。

同时，一些军事将领悲叹上海周围的老百姓与他们在1926—1927年北伐时遇到的人民不同。这里的老百姓组织性差，不与军队合作。在江湾作战的第88军36师将领宋希濂说，老百姓非常不配合，以至于他的军队连一袋盐都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宋将军憎恶农民的冷漠，并把这一状况归咎为内陆地区缺乏草根组织。^{〔40〕}不满的上海知识分子以此证明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政府不愿动员民众，而是任凭那些热心建立草根组织的有为青年们无所事事。时任文协领导、后加入新四军的钱俊瑞，正是在这个时候失望地结束了他的民族救亡工作。当时，他认为这个工作已经在政治上彻底失败了，“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41〕}

为了减轻上海人力过剩和周围群众对政治的冷漠这一问题，文协领导呼吁无事可做的知识分子加入“还乡”运动。这里所说的“乡”是指广大的内陆地区，他们把这个运动称为“文化游击战”。钱俊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要求知识分子放弃他们所熟悉的“课室和亭子间”的世界，去过艰苦的生活。文协认为，在中国的农村还没有开展民族救亡工作，知识分子应该把他们的文化知识很好地用在与农村民众的封建奴隶意识作斗争上，把他们组织起来支援战争。^{〔42〕}与“五四”时期相反，

〔40〕 胡子婴著，《在火线的后面》，《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29日。

〔41〕 钱俊瑞，《写给要求救亡的朋友们》，《抗战》三日刊，1937年9月13日。这篇文章中对战时政治腐败的尖锐描述可被视为这一主题的雏形，其后不久就在所有文学风格中变得显著起来。其中最成功地描述这一现象的就是张天翼的著名战时小说《华威先生》。

〔42〕 钱俊瑞著，《还乡工作运动》，5页；另见胡绳著，《抗战时期的文化》，《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29日；艾思奇著，《文化在抗战中》，《抗战》三日刊，1937年9月6日。

城市知识分子成为“落后”乡村的政治启蒙者；实际上，为了在战争中取胜，钱俊瑞和其他文协积极分子所渴望的正是乡村中国的觉醒，而这也正是时代赋予青年知识分子的任务。^{〔43〕}

为了开展“还乡”运动，从9月初开始，蚁社和文协派遣十一个演剧队到内地的不同地区进行战争宣传。^{〔44〕}在这些演剧队中，著名戏剧家洪深和演员金山领导的“战时移动演剧队二队”奔赴河北和绥远。当苏州观众问他们为什么去内地演出时，洪回答说他们在上海无事可做；而其他演剧社成员也都表达过改良农村的想法。^{〔45〕}许多为没有机会参战而苦恼的城市艺术家和作家也开始仿效这样的做法。在9月中旬，“文协”通告所有成员应尽快登记，因为在近来几周的混乱状况下，许多知识分子已经离开了上海，很多文化团体已经消失，而这些团体的名字还记录在案。^{〔46〕}

如果说，一些知识分子是为摆脱挫折而在9、10月间奔赴内地的话，那么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则迫使更多知识分子逃离这座城市，以免沦陷之险。10月初，罗店、南翔、大场（位于公共租界西北几英里之处）等战略要地相继落入日军之手。这些军事失利导致了26日闸北—浏河战线的崩溃。到此为止，中国军队已经牺牲20万人。11月5日，柳川平助将军在杭州湾的3万海军陆战队在金山卫、全公亭登陆，并且距上海不到20英里的淞江也沦陷了。这些致命打击之后，中国政府命令上海前线全线撤退到苏州—杭州铁路沿线，形成新的战

〔43〕 胡绳著，《抗战时期的文化》，《文艺作家应有的认识 and 任务》，《救亡日报》，1937年9月12日；钱君涛著，《留下纪念的痕迹》，《文艺春秋》，第5期（1945年9月），6页。

〔44〕 于伶著，《默对遗篇吊阿英》，21页；《救亡日报》，1937年9月。

〔45〕 《一个报告》，《抗战》三日刊，1937年6月，11页。

〔46〕 《文化战线》，第3期（1937年9月12日），8页。

线以保卫南京。11月11日，经过三个月的血战，除宣布中立的外国租界以外，日本上海远征军接管了大上海。^{〔47〕}

在大上海被占领前不久，后援会和文协的领导都努力维持上海公众的抵抗精神。后援会强调上海非常重要，不会被放弃，目前的撤退只是进攻策略的一种转变而已，它号召大家继续组成支持战斗的后方梯队。^{〔48〕}为了让老百姓在面对军事失利的时候继续保持忠诚，11月初后援会开展了一些反汉奸运动，比如积极分子给亲友派发爱国传单，在居民区的里弄里指导小组讨论，在商店前举办小型展览，谴责销售“日货”。^{〔49〕}

1937年10月26日防线崩溃前夕，文协的知识分子决心投入“以写作的形式进行更多的宣传工作”。^{〔50〕}而救亡工作也因此从行动退回了语言。根据《保卫大上海运动宣传大纲》所说，这里所指的宣传工作就是直接坚定军民意志的工作。^{〔51〕}在淞沪战役后的日子里，这项工作是文协工作的主题。

“孤军”八百壮士的英雄事迹成为这些团体的宣传攻势的极好素材。在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88军部分队伍受命在10月28日掩护闸北和江湾的军队撤往苏州。在日军的追击下，这场战斗看来败局已定。“孤军”却死守位于苏州河北线新垃圾桥对面的四行仓库（它是战区和租界之间的一个非正式的分界地标）。他们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在日军不间断炮弹和机枪的密集扫射下顽强抵抗了四天。与此同时，公共租界边界上也搭建起沙袋掩体和铁丝网，由英国军队和万国商团守卫。尽管

〔47〕 George Bruce, *Shanghai's Undeclared War*, Shanghai, 1937, 64—74 页。

〔48〕 《为保卫大上海运动告市民书》，《救亡日报》，1937年11月3日。

〔49〕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8039A号和8022A号（均为1937年11月）。

〔50〕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8039A号（1937年10月）。

〔51〕 《救亡日报》，1937年10月30日。

如此，上海工部局还是担心横飞的子弹和炸弹落到自己的辖区，造成另一个“血腥星期六”。它敦促中国军队投降，并许诺在租界内为他们提供庇护所。而“孤军”仍然拒绝停战，誓死与阵地共存亡。

特别是当“孤军”设法在仓库上升起国旗的时候，上海百姓从这样的决心中看到了中国人的不屈精神。据说，这面国旗是由一个叫杨惠敏的女童子军送来的。她把国旗藏在衣服里，连夜从外滩冒死游过了苏州河。^[52]

中国和西方的观察家都对这一卓绝的抵抗致以敬意。美国记者乔治·布鲁斯（George Bruce）在一个外滩旅馆的房间中报道说，“租界靠近战场的建筑物屋顶上从早到晚都站着观望的人”。^[53]外滩周围拥挤异常，以至于南京路东和虞洽卿路的所有路段的交通都被封锁。除了观看这场“真正”的街头大戏，上海人民也加入了这场战斗，他们捐献食品、棉衣、医药用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给“孤军”。这些物资由后援会的志愿者入夜后运到仓库。北京路、广州路和公园路等外滩周围的居民们组织了一天的绝食为抵抗者捐钱。而且，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请求英国士兵把钱、物传递给中国军人。^[54]同时，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狂热地赞扬“孤军”；充满敬意的报道出现在每份杂志上。八百壮士成为了民族英雄。

文协知识分子借助“孤军”的巨大声望，把它塑造成历史

[52] 关于“孤军”的一手报道，见《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1987；George Bruce, *Shanghai's Undeclared War*, 64—66 页；《上海孤岛文学作品选编》，三：18—40 页。根据其他资料，杨偷偷送来的国旗太小；仓库上升起的大国旗是后来送去的，上海人民还送来了募捐的六车食品和衣物。童子军战地服务团负责偷运物资的工作。见唐振常编，《上海史》，785 页。这些内容见一个童子军所写的报道《为孤军送粮》，《上海一日》，上海，1939。

[53] George Bruce, *Shanghai's Undeclared War*, 66 页。

[54] 《为孤军送粮》；Harriet Sergeant, *Shanghai: Collision Point of Cultures*, 308 页。

传奇。《江湾日报》用连续三个特刊，印刷诗歌和散文，赞颂“孤军”顽强不屈的精神。在这些作品中，八百壮士被解读为中国的精神象征。他们自我牺牲的抵抗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一切艰险，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意志。在一首题为《八百壮士抗战心》的诗歌中，逸关写道：

暮色苍茫中，/我们扯起光辉的国旗，/她象征着我们
圣洁无比的民族正气，/我们八百个生命蕴蓄着全中华的
精神，/终有一天我们会获得胜利。

作为中国精神的化身，“孤军”和其他的象征元素（例如辛亥革命）一起，成为错综复杂的传奇的一部分。10月31日，327名幸存者（遵蒋介石之命）在日军的轰炸下冲出四行仓库，进入公共租界安全地区，这一天，也是革命先烈黄兴逝世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江湾日报》的社论赞颂黄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和无畏的战士，毫不动摇地为中国的自由和独立而献身。报纸引用了黄兴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所说的话：“战亦之，不战亦之，不如先发。”^{〔55〕}作者提到黄的爱国主义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为了在他和“孤军”之间建立一种历史联系。这种联系因他们精神上的相似性得到了加强。他们坚定果敢的道德成为了一种理想，知识分子们希望这种理想会在民族奋斗之际闪耀发光。

1937年11月底，大上海的战争已经进入尾声，当苏州河上空还飘浮着黑色的硝烟的时候，大多数救国运动的领导者都认为，战争——至少是这个城市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后援

〔55〕《在孤军奋战中纪念黄克强先生》，《江湾日报》，1937年10月30日。

会在关闭之前，已经命令所有的宣传工作迅速向武汉和内地转移，城市的活动仅限于租界之内的募捐和难民慰问。^{〔56〕}12月初，就在国民政府宣布撤往武汉（继而在1938年底撤往重庆）和南京陷落（紧跟着发生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总计至少死亡20万人）之际，后援会仅在200余名成员中挑出8个人留守上海。^{〔57〕}同时逃难的，还有一大批来自文协的知识分子，他们带着自己的报纸和杂志大举逃离上海。在这批文化名人中，有茅盾、郭沫若和邹韬奋。郭沫若在动身去香港之时，与一个朋友在酒店的咖啡馆中告别。郭写下一首小小的打油诗，表达他依然有信心抗战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上海已然成绝岛，
早迟总得要离开。
从今戎马生涯里，
不待胡平不再来。^{〔58〕}

但是，并非所有的上海知识分子都能像郭沫若那样离开这座“绝岛”，他们不得不像“亡国奴”那样活下去。在非沦陷区那些“戎马生涯”的人看来，他们就一定是汉奸吗？何时才能“胡平”？他们能像“孤军”一样坚贞不屈，直到那一天到来吗？怎样才能坚持爱国热情，又能保全身家性命？当道义与生存发生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如果不妥协的精神也不能保卫上海，那他们的信仰就需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能不能让他们在沦陷区继续生存下去呢？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新的体制下，

〔56〕《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7994A号（1937年11月）。

〔57〕陈存仁著，《抗战时代生活史》，香港，出版时间不详，23页。

〔58〕《申报》，1938年11月12日。

知识分子的角色和状况是什么？他们如何让上海民众维持抵抗的精神？

对于这些道德和政治的传统命题，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答案。他们也许退隐以维护自己的气节，他们也许坚持传统的英雄主义精神，或者，他们甚至以遗民的名义附逆合作。但无论他们做出什么选择，在沦陷的八年中，他们的生活构成了一出充满了恐惧、煎熬、生存和道德矛盾的戏剧。

第一章 隐退：王统照和“抵抗的启蒙观”

苍烟飞不起，花落随流水。
石烂海还枯，孤心一点孤。

——王夫之《菩萨蛮》

1937年11月，大上海落入日军之手。此后的八年沦陷岁月中，这座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成为战争的俘虏和受害者。如一位作家悲叹：“居留在上海的我们，国家的保护已经脱离，侵略者的魔手在我们头顶。”^{〔1〕}“魔手”这一比喻，恰当地概括了知识分子们恐惧、愤怒和羞耻的情感。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生存需要与爱国感召的两难道德困境中，于是一些人归于沉默，停止出版，与世隔绝。他们试图以消极的方式进行象征性的抵抗，避免日本人的迫害。

王统照（1897—1957）——这位久负盛名的“五四”作家和诗人，就是沦陷时期留守上海的隐退者之一。在民族道义和自我保护的矛盾面前，他形成一套道德观念，我称之为“抵抗的启蒙”。实际上，这一概念有效地重释了“五四”思想中以歌颂个性解放为取向的博爱人道主义价值观。王统照以基督教

〔1〕 孔另境编，《横眉集》，上海，1939，42页。

的神启（apocalyptic）末日观为基础，将中日战争看作催生新世界的机会，反复强调战时背景下理性的宽容价值与自由的重要性。但是恐惧、贫穷和集体主义情绪冲击着他的思想，导致他从1941年起退回到沉寂的状态。之后，他将全部精力都花在维护个人气节的道德问题上。

“五四”人道主义者的形成

1897年2月，王统照生于山东诸城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2〕}他的父亲在他九岁的时候去世了，寡母把他和两个姊妹抚养大。在他的记忆中，母亲有着自我奉献的美德。因此，这个脆弱敏感的男孩儿很早就形成了对他人的责任感。童年经历影响了他的性格，他被看作一个对朋友忠实、工作可靠、性格含蓄而温和的学者。他是一个羞涩、内向而缺乏自信的人，而且在他的生活中始终展现出一种内省的特点，与之相伴的则是消沉的倾向。^{〔3〕}

1918年，由家庭包办，王统照和一个文盲的山东姑娘结婚。之后，他来到北京，进入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在北京，王统照受到当时青年运动的影响，卷入了学生宣传工作，并参与了示威游行，这些活动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先声。虽然王统照是个过于温和谨慎的人，不适合在学生示威中

〔2〕 除特别说明之外，这里所提供的王统照战前的传记资料都来自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研究资料》，宁夏，1983，12—39页；《王统照短篇小说集》，上海，1940，1—6页。

〔3〕 见郑振铎，《悼王统照先生》；臧克家，《剑三今何在》；臧云远，《记诗人王统照》，收入冯光廉、刘增人编，68—108页。关于王统照的影集，参见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香港，1985，1—6页。

担任革命领袖，但这一政治经历仍能给他精神上的启示。对他日后的世界观和自我意识而言，这些经历成为必经的仪式。此后，他视自己为“五四”宿将，并把宣传“五四”运动的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想视为自己毕生的责任。^{〔4〕}

正如其他从欧洲人道主义传统中吸取灵感的文化运动一样，以爱国为潜台词的“五四”运动旨在从沉重的传统文化重压中解放人的潜能，实现民族复兴和全面进步。个人自主和自我发展这一源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秩序的人道主义理想，被奉为中国“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为达成这一文化大业，“五四”知识分子着手革除传统思想中的奴性和克己意识，并以西方（布尔乔亚）的“文化批判”取而代之。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下，他们称颂“天赋人权”，认为批判理性是人类解放自我，改变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天赋能力。（实际上，正如毕昂高〔Lucien Bianco〕所指出，“‘文化上的亲西方主义’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之间并不矛盾”。）^{〔5〕}这些知识分子视自己为精神先锋，他们要救国，就要把自己的同胞从鲁迅所说的自欺欺人的“铁屋子”中解放出来。

这种明显的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使“五四”运动蒙上了不切实际的色彩。他们所反对的多过他们所拥护的，他们打算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改变整个中国，但事实上他们对中国的现实和人民都知之甚少。幻灭感很快就打垮了这些文化上的进步分子，实际

〔4〕 见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收入《“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北京，1979，244—252页。

〔5〕 Lucie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uriel Bell 英译, Stanford, 1971, 42—43页。关于“五四”运动的启蒙主题研究，见 Benjamin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1985；关于欧洲人文主义传统，见 Alan Bullock, *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 London, 1985。

上，一旦面对校园之外的社会现实，许多人就成为失望沮丧情绪的牺牲品。甚至有不少人向制度投降，服从于社会的惰性和压力（更不要说勇于面对政治压迫和农业社会的落后困境）。〔6〕而且，这一运动的特点在于将彼此不一致的理想和观念汇集起来，例如，尽管“五四”运动强调怀疑主义和批判理性，但其中也弥漫着神启的看法。“那时的青年多构成一个空洞而魅力的希望寄存在未来的乐园之中。”〔7〕如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的，在日本占领时期，王统照保留了所有“五四”思想的特点。

从性情上说，王统照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始终停留在“五四”运动的外围。他只是经常参加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办公室组织的新文化和俄国革命的讨论，才加入到号召爱国动员的运动中来。〔8〕但他并没有参加破除偶像的反传统活动，而是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呼唤他所渴望的那个仁爱的社会。1921年，就在他将从中国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前不久，他与茅盾、郑振铎、耿济之和叶圣陶等十一位有志作家，共同创办了文学研究会，并结下了终生友谊。他们支持新的文化美学和社会批评，以期通过文学来传播“五四”的启蒙福音。

王统照的一生可说是同时代作家的典型，他在“五四”时期的创作和批评作品都充满了对现实的高度主观感受，以及对于自我表现和美学探索的迫切关注。〔9〕在艺术探索的背后，实

〔6〕 幻灭和屈服是后“五四”文学的一个常见的主题。有两个著名的例子，一为鲁迅的《彷徨》，《鲁迅全集》，北京，1981，一为王统照的《春花》，上海，1934。

〔7〕 王统照，《王统照文集》，卷一，179页。

〔8〕 同上书，卷五，216—218页。

〔9〕 关于五四文学的出色研究，见李欧梵，“Romantic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ome General Explorations,”收入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Donald Munro 编, Ann Arbor, Mich., 1985, 239—258页。

质上是对于人的潜在创造力和追求爱与美人道主义的价值信仰。1924年，王统照也曾担任泰戈尔访华演讲的翻译（和诗人徐志摩一起），并赞同泰戈尔对人与万物都是神的表现的泛神论观点。在王统照看来，浪漫的爱和自然的美代表了通往幸福的唯一大道，这一至高无上的德行能够开启人性中潜藏的道德品质，正因如此，可以使个人利益与公共道德得以协调。^[10]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王统照采纳了叶芝（W. B. Yeats）的超自然“生命的批评主义”观念，把文学视为改变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手段，从而振兴中国。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希望创造一个充满美感和人伦之爱的“小世界”，将其置于大世界的道德堕落之中，以之启发读者，激发他们人性的潜能。

与这一人道主义观点相伴的是和平主义的自由信念。^[11]出于对自由和解放的真正信仰，王统照赞颂马志尼（Mazzini）和拜伦（Byron）所支持的“义战”，即为民族自治而战。而所有其他的战争都被他谴责为非正义的、不人道的，是人类兽性的表现。1919年他写道：“战是兽道，爱是人道，兽道昌了，人道就要灭了！”^[12]因此，虽然他赞颂“五卅运动”是抵抗帝国主义暴行的民族主义运动，但他呼吁所有的作家用文学作为“非战”的工具，用他们“正义”的蔑视来反战。^[13]我们将看到，这一自由人道主义的观点在日据时期支配了王的思想。

[10] 如《太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现》和《美育的目的》，《王统照文集》，卷六，315—322页和438—461页。瞿世英，《春雨之夜序》，收入王统照，《王统照短篇小说集》，455—457页。

[11] 我的自由主义的战争观源于 Michael Howard, *War and the Liberal Conscience*, New Brunswick, N. J., 1977; 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New York, 1977。

[12] 冯光廉、刘增人编，15页。

[13] 王统照，《王统照文集》，卷四，523页。

与王统照战时思想发展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参与和自我保全这两种矛盾的心态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焦虑。1937年上海沦陷前夜，王统照承认他的极端性格：“有时冷极，有时热极”；他将其归结为受到遗传和童年经历的影响。^{〔14〕}的确，王统照在1937年前的感情和精神生活可以被划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从社会参与转向退守自我，再到爱国行动。从参加“五四”运动到1926年，在北京和上海，他是文学研究会的积极参与者，并利用这些关系发表了不少诗集和短篇小说。^{〔15〕}但这些活动在1926—1927年间停止了，慈母在青岛去世，白色恐怖的政治灾难接踵而来。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和工会成员。接连而至的个人不幸和历史悲剧，粉碎了他对个人和国家的美好生活希冀。正如王统照后来回忆：“现实的剧变将大家的梦境打破了。除却作生的挣扎外一切空虚中的花与光都消没于黑暗中。”^{〔16〕}年轻的王统照辞去了中国大学的教职，举家迁往青岛，这一行为让人想起传统的居丧守孝（让人想到儒家的隐逸）。^{〔17〕}顺便提一句，青岛——这座城市对王统照而言有讽刺意味，因为他曾认定1919年日军占领青岛正是“五四”运动发生的理由。然而现在他深感一切都是徒劳，王统照退出了社会生活（躲到青岛当地的一所高中教书）。^{〔18〕}

这一自我放逐的孤独状态在1931年春的东北之行中打破。

〔14〕 王统照，《王统照短篇小说集》，5页。

〔15〕 冯光廉、刘增人编，18页。

〔16〕 王统照，《霜痕》，《王统照文集》，卷一，179页

〔17〕 Wolfgang Bauer, “The Hidden Hero: Cre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Ideal of Eremitism,” 收入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Donald Munro 编, Ann Arbor, Mich., 1985, 164—166页。

〔18〕 王统照，《王统照短篇小说集》，3—5页。

一位吉林的朋友操办了一所高中，王统照去那里教了四个半月的书。利用学校假期，他在东北进行了广泛的游历，亲历了日本统治之下的生活，他的民族责任感被唤醒了。正如他在旅行后的诗中所写：

日月催行役，艰危念此时。
途迷往日迹，文悔少年知。
救国愁乏术，抒辞意亦疲。
低头重自性，惆怅鬓边丝！〔19〕

诗人反思自己的文学生涯，他为自己采取的自我保全、逃避现实的做法感到内疚。

1931年夏，王统照返回青岛之后，开始公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谈论农村的贫困问题。通过文学研究会的朋友（包括叶圣陶在内的许多人也对政治产生失望情绪）关系，他在1932到1937年间出版了两部小说和五部散文集，这些作品都以尖锐的语调强调爱国的迫切性。出于对自由人道主义的信仰，王统照呼吁自由和良知，敦促同胞为民族独立而共同奋斗。由于他大力宣扬民族救亡，王统照1933年写的小说《山雨》因为描写帝国主义统治下破败的农村生活，上了国民党审查的黑名单。1934年，出于避祸的考虑，他变卖了大部分田产，前往欧洲旅行一年。〔20〕

1936年回国后，王统照离开青岛前往上海——救亡运动的

〔19〕《东北纪行》，王统照，《王统照短篇小说集》，6页。王的东北经历在他的散文选中也有表现，《北国之春》被收入《王统照文集》，卷五，3—102页。

〔20〕关于王在此期间的旅行和其作品的评论，见冯光廉、刘增人编，28—33页，188—445页。

中心城市，立志投身爱国创作（虽然他时常回青岛探望家人）。他加入郑振铎、叶圣陶、茅盾和一些左翼人士组成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以促进文学界的团结，还成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成员，该组织囊括了所有上海的进步作家。7月，王统照接受邀请担任左倾杂志《文学》的主编。^[21]这段经历充分表露出他对日本侵略的个人政治态度。尽管他一心想把《文学》办成文化启蒙和民族救亡的论坛，但是他很快就发现编辑工作太过繁重，和个人性情不投。他敏感、高蹈的性格不适合处理琐事，尤其不适合在这个热衷争论的中国现代文学界中领导这么重要的杂志。总体而言，他超脱于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也从未卷入过当时吸引了大多数作家的政治化文学论争（比如1936年关于写作与爱国动员之关系的“两个口号”论争），^[22]但他意识到自己仍旧孤立和苦恼。他常向密友抱怨自己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苦恼。^[23]加之，正逢国民党加强了对异见文学的镇压，作为一位一贯呼吁作家参与民族救亡的编辑，王统照经常为了可能突然发生的袭击而焦虑（他一直锁着编辑室的铁门，并提醒他的朋友不要把他的地址告诉他人）。王本来就是一个脆弱而十分敏感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出现哮喘和失眠的症状，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24]

当1937年7月抗战在北方爆发之际，王统照火速回到青

[21] 见冯光廉、刘增人编，700—702页。关于中国文艺家协会，见《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1980，254—255页。

[22] 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见夏济安（Tsi-an Hsia）著，*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f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1971。

[23] 王西彦，《回忆统照先生》，冯光廉、刘增人编，77—79页。

[24] 郑振铎，《悼王统照先生》，冯光廉、刘增人编，67—69页。关于王统照呼吁《文学》撰稿人参与救亡的例子，见《王统照文集》，卷六，530—544页。不要泄露他的地址，见王和赵景深的通信，《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6期（1981年4月），220—221页。

岛，带着他的家人来到上海。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虽然逃出了日军占领的青岛（他自从1919年以来收藏的珍贵书籍全部遗留在了那里），但却又来到一座马上要面临同样命运的城市。

《烽火》和淞沪战役

王统照与家人刚到上海，战争就爆发了。虽有战局挑动了部分作家的创作激情，但整个上海文坛陷入了萧条。位于战区的出版公司和印刷厂或被炸毁或是搬迁，出版业日渐停滞。^{〔25〕}文学刊物被迫停刊；没有新的文学作品出版。由于没有文学作品的供应，仅存的几家书店里只出售地图和战争画片。^{〔26〕}

到8月末，随着文协机关报《救亡日报》的出版，一些新的文学刊物开始出现。第一个尝试性的刊物是《烽火》（初名《呐喊》）——这是一个小型的周刊，用编辑者茅盾的话说，是为民族抗战凝聚力而做的“文化工作”。^{〔27〕}茅盾之外，编辑部的成员还有巴金、郑振铎等“五四”自由主义者，王统照也是成员之一。

王统照加入《烽火》的原因有二：第一，他与《烽火》编辑的交谊非常好。根据出版人赵家璧所言，他们都住在沪西的极司菲尔路。作家们经常互访，闲谈文学、讨论政治。随着

〔25〕 见茅盾，《烽火连天的日子》，《新文学史料》，4期（1983年11月），9页。

〔26〕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1940，上海，1984年重印，191页。

〔27〕 茅盾，《站上各自的岗位》，《烽火》，1期（1937年8月），1页。《烽火》由文学、译文、中流、文季四家停刊的杂志联合出版。

战争的爆发，他们都加入了文协，见面越发频繁，讨论集中在个人的未来以及对待民族危机的正确态度上。^{〔28〕}在1937年《文学》结束之后，这个同人性质的社团给王统照提供了从事“文化工作”的新论坛。

在思想上，王统照更认同他们是自由人道主义团体。他们视抗战为正义之战，这符合“五四”的传统，因为抗战的终极目标是自由和解放。与日本帝国主义“非正义的侵略”相反，中国的抵抗不仅是民族自卫的“正当”之举，而且是保护“人类文明”的“大义”抗争。此战之目的，是要激起日本人民推翻军国主义专政，消灭这个国际政治和文化秩序的破坏者。^{〔29〕}基于这一自由主义的观点，王统照和其他编辑认为在和平的道义和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之间没有冲突。他们的信仰可以用《烽火》另一位编辑靳以的一句名言来概括：“只有战争才能消灭战争。”这一团体把战争定义为“我们”与“他们”的斗争，定义为善与恶的斗争，从而为不利的战局找到了道义上的乐观主义的精神支持。王统照正是用“师直则壮”和“师出无名，军无斗志”来证明这一看法。^{〔30〕}换言之，道德决定战果。这也就是为什么王统照和《烽火》友人们（也包括文协）要赞颂道德的正义，以及鲁迅的“不妥协精神”，他的“不屈的尊严”被这些作家们誉为中国精神的表率。^{〔31〕}因此，尽管中国

〔28〕《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北京，1984，33页。

〔29〕王统照，《夜深沉》，《烽火》，1期（1937年8月）；关于茅盾，参见《写于神圣的炮声中》，《烽火》，1期（1937年8月25日），卷1。关于巴金，参见《给山川先生》，《烽火》，4期（1937年9月），82—86页。见靳以，《我的话》，《烽火》，1期（1937年8月），10—11页。

〔30〕王统照，《冲动与镇定》，《烽火》，2期（1937年8月），20页。《烽火》其他编辑所持的同样观点；见巴金《给山川先生》，《烽火》，4期（1937年9月）和田间《我诅咒》，《烽火》，3期（1937年9月）。

〔31〕王统照，《王统照文集》，卷六，545—547页。

目前军事力量还很弱小，但是，当所有人都愿意为之献身的时候，中国的正义之战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中国抗战这一人道主义的观点和随之产生的道德信念，一直是王统照在战争时期的思想主题。

淞沪战役期间，王统照在《烽火》上发表了他的大部分作品。如同作家郭天闻评论：战争一打响，所有的作家都成了诗人，诗歌成为表现激情的最直接的形式。^{〔32〕}自1927年退避青岛以来，王统照已经放弃了诗歌，因为他认为自己无法把握这个变化的世界，^{〔33〕}但是战火燃起了他心中的诗情。淞沪战役以来的三个月中，他的作品全部都是诗作，总共有十六首。所有这些诗歌都清楚地揭示一个观念，就是中国正处于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保家卫国是更高的道义。为了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所有知识分子应该超越“精英主义”和对个人的关注。^{〔34〕}

其中，最好的一首是《忆金丝娘桥》，概括了王统照在战争早期的激情。金丝娘桥是金山卫附近的著名风景地，王统照曾在1936年的秋天去过那里。1937年11月5日，当日军在杭州湾激战时，这一地区遭到猛烈的炮火摧毁。巨大的反差为金丝娘桥赋予了象征性的道德和政治意义。诗歌的最后一节是：

诗人幻想，也变成残酷的画图！
如今，金丝桥上正交织着红丝，
作什么回忆呢？稻田、疏林、蓑笠，

〔32〕 见《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上海文化》，6期（1946年7月），187页。

〔33〕 王统照，《〈这时代〉序》，《王统照诗选》，北京，1958，183页。

〔34〕 王统照，《冲动与镇定》。另见他的《抗战中的文艺活动》，《王统照文集》，卷六，554—559页。

柳岸，低塘，向人摇曳的芦蒲？
否，否！回忆已抹上勇敢的画面：
情愿在她的艳尸上涂遍血污，
是伟壮的战迹才不负秀丽的风物！〔35〕

美与和谐被摧毁了。桥，无辜的牺牲品，被日军的炮火所蹂躏。抵抗，变得必要而正义。

大上海沦陷和洋商报的兴起

《忆金丝娘桥》发表不久后的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入侵将上海文化界抛入惊恐之中。几周之内，所有的民族救亡组织和反日出版物被关闭，而且流言四起，传说活动家即将遭到迫害。在连接外滩和虹口的外白渡桥边，所有过桥人都必须对日军岗哨鞠躬致敬，否则当场遭到毒打或杀害。另外，还发生了知名作家和教育家遭到迫害和暗杀的事件。〔36〕出于对个人生命和言论自由的忧虑，大批知识分子逃到英国管辖的香港或者进入日军尚未占领的内地。〔37〕在文学界享有盛名的

〔35〕 王统照，《忆金丝娘桥》，《王统照文集》，卷四，313页。

〔36〕 关于各种流言和日军在上海的暴行，见姚苏凤等人，《作家离沪琐记》，《大风》，1卷1期（1938年3月），70、76页。关于日军在外白渡桥的恶行，见陶菊隐，《孤岛见闻》，上海，1979，第三章。

〔37〕 姚苏凤等人，《作家离沪琐记》，70—72页。另见茅盾，《烽火连天的日子》，《新文学史料》，第4期（1983年11月）。散文家陆丹林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相当典型的一位，他曾在淞沪战役期间帮助保护一座难民中心。尽管他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但是在朋友们的劝导下，以及听到各种政治迫害的消息之后，他认定自己不再拥有“在上海发火”的自由。陆很快奔赴香港，帮助创办了《大风》杂志。该刊物是战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期刊。它为上海来港的流亡者提供了宣扬爱国理想的论坛。见姚苏凤等人，77—78页。

王统照没有加入这个知识分子的大逃亡。那时，他已四十一岁，由于没有人能帮他在异乡找到工作和住所，王统照只好留在上海。况且，战争阻断了交通要道，旅行开支巨大且又相当吃力。王统照有哮喘和失眠的老毛病，在上海沦陷的时候，又感染了伤寒。他的家庭负担和日渐衰弱的健康状况使他根本无力应付这样的长途旅行。在茅盾的帮助下，只有他二十岁的大儿子被送往四川，而他与妻子和另外两个儿子留了下来。^{〔38〕}

1937 年底，王统照一家随着大批难民逃出上海华界，从沪西的极司菲尔路迁到吕班路的一所小公寓里，这里毗邻着漂亮、安静的法租界。西方势力管理下的租界位于上海中心地区，占地 8100 英亩，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和西方国家在中日敌对状态下的中立态度的影响，直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才被日本占领。^{〔39〕}这一特殊状况在当时被恰当地形容为“孤岛”。这一隐喻生动地将上海的中心地区想象成一个得到特殊恩宠的岛屿，它被汪洋般的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腹地中切割出来。但它并不像隐喻所暗示的那样处于绝对的孤立或者与世隔绝的状态。在整个沦陷期间，“孤岛”与未被占领的地区紧紧地连在一起，它有秘密而广泛的情报控制网，有商业活动、政治计谋、宣传工作，还是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的逃亡通道。如果没有这些联系，上海的抗日工作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相对的自由中，孤立的租界区内形成抵抗日军入侵的力

〔38〕 冯光廉、刘增人编，40 页。

〔39〕 “大部分地区未被占领”，因为公共租界的虹口地区位于苏州河北岸，这里实际上已经被日军占领了。这一地区被称作“小东京”，被日本居民长期统治。只有公共租界中苏州河南岸和法租界的部分未被占领。关于这一情况的简洁说明，见 F. C. Jones, *Shanghai and Tientsin*, San Francisco, 1940, 57—72 页和 Robert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 1937-1941*, New York, 1941, 第一章至第三章。

量。1942年前，上海的战时经验与欧洲迥异。在欧洲，人们面对面地抵抗纳粹的入侵，反法西斯传单流传和秘密报纸的印刷（如法国的 *Combat and Defense de la France* 和荷兰的 *Vrij Nederland*）都是相当危险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把自己的生命和他们手中的传单一起交给了他们的邻居”〔40〕（但同样地，两者之间的差距不应被夸大，因为欧洲抵抗运动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海外基地的保护——特别是伦敦——宣传广播、军事支援、经济支援等等）。

1938年初，“孤岛”的第一批抵抗者出现在知识分子当中。他们利用中立西方势力从事合法的宣传。他们所享有的合法地位有助于扩大其影响范围。不过，他们的言论自由非常有限，往往面临被发现或遭到武力报复（既有来自日本的，也有来自租界当局的）的危险。在知识分子所参与的新闻抵抗活动中，他们总会面对各种的恐怖威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统照投入到抗日活动中。

新闻界成为上海沦陷后第一个镇压的目标。1937年底，为了保住其“中立立场”，租界当局明确提出他们不会容忍反日宣传活动。〔41〕11月后，上海工部局以“出版不正确资讯”为名，总共关闭了11家报纸和期刊（其他30家自行停刊），并对其他3家发出45份警告。〔42〕

〔40〕 Peter Calvocoressi 和 Guy Wint, *The Total War*, London, 1985, 265页。关于欧洲抵抗运动，另见 Werner Rings, *Life with the Enemy: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Hitler's Europe, 1939-1945*, J. Maxwell Brownjohn 英译, New York, 1982; H. R. Kedward, *Resistance in Vichy France: A Study of Ideas and Motivation in the Southern Zone, 1940-1942*, Oxford, 1978。

〔41〕 Sterling Fessenden 曾这样宣称，而后，1937年11月13日，公共租界上海工部局主席也这样宣称，引自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1981，225页。

〔42〕 《上海工部局年报》，1937年，244页；《八·一三以来上海报界的动态》，《上海周报》，1卷5期（1940年6月），131页。

日本军部在夺取了三家外国电报公司的控制权之后，于11月28日接管了位于公共租界南京路的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并更名为上海新闻检查局。据报道，这一新机构由日本远征军和当地日本领馆共同控制；但日常事务由中国的傀儡机构掌控。^{〔43〕}这些傀儡机构包括早期卖国政府——浦东的大道市政府（成立于1937年12月管理被占领的上海郊区）和后来南京梁鸿志控制的维新政府（成立于1938年3月，名义上掌管长三角的所有被占地区）——的宣传特务。这些特务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政府审查相关新闻。^{〔44〕}

1937年12月13日，数十万平民和战俘在南京被血腥屠杀，随后，上海的日本新闻检查员要求租界内出版的所有中文报纸上交检查。既然把报纸上交日本就标志着承认侵略的合法性，上交与否似乎就意味着在抵抗或附逆之间做抉择。大多数报社以立即停刊的方式表示抗议，其中一部分完全迁离了上海。^{〔45〕}

只有两家小晚报——《华美晚报》和《大美晚报》公然挑战了日本的检查机构。这两家报纸都登记在美国赞助商名下（早期受到过国民党的迫害），避过了日本的规定继续运作，正如后者的发行人高尔德（Radall Gould）所说，没有“把报纸提交给任何检查机构”。^{〔46〕}

沦陷初期，这两份美国注册的报纸销量大增，^{〔47〕}但并不

〔43〕《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第8039A号（1941年3月）。

〔44〕《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第3019号（1937年12月）。

〔45〕同上；另见徐铸成，268页，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北京，1984，184页。

〔46〕《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3019号（1937年12月）；另见柯灵和任嘉尧，《记洋商报的兴衰》，《人民政协报》，1月1日—2月1日，1984。

〔47〕1937年底，《大美晚报》的销量从2000—3000份上升到40000—50000份；见张志寒，43页。

能满足孤岛读者的需要。在愤怒和半信半疑的气氛中，许多读者发现沦陷的城市是“文化莽原”——这里听不到任何令人鼓舞和使人放心的抗日新闻。^{〔48〕}就算不愿意帮日本人说话，报纸上能刊登的也就是鸡毛蒜皮的消息，政治语意模棱两可。为了表达内心的爱国情绪，上海民众拒绝购买向日方送检的中文报纸，也拒绝订阅日资报纸。所以，《新申报》——也就是中文版的《上海合同新闻》——只能在沦陷区附近免费派发。^{〔49〕}

针对这一情况，一批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是为抗议经营者的投降而辞职的报人）在1938年初筹办自己的日报——《文汇报》，他们希望以这份报纸解决生计，同时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发表爱国言论的平台。^{〔50〕}两份美国报纸因宣布外交中立就能躲过日本检查机构，受到这一成功策略的启发，抗日知识分子们花高薪聘请了一位爱尔兰商人克明（H. M. Cumine）来担任报纸的出版人。他唯一的职责就是确保报纸免遭日本人的骚扰，因此他被戏称为“外国保镖”。^{〔51〕}

《文汇报》在中国报业的“舰队街”（Fleet Street，伦敦报

〔48〕 该词借用自柯灵。见他的《回到莽原》，《柯灵杂文集》，94—101页。

〔49〕 关于上海居民拒绝购买日资报纸的情况，见《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3019号（1937年12月）；关于抵制中文报纸的情况，见柯灵和任嘉尧。著名的《新闻报》在送日本审查机构检查后的第一个月，销量从180000份下降到不足10000份就是抵制的例证；见徐铸成，272页。关于 armchair resisters 一词，见 H. R. Kedward, *Occupied France: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1940-1944*, Oxford, 1985, 53—55页。

〔50〕 关于《文汇报》创刊的全面情况，见徐耻痕，263—266页；另见徐铸成，281—283页。

〔51〕 徐耻痕，《文汇报创刊初期史料》，《新闻研究资料》3（1981年11月），266页。而且据徐铸成记载，克明（H. M. Cumine）月入300元，加上津贴，他的收入就算与最高级别的中国报人相比，都高出很多。比如说，《文汇报》主编的月工资是200—300元，而《大公报》主笔的工资是150—200元；见徐铸成，263页，282页。

业集中地。——译者注)——福州路和福建路交界处——开设报馆,并于1938年1月开始出版。该报刊登来自民国政府的(由国民党的地下特工所提供)和全国其他报纸的战争消息。该报以鲜明的民族主义姿态和煽动性的语言立即在孤岛赢得欢迎,销量从首日的20000份上升到五个月后——也就是1938年3月——的100000份。^[52]这一数字相当了不起,它的流通局限在两个外国租界,而以前的报纸则在整个上海销售,还辐射沪杭、沪宁铁路沿线的周围地区。《文汇报》的巨大成功标志着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洋商报”模式,它很快被孤岛新闻业界广泛采纳。所有这些报纸都由美、英或其他欧洲出版商作为代表,但都由中方管理,从而在日本的检查制度下获得了法律豁免。正如共产党批评家巴人所描述的,这些洋商报“顶着西商的招牌,说着中国人的道理”。^[53]从而给上海的抗日知识分子们提供了发出声音的媒介渠道,用文学编辑柯灵的话说,这些声音充满了“斗争的勇气”。^[54]

得益于这一特殊外国“保护”,上海新闻业蓬勃发展。从1938年中开始,涌现出一大批洋商报,包括《申报》这样当年为抵制日本检查制度而迁出上海的报纸。^[55]据当时的观察,孤岛的报纸之多,胜于战前的任何时期。^[56]

[52] 关于这一数字,见徐耻痕,270页。与此同时,著名的《新闻报》只有50000份的销量,其订阅量的减少,一部分原因是它对日本妥协,另一部分原因是它的销售渠道被限制。

[53] 巴人,《“鲁迅风”话旧》,《巴人杂文集》,563页。

[54] 柯灵,《“洋报”辩》,收入《边鼓集》,上海,1938,341页。

[55] 著名的《申报》因在汉口和香港未能立足,也迁回上海,并于1938年10月10日复刊,它以美国注册的哥伦比亚出版公司的名义经营,该公司由一个名叫阿乐满(N. F. Allman)的律师管理。

[56] 孔远之,《黄浦滩头》,《大风》,15期(1938年8月),456页和他的《五月的上海》,《大风》,10期(1938年6月),307页。这一观察并非夸张。

所有广受欢迎的洋商报都宣称，要使上海的抵抗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一部分。为了鼓舞民心和劝诫胆怯，他们以刻毒的语言攻击汉奸，在他们的妙笔之下，军事行动和其他事件都成为战争的宣传。^[57]他们还印刷重要的政府公告（在所有事件的纪念日，包括双十节和7月7日“卢沟桥事变”）和由国民党特工送来的油印报告。比如，《申报》记者金华亭作为地下中央宣传部的特派员，负责为所有上海报纸提供国民党所支持的城市周边游击战运动的“消息”。^[58]左派报纸也出版代表共产党的新闻，特别是关于中国中部和西北部的游击战争的情况。

因此，这明确表明洋商报与继续秘密存在于租界内的国、共两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上海沦陷后，两党或者依靠地下党员（中共江苏党委），或者依靠秘密部门（国民党统一委员会）继续组织并竞相控制租界区的抵抗运动。延安和重庆分别建立了各自的情报系统和秘密信息网络，以保持日常的信息交流，其人员遍布沦陷区。举例来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冯有真领导）在法租界里指挥地下“中央新闻办事处”为上海的报纸传递官方信息，并为忠于党部的报纸和新闻人提供资金。^[59]1938年

（接上页）根据资料，1936年有23家报纸和109名记者在上海工部局登记；到1937年到1938年间，数字分别跃到89家报纸和258名记者（《八·一三以来上海报界的动态》，《上海周报》，1卷5期，1940年6月，131页）。另见日本出版的《上海略览》（*Shanghai Yoran*），上海，1939，71—72页，列出了1939年的26家日销售量超过25000份的主要报纸。

[57] 用修辞手法来临时掩盖中国的失利也是爱国和“忠诚”的表现。因此，“改变战区”和“转移到一个新的地区”都意味着撤退。

[58] 徐铸成，271页。

[59]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国民党所参与的战时上海文化活动，特别是在报刊业方面的原始资料或系统研究的出版物。这一研究基于一些报人的个人回忆，如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1981；包明叔，《抗日时期东南敌后》，台北，1974；和李秋生《上海孤岛报业斗争史》，《传记文学》，45卷2期（1984年8月）。

1月，中共文化部（沙文汉和孙冶芳领导）发行翻译外国新闻的《译报》，并把它作为机关报，为意气相投的报纸传递延安的资料。^{〔60〕}

这些在日本人鼻子底下出版的抗日报纸大行其道，大大激怒了日军当局。《上海每日新闻》社论抱怨道：“那些在上海被占领后已经缄口的中国报纸，又开始极其活跃地做起反日文章来了。反日报纸依然能被获准出版，特别是在此时——上海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六个多月以后，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它就不应该被允许。”^{〔61〕}

日本的反应很强烈，任何洋商报都不被获准在外国租界以外的地区流传。为阻止反日报纸流入占领区，军事岗哨上贴了告示，在租界及其临近地区强迫进行邮政检查。^{〔62〕}更严重的是，租界中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政治恐怖的牺牲品。日本为以合法方式控制中国新闻业，不惜诉诸恐怖主义作为镇压的手段。

“宪兵队”在日语中的意思等同于“盖世太保”，它负责秘密情报和反间谍活动。据“维新政府”的汉奸称，在宪兵队的控制下，一个被称为“黄道会”的恐怖组织在1938年3月

〔60〕 王尧山，《关于地下党重建的经过》，《党史资料丛刊》，第1期（1979年11月），57—58页；另见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第1期（1979年11月）。

〔61〕 该社论发表于1938年5月。《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中存有其译文，第3019号（1938年9月）。

〔62〕 见湊田知绩，《上海宪兵队》（*Shanghai Kempeitai*），Tokyo, 1956, 9—19页。虽然如此，但是通过邮政工人仍然可以想办法“躲避日本检查”，有限的洋商报被秘密地藏上海附近的占领区。像其他黑市商品一样，这些报纸以高于原价（两毛五）70%到100%的价格被出售。关于邮政工人的抵抗，见John 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1942, 34页。关于黑市，见孔远之，《五月的上海》，307页。

成立。黄道会是一支由 1000 多流氓组成的武装（由声名狼藉的匪首常玉清领导），负责以恐怖方式破坏租界内的抗日运动。^{〔63〕}日本宪兵司令部就是午夜逮捕和严刑拷打的同义词，其总部设在虹口北四川路的新亚酒店（那里是汉奸早期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受到日本的保护），与“桥厦”仅一街之隔，^{〔64〕}在其保护下，这些恐怖分子在租界犯罪之后，能轻而易举地逃入虹口、南市或沪西的占领区，躲避逮捕。

自 1938 年 2 月开始，租界中发生了一系列暗杀和政治威胁事件，其中的第一桩大案就是以残忍手段谋杀蔡钓徒。蔡钓徒是小报《社会日报》的编辑，他被砍了头，脑袋就悬挂在位于薛华立路（Rue Chevalier）法租界巡捕房前的电线杆上，下面还写着字条：“看！看！抗日团体之结果。”^{〔65〕}在几个月之内，有六名被害人被斩首，他们的头被挂在租界的不同地方。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报告说已经收到装着腐烂的手和子弹的邮包和警告信，甚至负责调查蔡钓徒案件的巡捕都在邮件中收到手指。^{〔66〕}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中，一个新闻编辑后来回忆说，（孤岛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脑袋和手担心。^{〔67〕}

在恐惧的威胁下，抗日知识分子不得不在活命和维护人格的道德困境中做出选择。对一些知识分子而言，这选择是毫不

〔63〕《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第 8039A 号（1938 年 7 月）。

〔64〕关于桥厦之恐怖的生动描写，见 John Collar, *Guilt: The Grey Eminence Behind Character,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1985, 第六章。

〔65〕陶菊隐，《孤岛见闻》，上海，1979，30—32 页。另见朱梦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上海的暴行》，《上海地方史资料》，第 1 期（1982 年 12 月），152—154 页。

〔66〕朱梦华，154 页。

〔67〕同上。总之，据资料显示，与 1937 年的 22 宗案件和 82 个报告相比，在 1938 年有超过 42 起谋杀，收到了 148 宗威胁报告；见《上海工部局年报》，1939 年，237—347 页。

含糊的。用柯灵的话说：“路是分明的：这就是坚韧不屈地战斗。”〔68〕由于躲在租界的庇护所中而没有参加国统区的大后方抵抗，他们内心抱有内疚，而这次沦陷区的恐怖则被他们看作为救赎的考验。〔69〕这些知识分子总是把人性或人格与爱国责任等同视之，并且把它看得比活命更重要。“说生活第一，是不错的，斗争的目标就在于生存。”左翼作家唐弢写道，“但必须把国家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看成一条；必须把子孙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看成一条；……否则，说着这话的人，一定就是奴隶的候补者”。〔70〕因此，人就要抵抗。

“五四”知识界给人的联想，有点不同于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所描写的法国抵抗知识分子，这些作家把自己视为“道德精英”，他们用个人行动为国人驱走恐惧和犹豫，从而拯救国家。〔71〕文学研究会的创建人郑振铎曾以怀旧的语气讲述“五四”精英主义：“他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因之他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要为祖国和无数数的群众在最黑暗的漫漫长夜里擎起火炬，照耀到天明。”〔72〕

〔68〕 孔另境编，《横眉集》，325页。

〔69〕 比如，散文作家孔另境写道：“正当国难严重的阶段，撤退到大后方的文化人，正在火线上和敌人厮杀，我们留下来的可说已经够退缩了，蓑衣生活上的困苦实为分所应当。只要我们不降敌，只要我们还能动弹一下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尽可能给敌人一点不利。”见孔另境《华光剧专回忆录》，《上海孤岛文学回忆》，二卷，393页。另一位作家，文载道（金性尧）断言，爱情和个人的生命都应该为民族的自由而牺牲。见他的《初寒随笔》，孔另境编，《横眉集》，117—120页。

〔70〕 唐弢，《急就书》，孔另境编，《横眉集》，277—278页。

〔71〕 James Wilkinson, *The Intellectual Resistance in Europe*, Cambridge, Mass., 1981, 117—120页。

〔72〕 郑振铎，《大时代文艺丛书序》，孔另境编，《横眉集》，i页。引用的诗句出自宋代政治家范仲淹（989—1050）的著名文章。

经历了1937年末几个月的沉默后，洋商报的文学副刊成为作家们新的平台，可以让作家们发出大众的抗日呼声。他们把自己的任务称为“敲边鼓”，这个词让人想起鲁迅的“呐喊”，他们要用文学来“战斗”，“教育”大众“抵御”外敌。^{〔73〕}

1938年到1939年间，最受欢迎的文学副刊是《文汇报》的《世纪风》，由柯灵编辑，1938年2月开始出版，到1939年5月因《文汇报》关门而终刊。柯灵是上海沦陷期间首屈一指的文学编辑，他本人还是一位有造诣的散文家。1919年，柯灵生于绍兴（浙江），长期在左翼文化界活动。上海沦陷后，他因为经济的考虑和家庭的责任而留了下来。^{〔74〕}1938年2月，《文汇报》提供的这份工作即使他生活无虞，也给了他生活的目标——向自己和其他人证明，他仍然是全国抗日运动的一分子。

凭借高尚的人品和组织才能，柯灵迅速在《世纪风》周围建立起一个知识分子社团，团结了一批年龄、意识形态和文学道路迥异的作家。他们中的不少人是“五四”文坛的宿将，比如郑振铎、陈望道、共产党批评家阿英和巴人，以及年轻的左派唐弢和周木斋。他们有一套相同的历史观：憎恨日本侵略，反对旧秩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柯灵一样，都试图把文学变成与敌人搏斗的“刺刀”。正如散文家文载道所说的：面对“日本军阀残酷无比的炮火”，“枪”和“笔”没有区别，“都是焦土中愤火的闪烁”。^{〔75〕}而《世纪风》所发表的文章则以杂文（一种由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创造的战斗性的社会批

〔73〕“敲边鼓”一词出自巴人，见《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118页；所引的话出自孔另境编，395页。

〔74〕与柯灵的通信，1987年6月21日。

〔75〕文载道，《枪与笔》，孔另境编，139页。

判文体)为主,这就是为了与绝望和动摇的情绪作战,让中国从1938年连续的军事挫败中振作起来(比如10月武汉和广州的一连串的陷落)。^[76]此外,由于柯灵与左翼人士的联系,这份篇幅仅为一页的副刊还连载了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和其他关于共产党根据地的文学速写。^[77]

抵抗的启蒙观

王统照是《世纪风》的作者之一,很可能是在好友郑振铎的介绍下,他结识了柯灵,并由柯灵正式介绍加入这个团体。1938年初,经历了几个月的失业之后,王统照接受了暨南大学的一份教授中国文学的工作,而郑振铎时任该校的文科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做到1941年日军入侵租界。

暨南大学从真如校址(1937年10月陷落)迁往位于法租界陶尔菲斯路的一幢三层的公寓,后来又搬到位于康脑脱路的一座天主教堂顶楼。虽然只有200个学生,但该校是民族主义者抵抗日本向上海高校渗透的地下活动中心。由于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的学生组织在这所大学里也相当活跃。^[78]

[76] 关于杂文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整体描述,见Edward Gunn,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1982, 182—232页。

[77] 关于《世纪风》的回忆,见柯灵,《煮字生涯》,34—36页;另见徐开垒《〈世纪风〉副刊回忆录》,《上海“孤岛”时期文学史料》,12期(1986年12月),32—44页。关于史沫特莱对共产党地区的报道,见Janice and Stephen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Berkeley, 1988。

[78] 朱朗,《王统照先生在青岛》,冯光廉、刘增人编,60页。关于共产党在暨南大学的学生运动,见《上海孤岛文学回忆》,上,140—148页,卷二,20—29页,316—332页。

王统照并不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这主要是因为他打分严格，说话枯燥乏味，且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很少有学生选他的中国小说和古典诗歌的课程。不过，他的文名、博学和对学生的热爱使他在暨大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一个学生回忆：

自己最初对他并无好感。记得第一天上他的课，他就一句闲话也不说，先分讲义；分完之后，就开讲。……他的国语我一句也听不懂。……日子一久，就句句听得懂，而且句句有些味道。

在王先生的课里，每二星期作一次文……每一次的文卷，没有不是给改得乌黑一片。我感谢他。而因此也知道天多高，学问有多深。自己所写的，简直一无是处。

教师替学生批改文卷，批改得像王先生那样精细，不要说是眼前，即使从前，也是少有的。

其他的学生回忆：“他有些清瘦，头发略秃，戴着玳瑁边眼镜，经常穿着一件咖啡色长衫，看上去……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穷书生。”〔79〕

王统照也是一个负责的父亲。每天工作完毕，他会花几个小时来教导两个儿子。他们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一岁，由于战乱，他们的教育被打乱了。据小儿子回忆，他的课程提纲包括爱国诗歌、短篇小说，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都选自王统照自己的作品。〔80〕

〔79〕 第一段引用出自原予鲁，《暨南四教授》，冯光廉、刘增人编，56—58页。第二段出自徐开垒《怀念王统照同志》，《人物》，第3期（1981年5月），73—77页。

〔80〕 王济城，《序》，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研究资料》，i—iii。

为了赚取外快，王统照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兼职。1938年7月，他还担任了一份由国民党出资的英国报纸——《大英夜报》文学副刊的编辑。王在暨大有个同事叫翁率平，自从留法归来后一直担任这份报纸的编辑，就是他把这份工作介绍给王的。经过一番考虑，王统照接受了这份工作，但也提出了几个条件：不担任正式的编辑工作，享有编辑自主权，不在报馆办公，只和助理编辑秦瘦鸥（年轻的畅销作家）在附近的食肆讨论（不过，第一次讨论是在愚园路郑振铎的家里举行的，王统照是那里的常客）。虽然王统照提出的条件苛刻，但他耗尽心力经营《大英夜报》的文学副刊“七月”（让人牢记中日战争爆发的日子）很快成为爱国文学的集中地，作者多是“五四”宿将，如巴金和郑振铎。

但一个月后，王统照就辞去了这份兼职。显然的，沦陷区的敌对环境和他与亲国民党管理层之间关于文学政策的冲突，让王统照清楚地想起他与《文学》之间不愉快的经历。^{〔81〕}这种担忧加重了他的病情（他的伤寒一直拖延到1939年，而他的失眠症和哮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如果病倒，谁来养活他那不识字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呢？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他自觉辞去了抗战报纸编辑的角色。

《七月》的插曲体现出王统照在个人安危和爱国责任之间的抉择困境：一个人怎样才能在沦陷区活命，同时也不背叛国家和自己？当那些逃亡内地的作家说他们这些留在沦陷区的人是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的时候，怎样才能挽回这样的结果？^{〔82〕}一个人怎样才能“活得像个人”？在这一情况下，创作

〔81〕 秦瘦鸥，《王统照与〈大英夜报〉副刊》，《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卷一，131—133页。

〔82〕 如参见《留在上海呢还是到外地去》，《江南新闻》，第7期（1940年11月）。

成为王统照唯一的抵抗方式。

然而，王统照对于文学的诉求不能被简单解释为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很大程度上还出于他对文学力量的信仰，作为理想和价值的传播者，他要用文学来改变生活、激励希望、拯救人类。^{〔83〕}这无意中显露出他对于“五四”知识分子理念的忠诚：作为道德精英的一员，他要通过理想、理性和写作来改变社会。因此，尽管他敏锐地意识到行动比语言更容易得到认同，但他仍认为民族危机时刻的写作是一种自我认可和精神重建的行为。正如王统照所说的，在这个血流成河的时代，严肃的写作仍然可以激励读者的精神。^{〔84〕}所以，他选择创作应该被看作是对人道主义的启蒙理想的承担。这是王统照自“五四”时期就信奉的理想，这一理想与他活下去的渴望同样强烈。

王统照为谁而写作？他希望激励谁？他的作品似乎是为上海的青年读者而写的。“五四”关于“新青年”的话语就是把年轻人看作道德和文化转型的动因，这一信念仍然影响着。他是道德精英，是致力于国家启蒙的一分子。事实上，他的一些最富激情的作品很受大、中学生的欢迎，他们称这些作品是“黑夜中的闪光”。在学生们的记忆中，王统照在有关文学和道德品格等问题上，从不吝惜时间给予他们忠告和鼓励。^{〔85〕}

王统照相信，在整个沦陷时期，若要传播精神重建的理想，一个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系统地阐释人道主义，既要反对汉奸的民族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由于没有更好的名称，我姑且称这种理想为“抵抗的启蒙”。它是“五

〔83〕 如参见王统照的《编后话》，《文学》9，第2期（1937年8月）。

〔84〕 王统照，《王统照文集》，卷四，52页。

〔85〕 《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下，23—24页；徐开垒，《怀念王统照同志》，75页。

四”启蒙目标的一种合理的调整，是王统照在抗战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道德理性和人道主义者的和平观。

青年们的称赞肯定了他的写作价值，1938年间的王统照对“抵抗的启蒙”理想抱有明显的乐观态度。但是，由于沦陷区日趋糟糕的条件引起社会的恐惧和道德的堕落，加之他道德理想存在的逻辑矛盾，他的理想破碎了，他重新陷入了深刻的失望当中，这直接导致他在战争后期退出了政治活动。

1938年，王统照以《炼狱中的火花》为总题，在《世纪风》发表了一系列散文诗表达他的“抵抗的启蒙”观。散文诗让他获得了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那高度个人的、主观的语调和浓烈的隐喻性的语言，使抒情性的反省和道德劝谕在诗歌中和谐地融合。正如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在纳粹统治下用筹划未来的方法克服无助感一样，^{〔86〕}在这些诗歌中，王统照用艺术的手法表现了自由的理想世界和宇宙的和谐，他坚信这就是抗日运动的指导原则。作品以强有力的、超验的道德想象和对作者情感骚动的微妙重现获得了诗歌的浓缩的张力。《炼狱中的火花》呈现出恐惧与希望、踌躇与责任、期待与反省、个人利害与道德理想之间的一系列内在冲突，它再一次肯定了个人道德对残酷战争的胜利。诗歌《玫瑰色中的黎明》中的超验的道德想象最为突出，这首诗为王统照在上海青年中博得了广泛赞誉：

灯光昏黯中，正视你自己的身影，努力你的灵魂的遨游，
翔，坚定你的清澈的信念！

这样，你更感到暴风雨的雄壮节奏的启示。

〔86〕 如参见 James Wilkinson, *The Intellectual Resistance in Europe*, 37—40 页。

你所等待黎明前的玫瑰色已经从风片雨丝中透过来了。〔87〕

诗集的标题出自但丁，这为王统照道德理想中的神启观提供了证明。他把沦陷喻为中国人忍受的“炼狱”，强调个人意志战胜严酷考验的重要性。在考验中，人在彰显其勇气和特质的时候，也可能会激发出人性的潜能。所以，中国精神的重生就在于理性的优越：“愈当世变纷扰人生苦难的时代，……人类的理智却因外受横逆的摧残，内动良知的鞭策，比平常时更能迅速生长，发展，而处处显示它的力量。”（第21页）对于理性的赞颂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声的回响。实际上，王统照“抵抗的启蒙”所包含的大多数观念都能在“五四”思想中找到踪迹：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和捍卫人格。在这个人道主义理想的启蒙运动中，并非只有王统照一人持有此看法。当时正在闭关创作小说《秋》的巴金，也有类似的观点：“人们说一切为了抗战。我想得更多：抗战以后怎样？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88〕

然而，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语意、不同的假设和不同的价值标准。“五四”知识界的理想奠定在破除偶像的行为上，把道德全然看作“封建”糟粕加以摒弃，并代之以自我表现的美感。但是在沦陷区的历史语境下，每个上海男女都被迫在“生死关头”经历“忠”的

〔87〕 王统照，《繁辞》，上海，1939，43页。《繁辞》收录了王统照发表在《世纪风》上的一系列散文诗。除非另外说明，本节基本都在分析该书，页码在文中以插入括号的方式注明。

〔88〕 巴金，《家》，香港，1989，16—17页。

考验，此刻的王统照以大众的道德教育为使命，吸收了理性价值和个人自治的观念。他假设人类的行为取决于良心的判断，并引用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思想，认为理性是服从于道德的。但是，道德该如何定义？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王无意中显露出对儒家社会伦理的强调，正因为如此，他越来越远离了“五四”的理性精神。此刻，他不再批评传统的思想。相反地，他特别强调了忠诚的本质与其历史表现之间的差别。比如，虽然道德标准随时代变迁而有所不同，但指导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在中国，这一基本原则就以儒家忠信、廉耻思想为基础。在一次公开场合中，他指出欧洲启蒙思想中的自由、人道、个人理性和基督教思想中的兄弟情谊与自我牺牲，都是普世伦理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从未试图区分或者整合这两套道德价值，但设想了这两套价值观都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准则。相应的，在政治压迫的强力下，王统照更注重社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道德行为，而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品质。道德成了最高的普世准则。

王统照对道德行为的强调与上海知识界是一致的，因为他们大都内心中感到羞辱和内疚。《世纪风》编辑柯灵的情绪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而我们，暂时也都变成了奴隶。……躲在外人的荫蔽下动着笔，究竟有多大用处，这样是不是也算没有辜负做人的责任？”^{〔89〕}这些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以道德为绝对价值的摩尼教（Manichean）世界里。正如一个上海作者维正所说：“由于道德的有无，

〔89〕 柯灵，《柯灵杂文集》，184页。关于上海知识分子的抵抗的更多讨论参见第二章。

足以影响人的行为，故忠臣烈士之虽杀身殉国亦心甘，因存清高的道德；佞臣贼子之谄媚异族，因缺道德。现在，忠贞将士，浴血前线；后方汉奸通敌，奸商私贩仇货。”〔90〕

王统照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用“更新的民约”这一概念，将私德与公德这一对辩证体结合在一起。正如欧洲人文主义者通过民约论把个人自由和社会义务结合在一起一样，王统照希望用一个道德体系来限定个人自治的意义。在这一思想框架中，他预想了一个自由的、有责任感的人民组成的道德社会，他们通过个人的道德准则管理社会关系。这种“更新的民约”实际上就是个人道德在社会现实与政治现实上的一种投射。

但如何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间找到相通之处呢？王统照把他的论点看做抗日大潮中反对个人主义者的一剂解毒药，他重申“个体人格是人类世界中心”这一自由人道主义的前提。受到孟子侧隐之心和墨子兼爱思想的启发，他进一步假定人的本能目的就是追求快乐、躲避痛苦，因此同情他人、关注快乐和自爱一样是人的本质，但只有教育才能使这一潜在的能力得以实现。因此他经常引用洛克的名言：“知识即道德。”在“更新的民约”中，所有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理性的，他们在“道德自律性”中把握自己。他以实用主义的方法把快乐区分为“崇高的”和“卑下的”，并认为理性个体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恶意的”私利冲动引向高尚的公德境界：“人类使由褊狭的利己想进于公众的安宁与幸福。……道德价值由此而立，而利他心与推己及人的不自私精神其起点全由‘我’起。”（第35页）

通过建构这种二元的道德行为模式，王统照一方面为个人

〔90〕 维正，《道德与抗战》，《宇宙风》，82期（1939年7月），439页。

自主的重要性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又谴责自私自利和自我放纵。不过，在强调公共福祉的诫命之时，他陷入了谬误。因为如果实现个性的道路是唯一的，那么又何来人的自由呢？如果他在为公众服务的时候感到压抑的话，那么他又何曾达到过“真正的”个人自主呢？

由于未能考虑到这些问题，王统照不仅坚持把“更新的民约”这一概念当作中国抗日运动的终点，而且当作中国抗日运动的方法。如果每个个体都是有社会道德责任感的人的话，那么国家也按照国际社会的道德原则来彼此对待。他遵循自由主义的利益政治观点，把国际间的暴力根源归咎于国家利益的自私追求和民族主义狂热的不断升级。在这一前提下，他清楚地区分教条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他看来，后者是一种为民族自治而奋斗的理性的热情，因此能维持长期和平。在他的概念中，中国的抗日运动是一场正义的自卫战，是一场道德圣战，能够彻底摆脱掉一小撮自私日本军国主义者造成的恐怖和不公。在王统照看来，广大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一样，都是这些军国主义者的受害者，因此，他耐心地提醒抗日运动不要忽略了它的正义目标，要用道德理性来引导民族主义的热情。

在上海的抗日运动中，王统照提出了整合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的理想。不过，这一人道主义的理想由于表述的含糊和说教的语气，缺乏一个能与之协调一致的、可供实施的方案。他唯一的具体建议就是民意教育，概括地说就是“启蒙”民智，用人道主义的伦理观教育中、日两国青年。他相信人类的道德力量终将战胜不公和侵略，与大多数上海作家不同，他没有努力鼓动中国人民勇敢作战，而是把自己看作一个哲学家，劝告人们克制，尝试战后能够建立理性的社会：“在被外力强迫着流出群体的热血的时代，虽然大家的情感紧张，不能自己，但我们不会迷失了人

类的理性；我们不能愚笨地‘以暴易暴’，不尊重正义；……我们还期待着与人类共享阴霾后的温暖与光明！”（第29页）

但是，道德声明足以捍卫国家的自主权吗？怎样能使各自为政的自由个人们凝聚成一股历史的力量？在所有这些道德的背后，其先验权威是什么？^{〔91〕}而那些对中国人施暴的侵略者是否会有个人的理性？除了“教育”或者“个人楷模”之类的含糊概念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来调停世界和平理想与民族抵抗理想间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在不因集体利益而束缚个性的情况下，怎样实现自由？因为无法解决这些矛盾，王统照的“抵抗的启蒙”只停留于一种原初的观念状态，与其说是一个计划，或一个可行的政治行动手段，不如说是一个伦理道德律。他的这些人道主义理想，代表的仅仅是一种自我证明和个人抵抗的“伦理终极目标”，最多被当作是一种道德鼓舞，帮助那些以消极方式寻求有尊严生存的人们。

启蒙抵抗者的幻灭

从1939年到1941年，外国租界的自主权逐步旁落入日本之手，孤岛内的政治和生活条件都明显恶化。在此期间，纳粹德国军事占领欧洲。1940年9月，德国与日本缔结条约，胁迫上海的西方列强向当地占领军“逐渐投降”。租界当局日渐失去了对统辖区域的政治自主权和行政控制权。1939年末，日军对上海施行经济封锁，切断了从内地和海外供应的大米和其他

〔91〕 关于道德体系的理论问题参见 Bernard Gert, *Morality: A New Justification of the Moral Rules*, New York, 1988。

重要物资，造成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与此同时，日本加紧其恐怖攻势，意图破坏上海的政治局势。^{〔92〕}

1940 年以前，上海的经济曾经历过一个短暂的繁荣期。但这繁荣是畸形的，主要依靠“失去土地”的廉价劳工（来自战争难民）和东南亚市场的开辟。举例来说，这一时期的轻工业快速发展不是基于机器装备而是依靠进口原材料。^{〔93〕}所以当日本封锁切断了上海的海外市场 and 原材料供应之后，经济立即衰退，而大量的劳工也变成了不利条件。生活开支大幅上涨。

上海工部局米价索引明显地揭示出通货膨胀的结果。以 1936 年的一担（133.3 磅）二等本地大米为参考点，在 1940 年要花 107 元，到 1941 年 3 月则要花 127 元，比起 1938 年的 12 元的数字，上升了十倍多。^{〔94〕}在 1940 年 1 月，尽管租界当局试图通过进口西贡大米和责令 100 家米店卖低价洋米来缓解这一问题，但是除了让各处大排长龙外，这些办法收效甚微。1941 年 7 月，大部分官方定价为 89—116 元的“廉价大米”被卖到了黑市上。^{〔95〕}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那些幸运的有工作的

〔92〕 Robert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 1937-1941*, New York, 1941, 25—28 页。上海的大米主要来自青浦、淞江、常熟、昆山和无锡。从这五地来的大米在上海被统称为“本地大米”。

〔93〕 “畸形的繁荣”和“失去土地”（的廉价劳工）是上海此时期的普遍写照。见孔远之，《黄浦滩头》。关于上海战时工业的讨论，见唐振常编，《上海史》，上海，1989，801—805 页。

〔94〕 见刘铁孙，《从统计数据上观察上海物价》，《日用经济月刊》，3 卷 6 期（1941 年 6 月），880 页；《商业杂志》卷一，第 2 期（1940 年 10 月），53 页，和美国政府机密报告，1939 年 4 月—1940 年 12 月。根据后者的数据，生活支出索引从 1937 年的 118.15% 上升到 1939 年的 203.25%，又从 1940 年的 579.70% 上升到 1941 年 4 月的 732.79%。与《十年来上海市民生活》的数据相比，这仅仅是保守的估计。《十年来上海市民生活》，《上海周报》，4 卷 9 期（1941 年 8 月），283 页。

〔95〕 关于租界的“廉价大米”的一个有趣的报告，见美国政府机密报告，第 00752 号（1940 年 2 月）。关于“廉价”和黑市价，见同上，第 00697 号

人在“大多数状况下”都难以维持最低生活。^[96]一份面向收入微薄白领工人的杂志中建议，用70%的大米混合30%的红豆来节食，并且省掉早餐，这才是艰难时代“最健康”的生活方式。^[97]

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出现了新的不平等，不如说是旧的不平等的延续。当穷人的生存岌岌可危的时候，^[98]一些奸商却靠投机和谋取暴利轻易地敛财。在1940年到1941年间，由于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动荡，总共有53亿元的闲置资金从饱受战争蹂躏的内地和香港流入了上海。但只40%的资金被吸纳入银行系统，其余热钱都准备牟取短期暴利。^[99]持有资金的人囤积各种外汇和日用品，从大米到肉类、黄金和其他金属，大发“国难”财。黑市相当活跃，股票市场日趋疯狂。投机变得如此猖獗，以至于中上收入的人见面时候打招呼的话都不再是平常的“你好吗”？而代之以“你囤

（接上页）（1940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第8039A号（1941年8月）。在1940年，每人允许买一斗（17.6磅）洋米，但1941年份额下降到一升（1.76磅）；见屠诗聘，《上海春秋》，香港，1968，5—7章。

[96] 引自 Robert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52 页。根据上海市政府统计数据，1941 年上海最低生活开支是 167.84 元；中低阶层白领工人的平均收入是 150 元，学徒是 40 元，见《上海周报》3，第 7 期（1941 年 2 月），197。

[97] 《职业与修养》，卷一，第 2 期（1939 年 7 月），56 页。这两位编辑就是叶心安和著名的营养家和收藏家丁福保。

[98] 犯罪率、抢米骚动、罢工在 1938 年后的上升，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举例来说，在 1939 年 12 月就有 75 次抢米骚动（Robert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54 页），根据上海工部局的年报，罢工的次数从 1938 年的 12 次上升到 1939 年的 124 次，到 1940 年上半年（到 7 月）的 152 次；见《十年来上海市民生活》，284 页。至于偷窃，在 1939 年 7—12 月报告了 139 起，相比之下，1940 年则有 342 起（周化人，《上海的改造》，上海，1943，104—105 页）。

[99] 见《上海周报》，3，第 12 期（1941 年 3 月），366—367 页；唐振常编，804 页。

了多少”？中下收入的人也加入了囤积的狂潮，幻想能够跟上物价的飞涨。^[100]

同时，在民众中流行着一种享乐主义的情绪，因为他们想要回到正常的生活，也有可能是希望通过娱乐来暂时忘记战争生活的不幸。新闻出版人高尔德（Randall Gould）这样评论上海人的精神状况：“尽管商场的情形很差，但到目前为止，大世界和其他娱乐场所看上去很繁荣，也许是因为人们越是有大麻烦，越想要娱乐的缘故。”（1938年9月）的确如此，卖淫、鸦片交易和赌博都生意“兴隆”。由于恐怖行动非常需要资金，流氓们与日军沆瀣一气，把沦陷的沪西、南市地区变成了罪恶之乡。在愚园路、极司菲尔路和大西路之间，是被上海人称为“歹土”的地区，这里到处是舞场、鸦片馆（它们都有富于感召力的名字，比如“好莱坞”、“良伴”），而且戒备森严、日夜熙来攘往。甚至于，在租界里各种伪装下的妓院、电影院和夜总会都延长了营业时间。^[101]甚至那些自居“进步”、写过抗日小册子和文章的大学生们在这个时期都去跳舞和赌博。^[102]这种逃避者的萎靡生活方式，直接导致上海青年中每二十人里就有一个患上了梅毒。^[103]

恐怖主义只是加剧了经济的困难和道德的腐败。汪精卫于

[100] 见葛自振编，《民国二十九年之上海的经济与商业》，上海，1941。对于这些投机行为，他有生动地说明。此时的出版物上充满了公众反对投机，特别是反对大米暴利的呼号。关于这一现象的描写，见罗洪，《孤岛上海》，上海，1947。

[101] 关于上海沦陷时期的鸦片和赌博问题的文学描写，见郑定文，《大街》，福建，1983，86—94页；“生活的橱窗”，高尔德的报纸；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香港，出版地和年份不详，156—177页和214—280页。另见苏珊，《沪西毒窟巡礼》，《华美周报》，1期（1938年6月）。

[102] 1986年7月和刘以鬯在香港的访问。

[103] 《上海生活》，3，第2期（1939年3月），76页和3页，第5期（1939年5月），90页。

1939年5月抵沪，在1940年3月“返回”南京“重组国民政府”。当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正在升级它们的恐怖和宣传运动的时候，汪精卫到达上海激起了地下国民党对“和平运动”的破坏。

“军统”的“上海特区办公室”是国民党在租界的特工机构，由陈恭澍（不久就加入了汪的集团）掌管，拥有1000多名特工，都是由“青帮”（上海最大的犯罪组织）和在贵州接受过军事训练的知识青年组成。为了让汪精卫政府名誉扫地，这些地下特工从事军事破坏和暗杀活动，在1940年到1941年间杀死了160人。^[104]而另一方面，傀儡政府在租界出版报纸推动中日和谈和反共宣传（另见本书第三章），建立了装备精良、手段残忍的“特工总部”（特工总部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76号”，这是个委婉的名称，因为它位于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取代了原来的“黄道会”。76号是一个有组织的恐怖机构，由前国民党CC系成员李士群和丁默邨领导，成员多是流氓和国民党变节者^[105]。针对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恐怖活动，76号“以眼还眼”进行报复。炸弹、政治绑架、谋杀“几乎每天都在发生”。^[106]

在孤岛的抗日知识分子——特别是租界里的新闻记者，成

[104] 见关于“上海特区办公室”从1939—1941年活动的卓越说明，陈恭澍，《抗战后期反蒋活动》，台北，1986，2—40页，106—286页。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第4685号（1941年11月），1940年，“上海特区办公室”杀了107个日本军人、中国人和台湾通敌者。

[105] 见黄美珍、石源华、姜义华，《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上海，1984；和叶文心（Wen-hsin Yeh），“Dai Li and the Liu Geqing Affair: Heroism in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8，第3期（1989年8月）。关于76号的领导人的回忆，见马啸天和汪曼云，《汪伪特工内幕》（河南，1986年）。

[106] 这些描述来自美国政府机密报告，第00114—00118号（1941年5月）。

为这些暴行的受害者。作为爱国良知的代言人，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编写每一篇文章。1939 到 1941 年，从谋杀《大美晚报》的文学编辑朱惺公开始，20 多个记者不是被 76 号的恐怖分子暗杀，就是被绑架。例如，76 号刺杀了国民党地下领导上海新闻界的《大美晚报》的 Samuel Zhang 和《申报》的金华亭，报复两个汪政权的编辑被杀（见本书第三章）。

除了政治暗杀，76 号的恐怖分子还经常袭击报馆。在 1939 年到 1941 年之间，超过 7 家洋商报报馆被扔了炸弹，每家至少三至四次。举例来说，因为印刷了一份国民党怒斥汪精卫的文章，国民党 CC 系的机关报《中美报》在 1939 年 7 月就遭到 20 个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导致 3 死 23 伤。^[107]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抗日报纸不得不停刊。那些继续出版的报社被迫自我防御，在大楼内外设了多重铁闸和沙包，所有编辑和记者都搬进报馆躲藏。比如说，福州路上的《文汇报》就用栅栏把自己完全围了起来，只在前面留了一个小洞以便办公。^[108]上海市政警务厅也派出装甲车和卫兵 24 小时在报馆周围驻扎。^[109]因为这些保护措施，用编辑包明叔的话说：去报馆就像“去监狱”。^[110]确实，许多上海占领区的知识分子都觉得，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他们都像是囚徒。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急于扑灭汉奸的威胁，他们采取极端的意识形态手段激励民族情绪，采取动员行动。1939 年军阀吴佩

[107] 徐耻痕，《文汇报创刊初期史料》，《新闻研究资料》，3 期（1981 年 11 月），31—36 页。

[108] 徐开垒，《〈世纪风〉副刊回忆录》，104 页。

[109] 关于保卫措施的说明，见张志寒，《追忆抗日战争中上海新闻一幕斗争史》，《大人》，31 期（1972 年 11 月），48—49 页；赵君豪，《上海报人的奋斗》，上海，1945，1—85 页。

[110] 包明叔，《抗日时期东南敌后》，81 页。

孚死了。他曾大力宣传不要向租界寻求庇护，也不要为日本人工作，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上海新闻界称颂吴是中国道德“模范”，并组织了一场募捐运动，为他建造一尊纪念塑像。^[111]

一些年轻的共产党战士不再把吴佩孚看作“封建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反而对其“进步的激情”大加赞赏^[112]，并向艺术和文学中出现的“个人主义倾向”宣战。这就导致了一种狭隘的情绪（柯灵指出），一个人只要没有对抗日运动表现出积极的乐观主义情绪，就要遭到批评。^[113]在这种狭隘的意识形态下，针对“五四”理性和个人主义的攻击浮现出来。1940年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五四”思潮被视为“虚无主义的态度”，共产党批评家巴人首先对“老作家的沉默”提出责难，认为他们应该对上海抵抗文学的萧条状况负责。借着讽刺性的赞美他们的“隐忍”，他公开批评老作家们态度消极，没能表现出社会的抗战现实，脱离了中国大众（这当然暗示他们是不爱国的）。^[114]同样地，一些在上海有着很大影响力的“五四”作家学者（包括王统照的好友丰子恺、叶圣陶，他们刚刚逃到内地），也因为他们在民族危机时刻凝思于个人的情感（比如以美感的笔调描写了他们逃难途中优美的景色）而遭到诋毁。正如散文家文载道（我们将在第三章谈到这个人，他很快就妥协了）在对退隐主义的痛斥中所说（这一行动得到像阿英和巴人等许多领导抵抗的作家们的赞许），在中

[111] 见施英对这一宣传的摘要，《试论佩服吴佩孚的心理》，《上海周报》，1卷7期（1939年12月），186页。

[112] 《感情决定理智》，《上海周报》，1卷10期（1940年1月），280页。

[113] 柯灵，《市楼独唱》，1940年初版，上海，1984年重印，34页。

[114] 巴人，《论投机家》，《上海周报》，1卷16期（1940年2月），473—474页。

国人面前有——而且只有——一条路：武装抵抗。消极的态度和通敌合作没什么不同，任何道德口号都不过是对害怕和自私的借口。^{〔115〕}

王统照只有一份固定薪水，也感到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而在意识形态上也有同样的压力，虽然他从未被选定为暗杀的对象，但他的散文诗《炼狱中的火花》遭到过公开的怀疑。柯灵为王统照、丰子恺和叶圣陶的作品进行了辩护，强调文中的道德意义和艺术想象，但是于事无补。^{〔116〕}因此，也就无怪乎王统照所描写的上海是一座“牢城”和“死城”，在这里每个人都深陷囹圄，并被道德败坏的“瘟疫”所侵蚀。^{〔117〕}放弃了早年对人类潜力的乐观态度，深为人事上的徒劳感压倒，他感到幻灭了。现在，王统照意识到抵抗和启蒙实际上是不能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是对立的。在他看来，上海的抗日运动被“以暴易暴”的逻辑所左右，它所从事的是一场彻底放弃了道德目标的、残暴的和复仇式的非正义战争。那些爱国激情和行动主义的信徒、崇尚暴力的跟风者都应遭到道德的谴责。

因此，王统照深受爱国主义和纯洁道德折磨。从他的民族自治理想来看，他认同抗日运动；但从普世正义的人道主义被出卖的状况来看，他又深深地抗拒抗日运动。这一价值观的冲突该如何解决呢？在1939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他用一次自我实现的象征旅程解释他的新解决方式。在这一旅行中，战士和老者分别代表了暴力和逃避现实这两种不道德的存在，但是主人公既不接受暴力，也不接受逃避现实，他在对自我完善的

〔115〕 文载道，《扫除遗民气》，《横眉集》，孔另境编，上海，1939，110页。

〔116〕 柯灵，《拭沫之余》，文载道等编，《边鼓集》，上海，1938，351页。

〔117〕 王统照，《去来今》，上海，1940，131—133页。

永恒追求中找到了自由。“（幸福）在你不自私的寻求中。勤勉，公平，永远奔驰着你的长路。”^[118]王统照强调自我修养的重要性，拒绝任何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以一种绝对道德正义感，驱除失望的情绪。他赞美内在生命，就算是为自己生活，也远远优于在道德上不纯洁的社会行为。但是，道德上的纯洁如何有效地抵制人事腐败的状况呢？内在的追求能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吗？如果不能，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现实吗？不是在暗地里为个人利害开释吗？看来，他的解决方法所提出的问题比他所回答的要多得多。

1940年，当恐惧和经济压力达到极点之时，王统照选择写作一系列短篇小说，表现这些心理和情感的冲突。正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指出的，选择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来代替旧的艺术形式，从来不是纯粹的形式选择，而是道德的选择，一种“形式的道德性”。^[119]王统照更愿意选择小说，而没有选择曾在1938年使用过的散文诗，很可能是苏珊·佛格森（Suzanne Ferguson）所揭示的原因，即在清楚地表现作者的疏离感和孤独感的方面，现代短篇小说是最好的媒介。短篇小说凝思于“主观的现实”，以其紧凑感和有限的视角，对“局外人”的道德苦闷进行准确聚焦，揭露他们身边复杂的人际关系。^[120]的确，王统照在1940年所写的四个短篇小说，让人想起“五四”独有的悲剧的、沉闷的鲁迅和郁达夫小说，探索了

[118] 王统照，《去来今》，113—117页。

[119] 见 Roland Barthes, *Writing Degree Zero*, A. Lavers 和 C. Smith 英译, New York, 1980, 特别是15—17页。

[120] 见 Suzanne Ferguson, “Defining the Short Story: Impressionism and Form”。收入 *Essentials of the Theory of Fiction*, M. Hoffmann 和 P. Murphey 编, Durham, N. C., 1988, 460—468页。另见 Marston Anderson, “The Morality of Form: Lu Xun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y”。收入 *Lu Xun and His Legacy*, 李欧梵（Leo Ou-fan Lee）编, Berkeley, 1985。

道德情感和社会空虚的两难处境。

最杰出的一篇是《泪与翼》，这篇小说和其他三部作品于1941年6月合集出版。故事中充满天主教隐喻，反思色彩强烈，并以弥尔顿《失乐园》式道德悲观主义主题统领全文的结构，是一篇自传性的小说。作品中充满《圣经》原罪与救赎、优雅与堕落、启示与知识的二元叙述，是王统照在道德修养与社会参与两种思想抗争的真实写照。^[121]

这个故事旨在使战争中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在一座被战争蹂躏的城市中，“孤独、憔悴而孱弱”的和平女神发现自己在和谐、美的追求与结束人类“自我毁灭”惨剧想法的两难选择中举棋不定。相比之下，月姊却对战争漠不关心。她让和平女神瞥见了她所能给予的庄严的和谐，而后，又向和平女神揭示出人类的堕落导致了战争，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只有在死亡中才能得到救赎。哪怕是少数圣人、诗人，他们力求拯救人类以唤起人们的道德理想，也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因为与人类压倒性的邪恶相比，这些人在数量上和精神上都太微不足道了，不可能与之抗衡：

你想，人的祖先既已经是生于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121] 这部选集的名字是《华亭鹤》。其他三篇作品是《华亭鹤》（后面会讨论）、《母爱》和《新生》。它们和《泪与翼》不同，都曾经在上海或重庆的杂志上发表过。后两篇的主人公分别是天主教的修女和牧师。无论多么不幸，他们都试图带给中国精神的救赎，尽管主人公采用了相似的宗教符号，但采用的是不同的、有代表性的方式。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修女对孤儿的救助失败了，神父因为疾病和教堂的命令被迫结束了他在中国的服务。这也就意味着“启蒙”的失败。但这些作品都有一个不真实的结尾，和《泪与翼》不同，给读者一个未来会改变的假希望，这与叙述的自然进程完全不相符。这一结构上的矛盾尽管晦涩不明，但很可能是王统照为了不使读者大众疏离和气馁，想要增加一些乐观情绪的结果。所有这些作品曾经在郑振铎、王统照和耿济之三人的合集中重版。

尘土还不是罪恶的发源吗？他们生于罪恶，死于罪恶之中。

对呀，人类间曾有过那样的伟大人物。……但，可惜这种罪恶里偶有的灵明，胜不过他们同类的毒欲的火焰。……“完全人”太少了，太没有改善他们毒恶同类的气力了。他们，那点从天上带下来的灵明，如同暗洋上的一星亮光，立时被嘲笑与侵袭的风涛打灭了，浸没了，所余留的只是血水泛滥；只是毒欲的扩展，只是没有心的骷髅在尘土中撞打，毁坏。^[122]

在苦恼的煎熬中，和平女神为人类的罪孽深感痛惜。她“悲爱的泪滴”落在死者的身上，唤起了“复生欲望”，但所有人站起来就是为了杀戮。“把我们的仇敌尽毁”，“向他们的胸前掘出红水/向他们的后代留下赔罪”！这些奇特的意象让人想起皮特·布鲁格尔（Pieter Brueghel）的画作《死之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 1562 年），城市变成了一种恐怖的奇观。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平女神被那些在战争中复活的死人炸毁了。“女神的贞洁身体恰在一切静默后很自然的倒在地上，……只余一片鲜红的血茵铺在她卧倒的体下。”^[123]

因此，在“五四”文学中的那个著名启蒙隐喻——唤醒死者（比如鲁迅的“铁屋子”）——在这里被赋予了全新的、讽刺的解释。启蒙反抗者（和平女神）以道德理性之力为拯救人类所做的奋斗，得到的不过是变本加厉的暴行。这一讽刺清楚地说明，启蒙非但没有战胜人类的暴力，反而加重了抵抗运动

[122] 郑振铎、王统照和耿济之，《蘊华集》，福建，1985，50 页。

[123] 关于这幅画与布鲁格尔（1525—1569）的讨论，见 Keith Roberts, *Brueghel*, Oxford, 1971, 50 页。

中的极端教条民族主义。王统照的普世和平道德观带来的仅仅是和侵略一样性质的民族主义战争，都不过是“冤鬼的争斗”。在小说中，女主人公也要为自己的死负部分的责任，这一讽刺结局集中体现了王统照对人类道德潜力的悲观情绪。正如文中描写出和平女神死去前的心理：“她没了悲悯，没了同情，更失去泪滴与柔心！”的确，如果人类根本不向往最高的美德，那么所有提高人类条件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是自我的毁灭。所以，对一个启蒙的抵抗者来说，个人内在生命的修养是优于社会参与的唯一选择。

自我修养到什么程度才是对侵略的有意义回应方式？是像很多抵抗者所说的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与通敌合作没有什么不同吗？在40年代初，王统照为解决这一紧张关系，写下了《华亭鹤》，发表在好友赵家璧的通俗杂志上，并在1941年结集出版。

《华亭鹤》以苏州一位老艺术家的真实故事为原本。这位老艺术家是王统照故交，在日本占领苏州以后，他就离群索居，最后在1939年自杀了。在早先的一篇散文里曾经描写过这位隐居者，王统照用理学的“气节”和“行己有耻”来解释他的自杀，并称赞他是一个道德高洁的人。^[124]通过文学作品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朱老仙的自杀具有保全个人品德而舍身的道德/政治价值。朱老仙是一个“倔强的老人”，他不再是年轻时的那个文化反叛者，沦陷时期他沉湎关注自我的存在方式。在道德上，他反感周遭腐朽的社会，所以他满足于生活的沉思，在友谊和古典诗歌中寻找安慰。他的气节观念与其说是一种行动，不如说是一种主张。在小酌了几杯之后，他对

[124] 王统照，《追念同轩老人》，《去来今》，40—46页。

朋友说：“书害了我，无妨，安如，我敢说凭嘛不得法，我一辈子——我能说，从十五岁起吧，竖起脊梁活到现在！有死的那天，我不会再折弯了。您，敢情不信？”当他唯一的儿子，一个“年轻、乘机善变的留学生”加入傀儡政权，成为一名高级官员之际，朱老仙的忠诚考验来临了。他试图改变他，但没有用。“二十五年前，（朱老仙）他自己正在北京做法官，儿子还没进中学，每晚上虽是守着一堆诉讼文卷，总得抽出几十分钟专教他几句有关修养的古语。如今……更难自抑制地质问自己：为什么他……偏与自己青年时的精神来一个反比呢？……个性？还是教育的结果？”^[125]这一个人悲剧迫使他面对私德和公德的两难处境。既不能挽救自己的儿子，也不能大义灭亲（对许多抵抗作家来说，这个观念非常重要），为了成全自己的道德理想，他选择了自杀。他给儿子留下了一首最喜欢的苏轼诗歌，最后一联说明了他自杀的理由：

为君垂涕君知否，千古华亭鹤自飞。^[126]

“华亭鹤”暗指东晋诗人和名将陆机。他不屈的忠诚变成了道德正义的寓言。因而这位隐居老人的自杀所代表的是消极的抗议之声。尽管自我修养在反抗侵略方面的确效果不佳，但它也并非投降的行径。尽管略显勉强，它也是对纯洁与尊严的守护。与《泪与翼》不同，这个悲剧的结尾象征性地表明了对五四启蒙信仰的挑战。如果年轻一代——王统照曾把《炼狱中的火花》题献给他们——除了受过更多的现代教育，比老一代

[125] 郑振铎、王统照、耿济之，102，109—110页。

[126] 同上书，112页。

更糟糕的话，那么这是不是可悲地证明“新青年”是误导的信仰，理性与进步是徒劳的呢？

显然，朱老仙与和平女神的死是王统照选择内在生命而非社会参与的象征。他的选择已经转向，不再像早年那般乐观认为抵抗可以激发人的道德潜力和批判理性力量，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陷入完全的悲观主义。正如他悲叹的：

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诼，此吾所以悲也。^{〔127〕}

这种绝望的情绪从一首古诗中流露出来，这是他在《华亭鹤》集封面上写下的诗歌，为向出版商、散文家陆蠡表示感谢，但却标志着王统照开始彻底拒绝社会参与。他的心境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与1927—1931年间的心态相比，他更强调气节而不是启蒙。由此，开始了他离群索居的生活。

日本完全占领下的隐退主义

1941年12月8日清晨，紧随珍珠港轰炸之后，日本把它的军事占领扩张到了上海的外国租界。现在，全城都被占领了，所有的西方人都被送到收容营地。“孤岛”消失了。上海“畸形的繁荣”突然间永远不存在了，而代之以一个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社会腐败和颓败末世的世界，当时把这种生活状况

〔127〕 该诗为韩非子句，作为译诗集《题石集》题词，收入郑振铎、王统照、耿济之，《蕴华集》，扉页。

比喻为“黑暗世界”。^[128]

爱国知识分子成为日本镇压下的首批受害者。日军一进城，就关闭了所有洋商报和出版公司，命令没收反日书籍，净化“敌对文化”。^[129]当时，出版检查和政治监督全面强迫执行，日本当局命令所有抵抗者向“76号”登记，如果他们希望得到“政治特赦”，就要对这个新政权表示忠诚。^[130]与此同时，从1941年12月中旬逮捕许广平（鲁迅的遗孀）开始，日本的思想警察开始有系统地迫害抵抗作家。出版家陆蠡的悲剧就是一例，刚刚再婚的他主动到日本宪兵队，希望能尽早让书局的图书得到豁免，却从此一去不返。^[131]

在这种恐怖气氛中，阿英、巴人和赵君豪等众多有着国民党或共产党背景的知识分子抵抗者逃出上海。但是，大多数作家无法离开，“在上海的文化人，几乎不能做什么工作了，有的已经蛰居起来了，有的预备改行了”（孔另境）。^[132]为了生存下去，无论是退守到自我修养，还是变成一个街头商贩或是旧书商，^[133]这种被动的抵抗模式让人联想起牟复礼（Frederick Mote）所说的

[128] “黑暗世界”的比喻非常流行，除了投敌者和日本人的书刊之外，它几乎出现在当时所有书写上海的书籍和文章中。参见如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中随处可见。关于这一比喻及其内涵的有趣说明，参见陈存仁，226—230页。

[129] 窪田知绩，《上海宪兵队》，东京，1956，32页。《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121页。

[130] 与柯灵的通信，1987年6月21日。

[131] 没有准确的数据说明在这一迫害中有多少受害者。迄今我们所知的，有30起逮捕案，大部分是左翼作家。受害者包括夏丏尊、柯灵、孔另境。参见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1948，86页，136页。另见《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下，196—205页。

[132] 《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下，402页。

[133] 比如，作家兼画家钱君涛在1941年12月后停止出版反日杂志，关闭出版社，在占领期间专心研究甲骨和中国古代艺术（参见钱君涛，《留下纪念的痕迹》，《文艺春秋》，5期，1945年9月）。陶菊隐离开了《新闻报》的

中国传统里的“义务的隐逸”（compulsory eremitism）——儒生以消极的、不合作的方式来象征性地抵抗新朝廷。实际上，退隐提供了一种被认可的文化抵抗方式，采用这种方法，退隐者在面对危险无常时既可以保全性命，又不必牺牲道德准则。这既是纯洁性的追求，也是爱国抵抗的象征声明。^[134]虽然上海作家们用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135]的信条来表达他们对合法政权的忠诚，但他们对这一信条进行了现代的、民族主义的解释。他们拒绝妥协，不仅是出于对国民政府及其领袖的忠诚，而且是出于对整个民族的道义承诺。^[136]因此，他们大骂那些认为纯粹为了生存而投敌、声称“失节事小，失业事大”的知识分子，^[137]严厉谴责这些人缺乏气节，完全被欲望所支配。

（接上页）编辑工作，从事“晚清百日维新”参与者的传记写作，并照顾他多病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参见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上海，1947）。作家章铎者兜售大米以维持家人的生活，但大多数作家转行当了二手书店的商人。（参见唐弢，《我和象贤》，《新文学史料》，1期，1985年1月，77页。）

[134] 参见 Frederick Mote,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收入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Arthur Wright 编, Stanford, 1964, 特别是 279—290 页。本书将在尾声部分详细讨论日军占领下的退隐者与元代和明代朝代更替之际的退隐者之间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就某些重要方面而言只是表面的。但牟复礼对于投身政治权威和投身承诺原则本身之间的区分，以及关于大部分儒家忠良以“克制力”（restraining force）为效忠的主要手段的观点（286 页），都有特别充分的根据。关于纳粹占领欧洲时的“象征性的抵抗”（symbolic resistance）这一术语使用的细微不同，参见 Werner Rings, *Life with the Enemy: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Hitler's Europe, 1939-1945*. J. Maxwell Brownjohn 译, New York, 1982, 153—161 页；James Wilkinson, *The Intellectual Resistance in Europe*, Cambridge, Mass., 1981, 112—126 页。

[135] 这一名句出自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参见朱熹编，《近思录》（*Reflection of Things at Hand*），陈荣捷（Wing-tsit Chan）英译，New York, 1967, 177 页。

[136] 正如剧作家李健吾表达出上海退隐者的思想：“为良心，为民族，做了一个隐士。”（李健吾，《挽三哥》，《文汇报》，1945年11月29日）

[137] 江亢虎，《失节事更大》，《中华日报》，1941年5月5日，101—102 页。

为了避免被戴上逃避和虚伪的帽子，传统的隐退被赋予了现代想象。^[138]这些消极抵抗者用“蛰居”来为自己的撤退正名，把隐退比喻成一种生理的必然状态，使这一概念得到了重新定义，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被迫潜伏下来，保持沉默，以等待中国最终的胜利。所以，“等待黎明”或者“期待春天”或者“花儿即将开放”变成了日本占领时期抵抗艺术家和文学家们常用的意象符码。“沉默是……勇气的开始”，正如散文家唐弢写下的，“人类历史是一篇沉默的记录，急功好利之辈，纷纷用着损人利己的手段，制作历史，历史是沉默地等待着，等着那些人化为尘灰，归于沉默。”^[139]尽管个个都抱有爱国之心，但在贫困和痛苦面前只能退却，这种退却却需要更大的隐忍。

大家可以隐忍下去的动力还在于彼此之间的互相支持。当侵略继续下去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团结在共同的爱国诉求之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密。^[140]这些各自的经历被概括为“相濡以沫”，这一比喻出自《庄子·大宗师》，意思是“困在陆地上的鱼用口沫互相湿润”。^[141]这些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想象成离开水而搁浅的鱼，为了在沦陷时期的沉默中生存下去，他们在彼此间寻找着友谊和支持。

[138] 关于传统的退隐的现代想象的简洁说明，参见蒋星煜。关于隐士、隐逸的词语的历史发展，参见 Wolfgang Bauer, “The Hidden Hero: Cre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Ideal of Eremitism”, 收入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Donald Munro 编, Ann Arbor, Mich., 1985。

[139] 唐弢〔默然〕，《沉默篇》，《春秋》，1卷3期（1943年10月），14—16页。

[140] 正如耿济之的妻子曾愉快地回忆道：“‘孤岛’时期，济之杜门谢客，很少与亲友往来。可是抗日的共同目标把他与其他几位蛰居‘孤岛’的文艺界进步朋友联接得更紧密了。他与郑振铎、王统照……等人经常秘密往来，互勉斗志。”参见钱福芝，《追怀蛰居时期的耿济之》，《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354页。

[141] Burton Watson 英译，*Chuang Tzu: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1964, 76页。

最常见的做法是由一群密友或亲戚（通常是三到十个人）在家庭聚会，不定期组织茶话会。大家互相认可对方的努力，分享着从无线电和流言中听来的不利于日本占领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团体感和亲密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环境，刺激他们消极的内心，缓和痛苦和挫折感。这种私人的聚会组成了詹姆士·司各特（James Scott）所说的“社交空间”，其存在是对占领者的一种隐形挑战。^[142]

此外，他们还得到社会机构的支持，最受欢迎的是出版社，这是他们的主要去处和经济来源。比如，位于公共租界的开明书店，为上海沦陷时期的自由文人提供一份虽然微薄但很稳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还带来了真正的团体感。开明书店成立于1925年，在1937年已成为中国文学的自由之声。战争爆发后，开明书店把它的部分业务搬到了桂林和重庆，而上海福州路上的办公室负责协调。^[143]开明书店在1941年12月一度关闭，但到1942年中旬和其他大出版社被允许重开，条件是不再印刷反日或反满洲国的出版物。

为了暗中抵制与日本合作，开明集中重印中国经典读本和汇编工具书。前者能够培养上海读者的爱国意识，后者能够给这些知识分子一份长期的富有意义的工作，以帮助他们忍耐沦陷，等到最终的解放。开明聘请了一些著名的老学者和作家从事编辑工作，他们虽然没有生活来源，但在道德上坚定地抵抗

[142] 参见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1990. 关于此类群体的非常有趣的讨论，参见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陈存仁，222—239页。

[143] 孤岛时期，上海办公室负责发送新的手稿或者老的印板——既有高中课本，也有文学作品——到内地去印刷（经过两条海路从上海到重庆或桂林：一条经过宁波或温州，另一条从越南海防到昆明）。上海开明办公室的每个编辑每月收入20块。这当然不够支付上海的生活，所以大多数编辑还做教书之类的兼职。参见《我与开明》，上海，1985，291—303页。

侵略者。时事艰难，这些编辑在开明书店这个退隐社团提供的友爱支持下，却找到了些许满足。^[144]同样的，开明的编辑和友人也通过公司的商业网络从国统区的作家中得到鼓励。^[145]

王统照也是开明的编辑之一。他在1941年8月暨南大学关闭之后成为开明书店的一员。他的两个学生回忆，在最后一天的课堂上，王统照第一次在课后谈起了他的私人生活。最后，他满怀深情地对学生们说：

今天是最后一课。同学们，你们都很年轻……我们的日子正长，青年人要有志气，要有冲破黑暗的精神。学校可能内迁，你们跟不跟学校到内地去，这要看个人的家庭环境来决定，学校不勉强，因为留不留在沦陷后的上海，这不是决定性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走什么道路，在精神和行动上，是坚持抗战还是向敌人投降，这要有个准备。

这些话变成了王统照自己未来的预言。^[146]疾病、贫穷和沮丧，他没有跟随大学到福建新址，而是留在了上海。他不久

[144] 开明编辑部包括像夏丏尊、徐调孚、顾均正、周振甫等“五四”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江浙人。1941年后聘用的新编辑包括历史学家周予同、文学史家郭绍虞（在他被迫接受日军占领的北京大学的教职之后，他逃出了北平）和目录学家陈乃乾。开明书店的这个退隐团体的感情，可以用郭绍虞所写的一副对联概括，这副对联就挂在办公室的门上：“炊烟窗下腾腾起，流水府前汨汨来。”对联的田园味道改善了悲惨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在摇摇欲坠、连天漏雨的书店里，营造出一个惬意的隐逸世界。参见《我与开明》，108—170页。

[145] 《我与开明》，168—173页。与柯灵的通信，1983年2月1日。

[146] 徐开垒，《怀念王统照同志》，76页。另见原予鲁，《暨南四教授》，58页。

就把名字改成恂如，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日本人的迫害。当时，日本人对知识分子的招募劝降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147]

除了不定期地去开明书店，他过着隐居的生活。所以，他的大部分朋友和学生甚至不知道沦陷时期他一直在上海。^[148]像小说中的朱老仙一样，他过着退隐的生活，投身于为开明编写英汉字典的工作，在古典诗歌和友谊中寻求安慰。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中，他和著名作家耿济之、夏丏尊、郑振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去书店之前，他们经常和王统照一起共进午餐，或者在南京路的广东菜馆大三元，或者虹口路上的老半斋，两家饭店都在开明办公室的步行距离之内。^[149]和王统照一样，为了避免迫害，他们也都在沦陷之后改名换姓。这几位“五四”宿将在20年代的北京学生时代就已经相识，并在各自的新文化事业中共同工作，但他们的友谊是在沦陷时期，特别是1941年以后才变得亲密起来的。^[150]

1937年上海陷落后，夏丏尊和耿济之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夏丏尊是留学日本的著名语言学家和自由主义教育家。据他自己所言，他不能逃到内地去的原因是出于家庭责任。尽管有高中教书的微薄收入和版税的补贴，他还是经常陷入经济窘境，连自己的孙子都上不起学。长期心情不佳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夏丏尊皈依佛教以寻求安慰，成了一名居士。他对佛

[147] 冯光廉、刘增人编，42—43页。

[148] 徐开垒，《怀念王统照同志》，73—77页。

[149] 参见陈福康编，《郑振铎一九四四年日记》，《新文学史料》，第2期（1990年），208—222页。

[150] 1946年王统照写道，他和夏丏尊在192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但是他们直到沦陷以后才成为好朋友。参见他的《丏尊先生故后追忆》，《文汇报》，1946年7月5日。

教的浓厚兴趣也源于耶稣救世神学的倾向。在他看来，沦陷的上海是一个精神衰变的世界，只有佛的智慧能够启迪人们走出颓废。1939年，上海寺院委托他长期负责系统编辑、校订各种佛学手稿的工作，以备出版。虽然他远离了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不过夏丏尊还是通过他的佛学项目来帮助他的活动家朋友们小心地避开政治迫害，其中包括共产党的文学组织者楼适夷。^[151]

俄国文学翻译家、职业外交官耿济之因为心脏病和高血压，不得不留在医疗条件更完善的上海。为了打发消极的生活，他投身于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他计划在占领结束后出版），这一愿望始于“五四”运动时期。除了每天早晨几个小时的翻译工作，他还在善钟路开了一家小书店，以维持父母和兄弟的孩子们的生活。由于这个书店位置便利，满壁图书，成为朋友们最喜欢的聚会场所。这一小书店也成功避开了日本人的骚扰。^[152]

另一方面，文学史家郑振铎凭借广泛的交际能量和博学，成为上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公认的领袖。他以明代忠良黄宗羲自喻，把藏书癖当作支持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1938年，他提出纪念晚明东林党人“以身殉道”气节，与“文协”二十位

[151] 夏丏尊皈依佛门也是他反抗通敌合作的方式。1910年他作为留日学生回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许多日本军官强迫他加入汪精卫政府。夏丏尊公开皈依佛门以表明他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尽管如此，1943年11月宪兵队逮捕了夏丏尊和其他的六位出版商（两个来自开明书店）和教授，把他们拘押了三个星期。夏丏尊被释放之后，他花了更大的精力投身佛教的翻译。关于夏丏尊在沦陷时期的生活，参见楼适夷，《怀念夏丏尊》，《人物》，第4期（1981年7月），152—159页。“居士”是中国人隐逸的一种模式，参见 Wolfgang Bauer, “The Hidden Hero: Cre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Ideal of Eremitism”, 172—175页。

[152] 参见钱福芝，《追怀蛰居时期的耿济之》，354页；赵家璧，《怀念耿济之》，《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359—372页。

成员一起创办了“复社”，其中包括共产党作家巴人、鲁迅遗孀许广平、银行家孙瑞璜和《申报》编辑胡仲持。复社通过秘密的发行网络，出版了第一版鲁迅作品集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译本。^[153]从1940年到1941年，在张永霓（光华大学校长）和徐森玉（故宫博物院馆长）的帮助下，郑振铎以国民党教育部和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名义，致力于搜集善本图书和文化珍品，以避免被日本和满洲国的特务据为己有。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后，他就把这批善本图书中的一部分海运到香港，另一部分（可能是在夏丏尊的帮助下）藏在善钟路的寺庙里，就在耿济之的书店附近。由于相识之人过多，郑振铎被迫马上在居尔典路的一所小屋子里藏身。不过，他拒绝放弃“文化战”，只是现在得靠他自己孤身奋斗，无法得到政府的资助。每个下午，郑振铎假扮成购书者，继续在福州路一带搜求善本图书，他的房间里很快就放满了书籍。晚上，他忙着编辑一部多卷本明代幸存忠良的作品选集，其间还要学着自己做饭和洗盘子（他的母亲妻儿还住在愚园路的家里）。^[154]正是共同的知识背景和爱国信念，让王统照和这些“五四”宿将保持了一致的团结。

这群朋友通常是在开明书店、夏丏尊的书店，或郑振铎、

[153] 《鲁迅全集》第一次的编辑和出版是由许广平、郑振铎和巴人发起的。这二十卷著作的出版是在复社总部，也就是胡仲持在巨籁达路2号的住宅中开始的。全集的编辑和校对工作都是在位于霞飞路164号的许广平的住宅中完成的，涉及了十人以上，包括许广平、唐弢和柯灵。埃德加·斯诺的书由包括胡仲持和青年共产党作家梅益、冯宾符和林淡秋在内的十一人完成，每人负责一章。关于复社及其出版物的亲密、有趣的记录，参见《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24—65页。

[154] 关于郑在沦陷时期的活动，参见他的《劫中得书记》和吴文祺、周一萍和郑尔康在《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中的各种回忆，上，140—188页。另见诗人辛笛和作家吴岩、师陀和唐弢在《回忆郑振铎》（上海，1988）中的回忆录；特别重要的是陈福康编《郑振铎年谱》，北京，1988，285—328页。

耿济之、章锡琛（开明的老编辑）的家中见面，他们饮酒、闲谈、聚餐（耿太太的俄国烹调和郑太太新学的福建菜），有时候还一起打麻将、在煮酒的炉子上煮咖啡，^{〔155〕}互相诉说生活的难处，讨论文学和政治，或者交流诗歌，表达他们对国家的信念，或是个人内心的痛苦，甚至也猛烈抨击那些已经妥协的朋友们。^{〔156〕}正像王统照后来回忆的：“至于那时的窘迫、逼迫、隐避……一言难尽，大家偶得聚谈，顾及环境的恶劣，受经济的窘迫，往往长吁短叹，甚至瞪眼切齿。”^{〔157〕}

这个团体也是爱国出版物的网络。比如说，郑振铎安排耿济之与赵家璧签约，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赵家璧就住在王统照的隔壁，他在隐居的时候与青年作者保持联系，包括柯灵和报纸副刊编辑范泉，他们经常到开明书店来拉稿子，寻求编辑意见。^{〔158〕}

正是通过这种私人关系，王统照很快出版了他的小说。1943年2月，《世纪风》的编辑柯灵从著名的小报作者、盗印商平襟亚那里接受了流行杂志《万象》的编辑任务。他接手之时，正逢大多数学者隐退，既避免直接与侵略者对抗，又防止与汉奸控制的文化界拉上关系的时刻。而自称理想主义者的柯灵（在“76号”企图迫使他改变立场之际，他曾藏匿了好几个月）却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维护良知的声音，并为上海读者提

〔155〕 有两篇关于分享食物和酒的回忆文章，参见徐调孚，《忆耿济之先生》；周予同，《悼济之先生》，《文艺复兴》3，第3期（1947年5月），275—276和277—278页。

〔156〕 王统照，《丐尊先生故后追忆》。关于王统照在这一艰难时代的诗作，参见冯光廉、刘增人编，285—328页。

〔157〕 王统照，《丐尊先生故后追忆》。

〔158〕 关于这一社团的联系，参见如范泉，《我认识的王统照先生》，《新文学史料》，第2期（1990），120—122页；《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352—371页。

供文学杂志，以宣泄他们的爱国情怀。^[159]借助他的编辑权力与资源，以及他和开明书店——这个被他称为“上海和内地作家信息的汇集点”^[160]——的密切关系，柯灵没用几个月就把《万象》从一本与政治无关的、迎合大众娱乐口味的、鸳鸯蝴蝶派的出版物，变成了抗日的论坛。许多隐居的作家，包括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开明书店资深编辑徐调孚，以及青年作家师陀、唐弢都为《万象》投稿。可见，这本杂志给上海占领区的消极者们以公开发言的机会。^[161]

为了避免日本的审查，柯灵采用了一些表达爱国情绪的巧妙方式，这些方式后来被其他有相似政治倾向的杂志采纳。比如，1944年他出版了开明同仁庆祝夏丏尊结婚四十周年的特刊（周年聚会上有美酒和美食，王统照后来回忆说在被占领的上海这是少有的幸福和圆满的情景），^[162]包括王统照在内的许多上海和内地著名的作家、编辑（像朱自清、叶圣陶）都为此题诗。所有作品的形式都是古体诗，感情真挚，为这对老夫妇白头偕老的祝福中，巧妙地表达出他们对中国不可动摇的忠诚。^[163]柯灵还在每期杂志上发表国统区作家的私人信件，或者亲历报告和书法，比如叶圣陶、丰子恺、巴金和茅盾等人（这些作品都来自开明书店）。私人生活与政治信息的混合，表明了所有中国人在团结一致等待解放。

尽管这样做法圆滑灵活，柯灵还是要为此付出代价。在

[159] 与柯灵在1987年6月21日的谈话。

[160] 同上，1988年2月1日。

[161] 关于《万象》的全面研究，参见杨幼生，《回忆柯灵同志编万象》，《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期（1981年1月），21—28页。柯灵回忆他经常去开明书店约稿或打听上海和内地作家的消息（1988年2月1日与柯灵的谈话）。

[162] 王统照，《丏尊先生故后追忆》。

[163] 《夏丏尊羊毛婚唱和诗》，《万象》，3卷3期（1943年9月），55—58页。这种利用私人场合达成政治目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很普遍。

1944年6月和1945年6月，他两次被宪兵队逮捕。第一次（他被拘留了六天）让他丢掉了编辑职位，因为平襟亚担心被他连累，马上就关掉了《万象》；第二次他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经过九天的严刑拷打，柯灵始终不屈服，拒绝出卖他的朋友。伤势好转以后，柯灵不想再冒任何危险，马上在1945年6月逃出了上海。^[164]

在1943年7月到1944年6月之间，王统照正是在柯灵的《万象》上连载了他最后的战时作品——长篇小说《双清》。据柯灵说，王统照同意写这个作品，主要是因为需要额外的收入支持家用，同时也是因为出于自己和柯灵之间友谊考虑。^[165]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让王统照重燃乐观态度的原因可能是，他显然看到不合作的道德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尽管这效果是有限的。尽管上海的知识分子不能打败敌人，不合作的态度至少表现了他们自己的正直和不屈的尊严。事实上，从1942年到1943年，占领者曾经多次对文学现状表示不满，上海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作家、雇佣文人，作品只表现一些不关心政治的乡愁主题（参见本书第三章）。日本人在招募知名作家的工作上显然受挫了，在他们眼中，这些知名人士的服务与合作对沦陷区的“文学复兴”至关重要。沦陷区的合法性也因此岌岌可危。^[166]

王统照的连载小说并没有完成。故事的主题结构看上去已经完备，但情节和主要人物尚需进一步发展。柯灵第一次

[164] 参见柯灵，《煮字生涯》，上海，1986。

[165] 与柯灵的谈话，1988年2月1日。

[166] 参见如高桥良三，《建立中国新文化的基本问题》，《文协》，2卷1期，（1944年1月），4—9页；周化人，《东亚文艺复兴运动》，《文协》2卷2期，1944年3月。

被捕后，王统照可能因为害怕受到牵连停止了写作。但是，小说模糊的结尾仍能反映出王统照当时的思想状态，他对于未来深感无助。事实上，这怀疑的语调似乎恰当地代表了他在战争年代的感受。

事实上，《双清》是王统照占领区经历的写照。这个故事发生在军阀统治的中国东北，其政治环境与沦陷的上海极为相似，讲述了一个歌女寻求启蒙的故事。歌女象征着抵抗者，^[167]这一选择的意义显而易见，后“五四”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柔弱、无助的，她们往往是男性社会和性虐待的纯粹受害者。在象征的意义上，女性的生活与日本统治下消极抵抗活动令人沮丧的状况非常相似。^[168]通过塑造“贞洁”的妓女形象，王统照的言外之意在于表现爱国者在极度的危险下为维护道德操守的奋斗。

笑倩是一个“美丽、坚定、高贵”的东北歌女，她小时候被卖进了妓院，尽管顶着很大的压力，她想方设法维护着自己的贞操。她害怕变成“军阀或者官老爷”的小老婆，北伐战争的爆发实现了让她彻底改变人生的愿望。她爱上了那个把她从妓院中救出来的年轻的革命者，但这爱情稍纵即逝。他仅仅把她看作一个“不一般的妓女”，而她也怨恨他的屈尊降格、道貌岸然的态度，说道：“你不要瞧不起这又弱又细碎的花朵儿。”

[167] 事实上，把作为社会受害者的女性和作为政治牺牲品的象征的抵抗者联系起来的做法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中司空见惯。比如，耿济之在1942—1943年的《万象》上发表了三篇小说，描写被社会迫害的女性——寡妇、被强奸的女人和娼妓——以象征在日本统治下的抵抗者。参见他的《顾大嫂》、《重逢》、《保姆》，都收入郑振铎、王统照、耿济之，113—145页。

[168] 有关这一解释的研究，参见周蕾（Chow Rey），*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Minneapolis 1991, 3—4章。

笑倩因为骚乱逃到了乡下，她被一个叫“高大”的“隐居”老人收留。他是一个心灰意懒的学者，在当地德高望重。高大帮助笑倩学习儒家经典，并对她的自然之美十分欣赏。她很快就喜欢上了这种田园诗般的宁静生活，虽然“那强壮英俊的青年经常会来到她心中”的想象会引起她的“一种奇怪而模糊的不快”。很快，内战引起的政局动荡打破了乡村的平静。田园牧歌式的世界被颠覆了。盗贼猖獗，祸乱四起，高大送笑倩到偏僻的天主教堂避难。在那里她帮助中国修女管理孤儿院。她的聪明得到了称赞，她也喜欢照顾孤儿。但同时她也被深深的焦虑和孤独所困扰。到此，故事突然中断了。

回顾王统照在1939年写的有关自我修养的文章，那年轻的革命者是一个为了崇高目标就会使用暴力手段的人，他相信“噩梦很容易被忘记”。在《双清》中，他和那个年老的退隐者代表了沦陷状况下复杂的道德谱系中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类型。在王统照看来，暴力抵抗和避世主义，是公德与私德的极端表达。笑倩对两者都不赞同，正如她在孤儿院中的工作所象征的，笑倩选择了人性精神的再生，从而再一次肯定了王统照的启蒙观。不过，这一再次肯定是经过抵抗现实洗礼的产物，源自他对人性更成熟的理解。他既不像战争初期时那么的乐观（正如故事“结尾”不确定语调所暗示的那样），也不像当他意识到自己道德理想破灭时那么的悲观。这个未完成的故事也许因此表明了他对于人生模糊性的认同。一个人只能做他所能做到的。未来是开放的，就因为它是未知的。

但是开放性也不无讽刺的一面。王统照象征性的反抗究竟对未来有多大帮助？消极抵抗是改变历史进程的有效方法吗？他到底为国家做了什么？不做“徒劳的行为”是为了安

抚个人的道德感还是服务社会公德？^[169] 当一个国家遭受战争和占领的蹂躏，启蒙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行的？甚至早在1940年，王统照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当情感悱愤，又无从挥发的时候，偶然比物，托事，涂抹几首真真不能自己的韵语，固可少觉慰安，同时，也深增惭愧！……你的双手曾给这时代，——这存亡关头的民族有过什么贡献？有些什么成绩？”^[170] 笑倩未完成的实践也是日据上海八年中王统照个人故事的最好结尾。1945年7月，他带着他的一家去了青岛。王统照最终决定带全家离开那里，是因为他再也无法承担高昂的物价，也可能因为1945年春天每天都能看到美国轰炸机，他担心盟军会对上海进行地毯式轰炸。因为谣言的关系，大批民众在那个夏天撤退到上海郊区。^[171]

虽然只有48岁，但多年在外国占领下遭受的煎熬、悲伤和绝望已经把王统照变成了一个病弱的老人。^[172] 但他毕竟活了下来，虽然他的启蒙努力因为历史外力而失败，但是这一理想有助于阐明上海沦陷区抵抗者的道德准则和爱国行动，否则他们的声音也许已经消失了。尽管抗日战争最终没能成为普世重生的机会，但是上海解放了，中国幸存了下来。

王统照坚持道德追求，拒绝为敌人服务，体现出占领地区人们的自尊、忠诚和人格。但是，这种消极抵抗在多大程

[169] 这一术语借用自 Frederic Jr. Wakeman 对明代忠臣的分析；参见他的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Berkeley, 1985，2卷，1084—1085页。

[170] 王统照，《王统照文集》，卷四，317页。

[171] 关于谣言和撤退的生动描写，参见《春秋》，第4期（1945年4月）。

[172] “他的头发已经秃掉，……门牙全没了，天气已热，他还穿着棉大衣，皮领子上的毛四周磨光，里边是件土黄色的旧布棉袍，不再如昔年笔挺西装；或文学月刊所刊照片一般风采。八年呵，八年困苦的生活，是已刻画了个纪念碑。”他的朋友朱朗写道（冯光廉、刘增人编，60页）。

度上对城市的解放有所贡献呢？他的不合作对推翻外侮有帮助吗？如果没有，这种消极抵抗不就是一种体面的自我保护吗？王统照就是太在意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了。因此，在告别聚会上，他给柯灵、夏丏尊和郑振铎等密友写下了感伤的诗歌。在诗歌中，忧心忡忡的情绪配合田园的意象，仿佛是思考自己的人生。王统照意识到，在不确定的历史洪流中，隐遁是他最好的选择：

蹉跎十年负江南，双鬓徒赢雪色添！
梦寐海隅思钓咏，园林故里竟戈铤。
飘凌空有逍遥羨，艰悴深知来复缘。
敢向人天存怨想，尚拟努力补华年。^{〔173〕}

的确，王统照在随之而来的内战（1945—1949）期间选择了隐退的生活。虽然很厌恶战后的道德和政治骚乱，他也没有向国民党政府直接对抗。在日据的情况下，他坚定地维护了自己的道德操守，尽管穷困潦倒，他也没有为傀儡政府服务。他在古典诗歌、学术研究和对上海密友的回忆中找到了些许安慰。他与那些在乱世归隐，在盛世出仕的儒家文人并没有什么不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王统照还是从长久的沉默中脱颖而出，在新的山东省政府里担任了较高的文化职务。似乎为了弥补他过去的沉默，王统照把全部心血都扑在创造“新中国”上，直到1957年初因病逝世。他死在“反右运动”的前夕，而这场政治高压运动针对的正是像他这样的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173〕 参见冯光廉、刘增人编，43页。

第二章 反抗：李健吾的戏剧抗争

我抵抗，故我在。

——加缪《抵抗》

在这个被王统照称为“牢城”的上海沦陷区，许多知识分子都奋起反抗，而这抗击侵略的力量源自“被监禁者”坚韧不屈的精神。对上海和国家的解放来说，抵抗的意志、拒绝接受不公待遇的勇气，正如中国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一样至关重要。“乱世人命如草芥”，柯灵在1937年写道，“但是演什么角色，生旦净丑，主奴忠奸正邪贤不肖，却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抗战是长期的，我们必须作好精神准备，迎接新的岁月。”〔1〕

知识分子们把抵抗运动看作是与自由和人格尊严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否抵抗成为了是否具有道德使命的标准，因此他们需要不断地发起内心的革新和社会的抗争。而对个人利益的关注和妥协的欲望如同军事失败一样，是不利于民族大业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抗战被解释为精神的去污行动，抗战不但能够将自我升华到公众利益的更高层次，而且能够雪清国耻，为中国历史打开新时代的大门。最能代表这一

〔1〕 柯灵，《柯灵杂文集》，北京，1984，109、112页。

积极抵抗姿态的知识分子是剧作家、翻译家和戏剧批评家李健吾（1906—1982）。他和王统照一样，自 20 世纪 20 年代就闻名北京，并在沦陷的上海一直生活了八年。

在沦陷时期，李健吾从一个默默无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学者，一跃成为抗日英雄，乃至中国现代戏剧的领导者。他所领导的中国现代戏剧，和洋商报一起构成上海抵抗运动的主要手段。但李健吾和许多同志不同，他不愿意屈从于爱国动员运动的集体主义潮流，而是坚持个人主义和创作自由的重要性，所以他在抵抗运动中尽量保持边缘位置。他的战时戏剧中，戏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模式相结合，探索历史与自由之间的辩证逻辑。对李健吾而言，政治抉择即道德抉择，政治是个人道德的延续；因此，抵抗和自我超越与国家的解放互为一体。然而在整个沦陷时期，他经常在政治活动和学术思索间犹疑不定，直到他不再坚持学者姿态，这一道德困境才得以摆脱。

革命烈士之子

李健吾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1906 年他生于山西运城，其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旅途中度过的。其父李岐山曾是辛亥革命中领导运城解放最具传奇色彩的军事领袖之一，由于性情耿直坦率，李岐山与新任山西都督阎锡山发生了冲突，阎以叛变为由将李投入监狱。1913 年被释放后不久，李岐山带家人迁居陕西西安，并配合讨袁二次革命组织起义。李健吾是李岐山三个孩子中最小的，父亲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把他送到天津近郊，与父亲的多位战友一起生活，居无定所。直到革命结束，李岐山得到了北京军政府的任命，李健吾才得以和家人

团聚。然而好景不长，阎锡山阴谋策划将李岐山再次监禁。1919年李岐山被释放，在执行政治任务的途中，被其西安的战友、也是阎锡山的盟友所暗杀。^{〔2〕}

李健吾十三岁时丧父。全家人靠父亲几个政治伙伴捐助“寡妇基金”的利钱勉强维生。他们一家住在山西会馆，该会馆位于北京城北，靠近南下洼贫民区。李健吾自高中时期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一篇作品引起了王统照的注意，于是这位副刊编辑为这个少年提供了文学的建议和指导。^{〔3〕}1925年，已有大量作品发表的李健吾考入了清华大学，并于1930年取得西方文学的毕业文凭。在老师散文家朱自清和戏剧学者王文显的共同推荐下，他在清华谋得了助教的职位。1931年，阎锡山战败下野，在新任山西省长商震（李岐山的好友）的帮助下，李健吾得到了一份特别奖学金，在巴黎读研究生。在巴黎，李健吾学习非常努力，并且热衷社交生活。他当年的朋友回忆说，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话匣子，为人开朗、快乐、慷慨。

1933年夏，李健吾回到北京，与1931年结识的清华经济系毕业生尤淑芬结婚。同年，这位新郎申请到写作福楼拜评传政府津贴。在法国文学领域中，他被看作一位有前途的青年学者，文风优雅风趣，主张印象主义的批评主体性方法。但不幸的是，他还是无法在北京找到一份长期的学术工作。^{〔4〕}1935年，郑振铎从王文显和朱自清那里听说了这个年轻人，就帮他

〔2〕 李健吾的童年在他的记叙中得以再现，见《李健吾自传》，《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26—29页。

〔3〕 王统照当时是著名《晨报》的文学编辑。他帮助李健吾修改了很多篇作品，并给予他很多鼓励，李早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晨报》上发表的。李自认为是王统照的一个“未入门的学生”（见《李健吾自传》）。

〔4〕 有关法国新浪漫主义批评的总体研究，见 Albert Thibaudet, *French Literature from 1795 to Our Era*, Charles Lam Markmann 英译, New York, 1967。

在暨南大学谋了一个法国文学的教职。之后，李健吾离京赴沪，并一直在上海住到了1954年。^{〔5〕}

回顾李健吾的一生，父亲遭到暗杀对其心智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首先，这一事件成为伴随人生成长的回忆，赋予了象征的意义。父亲的英雄形象终其一生地伴随着他，父亲是拒绝违背自己良知的勇敢和道义典范。^{〔6〕}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记忆为李健吾提供了一个原初的英雄神话，一种内在的反抗冲动，形成他后期所有作品的潜在结构。

第二，失去了父亲的权威，他的个人兴趣得到自由的发展。1919年父亲去世不久，李健吾被封至模和留日归来的陈大悲（他后来在上海为日本人工作）发现，带领他进入了刚刚出现的中国现代戏剧舞台。虽然他还在上小学，但他的聪明、活泼，特别是他善于大哭的本领，让他在没有女性登台表演的时代成为最受欢迎的反串名人。^{〔7〕}1921—1922年，他进入高中。这时女性已经可以登台表演了，他失去了表演机会。然而他的戏剧热情依然如故，于是他开始了戏剧创作。^{〔8〕}

中国人所说的“话剧”是在1900年经日本介绍进来的西方现代戏剧，它在20世纪前二十年成为文化启蒙的手段。^{〔9〕}到

〔5〕 有关李健吾在巴黎和北京的经历，见徐士瑚，《李健吾的一生》，《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87—90页。

〔6〕 李健吾，《切梦刀》，上海，1948。

〔7〕 甚至在中国，李岐山都是一个特别严厉和苛责的父亲。比如在他的生日宴会上，儿子忘记给他鞠躬，他就在自家的花园里打了儿子好几个耳光。见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北京，1984，272页。因为演戏这个职业是最让家庭蒙羞的不光彩的职业之一，所以李健吾不能得到家庭的允许去参加演出。在这一点上，有关中国话剧先驱演员的经历之描述，见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北京，1957。

〔8〕 李健吾的早期生活和他父亲的职业的描述根据《李健吾自传》，335—337页；《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北京，1984，264页。

〔9〕 从话剧初期的名称、早期戏剧团体的名字和演出剧目上可以反映出早期话剧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中国陷入了党派争端和日本入侵的巨大威胁，话剧和其他西方文学形式一起进入了政治的空间。左翼戏剧家田汉、夏衍、于伶和自由主义戏剧家洪深等人所主导的“国防剧”更是如此。然而，现代戏剧变成了一种宣传工具，这种努力反而限制了更大程度地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因为除了国民党的镇压，大多数参加演出的都是对戏剧知之不多的业余人士。尽管他们有政治热情，但大部分人都根据西洋戏剧拙劣的译作表演，舞台也很简陋。而且，现代戏剧不同于传统戏曲（比如京剧、越剧）和现代电影，话剧的受欢迎程度是有限的。从话剧诞生伊始，它的外来形式、过度的教化、陈腐的对白仅仅在大城市中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圈子中流行。很少有剧作能够上演两次以上，甚至在上海这个话剧的中心都没有专业的话剧演出剧场。戏剧爱好者不得不临时租用电影院、学校或市政厅的礼堂进行表演。所以，直到战争前夜，现代戏剧主要还是业余的，观众圈仅仅局限于城市知识分子范围内。^{〔10〕}

在孤立无助的气氛下，李健吾开始了他的编剧生涯。虽然他也抱怨国人对话剧的排斥和偏见，他还是把戏剧创作视为“精神的反抗”、意志的考验，是对社会平庸的挑战。戏剧是由一群性格不凡的人所从事的寂寞职业。（在中国，戏剧创作）

（接上页）的文化和社会目标。现代戏剧最初的名字是“新文明剧”；“话剧”的名字是 20 世纪 20 年代由田汉创造的。新民社和开明社是最早的剧团；最早上演的剧目是《茶花女》（根据小仲马的同名作改编，1907）和《黑奴吁天录》（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译本，1908）。其他受欢迎的西方剧作家有易卜生、萧伯纳、罗曼·罗兰。有关中国现代戏剧的简史，见《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2 卷本，北京，1958 和 Colin Mackerras, *The Chinese Theatre in Modern Times*, Amherst, Mass., 1975。

〔10〕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话剧的这一问题的杰出讨论，见《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北京，1985。

“需要勇气，一种纯而又纯的精神的作用”，并把那些“终始不渝”的人，称为“英雄”。^{〔11〕}这种强烈的反抗语言表明李健吾对父亲形象的迷恋，剧场变成了他探索和定义英雄观的场所。

开战以前，李健吾已经写了几部戏剧。但除了《这不过是春天》之外，其余都是没有上演的案头剧。而且，《这不过是春天》这部革命加恋爱的戏剧仅仅在1934年由贝满女子中学的学生演出了一次。后来又在沦陷的上海，这部戏才得以重新排演。

贯穿李健吾早期戏剧的主题是探寻人类生存中的救赎机会。这一个个体存在的焦虑源于他长大后感觉到的背叛感和失望感。“我发现若干人类的弱点，可爱而复可怜，而我的反应竟难指实于嘲笑或者同情。”他在1935年解释道。“马齿越加长，世事的体验越加深，人性的观察越加细，我便越觉得自己忧郁，而这忧郁，蒙着一层玩世不恭的浮尘。”^{〔12〕}而且，他认为写作是一个庇护所和克服消沉的方法：“真正的公道在人世无处寻觅，未尝不在艺术的国度保存下来。我挣扎于富有意义的人生的极境。我接受唯有艺术可以完成精神的胜利。”^{〔13〕}这解释了李健吾在1937年以前远离政治的原因。他是一个边缘人，或者用老朋友巴金的话说，他是一个“沉迷于自己的研究”的“旁观者”，一个“书呆子”，^{〔14〕}他写作就是为了表达他自己。

李健吾感到深深的失望。他曾经是一个英雄崇拜者，崇拜他的父亲和他父亲的战友们，他和他们一起度过了漂泊不定的童年。但是，除了他父亲至死还在与不公正行为作斗争，其他

〔11〕 李健吾，《梁允达》，上海，1934，i页。

〔12〕 李健吾，《以身作则》，上海，1948，i页。

〔13〕 同上书，ii页。

〔14〕 引自李健吾，《咀华二集》，上海，1942，47页。

“英雄们”要么很早就死了，要么堕落成小军阀、抽大烟的，或者小窃贼，不是夸耀他们的过去，就是隐瞒他们的往昔。他们缺乏坚持理想的信念，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的“神话”破灭了。随之而来，李健吾意识到他也不是一个“英雄”。他甚至不能在他喜爱的北京找到一份工作，更不要说救国或者改造世界了。^{〔15〕}他认识到人被其本性所限——容易软弱和妥协。

但他在写作中寻找到了“精神的反抗”，这种故事的反抗可见于他的剧作《这不过是春天》和《十三年》（该剧写于1936年，首演于1939年）。两部作品的故事都发生在北伐前夕的北京，描写革命者从军阀的迫害中出逃（没有写明他们忠于何种意识形态）。《这不过是春天》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一个警察厅长的夫人厌倦了物质至上的生活，放走了她的旧侣，那人是个“从南方来的”革命党。同样的，《十三年》也写了一个北洋军阀的暗探放走了两个可疑分子（他们都被怀疑是共产党烈士李大钊的同志），因为他发现其中一个是他高中时代的心上人。暗探黄天利自杀之前，对他的旧情人说：“不瞒你说，我活到现在，别瞧你骂我是狗。我活到现在也只是为了那点儿……影子（爱）。”^{〔16〕}

李健吾说，这两个作品都比喻了新时代的黎明，但更富象征意义的是他对两个角色的描写——用他自己的话说，“凡人”被生活毁了，却能在对爱的残存忠诚中拯救自己。他们抓住了“最后的闪光机会”，通过了“最终考验”。对剧作家来说，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英雄”，因为他们表现出了“绝望和懊悔”。事实上他们恰恰表现出与现实生活中堕落英雄相反的一

〔15〕 见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223—233页。

〔16〕 见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上海，1937；《十三年》，上海，1939。

面：前者再造了更美好的自我，而后者却失去了自我。

李健吾尚未意识到，他自己“最后的闪光机会”很快就要来了。他对于英雄主义的寻求，面临着政治现实的“最终考验”——日本侵略，1937年8月战争到来了。^{〔17〕}

孤岛与抗战剧的兴起

31岁的李健吾似乎以冷漠和天真的态度看待战争的爆发。在枪林弹雨之下，他继续过着一边备课，一边每日在上海西郊散步的隐居生活。他和好友印象派诗人卞之琳一起散步，两个人一边啃甘蔗，一边讨论法国文学。^{〔18〕}

直到9月，李健吾才有了局势紧迫的感觉。暨南大学被迫从位于上海北郊的真如迁往法租界，李也只好随行。他把妻子和两个襁褓中的女儿安顿在巨籁达路的一间小屋子里，离位于陶尔斐斯路（Route Dolfus）的暨大校园不远。他就是在这里度过了战争。

在1937年8月到11月的淞沪战役期间，话剧第一次在爱国运动中显现出强有力的作用。如序言中提到的，在“文协”的组织下，共产党剧作家于伶领导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于1937年在法租界成立，把艺术家和作家团结起来，投身于抗战

〔17〕 见《十三年》，37页。两部作品的译本和跋在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和〈十三年〉》中。有关李健吾早期作品的优秀分析，见武田泰淳，“李健吾の喜劇について：中國の知性”（《论李健吾的喜剧：中国文学中的知性》），《中國文學月報》，54—59页；David Pollard，“Li Chien-wu and Modern Chinese Drama”，*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4，No. 2（1976），364—388。

〔18〕 师陀，《记一位外圆内方的老友》，《新文学史料》，第2期（1987年5月），85页。

剧和国防电影的创作。协会资助并集体创作了几部抗战剧，都是情节结构简单的“街头剧”，号召武装抵抗。这种旨在激发上海民众的民族热情的政治剧流行一时，协会组织了十三次戏剧巡回演出，每组二十余人，在急救医院、难民中心和前线演出。不久以后，蚁社、“银联”（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等国内外救亡组织也都纷纷仿效，建立了剧团，在街头和医院里演讲和上演爱国戏剧。10月末，随着中国军队失守上海，该协会派遣诗歌剧团前往内地，为民族事业进行群众动员。

正如当时大多数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李健吾被抗战的气氛所激励，虽然与此同时他个人的生活遇到了麻烦。显然，支持抗战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前线打仗。然而，“曾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我没有千万人当前，仅有三口人就把我拖住了。左顾右盼，前思后虑，我没有力量捐弃我个人的责任。英雄是忍人。我才一提起脚步，就见我的小乖无识无忧地跳过来，我的心柔了，我不是忍人。”他悲叹道，“于是我坐下来，想象火线上应有的壮烈……但是，飞机和炸弹的响声震碎了我纸上谈兵的计划。我的眼前不复是报纸，不复是字，而是一片血肉，而是泪。一个文化人只是一个弱者。我们住在一所打在现实的地基上面的房子（未来）。如今动摇的不是房子，却是地基。所以在街头遇见一个伤兵，就像有人迎面揭发我的隐私，我的心头激起一股惭愧和感谢的热情。他为了保护我和我的梦而受了伤，我要过去吻遍他英勇的伤口。”^{〔19〕}在1937年11月大上海落入日本之手，国民政府迁入西南地区，他的这种道德冲突和自我憎恨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11月12日，文协解散为一些小的地下办事机关，希望在

〔19〕 李健吾，《切梦刀》，32—33页。

不同的环境下继续爱国工作。^{〔20〕}大多数作家、戏剧家逃往内地，李健吾选择留在上海沦陷区。他做出这个决定，除了暨大教职是养活家庭的唯一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腿因幼年疾病跛了。尽管这样的理由是老生常谈，且有明显的自我辩解的成分，但他的理由是真实而令人信服的。^{〔21〕}大部分交通因战事中断，战争中的旅行既昂贵又艰险。而且，内地相当落后，大量逃亡知识分子给那里造成了严重的就业和住房问题，而且一切社会关系都要重建。事实上，在逃亡中被饿死和累死的作家并非没有，还有一些人在途中被杀。^{〔22〕}李健吾担心自己的两个小女儿陷入那样的状况。他似乎有时也考虑过把家庭留在上海，只身逃亡，但是他能把她们托付给谁？他又怎样养活她们呢？

正如第一章所谈到的，当上海落入日本人之手后，知识分子的生活立即陷入了严重的混乱。在唯一没有被占领的“孤岛”租界里，当权者禁止了所有的爱国宣传。所有的救亡组织被关闭（或转入地下），爱国出版物被停刊，日本将猖獗迫害的流言四处传播。一些零星的反日事件也于事无补（比如1937年12月，一个中国人高喊着“中国万岁”，从位于南京路的一座高层建筑上跃向日本庆祝胜利的阅兵队伍；一个星期后，一

〔20〕 陈福康编，《郑振铎年谱》，《新文学史料》，第2期，1990，267页。

〔21〕 大多数留守上海的知识分子在沦陷之后都强调健康不佳和家庭责任的问题（如柯灵、唐弢、王统照）。这个说法变成了自我辩解的固定模式。事实上，李健吾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可能仅仅因为不愿意离开他的安全、舒适的生活，不愿意把他珍贵的藏书留在上海，只身迁往后方或不熟悉的内地。关于李健吾房子中所藏的一排排昂贵的中英文书籍的描述，见师陀，《上海手札》，上海，1941。

〔22〕 有关去内地的旅行中的有趣的叙述，见包明叔《抗日时期东南敌后》，台北，1974；朱雯《烽鼓集》，福州，1983。这些死者中比较有名的是叶紫、鲁彦，他们的命运在上海被广泛宣传。

群中国青年因策划宣传运动而被捕)。〔23〕留守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一座压抑死寂的城市。而且，战争造成的破坏（总损失达三百亿银元，73.5%的中国工厂被毁）和大批难民的涌入，导致失业激增，住房和食品严重短缺。没有谁比编辑柯灵更有力地准确表达了沦陷初期知识分子间的这种普遍的悲观主义，他生动地写道：“救国无门，求生无路。”〔24〕

到1938年1月，黯淡的局势稍有好转。抵抗运动开始成形，洋商报和抗战剧也随之兴起。上海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为这一突破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国民党特工之外，中共江苏省委（1937年11月由刘晓、刘长胜、张爱萍领导）在“孤岛”建立秘密组织。到1938年发展了党员约100人，并密切配合八路军办事处（由刘少文领导）的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充分利用统一战线，尽可能动员上海民众秘密地坚持抵抗（同时也支援在安徽的新四军工作）。宣传工作是江苏省委工作的主要内容，这项工作落在了由沙文汉和孙冶方（后来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领导的文化委员会身上。〔25〕

共产党的文学组织者发现，话剧可以作为一种动员策略，这很可能是受到淞沪会战时街头剧所起到的成功宣传作用的启

〔23〕 见《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第8039A号（1937年12月）。这些目前隶属于“后援会”的组织计划在新年的时候，通过抵制日货、中国商铺挂国旗、派人去中国居民区散发爱国传单等方式，组织爱国意愿的示威。据其他警务报告，Zuan Hua公司印刷了传达爱国信息的贺年卡，在一周以内卖了6400张（1938年1月，第8038A号）。有关日军的胜利阅兵，见 Harriet Sergeant, *Shanghai: Collision Point of Cultures, 1918-1939*, London, 1991, 308—309页。

〔24〕 柯灵，《柯灵杂文集》，42页。

〔25〕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丛刊》，第1期（1979），37—40页。另见《上海人民与新四军》，上海，1989。上海共产党分为六个委员会（劳动、文化、职员、教育、妇女、学生和难民）和两个特殊委员会（海关和巡警）。文化委员会再分为戏剧、新闻和文学三个部门。

发。正如艾里克·本特利（Eric Bentley）所说，戏剧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是一种有力的表现形式：它是在观众面前的表演，以其本身煽动情绪。^{〔26〕}这种表演的仪式，包括大批观众的聚集、观看者与表演者之间的对话、共同的情感投入和错综的戏剧结构激发了更具典型意义的现实，正如萨特（Sartre）所描绘的，让戏剧成为“一种伟大的、集体的宗教现象”。^{〔27〕}如果表演恰当的话，戏剧能唤起“最大限度的说服力和魔力”，观众充满感情的反应又会强化舞台上演员的表演。总而言之，戏剧的参与可以演变成一场政治示威，而无需政治集会。这是戏剧在纳粹统治下欧洲产生的效果，也是抗战剧渴望在上海实现的目标。^{〔28〕}

与欧洲不同，上海的抗战剧是一种不成熟的、外来的话剧形式。但是随着战局的进展，沦陷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令话剧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1937年12月，共产党员于伶和阿英（他们都是著名的剧作家和共产党文化部的资深成员）着手创办青鸟剧社，它由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没有迁往内地的两支戏剧队主要成员组成（包括上海市政府中国职员俱乐部的两位演员许幸之和李伯龙）。^{〔29〕}

青鸟剧社没有坚持很长时间。1938年1月，青鸟剧社在公

〔26〕 Eric Bentley, *Playwrights as Thinker*, San Diego, 1987; *Thinking about the Playwrights*, Vanston, Ill., 1987。

〔27〕 Jean-Paul Sartre, *Sartre on Theatre*, Frank Jellinek 英译, New York, 1976, 39 页。

〔28〕 关于抗战戏剧在被占领的欧洲的有趣的研究，见 Linda Myrsiades, “Greek Resistance WorldWarII,” *Drama Review* 2, no. 1 (1977), 99—106 页；Patrick Marsh, “The Paris Theatre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Rev. d’hist. du theatre* 33, no. 3 (1981), 199—369 页。

〔29〕 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在1938年初迁往武汉后就解散了。上海市政府中国职员俱乐部是向所有上海市政府的白领职员开放的组织，它在战前不久刚刚建

共租界的剧院里上演了一些剧目之后（包括曹禺的《雷雨》）就关闭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包括：私人口角（中国现代文人的特征）、团体内的政治分歧，以及恐怖分子炸剧院（星光剧院在观众席中发现了一枚炸弹，而青鸟剧社计划第二天在那里演出）。〔30〕

于伶等青鸟剧社成员坚持具有政治责任的话剧作为抗战的手段。1938年初，他们继续成立其他的团体，例如上海艺术剧院。其中的两位成员顾仲彝和朱端钧都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业余戏剧家。这个剧团在蒲石路的兰心剧院为难民儿童上演了一出公益戏剧——李健吾的《撒谎世家》（根据威廉姆·克莱德·菲奇〔William Clyde Fitch〕的《真实》〔*Truth*〕改编），正当第二次演出排练的时候，他们却被法国公董局以安全为由“驱除”出了租界。这个组织因此解散了，〔31〕但于伶并没有放弃，他以自己特有的坚韧和机智组织了另一个剧社——上海剧艺社。它的建立是国共统一战线的体现，并很快变成“孤岛”抗战剧的领头组织。

公共租界拒绝发出演出许可之后，上海剧艺社在法国公董局辖区内提出了注册申请。它的申请被拒绝了，上海剧艺社被勒令出境，而该地区包括中央通讯社和宣传部在内的国民党机构都已在大上海陷落后秘密地迁走了。

然而，洋商报在西方出版社名义上的保护下成功生存下来

（接上页）立，并且在后方的特勤工作中非常活跃。在上海沦陷之后，在李伯龙的领导下它加入了爱美剧运动，该运动在1938年到1940年达到繁盛。

〔30〕 程中原，《记革命戏剧家于伶》，《新文学史料》，第12期（1983年5月），93—95页。

〔31〕 顾仲彝本来计划导演第一次演出，但他在遭到死亡恐吓之后被迫谢绝了邀请，躲藏起来。这一事件给法国公董局提供了解散该团体的理由。见《中国话剧艺术家传》卷三，北京，1988，30—70页，311—334页。

(这一状况是在1938年1月从《文汇报》开始出现的),于伶从中得到启发,向上级同志刘少文寻求帮助。刘少文是“结交”上流社会的专家,先后给他介绍了中法联谊会的中方会长赵志游和褚民谊,他们都是国民党的领导人。1938年7月上海剧艺社注册为联谊会的附属组织。为了确保该组织的经济来源,于伶获得了大企业家和中共秘密党员蔡叔厚的帮助,确保在银行得到贷款,为租用剧院提供了安全保障。〔32〕

上海剧艺社是一个半职业化的社团,但它几乎聚集了“孤岛”所有重要的剧作家和演员。除了于伶之外,领导成员还包括阿英、顾仲彝、朱端钧、陈西禾、吴仞之和洪漠(旅行家,与国民党和租界警察保持密切的关系)。在声明中,该社团宣布自己是一个教育组织,旨在发展中法文化关系,〔33〕但它真正的意图是政治的。顾仲彝1948年的回忆录为战时话剧的情况保存了一份最好的史料,根据他的回忆,该社团的所有创办人都认为戏剧应该是宣传运动的组成部分,应与民族抵抗事业联手,为动员上海民众反对侵略而服务。〔34〕

抗战剧在沦陷上海从一开始就面临政治和专业问题的双重困扰。日军的恐怖活动——政治暗杀、炸弹袭击、恐吓信——自1938年初就威胁着这些参与者。而且,他们很难找到稳定演出的剧院,也缺少资金。还经常遭到租界当局审查制度的骚扰,当局实行严格的登记要求,包括为预审提交剧本的翻译,并在每次

〔32〕《中国话剧艺术家传》卷三,59页;于伶,《默对遗篇吊阿英》,收入《阿英文集》,卷1,香港,1979,21页;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收入洪深编,《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上海,1948,143—145页。褚民谊,汪精卫的姻亲,不久后就加入了“和平运动”。赵志游是主管陈诚军队财务的特殊代表,安徽第三战区的总指挥,也是该社团名义上的领导人。

〔33〕任用梁编,《上海剧艺社与〈人之初〉的演出》,《文献》(1938年10月),H: 10—14页。

〔34〕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146页。

演出前得到批准。1938年后，审查员甚至会核查演出的内容。在驱逐令的威慑下，涉及反日情绪的作品完全被禁止。

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话剧的爱国任务，需要一种巧妙的应对能力。^{〔35〕}作为上海剧艺社的创办成员之一的李健吾，就是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建设抗战剧的主要人物。

从“精神反抗”到“不带神话的英雄主义”

沦陷以后，李健吾继续在暨大教书。在战时上海，各个大学严重的裁员，这份工作不足以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所以，李健吾还在复旦大学兼课，并且在中法研究所申请了一笔研究经费，负责写一部法国文学史。在1935—1936年间，他继续努力地工作，教书、翻译、撰写福楼拜。^{〔36〕}他设法依靠这些工作给家庭提供体面的生活，但是在外国统治下忍辱“偷生”而没有跟随政府到艰苦的西南去（代表祖国），成为他心中面对的尖锐问题：我忠诚吗？我是懦夫吗？我任性吗？和许多内疚的知识分子一样，比如柯灵把写作定义为“做人的责任”，^{〔37〕}李健吾则把在日本侵略下的生存视为一个挑战，一次道德品性的考验：活下来，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道德教化的潮流：一切都被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1938年，四岁和两岁的女儿相继生病数周，李健

〔35〕 于伶，《默对遗篇吊阿英》，22页。

〔36〕 徐士瑚，《李健吾的一生》，《李健吾文学评论集》，328页。1935—1937年间，除了学术研究外，李健吾在沈从文的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些文学批评，并把它们收入了《咀华集》，但是正如他在战前的其他剧作一样，直到李健吾在战争中成名后，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才引起文学界的注意。

〔37〕 柯灵，《柯灵杂文集》，182—185页。

吾用“弯枝梅花病”的意象为生活在“孤岛”的人民鸣不平。梅花是中国常见的比喻，这里的梅花因为外在的环境被扭曲、枯萎，失去了自由和活力，他用浪漫化的手法将中国人被束缚的内心的鲜明特质表达了出来。而且，疾病也具有道德衰败的象征意义，这些意象共同唤起了垂死的、腐败的、被掠夺的城市想象。^[38]

如果一个人不想留下“懦弱”、无用、可耻、“病弱”的骂名，他的选择就是行动。抵抗变成一种生存方式和政治行动。说它是生存方式，因为抵抗行动可以让一个人摆脱道德的折磨和道德堕落；说它是政治行动，因为它能解放上海，而且确保中国的胜利。这一行为既能促成自我解放，也能实现国家自主：“即使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儿女，我们也得拼了一切，争回自由的土地，舒适的呼吸，好做一个无往而不健全的人，真正的人，具有一切向上意义的人。”李健吾在1938年写道。^[39]

将爱国主义与自由并置，解释了李健吾对抵抗的决心；^[40]实际上，他加入抵抗运动并没有明确的政党意识形态。在他对英雄主义的新定义中，他所坚持的就是个人尊严和道德的反抗。如前所述，随着儿时偶像的幻灭，那种大于生活的英雄主义已被社会现实毁掉，这让他“在‘艺术王国’里重新发现英雄主义。就像《十三年》里的黄天利或者《这不过是春天》里的

[38] 1938—1940年间难民大量涌入租界，结果导致大部分地区过度拥挤、卫生条件恶劣，包括霍乱、猩红热、脑膜炎等传染病在租界肆虐。儿童成为特别易感的人群。在1938年，两位共产党作家——巴人和石灵的儿子都死于高烧，唐弢的两个孩子死于肺结核。

[39] 李健吾，《切梦刀》，39—40页。

[40] 抵抗的动机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问题。与大多数抵抗者一样，李健吾从没有完全清楚地表达过这个决心，甚至可能对他自己也没有，它的确代表了当时许多上海知识分子的决心。关于法国抵抗者动机的细致研究，见H. R. Kedward, *Resistance in Vichy France: A Study of Ideas and Motivation in the Southern Zone, 1940-1942*, Oxford, 1978, 75—81页。

警察厅长夫人，他们所代表的英雄都是小于生活的，甚至是可憎的角色，但是他们的勇气令其通过了“最终考验”，让他们超越了自我。这些戏剧创作更接近、或真正体现了1937年真实的人民和历史的状况。

淞沪会战期间，李健吾听说儿时敬仰的一位英雄当了汉奸，也得知了从前的同学牛小山牺牲的消息。他是一个短工的儿子，长大以后成为一个贫苦的雇农。牛小山活着的时候，由于相貌丑陋、出身低微，又非常胆小，一直受到欺侮。包括年幼的李健吾在内的所有人都会嘲笑他，往他身上扔牛粪来取乐，他只能愤怒地躲起来。然而，他却光荣地牺牲了。他炸了一座桥，杀死了很多日本人，而后中弹而亡。他加入军队是出于模糊的爱国心，也是因为参军可以逃脱租佃的压力。对李健吾来说，他的牺牲“照亮”了整个人生，也“照亮”了村子里每个人。在李健吾的心中，自我超越的爱国主义正是真正的英雄主义缩影。牺牲者是一个“无名英雄，非神话的真实英雄”，这正是新时代“灰色而坚定现实”的写照。他不是神化的人物，因为（如果不是更糟的话）他和任何其他人一样软弱而平淡，直到反抗的最后一刻，他才变成了英雄。实际上，这些不经神化的英雄们超过了他虚构的那些抓住“最后闪光的机会”来拯救自我的人物，他们用勇气和尊严为理想而战。用李健吾自己的话说，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真正代表，这一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英雄事迹和英雄抱负。中国将赢得这场战争，“我如今读着一部伟大的历史小说，不是过去，而是我的时代，险些被我当面错过〔这不带神话的英雄主义〕”。^{〔41〕}牛小山这一社会受害者的英雄形象，正好

〔41〕 李健吾，《希伯先生》、《时间》、《匹夫》，收入《李健吾创作评论集》，222—233页。引文出自《匹夫》，230页。

为李健吾的自我辩护提供了一个比喻。在长久的煎熬中，被侮辱的雇农与沦陷的上海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几分类似。他们活在外国统治的屈辱之下，只有勇于承担、勇于反抗，为自由和人的尊严而战，才能赎回并确认自己的价值，同时为中国的解放做出贡献。李健吾不再逃进“艺术的王国”寻求安慰，现在他在没有神化的英雄形象中面对了道德反抗的“最终考验”。

李健吾的哲学态度和心理期待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上海知识分子主流的抵抗情绪和感受。他们意识形态的讨论中弥漫着道德的腔调，这种观点被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称为“非此即彼的癖好”（versus habit）。在极端的情况下，妥协的压力无处不在，抵抗者把他们所处的世界看作一个非人即兽的摩尼教空间——一个善恶对决的世界。在这个有限的感知领域中，不存在正反并存或模棱两可的感情。正如共产党批评家巴人所宣称的：“中立与超然，那不过投降与出卖的一种掩饰。……抗日的，这边来！亲日的，那边去！阵形既分，冲杀自易。”〔42〕

左派和右派的抗日作家为贬低敌人，都力求使用传统词汇称呼叛变行为，还设定了洗涤罪行的时间。他们把通敌者描绘成恶魔、败类和人渣。中国人称通敌者为“汉奸”，这个词源于明代，指那些不配当中国人的不可救药的劣等人。因此，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就是堕落的典型代表。那些为他服务的知识分子都是“妓女”、没有灵魂的人和无耻者。〔43〕

对“他者”的非人化否定提高了“我们”的人性。抗日知识分子们大都在摩尼教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下理解“浩然正气”。而

〔42〕 巴人，《巴人杂文集》，北京，1985，151页。有关“非此即彼的癖好”（versus habit），见 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New York, 1977。

〔43〕 关于文化汉奸，见如柯灵，《柯灵杂文集》，305页。

新儒家“忠义”、“气节”和“情操”的一整套话语恰当地表达了这一姿态，这些概念象征着个人在危机时刻追求道德理想的内在自由，也是对贪欲、自私和利己主义的打击。在此思想下，反抗者趋向于把“沦陷”看作对人性的考验。通过考验的就赢得了尊严，而那些失败的就是禽兽。这场考验既是拯救也是诅咒。抵抗者的任务就是激发和领导上海民众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完成自我净化，通过这场考验。人/英雄将在净化的“熔炉”中诞生。^{〔44〕}

在种种艺术的描绘中，投射出对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的预期，左派和右派的作家都以浪漫的笔调肯定中国农民阶层的坚韧品质，以此为例激发大众的斗争意识和生存力量。因此，传统价值在新的语境下得到了重新阐释。新儒家在集体主义框架下歌颂道德自律的观念，正如巴人所宣称的那样：“忠的内容，不是尽忠于君主的个人，而是尽忠国家；孝的内容，也不是尽忠于父母个人，而是尽孝于民族；任何有违于民族国家的利益的个人……都同样可以用忠孝的名义来制裁他，反对他。而这正是集体主义的伦理观的形成。”（《巴人杂文集》，305页。——译者注）这句话强调的是政党政治和集体诫命，而李健吾“不带神话的英雄”却与大部分同志有所不同。^{〔45〕}

虽然未有公开的忠义考验，但此种战争观和对集体英雄主义

〔44〕 柯灵用一个简单的疾病的比喻来简要概括抵抗运动的话语：“在历史的大镜子面前，人兽之分，判然若隔，……历代的积毒，要一时除根自然不容易。抗战正是一种外科手术，只要肯开刀，一面剪去腐肉，一面生长新肌，自然也就有痊愈的希望。……借着时间的淘汰，正在筛清民族的渣滓。”（《柯灵杂文集》，266页）

〔45〕 把农民阶层视为坚韧的代表的浪漫化的写作，是被那些来自内地或去内地旅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手经历所强化的。比如，叔超说，“这次旅行〔从上海到重庆，我意识到〕中国人生存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我们绝大多数的国民的需要非常简单，他们习惯了艰苦的生活。我们进山去了好几次，看到一些农民的家庭。他们住在几乎不能遮风挡雨的茅草棚里，他们只有糙米和豆渣，和用胡椒粉做的汤……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力。一个国家有如此的强

的呼唤不仅限于上海的抗日知识分子，在国统区也弥漫着类似的思想风气。李健吾的好友曹禺在剧作《蜕变》中准确地抓住了道德控诉的情感和理性逻辑，虽然那时曹禺生活在桂林，但这部剧作是在上海上演的。曹禺在序言中写道：“这一段用血汗写成的历史里有无数悲壮惨痛的事实，深刻道出我们民族战士在各方面奋斗的艰苦同那被淘汰的腐烂的阶层日暮途穷的哀鸣。”〔46〕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在不同层面上致力于阐释和推广集体主义的理想。上海商埠对蒋介石“抗战建国”口号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他们对个人主义的批评和对传统道德的重申，都给予了广泛宣传，即为此种努力之例证。〔47〕这一相似的战争修辞和道德说教的腔调，以及相关物资和军事状况〔48〕都有助于形成一种统一的话语，加强上海与民族抵抗运动之间的情感、心理和政治纽带。正如上海的一些知识分子指出的，上海孤岛不孤，而是自由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在这两个地区的知识分子一直持续地接触。比如，当曹禺从重庆搬到上海以后，他就把导演黄佐临介绍给了李健吾，而茅盾则取道香港，把他给《文阵》的全部手稿寄给了在上海的内弟——散文家孔另境，待出版以后再通过水路

（接上页）力，是不可征服的。”（叔超，《内地通讯》，《上海周报》1卷，19期〔1940年3月〕，558—559页）另见杨刚，《星》，收入《上海孤岛文学作品选编》，2卷，16—18页。

〔46〕 见曹禺，《蜕变》，上海，1948。关于内地的文学活动和思想的总体介绍，见李欧梵，“Literary Trends: The Road to Revolution, 1927-1949,” 收入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John King Fairbank 和 Albert Feuerwerker 编，13卷2节，Cambridge, 1981, 421—491页。

〔47〕 日本也有类似的看法，即把战争看作民族纯化的手段。见 John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1986, 特别是203—292页。

〔48〕 比如，上海中共与内地的新四军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1938到1941年间，超过2万人被组织起来加入中共游击队，根据地的军费增加到总额一千三百万元。见《上海人民与新四军》，3—23页。

运回内地。〔49〕

正是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爱国信念框架内，李健吾和上海其他剧作家一起，力求用作品来激发民众坚持为自由、为民族和个人而战。

作为隐喻的过去：英雄主义戏剧

李健吾是法文权威且有戏剧经验，他在上海剧艺社的地位十分重要，直接影响了爱国话剧的形式。最初，李健吾是通过人脉网络涉入这一机构的，在大上海陷落之后，李健吾和王统照恢复了联系，还经常拜访郑振铎，而郑振铎在愚园路的家则是爱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聚居地。在那里，李健吾结识了阿英、夏衍、黄辛迪（留英诗人，他的岳父徐森玉当时正和郑振铎一起搜集善本书籍）和刚从法国回来的戏剧家陈西禾。1937年下半年，夏衍和阿英想以共产党的名义创办一份杂志，他们邀请李健吾加入，李健吾慨然把笔名“刘西渭”借给他们使用。这本杂志就是《离骚》，李健吾发表文章谈论了祛神化的英雄主义，但该杂志仅出版了一期就被查禁了。〔50〕尽管如此，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李健吾开始引起中共文艺人士的注意。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共产党对意识形态问题采取了更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沦陷区文学人才仍然非常匮乏。

1938年1月，于伶打算组织一个新的剧团。他为孤岛的戏剧人士举行了一个聚会，聚会地点就是文艺家们经常造访的锦

〔49〕 关于黄佐临，见《中国话剧艺术家传》，3卷，241—272页；关于《文阵》，见《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1卷，392页。

〔50〕 见《李健吾自传》。

江茶室，位于华龙路和霞飞路十字路口。李健吾也应学生张可的邀请参加了聚会，张可是一位中共演员，她和于伶的夫人、中共女演员柏李一起工作。正是在这个聚会上，上海艺术剧院诞生了。这一聚会也是李健吾抗战剧事业的开始，^[51]但是这个新的团体很快就被查禁了。

实际上，上海抗战剧从一开始就要面对很多问题，除了缺乏固定的演剧场所和好的剧本，还要对付日本的恐怖主义和租界警察接连不断的审查。

为避免被查禁，上海剧艺社（前身为上海艺术剧院）力求从其半官方的处境中得益。李健吾曾用法语为其写申请，在1938年7月为该组织赢得了中法联谊会戏剧组的名义（参见前文）。凭借这一名义，该组织被允许在法国公董会礼堂为难民免费公开首演法国名作。尽管环境令人感到压抑，大多数上海剧艺社的演员仍认为创作“意味深长的戏剧”正是抗日的“人的责任”所在。

因此，首演的剧目之一是罗曼·罗兰的剧作 *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李健吾在1938年10月翻译该作，并译名为《爱与死的搏斗》。^[52]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他因如何正确翻译“*Jeu*”这个词而苦恼过。这个词正确的中文翻译是“游戏”，但是于伶说服他改译为“搏斗”，旨在强调戏剧的

[51] 见李健吾，《忆郑振铎》，《收获》，1981年第4期；《李健吾自传》，40—70页；《上海孤岛文学文学回忆录》，1卷，392页。

[52] 真正的首场演出的是由顾仲彝翻译的马塞尔·帕尼奥尔（Marcel Pagnol）的《托帕兹》（*Topaze*），它由吴仞之导演，从1938年9月23日开始，连续演出三天。李健吾的戏剧是在1938年10月27日到30日上演的。由于为战争难民提供救济给两个租界当局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因此如果组织者把公开表演定义为慈善演出则比较容易获得许可。法国公董会明确提出，要在著名的礼堂进行的表演必须要与提高法国的利益有关。因此这就是上海剧艺社的策略。见任用梁，H卷，9—16页。

政治信息。^[53]在陈西禾的协助下，左派人士许幸之导演、蓝兰和章杰主演的这部革命戏剧，主题被改写为自我超越的吁求。译者希望这部作品能冲破沦陷上海普遍的绝望和冷漠的情绪。他谈到了抗战的思想：“是的，我们是为奋斗而活着。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我们演戏，我们要的只是力量。”^[54]

李健吾希望激起观众的“力量”，挑战内心的缺陷。与战前的愤世嫉俗不同，现在的他在罗兰的剧作中发现了对“人性还有无尽的希望”的赞颂，发现了孟子道德训诫的回响：“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55]实际上，他和上海抵抗者都自命道德高尚，谴责那些为金钱而写作或生产“黄色艺术”的人，痛斥色情小说和不关心政治的电影，因为这些作品创造了一个怯懦的白日梦，“忘记战争，忘记祖国”，“污染”大众的思想，暗中破坏了爱国的情操。这些作品是不负道德责任的表现，是上海流行的“弯枝梅花病”的表征。^[56]

同志们领会到了李健吾传达的信息，柯灵称赞这一译作，

[53] 李健吾，《〈爱与死的搏斗〉在孤岛时期的正式演出》，《山西师院学报》第4期（1981），24—25页。

[54] 李健吾，《我为什么要重译〈爱与死的搏斗〉》，《申报》，10月27日，1938年。罗兰的戏剧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被翻译过来。建议李健吾演出该剧的，是剧团里的其他人。正如李健吾所说，他决定重译该作，是因为他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而且被作品中的道德信息所振奋，以至于他不能忍耐低劣译本的存在。

[55] 李健吾，《我为什么要重译〈爱与死的搏斗〉》。李健吾引用了《孟子·公孙丑上》的句子以强调道德的力量：“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憊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James Legge 英译，*Chinese Classics*, Oxford, 1895, 2: 187—188）

[56] 批评家蔡楚生说，为了成为自由的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思想上有一个完全的改变。我们应该清洁我们自己〔道德上的罪过〕……跟着我们的良知来〔写作和出品〕……以激励我们的人民。蔡楚生，《战后的中国电影动态及目前的改进运动》，《文献》4（1939年1月），1: 4。因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是电影，因此抗战的主要批评都对准了电影人。在祝福国民政府的同时，香港（在上海沦陷后成为“中国的好莱坞”）开展“清洁运动”，寻求中国电影工业从与政治无关的商业目标向民族抗战的转向。这一

并同意“在这非常的环境里……我们更要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57]王统照在李健吾的邀请下观看了这部戏，他非常感动，还为赞颂道德的力量写了一首诗。甚至法租界的教育总监基诺布（Gnoisbois）也深深感动，亲自去后台向演员们道贺，并奖励了他们二百美元奖金。李健吾也很快被邀请到法国公董局，担当首届最佳法语翻译奖的评奖团，于伶和顾仲彝也在被邀之列（该奖颁给了中法联谊会的会长赵志游）。^[58]

然而，《爱与死的搏斗》并没有取得票房的成功。^[59]这一作品充满理想主义和说教式的信息、知识分子的语言和西方的形式（比如法国风格的表演），让观众感到陌生，只能让知识分子兴奋。和战前一样，在一天的劳顿之后，大多数人的娱乐还是去茶馆听书、去听传统戏曲，或者去放映好莱坞电影的摩登影院，^[60]这些

（接上页）运动在上海被广泛宣传，并且一度加强了对所有与政治无关的艺术的攻击。见《文献》6（1939年4期），H：5。中国组织了两组批评家，一组针对电影，一组针对文学，在上海进行“清洁运动”。这一活动的成果之一就是由包括于伶和阿英在内的51名作家一起发起了联合签名活动，即“上海各报副刊编者作者敬告上海电影界”，《文献》6（1939年4月），H：14—15页。

[57] 柯灵，《柯灵杂文集》，134页。

[58] 李健吾，《〈爱与死的搏斗〉在孤岛时期的正式演出》，25页。

[59] 尽管如此，因为广泛的需要，上海剧艺社在1940年2月重演了该剧七次。

[60] 1938—1939年，上海有40个电影院和100个剧院。因为大多数中国电影公司在淞沪会战中被毁掉了，当地只有不足20%的中国电影上映。最受欢迎的电影是《飘》，1940年该电影在上海持续六周满座上映。根据龚明道的报道，甚至一天上映三次，所有的电影院都爆棚（227页）。好莱坞电影的主导地位在1939年的放映单上明显地显示了出来：在25部电影中，国产电影只有8部；17部都来自美国，其中有 *If I Were King*（1939），*Young at Heart*，*Paris Honeymoon*（1939），*Charlie Chan In Honolulu*（1938）。见《文献》1卷（1939年4月）：H：43—44页。中国戏曲，无论京剧还是越剧，都强调音乐、武打和传统的才子佳人主题，还是受到老一代中国人的喜爱，无论贫富。当时上海的京剧名角是麒麟童（周信芳）。在左翼作家如田汉等人的影响下，周信芳在战争年代排演了诸如《明末遗恨》和《徽钦二帝》等爱国剧作。

娱乐方式才是生活主流。私下里读洋商报、抱怨上海生活的艰难、在粮店排队买米或者在饭馆吃午饭的时候分享战争新闻或谣言，是大多数普通人宣泄爱国主义的方式。^{〔61〕}

当很多作家继续痛斥与政治无关的电影和“色情文学”的“污染”的时候，一些戏剧家为了扩大受众，开始寻找新的表演语言，使话剧能够适应流行的趣味。^{〔62〕}紧接着，共产党把艺术和文学与爱国动员的需要结合起来，提倡“中国气派”。上海知识分子抱怨戏剧的“外国形式”是票房失败的原因，并以革命流行文化观把中国气派理解为通俗文化。^{〔63〕}但是抵抗者对通俗文化的态度纯粹是意识形态的和功利主义的，与文化精英利用通俗娱乐形式进行道德教化相似，他们把抗日的民族主义内涵注入传统形式中，一位剧作家称这种方法为“寓教于乐”。^{〔64〕}因此从1939年初起，抗战剧开始创作各种传统表演艺术的形式，从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中发掘灵感，充分调动大众耳熟能详的传统象征因素。

〔61〕 见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12章。

〔62〕 一些戏剧批评家也批评内地话剧的弱点。比如，戏剧杂志编辑胡松青列举了大多数业余剧团的五大缺点：轻率、肤浅、不认真、动作难看、朗诵笨拙。他责备这些毛病是话剧不能吸引观众、引起他们兴趣的主要原因。“在演出前，我们费了很多力气，把观众拖到场子里来，而在台上，给他们看到的效果，是把他们扫兴了回去……要每个剧团加强集体的研究，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剧艺。”他痛心地说道。见胡松青，《谈孤岛表演艺术》，《剧场艺术》，第4/5期（1939年3月），7—8页。

〔63〕 有关“中国气派”的历史背景和文学意义，见 Raymond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o,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1980; 另见 David Holm, “The Literary Rectification in Yenan,” 收入 *Essay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Wolfgang Kubin 编, Bochum, 1982。

〔64〕 《陆文龙》，《剧场艺术》，第4/5期（1939年3月），44页。关于前现代中国通俗文化进入上层文化的详细阐述，见田中一成（Tanaka Issei），“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Ming-Ch'ing Local Drama,” 收入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D. Johnson, A. Nathan 和 E. Rawski. Berkeley, 1985, 148—160页。

李健吾是最早在这一领域中探索的剧作家之一。在抗日运动中，他被作家和艺术家的讨论所鼓舞。像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王统照和其他消极抵抗者一样，上海的抗日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社交场”，通过这个隐蔽的、复杂的互助和文艺网络，探讨形成他们反抗的“潜文本”（hidden transcript）。^{〔65〕}为了逃避日本人的镇压，他们组成午餐俱乐部、每周在基督教青年会或基督教女青年会见面一次，或者在饭馆、街角的咖啡馆、私宅（通常是打麻将）和公共浴室里不定期地见面，有时候在生日聚会、婚宴或者葬礼的时候见面，秘密而充满激情地讨论鲁迅和《西行漫记》中所展现的共产党根据地。^{〔66〕}

其中一个讨论组织在上海剧艺社的剧作家中举行，从1939年3月到6月期间的每周日10点到12点，他们设法租借了短期的“实验剧场”，在位于宁波路破旧的星光剧院演出。他们演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剧作，像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于伶的《女子公寓》，与法国古典名剧相比，这些作品至少在

〔65〕 见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1990。

〔66〕 比如，1938年11月散文家孔另境的婚礼就为上海沦陷后所有爱国知识分子提供了第一次聚会，提供了一个讨论做什么来激励抗日的论坛。实际上，孔所参与的两本杂志——《世纪风》副刊和《鲁迅风》都是以这次聚会为开端的。共产党批评家巴人是个特别热衷玩麻将的人，尽管他猛烈攻击通俗文化，但是也常有编辑等在一旁，而他就在打麻将的时候写作的轶事。见《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1卷，389—402页。关于生日聚会，见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143页。正是在这样的场合，他第一次见到青鸟剧社的所有成员，并被邀请加入这个社团的。关于葬礼，见《宇宙风》，91期（1941年10—11月）。关于学习小组，大多数由共产党领导，如《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1卷，254—276页；2卷，316—332页。午餐会主要由教授、企业家、金融家和其他专业人士组成。其中一些是由地下共产党组织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星二聚餐会”和“星四聚餐会”，因他们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聚会而得名。在前者中，许广平、刘少文和张宗麟是常务成员。后者主要由前“文协”领导人，像郑振铎和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1938年被黄道会恐怖分子暗杀）组成。见顾执中，《报业杂忆》，《文史资料选编》，24期（1985）。

内容上不那么西化了。尽管入场券只需法币6毛钱（比首轮电影的票价低1—2元），但观众仍然不满意。^{〔67〕}经济困难一直威胁着上海剧艺社的生存。活跃在抵抗剧运动中的作家和演员，许多都是共产党员，每周演出之后，他们聚集在星光的后台，或者饭馆、私宅，讨论话剧推广的方法。这些戏剧改革既是生存的技艺，对抵抗者来说，也是政治的需要。

李健吾很可能就是从这些讨论中受到启发，以借用流行的娱乐形式来达到爱国的目的。以宋元“南戏”为基础，他在1939年写了八折的《贩马记》上部。他战前的印象主义作品都以人物的精神生活为中心，与客观现实关系不大，而且大多数是萨特“情景剧”，其特点是语言精炼，侧重境况的反映，而不注重情节和人物性格的描写。他的新剧作与此不同，剧本以人物的单边发展为基础，叙事线索明确，少有心理探索，军事行动丰富，属于典型的传统剧本做法。^{〔68〕}在对他父亲一生的虚构重写中，李健吾就像在《爱与死的搏斗》中那样，探索着一种转型，把政治悲剧转向了对个人的、不屈的反抗意志的赞颂。主人公高振义是一个穷秀才，他在陕西的一个小村镇里领导了一次军事起义，却发现革命已经结束了。“我还得到什么地方寻找真理。咱们不能空闹一场革命……我要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这个‘思想’，为这死了也甘心。为中华民国找一个真正自由的身子。这回辛亥革命不是胜利，实质上是失败了。”他在最后宣布。^{〔69〕}满洲和日本，以及辛亥革命和淞沪会战之

〔67〕 关于戏院票价，见《剧场艺术》的广告；关于电影票价，见郭鹏，《孤岛风景线》，《宇宙风》，第110期（1940年12月），474页。

〔68〕 Sartre, *Sartre on Theater*, 3—6页。关于南戏，见 Tadeusz Zbikowski, *Early Nan-hsi Plays of the Southern Sung Period*, Warsaw, 1974。

〔69〕 见李健吾，《李健吾剧作选》，233—328页。

间的相似性在此昭然若揭。“隐藏的”革命失败信息回应了“文协”的政治观：一个“真正自由”的中国只能依靠不妥协的精神才能创造出来。

《贩马记》终究还是一部案头剧。它的未完成性、松散的情节、模糊的人物性格、老套的象征主义——除了李健吾特有的机智语言和能唤起情感的场景设置能有所弥补以外——都不适合舞台表演。1939年，当巴金到上海的时候，李健吾把剧本给了巴金，巴金后来把它带到内地去，试图出版。^{〔70〕}虽然《贩马记》在艺术上失败了，但是它用传统的编剧方法将历史事件作为现实境况的政治隐喻实验，标志着对上海抗战剧的偏离。^{〔71〕}

以古喻今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可以巧妙地把意识形态内容融入娱乐之中，在历史上各朝代都有其艺术表现的形式，是逃脱政治压迫的寄怀方式。中国文人向来注重借鉴历史，他们很容易发现古今的相同之处，并在历史题材的写作中表达当代的政治信息。^{〔72〕}同时，历史题材也能让更多大众接受，这大大激励了李健吾和朋友创作历史剧的热情。“此地的环境不太允许我们自由地去想”，戏剧家舒詠说，“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但历史的教训却值得我们警惕。把历史与现实的相似之处扩大，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歌颂的是天地间浩然长存的民族正气。”^{〔73〕}

〔70〕 巴金后来回忆说，他有可能把剧本介绍给桂林的出版社。但是他记不清了。因此《贩马记》直到1980年都还是仅在密友中流传的未出版的手稿。见《李健吾剧作选》，569页。

〔71〕 李健吾，《李健吾剧作选》，250—328页。

〔72〕 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在文本方面的文学实践的有趣研究，见Robert Hegel, *The Novel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York, 1981, 第3章。

〔73〕 舒詠，《董小宛》，上海，1947。表面上，这与有关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散文的繁荣有相似性。后来投敌的散文家周黎庵，把这一流行归结为描绘抵抗者和投敌者过去和现在的相似性的潮流（周黎庵，《清明节题记》，15页）。共产党的

不过，历史隐喻难免要承载传统价值和形象。^{〔74〕}无怪乎抗日剧充满了传统中国的忠义象征——忠臣和烈女，赞美忠义和贞洁的固有美德。而对于通敌合作的行为，他们则一成不变地用“淫贱”、“下流”这样具有道德色彩的词汇来描绘。这些不恰当的戏剧模式，却成为了表达集体爱国抵抗热情的主要内容。

通过地下共产党羊枣的帮助，1939年8月，上海剧艺社背后的策划者于伶承租了位于公共租界爱多亚路的舞厅，改造成璇宫剧院。这是首次长期掌管一个剧院，上海剧艺社宣布成为一个职业剧团。从1939年8月到11月，上演了七部话剧（包括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于伶著名的《夜上海》），赢得了批评家的一片喝彩，但却部部都是票房灾难，上座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商业上的失败使上海剧艺社背上了巨额债务，并被迫取消了合约。^{〔75〕}

这些失败却带来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成功。1939年11月，阿英的实验古装剧《碧血花》在璇宫上演超过了35天，甚至出现了话剧史上第一次所有座位必须提前三天预订的情况。该剧的流行主要源于它单纯的道德主题，以及历史隐喻与现代敏

（接上页）戏剧家于伶回忆说，对于历史形式的戏剧的审查没有现代作品那么严格（见他的《默对遗篇吊阿英》，24页）。据说，1942年于伶逃亡重庆的时候曾经得到郭沫若的称赞，因为他准确而聪明地运用技巧，以过去讽刺现在，躲开了日本和租界警察的双重迫害（见程中原，《记革命戏剧家于伶》，97页）。

〔74〕 关于隐喻与语言的讨论，见 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1980。

〔75〕 这个舞厅可能是和一个叫吴邦藩的人合开的。他是中法舞蹈协会的一个舞蹈教练，与上海国民党有良好的关系。见程中原，《记革命戏剧家于伶》，96页。于伶，《默对遗篇吊阿英》，23页。关于剧目和观众率，见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156页。根据屠光启，当时的一个新演员，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香港的一个著名导演，上海剧艺社演员每月的津贴只有32块，而每人每天的房钱就要花掉一块二。贫穷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见屠光启，《孤岛时期的话剧界》，《大成》，第6期（1974年5月），44页。

感性的巧妙并置。为了迷惑审查，它还采用了《明末遗恨》这个叫座的京剧名字，这也吸引了看戏的常客。^{〔76〕}此外，这个作品是真正的集体创作。阿英、顾仲彝、吴仞之、于伶和李健吾都来协助指导（导演是阿英的好朋友吴永刚），全剧组都热情地参与了演出，包括经验丰富的女演员唐若青和即将成名的屠光启。^{〔77〕}

阿英的《碧血花》受到欧阳予倩当代京剧《明末遗恨》中晚明女杰李香君的故事启发，从本质上看，该剧是新儒家“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戏剧表达，在这一信条中，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被象征性地描绘出来。^{〔78〕}

《碧血花》的悲惨情境与沦陷上海有几分相似。剧本围绕着明王朝最后日子里南京文人及其情人的人生，刻画了他们面对这一危机的矛盾心态。在传统的叙事中，戏剧角色是程式化的，他们的对话是老套的，或者是儒家典籍里的语句。孙克咸（舒繆饰）和情人葛嫩娘（唐若青饰）不屈的气节与一对卖国夫妇的贪婪、自私，以及两个曾发誓要保持忠义的朋友的退缩相对立。在高潮的一幕，孙克咸因拒绝投降而被处死，葛嫩娘在怒骂叛徒蔡如衡（屠启光饰）后自杀以保忠贞。他们英雄式的伟大行为表达了新儒家“失节事大”的教义，肯定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为了显出更大的反差，阿英加上了一个乐观的结局，

〔76〕 顾仲彝记录，该剧上演了35天（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156页）。另一方面，于伶说，它的满座维持了两个多月，并回忆说，建议阿英采用《明末遗恨》的剧名，使审查者以为他的古装剧是京剧演出，更容易通过审查（《默对遗篇吊阿英》，23页）。

〔77〕 屠光启，《孤岛时期的话剧界》，46—47页。

〔78〕 京剧《明末遗恨》以《桃花扇》为底本，由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欧阳予倩创作，1937年12月由著名演员周信芳表演。欧阳予倩对1937年正在兴起的京剧改革有促进作用。在周信芳的帮助下，他导演了这部剧作。然而，他的实验被中断了，由于受到生命威胁，在1938年初他前往西南地区。

暗示南京（理解为上海）的占领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军队（新四军）正在开来。^{〔79〕}

这部戏剧中出现了爱、死、忠诚这些感人的元素，这些熟悉的主旨用传统的形式来表现，吸引了观众。在恐怖的沦陷中，戏剧想象唤起了观众的义愤，并为他们的爱国主义找到了宣泄的方法。据柯灵说，许多男女都是话剧的新观众，他们十分认同这种艺术形式，在看到葛嫩娘自杀时会哭泣，听到她谴责蔡如蘅和满族将军博洛“禽兽”的时候会怒骂。同时，观众的热情提高了上海剧艺社的士气。所有成员在后台手拉手，在团结和满足的高涨情绪中受到鼓舞；许多电影明星和京剧演员参与演出这部作品。然而，该剧的巨大成功却引来了官方的镇压。

在日本的压力下，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要求修改原剧，阿英因此做了八次修改。但是在演出时，剧团继续使用原本。审查者来剧场的时候，演员就转演修改的剧本。审查者还不断地被香烟、蛋糕等好吃好喝的东西打扰，以免他们看戏看得太认真。一次，一群穿制服的日本青年人出现在观众席上，并且都坐在前排的座位上。剧院老板建议他们取消演出，剧团拒绝了。然而，因为这些“满族人”坐在前排，表演变得越发激昂。观众都疯狂了，此后不久该剧就被禁演了。^{〔80〕}

《碧血花》的成功带来了历史剧的繁荣。这多半是因为商业上“赶时髦”的需求，而这一上海文学界的特点，正是备受

〔79〕 阿英的《碧血花》和其他英雄戏剧一起，都被耿德华（Edward Gunn）系统地研究了，但他把焦点集中在这些戏剧的宣传方面，以及在外国统治下历史伪装的必要性上，而不是其中的历史象征意义。因此他认为，他们对“史料的探索”是“传统复苏”的表现，与他们“反罗曼司主义者”的精神相符。见 Edward Gunn,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1982, 2—3 章。

〔80〕 见柯灵，《剧场偶记》；屠光启，48 页。关于镇压的情况，见于伶，《默对遗篇吊阿英》。

批评家们指摘的地方。1939年12月，上海剧艺社迁往辣斐大戏院，这家剧院位于法租界的辣斐德路，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场所，他们在那里上演了维克多利恩·萨尔杜（Victorien Sardou）的法国戏剧 *Patrie!*。尽管这个作品投入了所有的资金和精力，但票房仍然很糟糕。^{〔81〕}于是，这个社团转向了古装剧。1940年到1941年间，剧团演了27部戏剧，根据顾仲彝的资料，大约一半是历史剧。^{〔82〕}其中，吴祖光的《正气歌》和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都是在内地写成的剧本，满座上演了一个多月。^{〔83〕}这些历史剧都是千篇一律的“政治八股”，编排英雄忠义和自我牺牲的俗套故事，不同之处在于侧重的素材——

〔81〕 1939—1941年，有其他的职业剧团在演戏。比如，存在时间不长的中法剧社，由中法戏剧研究会在1939年组织，同年8月解散，其中上演了许幸之的《阿Q正传》和曹禺的《杨贵妃》。中国旅行剧团也是战前成立的著名职业剧团，在香港停留两年之后，于1939年底回到了上海。该剧团成员与阿英关系密切，并且特别擅长表演古装剧。也许因为这个剧团没有其他剧团那么强的政治性，也很少引起争端，因此更愿意把提供娱乐放在首要位置，它的剧目也就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另外，1940年，阿英和吴永刚根据共产党的指示，建立另一个名为新艺社的组织，主要演出阿英本人的作品，以转移日本和租界当局对上海剧艺社的关注。它的常备剧目包括《女店主》、《木兰从军》和阿英的《洪宣娇》。见《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1卷：293—298页；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149—150页和161—162页；Edward Gunn, “Shanghai’s Orphan Isl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rama,” 收入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onnie McDougall 编, Berkeley, 1984。

〔82〕 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157—159页。据作者所知，他所列的剧目仅仅基于他的记忆，并不完整。这些历史剧包括《陈圆圆》、于伶的《大明英烈》和顾的《梁红玉》。不在这个单子上的有周贻白的《文天祥》、舒讷的《岳飞》和阿英的《杨娥传》、《海国英雄》、《洪宣娇》。这些作品构成了阿英的一组著名的晚明戏剧。在收集资料和学者意见方面，阿英得到了著名革命诗人柳亚子的帮助。关于阿英的活动和他的作品与柳亚子的关系，见《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1卷，302—314页。

〔83〕 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150—160页。最流行的戏剧是巴金的《家》，它上演了三个月。吴祖光和阳翰笙都是生活在西南的左翼作家。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表明上海“孤岛不孤”，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原创话

有的是忠臣，有的是节妇，有的二者都有。〔84〕

然而，一些上海知识分子对古装剧与政治挂钩心存矛盾心理。虽然意识到这些作品受到欢迎，但他们担心对过去的强调、对忠臣烈女的刻画会向公众传达出一种“失败主义者”的观点和“封建的”态度。相反的，他们呼唤“现实主义”，剧作家们要为描绘沦陷上海现有的政治和社会黑暗而奋斗。以“不朽的孤岛时代”为名，一些批评家提倡写作应该抓住“即时相关”的题材，比如米价、高房租和投机。〔85〕

李健吾同样对历史剧心存疑虑。就艺术而论，他认为古装剧和现代剧没有不同。他坚持以印象主义者的观点区分“现实”与“真实”、“本质”和“现象”，并提倡文本的哲学意义。因此对他来说，“现实主义”的戏剧是这样一种东西，无论它的形式和素材是什么，作家成功地抓住“本质的真实”，并细微地表现出来，用可信的语言启发人们超越自我。〔86〕

（接上页）剧，上海剧院选择了内地作家的作品。上海剧艺社通过关系，委托未被占领地区的左翼剧作家写关于上海的作品。同时，西南繁荣的剧院也上演上海作家的戏剧。见夏衍，《愁城》，上海，1940，i—iii 页。

〔84〕 彭子仪《文天祥》是第一类的代表。它把宋代忠臣文天祥的牺牲刻画为忠义的体现，忠义正是儒家信条对人的要求。见《文天祥》（上海，1940）。第二类代表性的作品是唐纳的《陈圆圆》。该剧是献给他“忠贞的母亲”的，作品试图重新解释陈圆圆在明朝崩溃时的角色，将她的忠诚与她丈夫——投奔满族征服者的吴三桂将军的贪婪和不道德形成对比。为实现这个目的，唐纳说，他改变了许多历史事实。该剧的主旨在陈圆圆劝说吴三桂不要投奔清军的话中表露无遗：“我自幼就明白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见唐纳，《陈圆圆》，上海，1940。

〔85〕 见唐弢（默然），《沉默篇》，《春秋》卷1，第2期（1943年10月），370—373页。《历史与现实》，《上海周报》，卷1，第2期（1939年10月），56—57页。另见Edward Gunn的讨论摘要，*Unwelcome Muse*，3章。东方曦（孔另境），《论孤岛文艺的发展》，《鲁迅风》，第15期（1939年6月），208页。

〔86〕 李健吾，《咀华二集》，104—109页。李要求尊重古装剧的艺术和工艺。他认为，它们应该在事实上认真地保持历史的真实。他对阿英的《碧血花》表示不满，因为该剧以京剧中的程式化的语言来挪用现代的陈词滥调，比如“爱、自由、奋斗”。他发现这种带有“现实主义”渴望的历史剧，仅仅是怪异而已。

从思想上来说，李健吾抵抗了反个人主义的历史剧潮流，但是它对于新儒家忠贞美德的强调与抗战的口径是一致的。尽管这些美德现在被置于革命民族主义的新话语当中，但是却和李健吾所认同的以自由人文主义传统为主体道德自律和批判理性的“五四”思想相冲突。事实上，在1939年到1941年间，他曾因为不合时宜地推崇艺术个性而遭到攻击。李健吾称印象主义批评是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主观反映。但一个名叫欧阳文辅的作家则将其批驳为“（李健吾）是旧社会的支持者，是腐败理论的宣教师”！〔87〕李健吾在战前的戏剧《这不过是春天》和《十三年》因其优雅的风格和对人性弱点的感性描写，被一些青年的抵抗者选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代表。简言之，这些作品都是与抗战“无关”的东西。〔88〕

于伶和巴人都是负责文化界统一战线政策的资深共产党人，他们有时为李健吾说点好话。〔89〕但是，李健吾明白在抗战剧中，他的想法并没有被接受，而是被容许存在，他是少数派。他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处境，大门是开着的，只要信念相同谁都可以进来，我的所谓艺术标准让每个人都感到头疼。然而他们还是让我进来了，并没有把我踢出去。〔90〕有时，他会非常苦恼，以责备的口气回敬他的批评者们，“那些高喊口号的文章圣手，不也都是并列在市场，待善价而沽的‘弯枝梅花’吗”？〔91〕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被迫修正文学和政治观。

〔87〕 欧阳文辅的引言出自李健吾，《咀华二集》，159—163页。

〔88〕 如李宗绍，《一年来孤岛剧运的回顾》，《戏剧与文学》，卷1，第1期（1940），26—27页。

〔89〕 关于巴人对李健吾的评价，见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于伶，《一年读剧记》，《戏剧与文学》，卷1，第1期（1940），55页。《戏剧与文学》是于伶独立编辑的杂志，1940年发表了多篇维护李健吾的文章，其中包括李宗绍的文章。

〔90〕 引自李宗绍，24页。

〔91〕 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249页。

1940年，李健吾写了几篇散文澄清他的艺术自律观点。引用法国新浪漫主义权威，如勒梅特尔（Jules Lemaître）和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说法，他认为战前的艺术家和批评家，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出独特的个人特点。“客观性有什么用？”李健吾向读者们解释说，“人人有他自己的图解，任谁也不见其就对。为什么？因为人人有一个自我”。因此，文学创作（包括文学批评）是批评主体性的表达。^{〔92〕}但是1937年后，李健吾的道德责任感令他对主观性有了新的定义，像好友王统照、郑振铎一样，也像萨特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沦陷的法国一样，他把集体主义的道德主义提高到“普世准则”的高度。^{〔93〕}假如人类为了“一种共同的人类正义感”，他重新把自我定义为一个批评上的移情存在物，“自我不是一个自私的存在，既不感伤，也不游戏，是一切真实的可能的集中，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小宇宙”。^{〔94〕}换言之，这是一个小世界，它由历史决定，顺应历史潮流。这一观点与战前的无政府主义的看法相反，他把自由主义的存在与顽强的抵抗等同视

〔92〕 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215页。

〔93〕 正如1940年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对萨特的评价：“他强烈的道德感经常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买过什么吗？我告诉他，我偶尔买了一点茶叶，连这点东西也太多。萨特总是坚持他的想法，更不用说他喜欢或不喜欢什么，他在口头或行动上都是非常独断的。但他从没有把这些想法最大化地系统地表达出来……（在他出狱后）的第一个晚上，他又让我吃了一惊。他告诉我，他不会回巴黎来享受甜蜜的自由，而是要去行动。我吓了一跳，问他，怎么行动？我们这么孤独，这么无权无势！这孤独已经千真万确地被打倒了。他回答，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组织一个抵抗运动。”关于萨特在纳粹占领的巴黎的生活的精彩情况，见Annie Cohen-Solal, *Sartre: A Life*, Anna Cancogni 英译, New York, 1987年，特别是129—244页。以及有关伟大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法国维希的细致研究，见Carole 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Cambridge, 1989，特别是205—324页。

〔94〕 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221—236页。

之。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像鲁迅、或者巴尔扎克、福楼拜那样的人，彻底的“独立”，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且一直为公正而战。这些自由主义者为人类的利益而活，他把自己的自由和其他人的看作同样的重要。因此，只要作家“只要他为人类共有的高尚的理想活着”，李健吾向他的批评者呼吁，“我们便把自由创造的权利给他”。〔95〕

这一呼吁引起的只是进步主义者更大的疑虑。因此如果李健吾在沦陷之后不再保持沉默的话，那么他只可能会走上文学的舞台。实际上直到1942年，李健吾写得很少，只在翻译 *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 上花费了很多精力。除了上海剧艺社以外，他还加入了无政治性的组织。就算在那里，他仍然扮演一个有名望的、值得尊敬的角色，而非一个领导者。他们需要的是他的天分而非他的想法。李健吾继续把大量时间花在家庭、教书和学术研究上。除了偶尔去参加彩排和作品见面会以外，他在社交生活中仍然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发现与学术伙伴（特别是陈西禾，暨大的文学教授、著名反满诗人柳亚子的女婿陈麟瑞，才华横溢的学者兼作家的钱锺书夫人杨绛，她也是王文显的学生）相处比和进步主义者相处要志趣相投得多，而且他正忙于帮助以前的老师、当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书的王文显；另外，朱自清（迁往内地）也把家人托付给李健吾照顾。〔96〕

不论李健吾是否心有所虑，日本人把古装剧和洋商报都称作

〔95〕 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220—222页。另见《咀华二集》，221—236页。

〔96〕 王文显非常穷困但拒绝投敌。李健吾翻译了他的剧作《委曲求全》，并把它介绍给剧院。该剧最初用英语写成，当王1927年在耶鲁学习时首次上演。每次演完该剧后，李健吾就把捐款和收益给王。李显然还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朱自清的妻子和孩子度过八年沦陷。朱太太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感激李健吾在最艰难时期的帮助。见王卫国、祁忠，《他在骄阳与巨浪间——李健吾的戏剧生涯》，收入《中国话剧艺术家传》，第3辑，173页。

是“外国租界文学”的敌对文化产品，这反而大大提高了抗战剧的人气。业余剧院的快速增长也为这种流行提供了线索。1938年底以来，话剧在上海爱国青年中十分流行，许多业余演出团体出自学校、商行和公共组织。但是，他们主要在朋友、同事圈中演出鼓动性的独幕剧，演出的意义也仅仅局限于同志们的互相切磋。为了在抗日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许多团体被整合到上海戏剧联谊社的名下，这是一个由共产党的文化委员会组织的联合体。到1940年，该社宣布一共有120个人会团体。该社和上海剧艺社密切合作，上海剧艺社被戏剧人称为“大剧场”，区别于业余团体（被称为“小剧场”），上海戏剧联谊社为所有这些缺乏经验的团体提供戏剧培训，还提供导演、剧本或服装，并组织他们每星期日10点到12点在辣斐大戏院、星光剧院、兰心剧院、卡尔登剧院这样的地方登台，这样他们就可以为更多的人演出。

随着这些制度上的筹备，业余团体和职业团体频繁接触，演出经验和观众人数都得到了提高。例如1939年7月24日到7月30日，联谊社组织十一个业余剧团（300余人）进行了六天二十场的慈善演出。这一大型的演出被誉为中国剧院的“历史事件”，其部分收入由组织者秘密捐献给刘绍文的新四军，而两位组织者李伯龙和张菊生都是前蚁社的成员。在最后一天，为了庆祝成功，所有上海主要的戏剧家都参加了上午在公馆马路黄金剧院举行的庆祝活动。李健吾也参加了，他好像要和进步分子相区别，做了一个关于契诃夫戏剧才华的学术演讲。据一位观察者说，所有的参加者都鼓励其他人坚持为抗战剧而战，整个大厅里充满了同志的精神。这种动人的同志友情给上海抗战剧以爱国的团结之感，而且演出感人，多次使得观众起立鼓掌。^{〔97〕}

〔97〕《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227—290页。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

1941年3月，由于日本人的压迫日益严重，于伶和巴人在逃亡香港之前向李健吾道别，并请他多参与上海剧艺社的活动。但是，李健吾承担了很多中法研究会的研究课题，另外心中可能还对同志们在意识形态上过于苛刻心存芥蒂，他并没有实现这个承诺。不久之后，他为此感到后悔。^{〔98〕}

1941年10月，曹禺的《蜕变》由上海职业剧团上演，这是曹禺在内地写作的一部关于中国重生题材的戏剧。上海职业剧团和上海剧艺社有密切的关系，该剧导演是留英戏剧家黄佐临，最初被李健吾引介到上海戏剧界。该剧获得巨大成功，满座上演达一月之久。据一位目击者说，在场观众一边鼓掌，一边高呼爱国口号，当主人公高喊：“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后台的创作者们在哭泣中激动拥抱。11月的时候，这部剧被禁演。^{〔99〕}镇压的确是未来事态发展的先兆，一个月后，1941年12月，日军将军事占领延伸到租界，随着上海剧艺社的关门，抗战剧被击垮了。

全面占领和商业剧的兴起

12月8日日军进入租界之际，所有的剧院就和洋商报一起

（接上页）150—155页。引文出自松青，《这一月》，《剧场艺术》，10期（1939年8月）。沦陷时期国民党的领导者吴绍澍，主要参与搜集军事情报以及保持富人、公共人物的忠诚的工作。他称赞上海剧艺社在激发青年人坚持抵抗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他甚至试图通过该社团的赞助人和名誉导演赵志游收买这个社团，但失败了。于是，国民党不得不开始建立自己的职业剧团——天风剧团以取代上海剧艺社。天风剧团由戏剧家姚克和导演费穆领导。这个剧团擅长历史剧，特别是姚克的名作《清宫怨》。见吴绍澍，《记上海统一委员会》，《文史资料选集》，卷9，90页。另见《上海人民与新四军》，187—189页。

〔98〕 李健吾，《〈爱与死的搏斗〉在孤岛时期的正式演出》，25页。

〔99〕 柯灵，《剧场偶记》，92页。

遭到关闭，并且要求各剧团提交成员名单。军事哨卡遍布全城，政治上可疑的居民区被封锁了数个星期。军队要求所有抵抗组织立即投降，日军计划进行全城人口普查。所有这些政策助长了镇压即将到来的流言。实际上，许广平在1941年12月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严刑拷打之后，到1942年3月才被释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迅速撤出上海，同时国民党的负责人也撤退到安徽、浙江或重庆；加入两党的知识分子也逃亡内地或东南亚。所有的抗日团体都解散了。^[100]

对于那些不能离开上海的人，生活则沉闷而危险。例如，当从左翼作家唐弢那里得到许广平被捕的消息之后，郑振铎立即搬家了。此后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我做了不少可怕的梦，甚至连汽车经过街上，也为之惊慌起来，”他后来回忆说，“有时，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简直不敢回过头去。有时，在电车或者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着时，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跳了下去。”^[101]另一位作家怀玖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经历的道德困境：“只能含垢忍辱地活下去。”^[102]

李健吾也是这群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暨大、复旦和中法研究所都在1941年12月关闭，在失业的状况下，李健吾在个人生计和保持清白之间陷入了矛盾。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他的跛腿和家庭义务再一次阻止他和暨大一起长途跋涉迁往内地，在那里他也没有什么私人关系。他本来也许能像王统照和开明的那群人一样，蛰居在家，但他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103]那

[100] 关于日军全面占领后第一个星期的细致、生动的记载，见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上海，1974，第二章。

[101] 郑振铎，《求书日录》，《大公报》，1945年11月。

[102] 怀玖，《忆陆蠡》，223页。

[103] 李健吾以羡慕而又嫉妒的口吻写了两篇散文，一篇是关于王统照的，一篇是关于李先生的。李先生是一位隐士，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音乐和学术，

么，如何才能找到一份保全尊严的养家工作呢？

1942年初，已经落水的“五四”作家周作人给李健吾写了一封信，给了他一个在日控北京大学里担任行政职务的位子，李健吾拒绝了这个邀请。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剧艺社的同事黄佐临和朱端钧帮助他在戏剧业里找到了一份工作。^[104]

几个月的沉默之后，上海戏剧再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话剧在1942年再度出现主要是因为日本禁演英美电影造成的。当时只有很老的德国、法国片，以及日本片和一些中国电影可以上映，而且每次上演之前都要放十五分钟无聊的日本宣传新闻片。^[105]

孤独而渴望娱乐的大众远远不能满足，为了维持表面的正常，占领者于是在表演艺术上放松了他们的控制，剧院重新开放了。与此同时，沦陷后制造业的崩溃也令一些资本家投资娱乐业。由于逃避现实的情绪蔓延，娱乐业非常有利可图。1943年，当日本集中掌握了上海电影工业之后，电影业甚至比以前更加赚钱了。出于商业和政治的双重目的，一些电影业主把他们的财产转入了现存的剧场和有组织的剧团。同时，许多电影人开始从事话剧。所有这些原因促成了沦陷上海的戏剧繁荣。^[106]

不过与孤岛时期的戏剧运动不同，日本占领下的话剧从本

（接上页）在沦陷期间，他得到了他的兄弟——作家巴金的资助。他用“君子人”一词来称呼他们，意味着唤起儒者的理想，并称赞他们的隐退是对“终极考验”的顽强抵抗，因此表现了他们的孤傲美德。见他的《王三哥》和《怀王统照》，《切梦刀》，88—93页。

[104] 朱端钧是复旦大学教授，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据说一个共产党的文学组织者说服他在1941年后留在上海，加入戏剧工业，以便给上海的戏剧带来一些积极的因素。见《中国话剧艺术家传》，2卷，96—120页。

[105] Arch Carey, *The War Years at Shanghai: 1941-45-48*, New York, 1967, 73—74页。

[106]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14章；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163—167页；王俊，《一年来上海剧团的变迁和演出》，《太平洋周报》（1942年12月）。

质上说是商业活动。娱乐和利益控制了一切，话剧的“商业化”带来戏剧的空前繁荣，许多作家和演员在这蓬勃的工业中找到了工作。^[107]在1942—1945年间，共出现30个全职剧团，16个剧场和总数500余人参与戏剧工作。^[108]当时剧院的上座率普遍能达到四成，而最受欢迎的话剧是1942年秦瘦鸥的《秋海棠》和1943年黄佐临的《浮生六记》，其满座情况分别持续了五个多月和四个月。

尽管如此，这一商业成功却遭到政治观点不同作家们的批评，认为这是对话剧教化和艺术传统的背叛。他们谴责这是向庸俗的投降，不去引导社会而是被社会所引导。正如一位批评家在一份爱国杂志上所要求的，不要取悦观众，不要让你自己被他们所控制。否则（话剧）迟早要消亡。^[109]另一方面，协助日本人的官员周雨人谴责商业剧，最近的戏剧迎合庸俗的趣味，仅仅吸引格调低下的观众……今天的剧团都只关心票房效益，唯利是图，与艺术背道而驰。^[110]

爱国批评家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讽刺性的事实，沦陷的上海是一个这样的世界，表面上与政治无关的艺术变成一种强有力的

[107] 许多知识分子此前没有戏剧艺术的经历。比如，柯灵是《世纪风》的编辑，当租界被完全占领后，第一次加入了电影公司。当日本人掌握电影工业控制权的时候，他辞职了，并且当了一段时间的推销员，但很快就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那时，他以剧作家的身份加入了左翼的苦干剧团，并一直在那里待到战争结束。与柯灵的谈话，1987年6月21日。

[108] 柯灵，《剧场偶记》，24页；另见罗洪，《孤岛时代》，上海，1947，89页。

[109] 引自《我对话剧界的希望》，《万象》，3卷，4期（1943年10月），110—112，142—147页。关于投敌合作者的相关批评，见冰独，《上海剧团漫步》，《杂志》，第9期（1942年8月），162—167页。关于上海戏剧全面反映的记录，见柯灵，《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1982年4月），1—18页。

[110] 周雨人，《中国剧运近况》，《申报月刊》4，第4期（1945年4月），110—114页。

政治。^[111]恐怖迫害令一切隐性的反抗活动都充满危险，日本宪兵队和汉奸组成的暗探对知识分子保持高度警惕，经常以“思想感化”的名义拜访、拘留、拷打那些被怀疑分子。所以，为了安全的缘故，抗日剧不得不伪装起来，以便于成为高效的抵抗武器。^[112]

李健吾似乎也对这一情况印象深刻，当战争结束后，他有点夸张地说戏剧是独立于日本思想控制的“唯一文化产物”。戏剧公开的盈利目标和与政治无关的特点让它躲过了政治的干涉，这一点上可与柯灵主编的《万象》相比。^[113]尽管如此，他解释说，在商业艺术的伪装下，爱国戏剧家为保卫国家纯洁而战，在作品中渗透生动的抗日精神。^[114]事实上，这些戏剧是在日本的全面占领下抗战剧作家反映情绪、热忱和表现方式的重要途径，李健吾的一些戏剧也证明了这一点。

1942年初，李健吾加入荣伟公司当编剧兼导演。这个剧团属于黄金荣的孙子，但是由于三个月都没有赢利，这个公司就

[111] 在沦陷的上海，一些政治性的戏剧也设法通过政治的运作上演。1943年，根据舒譚所说，在准军事组织中的一些中国人建议日本军队赞助他们演出关于宋代忠臣岳飞的新剧，说他们希望通过彻底扭转岳飞和他的对手秦桧的历史象征意义，来改变公众的和平观。他们随后交出他们剧本的副本以供审查，在这个剧本中，岳飞被刻画为一个残暴的军阀，秦桧是一个爱国者。这个剧本得到通过，并且得到皇军的中文喉舌《青年报》的赞助。为了演出，剧本改编自舒譚的爱国剧作《岳飞》，该剧本写于1940年但从没有上演过。在舞台上，秦桧操着一口广东话大谈和平的必要性，这立刻让观众们想到了汪精卫。这出戏在第三天开始满座，但是在第五天就被禁演了。见舒譚，《岳飞的遭遇》，90—93页。

[112] 有关中国作家在日本镇压下的恐惧的生动描写，见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165—166页；另见郑振铎，《蛰居散记》，上海，1946。

[113] 像柯灵的《万象》和陈蝶衣《春秋》（都在第一章中讨论过）这类杂志都宣布自己是商业投资，以躲避政治镇压。虽然他们主要印刷爱情故事和历史小说，但是这些杂志也出版关于戏剧和关于演出与表演者的报告。

[114] 引言出自赵景深，《忆上海文协成立大会》，《文艺复兴》卷1，第1期（1946年1月），126页。另见郑振铎在同一会议中关于上海知识分子抵抗的谈话。

破产了。从那时直到 1945 年，李健吾为不同的剧团工作，但他们背后的资金来源都十分的不明不白。四年中，李健吾编剧、导演、演出了很多戏剧。^[115]这些工作给他的生活以保障，但他也因这些商业公司的背景而陷入麻烦。比如，他在 1942 年末受雇共同管理华艺剧团演出委员会，但后来发现赞助人（傅如珊）与日本人关系密切。李健吾因此退出了那个剧团，加入上海艺光剧团，这个剧团又和华中日本远征军中臭名昭著的新闻课有良好的关系。1943 年，当这种关系被发现以后，李健吾和其他团员一起离开了。^[116]此时，李健吾把自己比作唐玄宗（712—755）的宫廷弄臣李龟年，正是一个为取悦主人而写作的人。“我是一个小民，没有政治野心，永远只为这小小的良心许留安宁。”在 1946 年他加入剧团事务的时候，也进行了自我辩护，“我跳出了象牙之塔。扔掉了清高，甩开了诱惑，从此以戏剧为生，成了士大夫不齿的戏子”。^[117]

李健吾在友情和学术生活中得到了安慰。“戏养活着我，是我表面的活动，其实我每天伏在案头正常的工作乃是翻译。”^[118]每天早晨，在帮助太太排队买完食物之后，他花费几个小时来翻

[115] 李健吾后来加入了 C. Z. C. 娱乐有限公司，它由一群商人和戏剧爱好者建立，得到 5 万元的资金，但三个月后就关闭了。1943 年末，在为华艺剧团和上海艺光剧团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他转到了新成立的上海联艺剧团，由电影巨头柳中浩和柳中亮成立，他们经营了金城大戏院、金都大戏院、世界大戏院和国华电影公司。他们（依其申述，他们和重庆有密切的关系）拒绝让日本人控制他们的公司。它自称有 10 万元资本。同时，李健吾以其个人的关系，写作并介绍大多数内地作家的作品给许多剧团。在 1937—1941 年间，他仅仅写了三个戏剧，在日本占领了孤岛之后，他完成的剧本不少于十部，而且都改编自法国或英国的剧本。

[116] 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175 页。

[117] 李健吾，《与友人书》，《上海文化》，第 6 期（1946 年 7 月），28—29 页。李龟年因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名垂千古。

[118] 李健吾，《与友人书》，28—29 页。

译福楼拜的小说，希望在解放后出版。这种期望使他在沦陷时期保持乐观，他也和朋友陈西禾、陈麟瑞和杨绛保持密切的关系，大家都靠写戏剧维生，而且钱锺书也在1941年从昆明回到上海和妻子团聚。这些好朋友互相支持，不时地相互款待，从李健吾的家步行到位于霞飞路的陈家或杨家吃晚饭只要几分钟，或者去便宜的小饭馆享用一顿涮羊肉和美酒。它们聊天、说笑话、讨论戏剧和西方文学，彼此介绍作品去剧团，并且交换文坛和战事的消息。一天，钱锺书帮李健吾找到了一条久寻未得的注释，这让他“高兴了整整一个下午”。在这种志趣相投的气氛下，从1942年到1945年，李健吾翻译了《包法利夫人》、《三故事》和《爱的教育》，并修订了《圣安东的诱惑》（该书完成于1936年）和《萨朗波》。^[119]

但李健吾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日本人的恐怖高压下坚持自己的道德反抗。虽然他不是为了政治原因再度参与话剧活动（“我在戏剧里面求生活，并不是为了‘地下工作’”），^[120]但是他的民族尊严（和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他父亲那“严肃”、“可怜的辛劳的”面容激励他不甘苟活，不肯同流合污）^[121]带给他的深刻焦虑很快就让他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把那利润挂帅的商业剧变成传播抗日意识的斗争活动呢？

[119] 李健吾，《与友人书》；杨绛，《喜剧二种》，福州，1982，1页。另见《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1卷，213—214页。杨绛的戏剧《称心如意》就是在和李健吾、陈麟瑞在1942年底的一顿涮肉午餐中得到的灵感。该剧的初稿最先得到陈的评论，而后送到李手中进一步提意见。但李很快把它介绍给导演黄佐临演出。李后来还在1943年扮演了剧中的一个角色徐朗斋。当时钱锺书经常躲在书房里写他的著名小说《围城》，这本书在战后才为人所知。关于钱锺书的生活和著作的研究，见 Theodore Hutters, *Qian Zhongshu*, Boston, 1982。

[120] 李健吾，《与友人书》，29页。

[121] 同上书，102页。

凭借他个人的魅力、全面的戏剧才华和写作技巧，李健吾被一位评论者称为“最受尊敬的人物，上海剧坛的盟主”^[122]。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自己大部分的戏剧作品不满意。他很难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和爱国思想，他有时自怨自艾，觉得写不出想要的东西。他觉得人类的特性就是遗憾，总是希望做他不能做的事情。^[123]

为了创作更多的剧本来维持话剧的商业需要，李健吾翻译了许多法国“佳构剧”（well-made play），包括萨尔杜（Sardou）的 *La Tosca*, *Fernande*, *Fédora* 和博马舍（Beaumarchais）的 *Le Mariage de Figaro*，并且还改编了著名通俗作家张恨水的畅销小说《啼笑因缘》和《满江红》。柯灵也是当时活跃的戏剧家，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上海戏剧舞台上充满了改编剧（几乎没有原创本土戏剧）、喜剧和历史情节剧，几乎每部戏都少不了浪漫爱情故事和社会琐事。^[124] 因为害怕报复，1941年前忠臣烈女隐喻道德政治的话剧已几乎消失了。但是在抵抗者的创作中，家庭的爱情故事也能变成反抗的象征。

实际上，李健吾在这些情节剧的改编中加入了新的道德政治解释。但是潦草的笔迹表明他受到交稿期限的压力，那些来找乐子的观众几乎无法在这干巴巴的、未经打磨的段落中发现“藏”在其中的微妙信息。^[125] 比如，在《花信风》（萨尔杜的 *Fernande* 改编）中，李健吾以女主人公遭到强奸来比喻沦陷的上海。她年轻的未婚夫在几经犹豫之后，顶住社会压力和她结

[122] 引自王卫国和祁忠，178页。评论者是某个叫董史的人，这篇文章出现在柯灵的《万象》上。

[123] 李健吾，《风流债》，上海，1946，1页。

[124] 见顾仲彝有关这些戏剧的论文。

[125] 见《剧团往来》，《万象》4，第5期（1944年11月），66—70页。

婚了，以此象征那些有浩然正气的抵抗者才可被看成人。然而，把高尚的道德政治目的与仅仅是不为传统所接受的强奸受害联系在一起，似乎是过于牵强了。正如一个评论者所抱怨的：剧中的人物都那么的不真实，语言那么生硬，总之该剧的问题很多。^[126]

《金小玉》改编自萨尔杜的戏剧（中国版的 *La Tosca*），该剧受到观众的欢迎，票房保持了两个月的满座。该剧在位于花园路 21 号的卡尔登剧院上演，友人黄佐临和柯灵的苦干剧团演出，演员阵容强大，包括石挥（绰号“话剧皇帝”）和丹尼。故事背景发生在 20 年代的北京，讲的是一个女伶（丹尼饰）被军警头子（石挥饰）折磨，为了救出以前的爱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出卖了自己身体。主演石挥在表演一个残酷变态的施暴者时，抽着雪茄、不时结结巴巴说广东话的精彩表现，还有拷打的场景，都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心，没人会看不出这场景和宪兵队、“76 号”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相似性。但对于在此剧饰演小角色的李健吾来说，不仅仅要担心日本人的恐吓，还要闻台上难闻的雪茄味。在一次演出结束之后，他甚至在后台昏了过去。^[127]

李健吾的原创作品《青春》写于 1944 年，并在同年上演。该剧是为新艺剧团而作，成功地表达了他的哲学观。作品在主题上是他早期《贩马记》的重写，为了避开日本的迫害，强调

[126] 李健吾，《花信风》，上海，1947。我对李健吾改编萨尔杜作品的看法不同于耿德华，他过于强调法国戏剧家对于“悬置和逃避”的表现，并认为这是“戏剧犬儒主义”的流行原因。见 *Unwelcome Muse*, 104 页。引文出自《六月戏剧演出》，《杂志》（二），第 4 期（1993 年 7 月），190—191 页。

[127] 见 Tony Hyder 的精彩研究《译者后记》，收入 *It's Only Spring*, 119—120 页。另见柯灵《序言》，《李健吾剧作选》，1—17 页。

了浪漫的部分，而不是革命的方面。这部四幕剧是对李健吾战时思想的最充分的表达。正如萨特的《苍蝇》，《青春》从本质上看是一部为道德自由而反抗和斗争的政治剧。它坚信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是拯救人性的先决条件。李健吾的看法和萨特一样，认为每个政治行动都是一次道德的选择，因为内心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只有自己的内心得到自由，才能改变外在的不公。

《青春》以生动流畅的语言，辅以山西当地的方言俚语，唤起了作家关于辛亥革命前夕的山西农村生活回忆，其内容是关于一个穷苦农民田喜儿想要娶村长女儿香草的斗争。虽然香草的父亲反对这桩婚事，后来还以死相逼，但是，田喜儿对这个姑娘的承诺和他那“更美好明天”的信念又激励他公开反对这个暴君。不过，他们的私奔白费力气，香草还是被迫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十一岁男孩。在封建社会，这是一个普通不过的没有爱情的故事，但是李健吾却把它作为表现人类救赎的独特作品。一年后，香草和她的婆家人回到了娘家，田喜儿再一次鼓动她和自己远走高飞：

田喜儿 你真就变了心？

香 草 （低下了头）我有一天会死的！

田喜儿 香草，不会死的。你嫁了一个孩子，那不叫嫁人。赶明儿我要是一朝得了势呀……（放低声音）景相公讲，要换朝代了，什么全跟着换……

香 草 好喜儿哥，我等不到那一天的。

田喜儿 等得到的。也就快了。〔128〕

〔128〕《青春》，上海，1948，126页。“Springtime”，David Pollard 英译，收入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Drama: An Anthology*，Edward Gunn 编，Bloomington，1983，216页。

没人会误解这些台词背后的意思。在此，李健吾有效地运用了爱情信念——这一当时抵抗文学中的流行密码——的隐喻，号召观众坚持下去直到上海的解放。不过，对话中也暗示出不确定的语气。

第二次私奔再次被发现，香草离婚了。她的父亲把离婚看成是丢人的事情，逼她自杀，香草准备顺从地照办。在最富抵抗性的剧作家笔下，这出戏会有一个恰当的结局。^[129]而把田喜儿留下来等“明天”，让他在愤怒和仇恨中消磨时光，会增加沦陷带给人的恐怖和荒诞。不过，李健吾更强调交战的救赎力量。田喜儿得知了香草的厄运，如果他要阻止的话，村长就会杀了他。可他坚持为了自己的爱的自由而战，这里出现了要杀死自己女儿的“兽”和要牺牲自己拯救爱人的“人”之间的尖锐冲突。甚至连田喜儿意志坚强、牙尖嘴利的寡母（代表被围攻的国民党政府）也来帮助他，尽管她以前曾经反对这桩婚事。喜儿以高度情节剧化的方式成功地打败了村长，把香草带回家。戏剧在乐观和希望的情绪中结束：“阳光一线，照着他们的背影，天色已经完全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农人田事已毕，远远传来他们种种的声音，唱歌，吆喝，同时牛鸣驴嘶，啼鸦啼鸟，交织成田野的音乐。”^[130]这里，“田野的音乐”显然象征着来自内地的民族抵抗，他们不屈的斗争将使沦陷土崩瓦解。

为了回应他早年所写的贫苦雇农“牛小山”牺牲的文章，李健吾重申了“不带神话的英雄主义。”田喜儿凭借反抗中的勇敢打败了封建压迫（可理解为沦陷的恐怖和不公），这暗示了以

[129] 见如，师陀《大马戏团》，柯灵《恨海》，和孔另境《李太白》。

[130] 《青春》，159页；英译本 Pollard, “Springtime”，222页。

战斗来救赎的可能性。剧作家表明，每种生活状态都包含着限制（历史）和可能（自由）；每个政治行动都是道德行动。只有像田喜儿那样，摆脱恐惧和胁迫，追求个人的自由，才能帮助别人从政治压迫中解放出来。所以，田喜儿的道德勇气给香草和他的寡母带来了自由。个人的解放与中国的解放是相辅相成的。面对死亡，抵抗作家（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要扮演政治预言者的角色，帮助驱散弱者的幻想和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和政府）在内的无力感，赋予他们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战的勇气。

当我们把《青春》放在当时的语境中来看的时候，李健吾的信息中所传达出的政治意义意味着更敏锐的解脱感。从1943年到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反复受挫之后，为了支持战争所需，它被迫不顾一切地为原料和经济资源而战。^[131]除了1944年在豫湘桂发动的进攻威胁到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存亡外，日本皇军收紧了对沦陷地区政治和经济的控制。^[132]在上海，所有被认为对军事有用的经济资料都被充公和集中起来。城里的物质生活很快变得更糟，与此相伴，对不同政见者的无情镇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到1943年，电影工业完全由日本经营；剧院勉强逃脱了相同的命运，但是审查制度导致剧院的接二连三地倒闭，经常有知识分子被捕。许多作家和剧作家被捕了，甚至莫名消失了。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下，由于公众的默许和逃避，汉奸作家和艺术家增

[131] 见 Saburō Ienaga, *The Pacific War: World War II and the Japanese, 1931-1945*, New York, 1978, 第8—9章和II；另见木坂润一郎, *Taiheiyō sensō*（《太平洋战争》），东京，1982。

[132] 关于豫湘桂战役对国民政府和内地的破坏之影响，见 Lloyd Eastman,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收入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费正清和费维恺（John King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编，卷13，2节（Cambridge, 1981），580—601页；关于上海的情况，见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235—322页；John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1972, 第15章。

多了。对于少数进行抵抗的人来说，最终的忠诚和气节考验的时刻到来了。正如柯灵在他的戏剧《恨海》中所说：“自有史以来，道德的堕落，今天已经是到了极点……许多人都在变，有的简直变成了禽兽，叫你对面也认不出来。”^{〔133〕}

在这种语境下，李健吾的《青春》的用意，显而易见是要驱除上海知识分子的恐惧和胆怯，唤起他们代表人民为自由坚持战斗的道德责任感。他们只有像田喜儿一样，通过顽强的战斗才能证明自己的人性，而上海人民的命运和香草的情况一样，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久，李健吾必须要面对人格的“最终考验”。1945年4月19日凌晨2点，他被宪兵队逮捕了。当三个宪兵队特务从偏门进入他家的时候，他流露出政治上的天真，就好像战争刚刚开始一样，他以为这些入侵者是贼，所以从前门溜到邻居家给警察打电话。但是当他后来回家之后，他发现宪兵队的官员正在等他。当他被带到街上的时候，他以为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家人了。“太太的眼睛挂着泪。床上睡着三个孩子，摇篮睡着顶小的一个。黑漆漆的夜不及我的心黑。”尽管如此，李健吾还是幸运的，因为他很快发现妻子救了他一命，她及时移走了床下那些内地寄来的信件。^{〔134〕}

李健吾被带到了宪兵队所在地（那里最初是个美国社区的教堂），位于法租界贝当路（被叫作“贝公馆”），并且立即被臭名昭著的荻原大旭（他以前是个和尚）提审。邪恶而英俊的荻原看上去是“马基雅维利、李莲英和徐志摩”的奇怪组合，李健吾想道；与石挥在李健吾《金小玉》中所想象的施暴者不同，他既不抽雪茄也不说广东话。

〔133〕 柯灵，《恨海》，上海，1947，98页。

〔134〕 李健吾，《罪案》，收入《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255—257页。

在连续四个小时的审问之后，李健吾的回答无法使宪兵队满意。然后他被带向厨房（在那儿他天真地以为会给自己吃饭），进入了一间放着一个巨大的水泥浴缸和橡皮水管的房间，他很快就被脱光，而且绑在一个低矮的长凳上，开始受水刑。冰冷的水不停地灌进他的嘴和鼻子里，直到这些水再混着血水倒流出来。然后，这个过程重新开始。有几次施暴者甚至站在或者坐在他被水胀满的腹部，以增加疼痛。经过了这些折磨，在中国翻译的帮助下，获原一个接一个地问他问题。李健吾已经衰弱成“一个哀求着死亡的肉体”（吉恩·艾莫里，Jean Amery），拒绝说出任何名字。这个曾经因为吸入雪茄烟而昏倒在后台的人，却能忍受莫大的折磨，体现出“面对肉体痛苦时，抵抗的道德力量”。^[135]

为了加深他精神上的痛苦，李健吾被要求给他的家人留“遗嘱”。“我全身在打冷战，冷水窒住我的喉咙，我的鼻孔，我的耳管，我的牙齿辘辘作声。我的气息虽说幽微，终于进出了一句话：‘告诉他们我是好人。爸爸……死得苦……叫孩子们好……好儿作人。’”也许受他父亲牺牲的影响，意味着这“遗嘱”是对光荣的死的肯定，是人性正义的实现。

除了一本文学草稿本之外，因为没有足够的不利证据，加之他坚强的忍耐力让他什么也没说，二十多天的审问之后，李

[135] Jean Amery, *At the Mind's Limits: Contemplations of a Survivor on Auschwitz and Its Realities*, Sidney 和 Stella Rosenfeld 英译, Bloomington, Ind., 1980, 特别是 21—44 页。这里记录了作者对于自己在纳粹党卫军 Breendonk 营地所遭受到非人遭遇的令人同情的、残酷的感性记忆。在 Amery 对于折磨的描述中，他经常用一种混合着无助和“可怜的赞美”来看待他的施暴者，而且每个字都适用于李健吾：“行刑，就是把一个人完全变成一具肉体。软弱地面对暴力，痛苦的哀号，等着不存在的帮助，无反抗的能力，被折磨的人只是一具尸体，而不是其他的什么”（33 页）；另见，“机械臂的一次轻微的压力就足以使另一个人像屠宰场里的猪仔那样撕心裂肺地嚎叫，而在他的头脑中浮现的可能是康德和黑格尔，全部的九个交响乐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35 页）。

健吾被释放了。^[136]他清华大学时代的好友孙瑞璜时任新华银行的副经理，也曾是上海文协和复社的成员，通过关系付了50万的赎金，救了他一命。^[137]

李健吾的幸存给了他自豪感和尊严。他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一个真正的“不带神话的英雄”，已经通过了纯洁的磨炼，证明了道德承诺的救赎力量，像他的朋友牛小山一样，“我是一个小民，没有政治野心，永远只是为这颗小小的良心寻求安宁”。^[138]这次折磨给了他“最后考验”的机会，正如他在《十三年》里所写的，“他寂寞伟大的心灵，照亮了我们整个村子”。^[139]1945年5月，他被释放后不久，他在两部剧作中——《王德明》和《阿史那》，再次写下精神重生的感受。这两个作品分别改编自莎士比亚的《麦克白》(Macbeth)和《奥塞罗》(Othello)。为了避免审查，李健吾诉诸历史隐喻，传达他对政治经历的看法。前者由苦干剧团接手，很快就在偏僻的辣斐大戏

[136] 这里关于李健吾在宪兵队所受的刑罚和经历，是从他的散文《获原大旭》、《罪案》、《小蓝本子》中重组出来的，收入《启蒙》，65—87页。关于日本监狱的条件和行刑的撼人而恐怖的描述，见许广平，《遭难前后》，上海，1950；以及司徒宗，《血债》，福州，1985，151—185页。

[137] 徐士瑚，《李健吾的一生》，98页。1966年“文革”期间，李健吾在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两个上海来的红卫兵找上他，指责他在日本的监狱里通敌叛国，并对他进行野蛮的审讯。由于这件事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缺憾，也是最令他骄傲的大事，李健吾为这样的捏造感到出离愤怒。如果不是他妻子和他的同事好友钱锺书和冯至阻止他的话，他就自杀了。他妻子平静但坚决地说：“别人不知道你，我跟了你一辈子还不知道你吗？”见王卫国和祁忠，184—185页。

[138] 李健吾，《与友人书》，28页。

[139] 战后，李健吾以自传的语气谈到编辑陆蠡的牺牲。陆蠡是因为去上海租界巡捕房抗议日本镇压文化生活出版社而被杀的。他说：“(陆蠡象征着)这种向上的道德的人性……一个人平时没有一点点英雄的样子给人，然而危机来了，他却比什么人也勇敢……这个纯洁的灵魂在先象征着一个善良的中国百姓，如今成为这老大民族的年轻的抗争的声音。”见他的《陆蠡的散文》，收入《陆蠡散文集》，台北，1979，212—213页。

院上演。导演是黄佐临，并由黄的太太丹尼主演，这匆匆写就的心血之作最终获得好坏参半的评价。^[140]

《王德明》以混乱的五代时期（907—960）为背景，讲述的是一个忠臣的故事，他选择身居异邦，只为了推翻这个国家。该剧的道德主题是从元杂剧《赵氏孤儿》中得到的灵感，主人公李震是篡位者手下的高官，为了救废君嗣子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为最后推翻篡位王朝做出了贡献。（考虑到他早年在《忠臣烈女》中道德主题的矛盾性，李健吾试图用“个人主义”的细致描写来突出这个人物：李震既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忠臣队伍，也不甘屈从篡位者的淫威。他的行动听从的是他内心的声音。）这种为王朝而自我牺牲的个人行动，有助于弥补一个忠臣因服侍外来统治者而犯下的原罪。尤其是这一行动使他的一生“闪光”，并救赎了他的人性。因此，李健吾让他的人物最后引用了孟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格言。他向自己，也向别人证明，无论如何，他是一个真正的人。^[141]

李健吾和他虚构的忠臣实在是太相似了。李健吾觉得，通过在（独自）面对异族统治的恐怖时为保持“国家的纯洁”所作的斗争，让他获得了人性，并使自己远离政治的生活得到救赎。从一个迂腐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学者变成一个从最野蛮和没有人性的日本施暴者手中生还的抗日英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此同时，他也摆脱了默默无闻的状态，进入了上海文学生活的中心。^[142]从他自己的经历出发，他认为战争给

[140] 见柯灵，《回忆苦干》，收入《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卷二，北京，1985，345—353页。

[141] 战后，该剧在左翼文学杂志《文章》第1—4期（1946年1月—7月）连载。

[142] 在1942年到1945年间，李健吾不仅被视为“上海戏剧的领袖”，而且变成战后文学界的积极参与者，并得到广泛的尊敬。比如，除了1945年12月在

中国精神的复兴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像他的许多同志郑振铎、柯灵、黄佐临和杨绛一样，^[143]李健吾倾向于把政治和个人道德等同视之，把抗日战争视为中国道德的重生。“我们”被救赎，而那些不配为人的“他们”该下地狱。“战火是破坏，也是建设，腐败让给健康，旧让给新，物质让给精神。”^[144]不过，这种道德观很快让他和其他抗日知识分子在面对1945年胜利后官僚横行的腐败国民党政府时感到了幻灭的苦涩。和他的戏剧《贩马记》中的人物一样，他在战后写道，那些曾经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私欲的人，在自私自利的放纵中变得更坏了。……光明在黑暗中黯淡，阴影……封住了大地的伤口，在那上面血泪已经干了。^[145]

1945年5月，就在李健吾获得自我解放的新感受之际，他也在等待着国家的解放。到1945年夏，对上海民众来说，日本人的失败指日可待。美国B-29轰炸机在城市上空的频繁出现，以及位于黄浦路2号的苏联领事馆外，沿着外滩悬挂的展示欧洲战况的地图宣传了第三帝国的瓦解，这一切都暗示了军

（接上页）中国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开幕式上代表上海戏剧家做主题发言外，他还和郑振铎一起，成为富有影响的杂志《文艺复兴》的副主编，他旗下的撰稿者包括文坛重量级的作者，像郭沫若、巴金和茅盾，而钱锺书的《围城》也是在这个刊物上连载的。他和顾仲彝、熊佛西一起建立了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院——至今享有盛誉的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见王卫国和祁忠，179—180页。赵景深，《忆上海文协成立大会》，《文艺复兴》，卷1，第1期（1946年1月）。

[143] 关于这些作家的观点和参与著名的战后杂志《周报》，见柯灵，《煮字生涯》，山西，1986，76—117页。和陈西禾一起，陈麟瑞、唐弢、钱锺书、许杰、师陀、夏丏尊、周建人（鲁迅之弟）和许广平，他们在1945年10月联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敦促把审判文化汉奸作为“一雪国耻”的方法。见《文汇报》，1945年10月20日。

[144] 李健吾，《清明前后》，《咀华二集》，134页。

[145] 李健吾，《咀华》，133—134页。关于战后上海文学风景的有趣研究，见Theodore Hutters，54—80页。

事战局的扭转。但是同时，日本宪兵队在对待市民上则变得更加残忍。^[146]

在李健吾获得自由后的两周，他必须再次会见获原大旭。这次是在巨籁达路他家附近的一个小咖啡馆里。这位宪兵队军曹穿着一套入时的西装，带着一顶呢帽，询问他的被害人是否知道著名的抗日作家田汉，当李健吾给了他一个含糊的回答时，他以威胁的口吻（而且是用英语）说道：“他正在取道往上海来。”（He is on the road to Shanghai.）整个谈话似乎是在告诉李健吾，宪兵队的控制力还在，不仅消息灵通，而且关系广泛，他最好还是谨慎一点。半个小时之后，会见结束了，付账的是李健吾。^[147]

由于不堪忍受这样的心理压力，5月末，在戏剧活动家李伯龙的介绍下，李健吾在一个行商的帮助下通过沦陷区和非沦陷区之间的走私网络，逃离了上海。他先去杭州，与随后赶来的家人团聚，再去往安徽屯溪（上海以西未被占领的第一个中国城市）。^[148]李健吾的船一越过分界线，他顿时感到了自由，“弯枝梅花病”似乎立即治愈了：“在自由的土地呼吸着自由的嘘息。小船绕过富阳，我的心胸是怎样形容不出来地舒展呀！我被毒阳晒成了黑人，黑得多叫人开心！再见，永远再会了，获原大旭！”^[149]

[146] 《回忆苏商时代出版社》，收入《中国出版史料》，卷4，北京，1958年，504—508页。关于日本统治上海的最后日子，见陶菊隐，《孤岛见闻》，第20章。

[147] 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253页。

[148] 徐士瑚，《李健吾的一生》，95—96页；王卫国和祁忠，179页。关于走私的网络，见Lloyd Eastman，“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Smuggling, Puppets, 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 1937-1945”，收入*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Cultural Interactions*，入江昭编（Akira Iriye），Princeton，1980，275—303页。

[149] 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253页。

李健吾在抵抗中找到了自由（田喜儿的诛杀暴君），在折磨中克服了罪恶感（《王德明》），而且他成为上海戏剧界的领袖，现在他把自己看作一个生于战争的、关心政治、热心参与社会的作家（*écrivain engagé*），一个以拯救人民为己任的现代英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兴高采烈、慷慨激昂、充满希望，立即动身返回解放了的上海，准备为中国精神的更生——“凤凰涅槃”而献身。^[150]

[150] 抗战知识分子对内战（1945—1949）和共产主义者最后胜利之影响，还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足够注意。比如胡素珊（Suzanne Pepper）出色的《中国内战》（*Civil War in China*）解释蒋介石的垮台主要归咎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以及自由知识分子的响应。这种看法当然是站得住脚的。然而，正如这里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把战争视为精神革命的理想化的观念，以及抗战作家有关道德选择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多少预见了中国的再生，以及部分形成他们对战后局势的反应。换言之，他们的希望和幻灭应该在他们战时的经历中寻找踪迹。如上所述，在李健吾的个案中，他于1946年和许多在沦陷区活下来的有骨气的作家们（包括郑振铎、柯灵、夏丏尊）一起呼吁，在建立自由的、人道的和独立的中国的同时，也要重建气节的道德规范。但他的愿望很快就被恶性的通货膨胀、官僚的腐败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所破坏了。

第三章 合作：“《古今》派”的遗民文学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
脱履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
完缺？

——吴伟业《贺新郎》

上海的附逆行动始于为数不多的几个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的行为称为“少数派的起义”。在汪精卫的领导下，他们发起了“和平运动”，幻想通过委曲求全、与日和谈的方式挽救这个由国民党无能的政客和非理性的多数派所误导的国家。1941年12月日本完全吞并租界区之后，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和平运动”。但是，在沦陷的上海并没有出现像马塞尔·德阿（Marcel Deat）和罗伯特·巴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那样为希特勒积极宣传欧洲“新秩序”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上海作家把日本的“新东亚秩序”放在心上，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为敌人做宣传，不过出于生存的考虑，他们选择了部分地合作。因此，他们的作品中使用很多典故以表达自己因妥协而生出的羞愧和懊恼。也许是为了赎罪，这些作家很少渴望“新秩序”，他们把自己描绘成

遗民（anachronisms），^{〔1〕}而怀旧则成为其作品的主题。

《古今》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遗民态度的体现，它是由汪精卫政府的高官们赞助出版的文学杂志。这些高官们曲线救国的努力不断被日本的军事侵略行动所挫败。而《古今》正是适合这些遗民的一个自我怜悯、自我辩护的退隐文学的载体，它为不少附逆文人（包括文载道、周黎庵、纪果庵在内）提供了一个赎罪的空间。因此，这群《古今》的撰稿人以另一种无法言传的方式表达了上海附逆文人的政治矛盾。

附逆：少数人的反抗之道，1937—1941

1937年11月大上海沦陷之后，中国军事上的惨败接二连三。1938年，徐州、开封、武汉和广州相继沦陷，但日军并不能征服中国，只能占领当时所谓的“点和线”——沿海城市和铁路沿线地区。1938年中，国民政府退守西南。与此同时，共产党则在西北地区建立了广大的游击根据地。抗日运动仍在继续，而战争则进入了相持阶段。^{〔2〕}

1938年初，为了解决“中国问题”，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违背了军队要求中日“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从而摆脱“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愿望，他同意不把领土占领或战争赔款等内容列入和平条款。而汪精卫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仅

〔1〕 遗民一词通常被译为“remnants”或者“relics”，指的是拒绝为新朝服务的文人。但就这些上海的附逆文人来说，正如我在后文中所展示的那样，他们自称为“遗民”的姿态有伤感、自我辩护和自我放纵的意味。因此我把这个词翻译为“anachronisms”，意为“不合时宜的人”。

〔2〕 关于战争的这个阶段的讨论，见王沛、杨卫和著，《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1983，第一章。

次于蒋介石，个性鲜明的他对日本的这一计划抱以很大热情。由于汪精卫对中国抗战所持的悲观态度，他和一群“改组派”国民党官僚聚集在所谓的“低调俱乐部”中，寻求与日本和谈的机会。他们指责蒋介石“独断专行”、无视中国军事力量的弱小，将中国卷入“共产国际控制的共产党”所希望的无望的、灾难性的战争。汪精卫从昆明潜入河内（他的长期助手曾仲鸣就是在那里被国民党密探暗杀的），并于1938年12月29日发表“艳电”，宣布赞同近卫文麿的建议。在日本的帮助下，该集团回到了上海，并推动“和平运动”。而重庆政府拒绝承认这一运动，称汪精卫及其成员为卖国贼，将其开除出党。^{〔3〕}

1939年5月，汪精卫和追随者抵达上海，他们发现“和平运动”在这里不得人心。^{〔4〕}而主张抗战到底的爱国主义情绪才是当时的主流态度。中文报业——特别是洋商报——无情地谴责他们的附逆行为。同情汪的知识分子即使不死，也会遭到排斥，在“除奸”的口号下，由秘密的国民党特务部门主使的政治暗杀活动猖獗。例如1939到1940年之间，共有超过52个汉奸被“制裁”。^{〔5〕}在

〔3〕 关于汪集团和日军导致“和平运动”的政治交换，后来在1940年3月建立南京政府，该政府直到占领结束之时的政治问题等细节分析，见John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1972;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河南，1987。另见金雄白（朱子家）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6卷，香港，1984。有关“改组派”的历史研究，见王克文著，《国民党的转型》，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1985。

〔4〕 这一研究致力于对知识分子附逆者的考察；但对汪精卫和他的政治伙伴——周佛海、陈公博和林柏生的关注却是非常少量的。有关附逆者的传记研究，见黄美真编，《汪伪十汉奸》，上海，1986；Susan Marsh, “Chou Fo-hai: The Making of a Collaborator”，收入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Akira Iriye 编, Princeton, 1980, 304—327页。关于汪精卫，见蔡德金著，《汪精卫评传》，四川，1988；闻少华著，《汪精卫传》，吉林，1988。

〔5〕 《和平运动殉难同志专页》，《中央导报》，1卷5期（1940年9月）：1—14页；另见《新申报》，1940年9月1日。

这种气氛下，作为汪精卫副手的周佛海，这位国民党前宣传部部长、蒋介石的顾问，也深感苦闷，承认“现在所受恐怖分子的生命威胁比以前所受日本飞机的威胁要大得多”。〔6〕然而，由于担心被日本人当作傀儡，该集团不愿在虹口、南市或浦东等沦陷区建立基地。因此他们不得不留在沪西——这一模糊的越界筑路区。该地区的执法权由上海工部局（管理街道）和日本（管理道旁的房屋）共同享有。汪精卫、周佛海及其亲信都在防卫严密的愚园路1136弄居住和工作。

为了改变这种孤立状态，汉奸们想方设法逐步扩大自己的支持阵营。他们迅速在亚尔培路（法租界）和威海卫路的“太阳公寓”（公共租界）建立了两个招募中心，所有应征人员——大多数都是私人关系——在等待分派工作期间都可得到每月30—100元的薪金。〔7〕为了显示这一运动的合法性，1939年8月29日、30日，汪集团自称为国民党正统，在沪西霞飞路76号召开了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下，该会将“和平运动”嫁接到孙中山民族解放思想之上，表示该运动是对1911年辛亥革命的直接继承，从而在表面上巩固了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继承者的说辞。与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的 *don de ma personne*（意思是“把自己献给法国”）的说法类似，汪集团也把他们的和谈描绘为忠于国家的行动，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挽救中国脱离危机所采取的无私奋斗。他们指出，持续的抵抗将使中国损失惨重，除了军力不敌的原因之外，在政治上，抵抗会让共产党借助统一战线从内部瓦解国民党重庆当局。因此，与日和谈创建“大东亚新秩序”来解放中

〔6〕 周佛海著，《回忆与前瞻》，初版于1939年7月，再版于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3页。

〔7〕 金雄白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上：38—39页。

国不失为一个全新的、合理的选择。事实上，早先的休战已经得出结论，（在汪精卫的领导下）中国将会得到更有利的条件。与投降相比，对日本的“和平主义”是“革命行动”，是“合于正义之和平”的爱国追求。^{〔8〕}

在汪精卫看来，“合于正义之和平”是比通过战争来获得最终民族解放的更好方法。因此，国民党“六大”提出的“和平、反共、建国”为宗旨的“和平运动”，将汪集团与国民党重庆当局（呼吁抗战救国）区别开来。随后，汪精卫开始着手以“心理改造”为名的、从反日情绪走向合作精神的政治宣传。该会敦促所有中国人不要听信政府的沙文主义主战谎言，而要拥抱“大东亚新秩序”的国际主义理想。^{〔9〕}

甚至连外国租界也逐步组织了宣传。他们把1939年初由宪兵队建立的恐怖组织正规化，以取代前国民党特务李士群和丁默邨的“黄道会”。延续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方式（特别是戴笠的“军统”），位于极司菲尔路76号的“特务工作总司令部”（俗称“76号”）号称拥有一支300余恐怖分子的军事力量，虽然每个人都身穿绿色制服，但制服上没有什么证明标志。该组织成员由国民党的变节者、前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警察和黑社会组成，其中大多数隶属于青帮大流氓季云卿，其任务是负责“维护”和平。^{〔10〕}

〔8〕 见《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决定以反共为基本政策》，收入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324—332页和337—339页。关于官方版本的“新秩序”，见时任日本外相的松冈洋右的宣言《大东亚新秩序》，《当代日本》第3号，I（1939年3月）：1—9页。关于法国维希的自我辩护宣传，见H. R. Kedward, *Occupied France: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1940-1944*, Oxford, 1985, 17—45页；Robert O. Paxton, *Vichy France: Old Guard and New Order, 1940-1944*, New York, 1972, 1—3章。

〔9〕 有关理论的详尽阐释，见《和平运动与心理改造》，《中央导报》，1卷23期（1941年1月），312—337页。

〔10〕 见黄美真、石源华、姜义华著，《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上海，1984。关于76号头子的情感和文化世界的有趣研究，也可见叶文心（Yeh Wen-hsin），

对附逆者来说，在孤岛上海开展宣传工作的确困难而危险，因为这里的出版业由抗日运动主导。汪精卫手下有一个十六人的秘密“编辑委员会”，其中包括赵叔雍、樊仲云、朱朴等几个汪精卫的老门徒，他们也是后来的文学杂志《古今》出版者，可是汪集团的宣传品连散发出去都困难重重。外国租界中大多数报纸经销商和出版社都受制于国民党的地下组织，他们联合抵制汪集团的宣传。1939年中，该集团只能出版一种报纸——林柏生的《中华日报》，它是“和平运动”的机关报，还有日本赞助的《新申报》和几本小杂志，包括前上海“文协”领导人诸青来的《时代文选》。但这些报刊都销量不佳，比如《中华日报》月销售量仅为500份。结果，编辑部就转而打起了贿赂（每月津贴20—100美元）和威吓反日记者的主意，也用收买的方法来对付《文汇报》和《华美晚报》等有影响的报纸。^{〔11〕}

直到1940年3月，汪精卫正式建立伪国民政府，林柏生（广东人，汪精卫的老助手）在南京掌管宣传部之后，更为积极主动的出版机器才在租界启动。1940年11月，汪集团从

（接上页）“Dai Li and Liu Geping affair: Heroism in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收入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8，第3期（1989年8月），545—562页。

- 〔11〕《在上海汪精卫一派的活动》，分类的日本情报；钱俊瑞等著，《汪派在上海各界活动真相》，收入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172—176页和242—256页。汪精卫的不成功使日本报纸的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众对他缺乏信心，加深了失望和怀疑。”《华美晚报》的出版商朱作同，是一个娱乐场的老板兼记者，与国共两党的新闻记者都交好，他同意把自己的报纸卖给汪集团，而且向“76号”出卖了他的朋友，既是国民党特务，也是《申报》记者的金华亭，从而导致金在夜总会前被杀（见第一章）。为了报复，朱不久以后也死于国民党特工之手。见《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第3019号（1938年3月）；金雄白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1卷：66—76页。

日军手中接管了位于南京路的“上海新闻审查局”。该机构劝诱中国出版业屈服于日本，并出版了六份报纸和八份杂志，如《三民周刊》和言情小说家张资平的《文学研究》。^{〔12〕}由于担心被抵制，这些新的出版物都不敢拥护停战。相反，为了掩盖政治意图，他们或者伪装成流行杂志，或者伪装成小报，充斥着丑闻、夜生活指南和色情文学。同样地，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来迷惑读者，比如在发表社论时使用与著名抗日者相类似的笔名，或在国共两党领导人爱国声明旁边刊登亲日新闻。^{〔13〕}

尽管如此，这些出版物还是少有订阅，而且还经常遭到国民党授意的暴力干涉。从1939年到1940年，在“76号”和国民党地下特务“以眼还眼”的恐怖斗争的夹击下，无论是支持日本的记者还是反对日本的记者都同样面临生命危险。比如，穆时英和刘呐鸥（30年代初期受到日本现代派启发的著名短篇小说作家）在丁默邨赞助的报纸当编辑，1940年，他们二人相继在南京路被刺杀，其原因是为了给两个死掉的国民党新闻记者报仇。^{〔14〕}与此同时，在1940年秋天的爆炸和四次搜捕之后，另一份汉奸报纸《平报》的报馆，像其他邻近的洋商报报馆一样，也用铁丝网和钢板保护起来，而且还由“76号”的36名武装特务把守。所有的编辑人员被迫在报馆里生活，当主编金雄白不得不去参加母亲的葬礼时，周佛海派了100名全副

〔12〕 关于报纸，见刘其奎著，《汪精卫汉奸文化论述》，收入《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上海，1987，217—262页；《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第3019号（1941年1月31日）。关于杂志，见《东亚新闻》，96页。宣传局有职员96人。

〔13〕 金雄白著，《记者生涯五十年》，香港，1977，100—104页；《汪政权的开始与收场》，I：172—176页。

〔14〕 在丁默邨用5万美元从外国出版商手中买下了著名的抗日报纸《文汇报》之后，该报才得以出版。从附逆者的角度看这两个受害者的有关报道，见《新申报》，1940年6月29—30日，9月4—8日。关于日本的报道，见松崎岩次著，《上海人文记》，东京，1941，183—202页，226—290页。

武装的警察保卫护送，警察把灵堂团团包围。〔15〕

在主战的民族主义气氛中，“和平运动”的推进一筹莫展。直到1941年上海被完全占领，才有少数知识分子愿意加入。根据一位因拒绝投敌而逃到重庆的中学校长程宽正所说，那些加入运动的人——被蔑称为“下水”——可以分为“屈从的”和“自愿的”两类。〔16〕前者是迫于生计，孤岛高昂的生活费导致一些失业的作家和记者在沦陷后加入了汪集团，因为汪精卫答应给他们一份稳定的、微薄的收入。也有的是碍于人情或者遭到“76号”的人身安全的威胁才被迫屈从的，比如通俗作家秦瘦鸥，他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受朋友之邀在1940年初加入了金雄白在南京的《中报》。而他加入的原因是他所供职的抗日报纸《大英夜报》被迫关闭，他的工作（作为王统照的助手）也丢了。不过，他因不能写出“令人满意的社论”，很快就被《中报》解职了。还有一个例子，程宽正和华东中学校长为了换取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被迫发誓效忠“和平运动”。〔17〕

不过，“自愿的”附逆者中的大多数要么和汪精卫及其随从有私交，要么对中国抗日运动持悲观看法。其实，他们中的不少人是赞同汪精卫的，尽管也把附逆行为视作“跳火坑”，但是他们同样认为与日和谈是将国家从完全崩溃中拯救出来的办法。他们和“屈从”一类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积极为“和平运动”做宣传，并说服他们的朋友加入进来。例如，《平报》

〔15〕 金雄白著，《记者生涯五十年》，103—107页。《平报》由金和其赞助者周佛海主编；它的报馆位于福州路和石路的交叉口，靠近所有的洋商报的报馆。

〔16〕 程宽正著，《从祸水中跃登彼岸》，收入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1984，373—382页。

〔17〕 金雄白著，《记者生涯五十年》，93—95页。关于程宽正和他的同事的情况，见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172—174页，373—380页。

的编辑金雄白曾经和曾仲鸣交好（此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为《平报》承担经费），而且与周佛海关系密切，金雄白和周佛海自1928年起就曾同游上海和南京的多家妓院。因为这层交情，金雄白在1939年帮《中华日报》找了一个出版商，他自己也成了周佛海招募的第一人。理论家刘石克和郭秀峰曾编辑过汪精卫集团的机关报，他们曾是编辑林柏生在广州时的老同学。^{〔18〕}留日经济学家袁愈侓就是被他的同事顾宝衡说服了去见汪精卫，并很快成为汪的追随者。^{〔19〕}而顾宝衡是周佛海助手梅思平的好友，还有一些在日本接受教育的台湾知识分子，比如作家兼编辑刘呐鸥（1940年被暗杀）在战前组织了一个亲日文化圈。^{〔20〕}1941年之前，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进一步统一了亲汪文人集团的口径。

文化汉奸旨在替汪精卫的立场进行辩护，但其结果却只是不切题地回应了抵抗者对他们的指责，比如将绥靖等同于变节、指控汪精卫集团失节。汪的支持者为了呼应民族解放的官方口径，重新定义了爱国主义话语，以期将“和平运动”置于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传统之中。为此，他们乞灵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来为自己辩护。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发表

〔18〕 北伐期间，在金雄白担任《时报》的战地记者时，蒋介石把他介绍给了周佛海。除周佛海外，新闻业还与陈布雷等其他国民党高官有联系。金和周曾一起沉醉于赌博和夜生活。见金雄白著，《汪政权的开始与收场》，上：1—6页；《记者生涯五十年》，上：24—42页；郭秀峰著，《汪伪时期的〈中华日报〉》，收入《文史资料》，第5期（1980年8月），165—167页。

〔19〕 袁愈侓著，《经历者的回忆》，收入朱金元和陈祖恩编，《汪伪受审纪实》，杭州，1988。

〔20〕 刘呐鸥生于台湾，在日本上了高中和大学。19世纪20年代末，他来到上海，成为现代派文学的领导者。当1937年战争爆发之际，为了宣传目的，他协助日本人招募艺术家，建立针对华中市场的“中华电影公司”。关于他的生活，见松崎岩次著，《上海人文记》，226—278页。

的演说概述了这一思想的大意，这个模糊的概念基于“语言和文化的相似性”的假设，认为日本有“义务”帮助中国这个“兄长”重新恢复自治（而不是像20世纪最初十年那样来剥削它）。在这一基础上，两个“兄弟”国家将联合建立一个摆脱英美帝国主义统治的独立亚洲，这一中日合作的理想为汪精卫集团的附逆意识形态奠定了基调。

汉奸们将“垂死的狼”和“受伤的老虎”等相关的意象联系起来，形容中国过于弱小，不能保卫自己，而日本也还没有强大到能靠一己之力就能赢得这场战争的程度。实际上正如汪精卫集团所说的，这场战争“阴差阳错、拖泥带水”。因此，和平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这是拯救中国和日本的唯一方法。而近卫宣言所提出的“大东亚新秩序”则被断言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这一预言的题中之义。从这个角度看，抵抗者变成了不忠的“他者”，他们持续的抵抗只会把中国拖入灾难。民族救亡的英雄事业不过就是一种绥靖——它的英勇之处在于它挑战了国民党领袖的怯懦，他们缺乏将现实从幻想中分离出来的勇气，而非理性的大众将要成为共产党“沙文主义战争修辞”的牺牲品，因为共产党人为了一党私利，要把国家推入战争，从国难中捞取好处。

汉奸和抵抗者一样，都利用同样的文化符号和爱国语言来解释自己的动机。例如，因为私人关系和养家经饷口加入了汪精卫的龙沐勋，就把儒家的“仁者，爱人”^{〔21〕}的观念延伸为“救人”的意愿。他把《论语》中管仲（？—前645年）辅佐篡位的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故事当作“成仁”的原型表述。因此，

〔21〕“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12章，22行。见《论语》（*Analects*），D. C. Lau 译，London, 1979, 116 页。

汪精卫为中日和谈所做的努力就被赋予了出于“恻隐之心”的正当理由。^{〔22〕}与此同时，一些汉奸重弹“五四”的“启蒙”、“独立思考”、“献身科学真理”、“反对独裁”以及“异化”的老调，把自己与辛亥革命时期冒着被社会放逐、甚至是死亡危险而为真理说话的烈士相提并论，将自己描绘为一个理智而理想主义的少数派“爱国者”。正如政论家陶希圣所言：“战斗的纯粹的民族主义……（我们）倡导科学，不怕力排众议，为了不同流俗。”^{〔23〕}

汪精卫早年刺杀满族亲王失败，险些在辛亥革命中丧命，这件事使他被誉为“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24〕}从1939年3月到1940年7月间在民族主义暴力事件中死掉的52人，其中包括曾仲鸣、刘呐鸥、穆时英，都被汪精卫最信任的助手陈公博称颂为在“危难关头”牺牲自己拯救中国的“烈士”。^{〔25〕}

“和平运动”也能从古代英雄的谱系中找到自己的形象。

〔22〕 龙沐勋，4—5页。龙沐勋所引用的管仲的故事源自《论语》第14章，第16行：“子路问管仲：‘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见《论语》（*Analects*），126页。龙沐勋在1937年后为了维持妻子和七个孩子的生计，不得不在五所大学每周授课33小时。结果他的胃病复发，甚至严重到不能饮水。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接受了汪精卫的邀请。见龙沐勋，《苜蓿生涯过廿年》，《古今》，19—23合期（1943年3—5月）。

〔23〕 《两年来的国内文化界》，《时代文选》，第8/9期（1939年11月），45—48页。

〔24〕 见《抗战中的文化界》，《时代文选》，3/4期（1939年6月），31—32页；《宁不主义》，《时代文选》，3/4期（1939年6月），5—7页；《两年来的国内文化界》，45—50页。见《新申报》，1940年9月3日。在1941年广东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记者大会期间，所有与会者都在纪念1910年黄花岗起义的七十二烈士像前献花，祈求和平。他们把自己比作黄花岗起义中的烈士，把“和平运动”视作为正义和自由而斗争的自我牺牲。见《东亚新闻》，1—22页。

〔25〕 见《新申报》，1949年9月3日。

和谈者——而非战士（就抵抗者而言）——是他们的英雄。围绕着自宋（960—1279）至清（1644—1911）在外侮来犯时，主战还是主和所反复出现的论争中，附逆者赞扬民族图存的德性与高超的和谈策略，以此与抵抗者进行辩论。宋代力主议和的秦桧（而非岳飞）、清代与西方列强签署和平条约的政治家李鸿章（而不是黑旗军将领冯子材）得到了赞颂，和汪精卫一样，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他们拥有以停战来“拯救同胞生命”的勇气和良知。而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汉奸”，只不过是“顽固偏见的受害者”，这个名词应该永远从政治对话中被抛弃，以便恢复和谈的正当。^{〔26〕}

尽管这些爱国的宣言都声称自己是“开明的”少数派，“和平运动”在1939年到1941年间仍然没有什么进展。在政治上，它永远都无法摆脱叛国和恐怖的污名，而1940年汪精卫的两名高级助手（陶希圣和高宗武）揭露了汪日密约的内容和“76号”镇压抗日运动的残暴行径，他们的叛变只不过使“和平运动”的形象更加阴暗。这一运动仍然处于孤立状态，正如一位宣传官员哀叹，“因一二流作家都在‘抗战阵营’，文化界在衰落，令人感到寂寞。和平文学的理论工作便是一例变弱，故以后的工作目标：培养新作家”。^{〔27〕}

〔26〕《讲和与汉奸》，《时代文选》，3/4期（1939年6月），8—15页。另见江亢虎，《失节是大》，《中华日报》，1941年5月5日。

〔27〕沈逸凡，《和平文艺的建立与新近作家》，《中央导报》，1卷30期（1940年2月），15—16页。一个小作家认为和平文学是“大东亚主义”的宣传文学，拥护中日之间的互助和永久和平。见《和平文艺建设论》，《中央导报》，1卷11期（1940年11月），5—9页。和平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张资平，他是一位从日本回国的作家，1920年代在青年读者中以感伤的三角恋爱故事闻名。但他在《中报》的连载小说非常不受欢迎，以至于编辑金雄白不得不中途停止发表。见《记者生涯五十年》，95页。

在首相米内光政领导下的日本政府显然对于汪精卫无法取得群众的支持而感到苦恼。汪精卫早前保证可以把一半的重庆官员和军队都拉入和平运动，而这一许诺的兑现看上去遥遥无期。日本当局对此深感不满，直到1940年11月才承认南京政府（也就是就职典礼的八个月之后）；与快速和平路线相比，日本现在更多地看到了其他可能性。因此，尽管有来自汪政府的抗议，但是日本人继续寻求直接与蒋介石政府和平谈判的机会。〔28〕

就汪精卫集团而言，他们把自己缺乏群众的支持归咎于抗日者夸夸其谈的言辞和日本的“不守信用”。比如，周佛海和陈公博在1939年到1941年间多次抱怨日军在占领区所采取的高压政策以及对待汪政府的高傲态度，这使汪政府看上去无异于中国其他的傀儡政权。而更令汪精卫集团深感烦恼的是，自1938年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到1940年签订旨在迫使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华日基本条约》期间，日本对华政策的矛盾和日本权力结构冲突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他们指责，这一状况有损于上海公众眼中“和平运动”的正义性。〔29〕

1941年12月当日本入侵外国租界之后，汉奸不再为孤立无援而苦恼。在此后的四年中，汉奸们不再提“少数派的反抗”，而要在“和平地区”（如中原）建立政权。然而，汪政府被社会和经济问题所困扰，其政治的合法性仍相当不稳定。

〔28〕 关于日本寻求与蒋介石和谈的种种努力，见 John Boyle，第14章。

〔29〕 见周佛海，《良药忠言》，《时代文选》，2卷1期（1940年2月），32—33页；陈公博《怎样才得到中日永久和平》，《时代文选》，2卷1期（1940年2月），34—36页；关于《华日基本条约》的谈判和苛刻条件，见《中央导报》，1卷9期（1940年12月），1—12页。

上海正在为建立“大东亚文艺复兴”中心而努力，许多作家都加入到这一运动中来；尽管有少数人在为“新秩序”做宣传，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哀叹“旧日好时光”的一去不返，并陷入了怀旧情绪之中。在很大程度上，1942年到1945年间的社会和经济动乱导致了知识分子中疏离情绪流行，而这一状况影响了当时的每一个人。

日据时代的生活水准

几乎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太平洋战争也在上海打响。1941年12月8日上午10点，黄浦江上的英国炮舰“海燕”号被炸，日本皇军的坦克和汽车兵分三路开进租界，并在主要道路上设置路卡。就在几个小时以内，孤岛消失了。日本试图以建立“新秩序”的说辞使其军事占领合法化，宣布这场战争是为了把东亚从英美帝国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他们把西方统治上海的象征地——南京路跑马场改为军事司令部，并把位于外滩的另一个英国地标——汇丰银行大厦更名为新亚大厦。美国军舰在珍珠港沉没的巨幅照片被张贴在每个繁忙的交叉路口，同时，所有电影院都必须上映《亚洲人的亚洲》和《共荣圈》一类的新闻片。侵略军也接管了所有外国商业机构，包括银行和公用机构，作为“敌人财产”都归“军事管治”。西方人（除了德国人、维希政府的法国人、意大利人外）一律要佩戴红色臂章，过去趾高气扬、高高在上的“洋大人”现在也因为银行存款被冻结，与其他人一样冒着风雨排队领取生活用品，经过日军岗哨也得低头鞠躬。他们也被禁止进餐馆、俱乐部和电影院。此外，从1943年2月开始，一批批西方人被送

到市郊的集中营。〔30〕

日军以根除“敌人文化”为借口，关闭所有剧院、洋商报馆和主要的出版社（总共七家），如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超过五百万册图书和杂志遭到反日、反满洲国的指控而被查抄。1942年2月12日，日军发布法令，禁止保存任何包含共产党或东北内容的物品，也不得使用重庆当局的序言和题字。〔31〕除了德国的XGRS电台、日本的XQHA和XGOI电台外，所有的电台都被查禁；短波电台则被告发。此外，印刷公司连印刷商业海报和布告都必须得到许可。〔32〕同时，社会上还谣传存在一份知识分子的黑名单。事实上，尽管当局发布了对在1941年12月前自首“恐怖分子”的特赦令，但是许多作家还是被捕或者失踪了。〔33〕

为了确保“公共安全”，1941年12月颁布了军事管制法和宵禁令（1942年末废除），除餐厅和夜总会之外的商户都必

〔30〕 见《新申报》，1941年，12月8—22日。“Shanghai Repercussions as War Spreads to the Pacific”，*Shanghai Calling*，2卷1期（1941年12月23日）；Arch Carey，*The War Years at Shanghai: 1941-45-48*，New York，1967，1—78页。屠诗聘著，《上海春秋》，香港，1968，84—85页；《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下，388—390页。尽管有很多限制，但上海是“二战”中向犹太人开放的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日本人似乎没有接受它的盟友——纳粹德国（及其傀儡政权法国维希）的反犹主义。因此，成千上万的欧洲犹太人在上海建立避难所。大多数难民只能找到收入很低的体力活，居住条件污秽不堪，虹口很快就成了犹太城。见David Kranzler，*Japan, Nazis and Jew: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New York，1976。

〔31〕 张静庐编，《中国出版史料》，上海，1953—1959，5卷：402页；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上海，1947，56—60页。

〔32〕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8149号（1942年3月）。*Shanghai Calling*，1—3页（1941—1943）。XGRS电台每天从早上7点到午夜播出，主要是新闻（包括英语、国语、广东话、意大利语、俄语、德语和法语）和古典音乐。XQHA电台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50分播音，播送新闻（日语来自东京，汉语来自上海，还有英语）、军事节目、轻音乐和日本士兵时段。XGOI从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播送的特别节目有外国音乐和教中国人学日语的节目。

〔33〕 《新申报》，1941年12月—1942年3月，随处可见；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第2章、第6章。

须在晚上9点以前关门。主要路口设置铁丝网路障，并有日军把守；路过的中国人必须鞠躬并出示他们的证件，以免被羞辱甚至杀害。而且，恢复了传统保甲制，每个保长负责十户人家，邻里之间每人都被命令报告他人的情况。^{〔34〕}从这些本地的控制单位中，组建了由25岁到45岁的成年人组成的“自卫队”。除了连续不断地轮流维持治安之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突发事件（如爆炸或暗杀）期间把特定地区用绳子围起来。里面的人不得离开，该地区一直被封锁，直到可疑分子被捕。例如在1942年2月14日除夕夜，南京路的太阳公司被炸，河南路、西藏路和爱多亚路之间的办公和居民的全部街区在两个星期后才解除封锁；据报道，一些小孩在这封锁期间被饿死。^{〔35〕}到1942年夏天，作为这些措施的结果，日本官方宣布“敌对的上海解体”，“新上海”诞生。^{〔36〕}

从1941年到1945年完全的占领，“新上海”构成了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内主要的经济来源；它被掠夺的财富为日本军事机器向太平洋“南进”提供了燃料。在名义上，控制该城的汪精卫政府被迫满足日本的要求。但这一任务却是不可能完成的。作为一个港口城市，上海是一个商业中心，它的财富大部分来自于与国外和内地的贸易。现在，由于切断了与国外的贸易，上海变成了一座消费城市，在长江流域（该地区被日本中原远征军规划为经济基地，在此“以战养战”）与日本军队争夺食物和原料。^{〔37〕}而这种竞争状况在1942年的中途岛战役后日益显著，

〔34〕 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87页；屠诗聘著，87页。

〔35〕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香港，出版项不详，238—240页。

〔36〕 见东英明著，《上海は立ち上がる》（《上海的兴起》），东京，1943，1—55页。

〔37〕 引自李达著，《上海近期经济的动态》，《申报月刊》，2卷8期（1944年8月），2页。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多次军事挫败，更加剧了从中国掠夺战争原料的需求。1943年1月，南京政府被迫正式向同盟国宣战，这使它陷入了满足日本需要（像汪精卫所描述的那样作为“大东亚后方基地”）^{〔38〕}或养活自己的两难困境当中。当然，前提条件是日本获胜。

由于政治压迫和物资匮乏，上海被拖入了“黑暗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充满无尽的恐惧、贫穷、不确定和痛苦。在日据的45个月里，上海变成了真正的地狱。经济崩溃和通货膨胀完全失控，囤积和黑市交易繁荣；大规模的失业伴随着饥饿的蔓延，生存的焦虑成为上海的生活方式。正如一位幸存者写道，“除了人命以外什么都贵”。^{〔39〕}1942年夏天是三十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气温高达103华氏度），高温造成了伤寒症和霍乱的流行，从这时开始上海被无法控制的物价上涨所折磨。与此时相比，孤岛时期的经济困难看上去微不足道。以1936年为参照点，日用品价格指数表明了一个反差巨大的跳跃，从1941年12月的1500元到1942年6月的2910元，再到1944年7月的400000元，再到1945年8月上海解放时的660000元。^{〔40〕}到占领结束前夕，要花10000元洗一个热水澡，花8000元看一场京

〔38〕 见顾凤城著，《文化界消沉的原因》，《申报月刊》，1卷3期（1943年3月），15页。另见汪精卫1942年到1944年的讲话，收入余子道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1985，2—13页，20—31页，87—93页。

〔39〕 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49页。

〔40〕 李石峤，《一二·八后之上海物价》，《中国经济》，2卷6期（1944年6月），4—7页；克伦，《每月华中经济大事》，《中国经济》2卷10期（1944年10月），15—17页。本章所引所有数据，除特殊说明外，都指国民党的法币，此种货币于1943年3月停止在上海流通，当时，汪精卫政府宣布唯一官方货币是周佛海的中储银行所发行的中储券。一个中储券相当于两个法币。这里没有1945年官方统计的商品价格。数据统计追溯到1950年末。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335页。另见唐振常编，《上海史》，上海，1989，843页。

剧，^{〔41〕}但这都是“奢侈的事情”，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最大的威胁是食品价格的上涨。特别是1944年和1945年，根据统计，粮价分别是战前价格的600和65000倍。^{〔42〕}

米价飞涨是沦陷区生活不稳定性的缩影。在1942年7月，为了保证在华日军充足的大米供应，^{〔43〕}侵略者禁止从内地向上海运送大米。反而颁布了一个配给制度，允许配给卡持有者每人每星期从400家许可米店中用4.20元中储券购买1.5升（约2.7磅）大米。在早上9点开门之前，这些米店门口就大排长龙。^{〔44〕}

〔41〕《大众》，3卷，第7期（1946年5月）：106页。1941年12月，北京剧院的戏票从4毛钱涨到了18块。《新申报》，1941年12月1—25日，随处可见。

〔42〕汤心仪编，《战时上海经济》，上海，1946，59页；正如占领期间和占领之后所有的统计资料显示的那样，这些数据是以1936年为基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到1945年8月，粮价自1936年以来经历了百分之8165177的上涨。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1958，330页和335页。

〔43〕根据南京政府内务部副部长袁愈佺所说，到1942年，长江下游所有稻米产区的产量比战前下降了大约二成到三成。这种低产的状况是由战争破坏和日军的剥削共同造成的。除了当地士绅和汪政府官员的广泛贪污外，日军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征农产品。因此，农民拒绝种庄稼或不把农产品卖给日本人，而是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把大米卖到上海去，以求得到一个好价钱。因此，配给制意图抑制直接从农民手中买米，并限制上海的大米消费。在长江下游产量有限的稻米中日军强占了最大的份额。例如，在1944年，收获稻米25万吨，其中的22万吨拨给了日军，剩下的3万吨分配给汪政府的警察、军队、上海和南京的人民。见袁愈佺，《日寇加强掠夺华中战略物资炮制商通会》，《档案与历史》，1—2合期（1987年5—6月），第1期，100—102页。

〔44〕潘再新，《谈谈上海的市米问题》，《中国经济两月刊》，1卷2期（1943年9月），21—25页；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160—250页。配给制很快扩大到火柴、煤、面粉、食用油、糖和肥皂。1943年3月配给由新成立的全国商业统治总会负责，该会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和汪政府工业部共同运作，以加强南京政府在其管区内的作用。由于政府在“大东亚战争”中的财政困境，该委员会负责集中分配长江流域的所有经济物资，以及上海和南京的配给，同时确保日军的军事供给。对这一重要的经济组织及其对与日通敌关系的重要性仅有的系统研究是袁愈佺，第1期；李达，《上海近期经济动态》，1—12页。关于委员会，见Wang Kewen，“Collaborators and Capitalist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ontrol in Wartime Shanghai,” 未刊论文。

成人平均每天消费大米 0.88 磅（大约 3 碗），而每周配给的掺和了石子和麸子的陈米、烂米仅够三天的饭量。更糟糕的是，1942 年 9 月之后供给减少到每十天 1.5 升，在 1943 年 1 月这样的配给更减少到每月两次，而这也还不能常常保证按时供应。因此在 1942 年到 1945 年间，每人只被分配到了 74 次配给（125 升大米），三年间的配给大米总量不够一年的消耗！〔45〕

唯一可供选择的大米来源就是黑市，上海消费的大米中大约百分之七十来自这里。〔46〕大米黑市开始于 1940 年。由于印度支那战争，外国进口大米量减少，上海市郊的农民以比外国市政局所设的更高的价格将走私大米卖给米店。尽管如此，1942 年后日本军事邮局在城市四周建立，派“经济警察”监督米店以加强配给制度。但每天大约 8000 走私者把从郊区买来的大米藏在衣服里试图冒险通过封锁区（由带狗的军人和警察把守，准许当场杀人），在后街和拥挤的巷子里秘密兜售大米。〔47〕因为危险，黑市上的米价很高，而且波动很大。例如，米价从 1941 年 12 月的中储券 170 元一担（约 133.33 磅）跳到 1942 年 7 月的 450 元，又涨到 1943 年 2 月的 1220 元。〔48〕唯一的例外是 1943 年 3 月末，大米倒卖禁令有所放松，导致米价下降到 700 元。直到占领的最后日子，米价的上涨没有减弱。1944 年 7 月 6 日，在供给品流动的终止和禁止黑市的新一轮努力的共同压力下，走私大米的价格从早上的 6800 元中储券涨到中午的 8000 元，又涨到晚上的 10000 元。到 1944 年底，

〔45〕 汤心仪编，147 页；《上海市物品配给概况》，《新闻月刊》，1 卷 3 期（1945 年 7 月），48—52 页。

〔46〕 沧海，《论战时国民生活》，《文友》，2 卷 4 期（1944 年 1 月），12 页。

〔47〕 黑市米价每担平均赢利 300—400 元中储券。见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22—28 页和 173—175 页；另见潘再新，24 页。

〔48〕 潘再新，23 页。

价格飞涨到 50000 元，到 1945 年 5 月，由于美国 B - 29 飞机轰炸上海，价格一直在 10 万元高居不下（与配给大米 6500 元的价格形成鲜明对比）。〔49〕由于价格飞涨和大米供应的不确定，导致了人吃人的谣言满天飞，上海的日常问候语也变成了：“今天米价多少？”上海似乎在食品的疯狂中丧失自我，大米变成了全城的困扰。〔50〕甚至是那些看不起家庭琐事的男性知识分子也开始不断地抱怨缺少食物，开始帮助他们的妻子去排队领配给口粮。〔51〕

过高的生活开支与占领以来的经济萧条相叠加，许多工厂倒闭了。尽管对能源的使用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减少公共交通，限制家庭用电许可，〔52〕日军征用煤炭和其他原材料还是引起工业产量的惊人下滑。比如，煤炭的匮乏引起 1944 年

〔49〕 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264—312 页；李石桥，《一二·八后之上海物价》，4 页；汤心仪编，119 页；毛旬生，《华中经济病态之考察》，《申报月刊》，3 卷 1 期（1945 年 1 月），42—50 页；奉圣，《每月华中经济》，《中国经济》，2 卷 8 期（1944 年 8 月），72—74 页。关于大米配额，见汤心仪编，147 页。

〔50〕 见沧海，1—14 页。

〔51〕 在必需品断供或价格上涨之前，排队领取是当时上海生活的一部分。比如，1943 年 11 月，煤砖的价格是一斤 51 元中储券，每人一个星期配给是 10 元的量（黑市上的价格超过 100 元中储券）。煤店前排着长长的人龙。12 月，所有的煤都没有了，黑市的价格飙升到 350 元。1945 年的面粉配给价也上涨到 1936 年的 486 倍。见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240—248 页；汤心仪编，147 页。男人必须帮助他们的妻子，因为要排队购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特别是一些特别珍贵的商品——像大米和煤——排队就是一场弱肉强食的丛林争斗。情况相当粗野。女人总是遭到靠勒索弱者为生的警察和流氓的侮辱。见陈存仁，196—198 页。

〔52〕 在 1942 年早期，公共租界的巴士和电车的时间表被减少到只在高峰时间服务：7：30—9：30，12：30—13：30，16：30—18：00，所有的交通灯都关闭。而且从 1942 年 6 月开始，所有的住家和店铺的用电量只为 1941 年的 45%。1943 年 12 月的家庭用电量仅为 1942 年的 65%；为上海赢得“东方巴黎”之称的霓虹灯在晚上 7 点必须关闭。1945 年初上海家庭用电只能在晚上 7 点到 10 点之间。上海变成了“黑暗世界”。见唐振常，853 页。

的工业用电减少到战前的 20%，水的供给也减少到 30%。因此至少 55% 的纺织厂关闭。^[53]而且，因为来自武汉的小麦供给大幅度减少，只有 27% 的面粉厂继续生产。^[54]在这令人沮丧的经济中，失业极为严重。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一些失业的工人被招募到汪政府中为日本工作。少数幸运地保住工作的人平均月收入是 1000 元中储券，在 1943 年这些钱还不够在黑市上买一担大米（一个五口或六口之家每个月消耗大米 7.5 担）。^[55]许多高中老师只有 672 元一个月，每周要上 56 小时的课。如果能有机会在街头摆摆摊、澡堂子给人按摩、倒卖点黑市米，那就是全家的幸事了。^[56]

虽然走私、囤积是在沦陷区活下去的唯一办法，但也有少数人从经济危机中牟取暴利。在 1942 年到 1945 年间，由于日本的霸占和南京政府的贪污，上海有总共 300 家银行（超出

[53] 克伦，7—16 页。1936 年制造业需要总共 300 万吨煤的燃料。1941 年以后每年平均只有 60 万吨。1944 年由于能源短缺，上海每户只在每天上午 9 点到下午 4 点之间供水，每月只有 7 千瓦电，为了省电，所有的商店被要求在晚上 7 点关门。见《中国经济》，2 卷 10 期（1944 年 10 月），16 页。

[54] 小麦供应短缺是由于战争破坏和从农民手中的收购价低造成的。例如，1943 年，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商统会）计划从武汉获得 54 万吨小麦，但只收购到 22 万吨。而且其中的 10% 是用于上海的公众消费的；剩余的 90% 供军队备用，以及运往满洲国和中国北方。见袁愈佳，2 期，99—100 页。

[55] 1943 年 1 月，日本开始向汪政府求助，以招募熟练的造船工人赴日工作。南京按照日本指示，在 1943—1944 年间至少招募了 2500 名工人，其中还有妇女，被运往日本和菲律宾。见唐振常，842—843 页；《日伪上海市政府》，上海，1986，265—275 页。见思维，《每月华中经济大事》，《中国经济》，2 卷 4 期（1944 年 8 月），9—12 页；周震，《怎样解决上海的米市问题》，《申报月刊》，1 卷 9 期（1943 年 9 月），8—11 页。另见《今日之民生问题》，《申报月刊》，2 卷 1 期（1944 年 1 月），49—54 页。

[56] 因为缺乏空间，在被占领的上海，平均课堂上有 90—108 个人。江枫，《教育座谈》，《申报月刊》，1 卷 3 期（1943 年 5 月），118—119 页；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205 页。有很多当代印刷品中都有关于知识分子加入失业工人队伍，转行做小买卖，家庭主妇参与危险的走私之类的故事。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总共有超过 10 万人在沪杭、沪宁铁路沿线从事走私。

1936年50%)，750亿元法币呆滞资本。^[57]这些钱中的很大部分，要么与高层汉奸（特别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财政部长周佛海和李士群）有关，要么属于重庆领导人，这些钱被南京高官“保护”起来了。^[58]他们以囤积的方式投资黄金。在严峻的经济环境下，几乎所有的商品，包括卫生纸、药品、橙子都被囤积起来。违法的黄金市场从1942年1月每500克11286元，上涨到1943年10月的193760元，又上涨到1945年7月的2500万元（是1936年比率的11万倍）。^[59]这种投机加剧了日据上海通货膨胀的急速上升。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两极分化。

如果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意味着穷困，那么对少数人来说就意味着狂欢。大多数人在上海艰难地维持生计，乞讨、贪污和犯罪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60]但是，少数在投机中获利

[57] 袁愈隄，1期，86—87页；和史奥，《论防止通货膨胀政策》，《中国经济》，2卷10期（1944年10月），4—11页。

[58] 比如，被解散了的傀儡“维新政府”的头子梁鸿志，出任汪政府的检察院院长，据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曾过问，“保护”他及其妻弟宋子文在上海的财产。见袁愈隄，《经历者的回忆》，139页。

[59] 汤心仪编，55页。

[60] 在沦陷状况下，关于卑鄙的贪污和犯罪的报告和申诉汗牛充栋。一些例子足以说明这些社会问题的普遍存在。扒手每天都在拥挤的巴士站和巴士上作案。晚上在人少的巷子里，许多行人会被扒掉衣服。街上的乞丐经常从别人手上抢吃的东西。但几乎没有受害者会向当局报告这些案件，因为这样做一定会让他们失去的更多。而且，邮差会用他们的服务要求小费，巴士售票员拒绝找钱，警察会从每个案子中索取钱财。他们还会向排队领取配给的人和带商品回家的人盘剥“保护费”。救火夫希望受害者额外给他们钱；由犹太富翁哈同（Silas Hardoon）建的著名的“爱俪园”就因为房子着火时，住户没钱贿赂救火夫而几乎被烧光了。旅行者要上火车，也必须付给服务员和脚夫几百块钱。见沈澄，《社会退化之现象与对策》，《申报月刊》，3卷1期（1945年1月），58—62页。陶菊隐，《天亮前的孤岛》，260—264页；《中国经济》，2卷10期（1942年10月），16页。另见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北京，1984）。

的暴发户则沉迷在奢侈品、滥交、享乐主义的颓废生活中，娱乐场、高价餐厅、高级妓院和鸦片馆随处可见。上海的生活似乎固定在现在；每时每刻都是借来的时间。社会和道德的混乱使人们不再相信占领军的道义和能力，上海人对现在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完全没有信心。他们怀念战前的好时光，除了“食物和钱”以外什么也不关心。^{〔61〕}

日本和傀儡政府都为失去民心感到极为不安。1940年到1944年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公博在一次市政会议上满脸感伤地说：“上海米的问题不能解决，市长便一日不能做。”^{〔62〕}日本官方发言人吉田东祐刻毒地评价上海“大多数市民关怀的不是中国的解放，而是交还租界后米价怎样”。^{〔63〕}

领导层就谁应该为这一恶劣状况负责发生了分歧。汪政府抱怨日本对中国经济资源的持续强征暴敛造成了上海的通货膨胀，而日军谴责附逆者们无力运作配给系统。与日本和德国不同，上海政府陷入了对既得利益的贪婪追求、贪污腐败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新闻界则变成了双方苦斗的隐蔽战场。^{〔64〕}然而，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南京政府和日本皇军没什么区别，他们都是“一伙强盗”，让上海变成了“地狱”。因此，汪政权的内务部副部长袁愈佺承认，在1945年8月日本向同盟国投降之前，上海人都在默默祷告解放。^{〔65〕}

〔61〕 沈澄，《新情势下物价问题再提出》，《申报月刊》，1卷9期（1943年9月），1—8页。

〔62〕 引自奉圣，72页。

〔63〕 引自《申报》，1943年8月1日。另见吉田东祐，《中日问题的总体解决》，东京，1944，上篇。

〔64〕 《申报》、《文友》和《新中国报》是日本看法的主要支持者；《中华日报》、《政治周报》和《中华周报》是南京政府的机关报，代表汉奸的观点。有关两篇代表文章，见沈澄，《新情势下物价问题再提出》和《两月来华中经济大事》，《中国经济》，1卷2期（1944年1月）。

〔65〕 袁愈佺，1期。

“《古今》派”的崛起

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许多作家被迫投敌。上海的附逆文人不同于欧洲的知识分子投敌者，像罗伯特·巴西拉齐（Robert Brasillach）、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和保罗·德曼，他们以法西斯革命所激发，“法西斯人类”的年轻活力为荣，以“新秩序”下的团体感为荣。^{〔66〕}而上海的附逆文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出怀旧和疏离的状态，他们把自己看成并描绘成完全不合时宜的“遗老遗少”。在高层汉奸的怂恿下，这些知识分子沉浸于感伤的怀旧情绪中。与官方呼吁的“抗战现实主义”不同，他们倡导一种抒情风格的散文，我把这种文学称为“遗民”文学，它力求把忏悔的回忆与历史的反思结合起来，将个人作为人类悲剧的明证。苟且偷生是值得庆贺的，这一残酷的人性法则嘲笑了对道德的坚守。在1942年到1944年间，一群抱有羞耻和自怜态度的文人就聚集在双月刊《古今》周围。

《古今》是上海完全沦陷后出版的第一份文学杂志。在1942年初，上海文化界很沉闷，所有重要的作家要么逃往内地，要么退出文坛，缄口不言。大众媒体上充斥着日本人的宣传品或狭邪小说。1941年12月中旬，《申报》和《新闻报》这两家最大的报纸奉命在“军事监管”下复刊。随之出版的还

〔66〕 关于法国维希的法西斯主义作家的出色研究，见 Alice Yaeger Kaplan, *Reproductions of Banality: Fascism, Literature, and French Intellectual Life*, Minneapolis, 1986; 另见 Robert Wohl, *The Generation of 1914*, Cambridge, Mass., 1979, 对欧洲知识分子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探索。

有40家小报和《中华日报》、《新申报》为主的汉奸和日本人报纸。1941年前的60多家杂志，约有半数关闭，其中《万象》和《小说月报》这两个被定位为鸳鸯蝴蝶派的通俗杂志，在日本人的审查制度下幸存。^{〔67〕}1942年3月以刊登历史掌故随笔为主的《古今》出版。这本杂志的第一期在五天内就卖掉了1500本。随着印数的增加，直到1944年10月被日军关闭为止，《古今》一直长期受到知识阶层欢迎。^{〔68〕}

《古今》的社长是朱朴。他于1902年出生于无锡的一个地主家庭，是“和平运动”中的宣传骨干，他和汪精卫自1928年相识，当时他是一位学者，曾得到CC系资助赴法访问。自那时开始，他就参与指导了汪精卫的所有文化工作，比如筹办香港的《南华日报》和上海的《中华日报》。他起初与林柏生交往密切，但1940年加入了周佛海一派，并在汪政府的组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1941年的一场疫病中，他失去了妻子和小儿子，这一家庭变故使他变得意志消沉，以至于在1942年初辞去了南京政府的所有职务，回到了上海。他在中国银行（在吴震修手下）和周佛海领导的中央储备银行担任了顾问一职，过上了藏书家和艺术品鉴赏家的高雅生活，并为年轻的艺术家的提供资助。1942年3月，也许是为了在心理上弥补失去家

〔67〕 只有《申报》和《新闻报》是在1941年12月8日被关闭后重新复刊。自1942年到1945年上海主要发行的报纸是《新中国报》、《中华日报》、《国民新闻》、《平报》和《新申报》，每份报纸的平均发行量是4万份。他们都是从1939年和1940年开始出版的。见东英明著，《上海は立ち上がる》（《上海的兴起》），东京，1943，66—67页；杨寿清著，《两年来的出版界》，《文艺春秋》，第1期（1944年10月），87—100页。

〔68〕 朱朴，《漫谈〈古今〉》，《古今》，第2期（1942年4月），40页；《〈古今〉两年》，《古今》43/44期（1944年4月），46—47页。

人的痛苦，他创办了《古今》。^{〔69〕}实际上，在日本人手下工作让他时常感到屈辱，而个人的不幸又加深了这种挫败情绪，这让他道德上更加内疚。同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良知，但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辩护，从而引发了更深的焦虑。而他的创作就是在满足这种辩护和忏悔的心理需求。^{〔70〕}

根据金雄白所说，1940年3月建立投降政府之后，汪的领导层中弥漫着因内疚引起的深深的焦虑。他们同意签署《华日基本条约》，由此形成了日本对控制沦陷区的全面控制，并展开全面的军事统治。多年以后，金雄白生动地回忆了1940年11月4日当天情景：

协定书的签字地点即在汪政府的所在地……那天，他穿了一套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抵达以前，他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著，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眼眶中沿著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于捶胸顿足。所有在四周的人员，也为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国家之痛，与身世之悲，许多人的眼眶都红了。^{〔71〕}

在公众的眼中，连续的经济和社会动乱进一步危害了南京

〔69〕 朱朴已经是汪集团的机关刊物《时代文学》和《时代晚报》的编辑，1940年后南京政府组织和宣传代理部长。他后来在国民经济委员会里担任一个象征性的职务。见《四十自述》，《古今》第1期（1942年3月），20—24页。

〔70〕 见 John Carroll, *Guilt: The Grey Eminence Behind Character,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1985, 9—32页。关于中国的“罪”的概念的有趣讨论，见 Wolfram Eberhard, *Guilt and Sin in Traditional China*, Berkeley, 1967。

〔71〕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上，113—114页。

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正义”的和平幻想终结了。在汪政府无法确认其主权的同时，民族抵抗在美国参战之后日益高涨。在这种情绪影响下，汪政府的官员们从上到下都表现出普遍的贪污和享乐主义。^{〔72〕}例如，尽管周佛海的心脏有问题，但是这位权势显赫的财政部长、后来的上海市长（1944—1945），却在酗酒和纵欲中寻求安慰，以缓解他深深的懊悔之情。他后悔做了错误的选择，但是又被迫坚持下去。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日本顾问告诉了他此事，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初必胜，后因物资缺乏，结果必败。日本如胜，中国必沦为殖民地”；“当时〔1940年3月30日〕万不料还都后艰难困苦如此其甚，至今思之，令人气馁。目前，势成骑虎”。^{〔73〕}

事实上，一旦做出错误的选择，就无法回头，因为选择像个陷阱，它已经限制了一个人未来的决定，如果你要反抗，就会把你陷得更深。《古今》中的虚无主义哲学就是这种悔恨情绪的直接体现。在发刊之初，朱朴宣布这本杂志致力于追忆和鉴赏，以文学的活动缓解人生处境中虚无的焦虑。作为一种自我辩护，他描绘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丰富的悲观主义传统（像陶渊明、杜牧、苏轼），以指出道德和历史的不调和。历史像四季交替一样，被看作一个无意义的悲喜剧的循环，而人的奋斗则任由残酷的机会摆布。命运自有定数。政治的失败与道德的失败无关。同样的，道德的选择不过是政治命运的演习。朱朴以感伤的语调引用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名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古今》有一句名言：“我们——全世界的人们——现在都是这个时代

〔72〕《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下，101—136页，151—168页。

〔73〕蔡德金编，《周佛海日记》，第一册：620页（1941年12月11日），第二册：667页（1942年3月21日）。

中某一喜剧或悲剧中的某一主角或配角。”〔74〕

与此思想状况一致,《古今》被定位为一份“名士”和“隐逸”的杂志。〔75〕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名士是一群喜欢隐居的有识之士。从魏晋时代开始,名士就是不愿与世俗同流的有道德理想的文人集团。他们不顾社会习俗和道德教条,无视礼教,陶醉于怪癖、自由的生活方式。虽然有些名士(如陶渊明,365—427)的确是为了逃脱正统礼教强加给他的职务“樊笼”而退隐的,但是,与鲍吾刚(Wolfgang Bauer)所谓的“内在化的隐士理想”(internalization of anchoretical ideals)不同,大多数名士(如明代散文家袁宏道,1568—1610)正是以此方式继续为朝廷服务,是为“朝隐”。在他们的公开身份之下,他们或者寄情山水,或者寄情于山水的代替品——如山水画和诗歌,以表达真我,并象征着对自我的净化。然而,在强调为群体利益服务的儒家文化中,名士和隐逸都被社会视为孤芳自赏和不道德的行为。〔76〕

在这份名士定位的杂志中,《古今》第一期的封面精选了一首宋末朝隐诗歌的第一联和最后一联,这四句诗正暗合了朱朴的身份:

久欲谋归力不任,浮云踪迹谩巢林。

世间万事俱陈迹,空倚西风阅古今。〔77〕

〔74〕《古今》,第1期(1942年3月),2页。

〔75〕《周年的话》,《古今》,19期(1943年3月),53页。

〔76〕见 Richard Mather, “Individualist Expression of the Outsider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Wolfgang Bauer, “The Hidden Hero: Cre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Ideal of Eremitism”, 收入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Donald Munro 编, Ann Arbor, Mich., 1985。

〔77〕朱朴,《满城风雨话古今》,《古今》,第9期(1942年10月),32页。诗歌为自宋代诗人郑震(菊山,1199—1262)所作。

1942年11月，当杂志由月刊改为双周刊的时候，杂志封面改为清代狂士石涛（1630—约1718）的一幅画作，画中有两个坐着饮茶的隐士，画的下方浮着一叶扁舟，他们显然正在山中分享对过去时代的看法。同时，第一期的封底还刊登了几张南京领导人的私人照片，其中一张是周佛海一家在他家的花园中拍摄的。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照片和书法承载着象征的意义，周佛海的家庭照会被视为他支持《古今》的证明。通过这些来自周佛海及其政治伙伴——如陈公博、梁鸿志和上海市政府秘书赵叔雍等人——的日常捐赠，进一步表明该杂志与南京领导层的密切关系。汪精卫也经常把自己的散文和诗歌作品投给《古今》，以增加杂志的影响力。^{〔78〕}于是，即使是那些不知道朱朴与周佛海之间密切关系的读者，也毫无疑问能从其资助人的身份了解《古今》的背景。^{〔79〕}

名士画、诗歌和政治人物照片的并列，表明了二者之间的象征性的联系。这说明《古今》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石涛所画的两个隐士暗示出，高层汉奸把自己定位为隐士（特别是朝隐的隐士）以求缓解悔恨之情。因此，朱朴喜欢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愤世嫉俗落落寡合”的人，只对个人的文化修养感兴趣，而陈公博则设计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审美的、浪漫的自我形象，一个唐璜式的政治领导人的自我形象。周佛海也一样，在《古今》第一期发表的访问中说，他“（一）不修边幅，（二）

〔78〕 汪精卫给《古今》写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感伤之作，回忆他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同志。见他的《故人故事》，《古今》，第19期（1943年3月），2—4页。

〔79〕 关于周佛海对《古今》的资助，见朱朴，《漫谈古今》，40页；《古今一年》，《古今》，19期（1943年3月），24—26页。

不事生产，（三）不好应酬”。〔80〕

这样的身份认同为什么会产生呢？如上所示，作为一种文化的原型，名士所包含的两层隐含意义有助于附逆者实现自我辩护。第一，“内在化的隐士理想”（如对大自然、美酒、山水画和诗歌的热爱）代表一种“象征性的净化”，意味着清洁、“净化”附逆者“被污染的”自我、被败坏的良知。〔81〕第二点更加重要，类似于他们在1941年以前自称是少数派起义的说辞，南京领导人很乐意利用魏晋和晚明狂士不被理解、或不合时宜的文化形象。以此类比，他们的投降行径仅仅是一种曲线救国的方法。尽管他们争取和平的运动失败了，他们“真我”中的爱国心并不比那些谴责和污蔑他们的抵抗者少。因此，虽然就他们的情况看来，和平看上去是一个更加遥远的愿望，但是他们有助于保护落入日本人之手的中国人民远离更大的不幸（其状况与1942年后法国维希“帮助减轻困难”的说辞类似）。〔82〕

《古今》给予这些政治汉奸一个与他们官方身份相反的“个人”空间，来进行“爱国的自我表达”。他们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专注于对自己革命历程的缅怀和回忆，许多人（特别是

〔80〕 关于朱朴，见他写给第二任妻子（1944年结婚）的信，《朴园短笺》，《古今》，第4期，40页（1944年2月），4；关于周佛海，见左笔，《记周佛海先生》，《古今》，第1期（1942年3月），5—6页。关于陈公博的自我想象，见他的《上海的市长》，《古今》，第11期（1942年11月）1—3页和《我的诗》，《古今》，第24期（1943年6月），1—10页。

〔81〕 这一术语借自周质平对明代公安派对自然与旅行的迷恋的分析。见周质平（Chou Ch'ih-ping），*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 Cambridge, 1988。

〔82〕 有关这一立场准确而经典的体现，见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1—2册。正如贝当（Marshal Pétain）喜欢说的：“如果我不能成为你的剑，那么我就要成为你的盾。”有关法国维希的修辞学，见Robert O. Paxton, *Vichy France: Old Guard and New Order, 1940-44*, New York, 1972。

汪精卫和赵叔雍)专门写在辛亥革命和北伐中牺牲的朋友的回忆录。这些作品的基调以自我辩护、忏悔、后悔和沮丧为主,表现出了一种深深的补偿焦虑。周佛海在《古今》中经常被引用的散文《盛衰阅尽话沧桑》就是一例:

我年龄不过四十余岁,参加政治生活,也不过十六七年,所亲自经历的事情,较之几朝遗老,革命先辈,当然要少得多,配不上说阅尽兴亡,历尽盛衰。不过自从中华民国成立,至今三十一年,在这短短的时期之中所发生的盛衰升沉的事实,实在比升平时代一百年中所发生的要多得多!……自从国民革命以后,虽然只有十九年,却亲自经历过许多突起突灭,时分时合,忽盛忽衰的悲剧和喜剧,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这样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几年,焉得不令人感觉个人的事,无一不是空的,而发生消极之思呢?……如果半途而废,虽存周公之心,终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对祖先,下何以对子孙!〔83〕

正如朱朴指出的,所有的这些历史典故及其中的虚无主义哲学与政治急迫感都旨在唤起对作者理想主义被误解的同情。

〔83〕 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古今》,第3期(1943年5月),17—18页。当从肺炎和心脏病中恢复过来的时候,他的感受也透露出这样的想法(周佛海,《病后》):“其实,我这次不死,是幸或是不幸,还是问题。也许天不许我轻易的脱离苦海,要在苦海中,使我再受些折磨,再受些灾难,才让我离此浊世,也未可知。……今后的我,已经不是我的我了。所以今后更可以不顾成败利钝,不问毁誉得失,本着自己的信念,为国家效忠,为民族努力,以免负此残生。”(《古今》,第3期〔1943年5月〕,4页)。这些系列散文后来被收入由古今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往矣集》。

如果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的意图即便是好的，但他仍然犯了严重的错误。总之，他是一个“孤臣孽子”，而不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所谓的“乱臣贼子”。〔84〕

然而，在此类“朝隐”文学所渴望的理解之同情的外表之下，潜藏着残忍、贪婪和政治阴谋的现实。权力和金钱支配着汪政府，它的领导层已经被不断的党派斗争所撕裂。特别是周佛海自1940年起就在自己周围营造了一个包括朱朴在内的强有力的小团体，帮助他在政府中扩大政治和金融影响力。例如1943年为了接管军界，他操纵了一系列黑手党式的派系斗争，这些斗争要与宪兵队合作，而且还导致了他以前的盟友、特工处负责人李士群遭到暗杀。周佛海的集团还以奢华的生活及在沦陷区参与投机和黑市交易而著称。不仅如此，虽然周佛海在南京政府中是仅次于汪精卫的最有权力的人，但是自1941年起就与重庆国民党（既有第三战区总指挥顾祝同，也有军统头子戴笠）建立了秘密联络，协助保护国民党在上海的秘密领导人（包括蒋伯诚和吴开先），还为长三角国民党的游击队筹措资金。这种政治上的投机行为与其“朝隐”的想象和在《古今》上的说辞形成了尖锐的对比。〔85〕

作为合作方式的遗民文学

朱朴在宣传方面经验丰富，但如果只靠他一人，《古今》

〔84〕 朱朴，《往矣集序》，《古今》，第15期（1943年1月），14页。

〔85〕 关于朱朴的派系政治，见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128—145页和第2册：69—73页；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276—324页；关于朱朴与国民党的秘密关系，见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政权的经过》，《文史资料》，第40辑，1980。

肯定不会取得文学上的成功。其实，在沦陷期间《古今》能够成为一本以随笔著称的杂志，主要应该归功于陶亢德和周黎庵。

周黎庵 1916 年生于浙江镇海的一个商人家庭，由在苏州的祖母抚养长大。在上海读完高中之后，他返回故乡，过着饮茶游历的雅致生活。朋友都知道他好酒，熟知明清历史。不久他开始写散文，并与《论语》派和《宇宙风》派发生了一些联系。这是 30 年代中期林语堂主办的两个杂志，^[86]标榜晚明公安派的闲适幽默风格，反对流行的政治文学。1936 年末，周黎庵搬到上海，和《宇宙风》著名的编辑陶亢德一起办了一个小杂志。但战事一开，他们的杂志就关门了。当时，周黎庵正在镇海过暑假，但 1937 年 11 月当镇海遭袭后，他返回了上海。1938 年到 1939 年间，他曾短暂地参与抗日杂志的宣传活动。1940 年，周黎庵又帮助陶亢德出版《宇宙风月刊》，该刊物以发表小品文为主，其主旨与战争关系不大。之后，因同情汪集团，顶着新闻界的压力帮他们出版机关刊物《时代文学》。周黎庵这种可疑的政治行为和他不屑于从事战争宣传的态度，使他与朋友们逐渐疏远了。杂文家唐弢本来是周黎庵的朋友，但在 1941 年嘲讽他“涂装粉脸”。1941 年 12 月当上海落入日本人之手以后，周黎庵选择留在后方。尽管上海的大多数出版

[86] 周作人是《论语》派之父。其哲学思想影响了多产的作家和翻译家林语堂，他呼应了周作人的主张，认为创作应该“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这个流派在不同时间中出版了《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这些刊物都是由林语堂和陶亢德编辑的。1937 年抗战爆发之后，《宇宙风》迁往广州，之后又迁往桂林。见李欧梵，*Literary Trends: The Road to Revolution 1927-1949*，421—491 页，关于《论语》派的部分；关于公安派，见 Chou Ch'ih-ping（周质平）。此处关于周黎庵早期生活的史料是根据他的《华发集》（上海，1940）；《宇宙风与我》，《宇宙风》，100 期（1940 年 6 月），155—158 页。

社关门了，他和陶亢德仍然计划重办杂志。^{〔87〕}

据当时在上海过着半隐居生活的朱朴所说，陶亢德在1941年底请他来支持这个出版计划。为了减轻个人和政治的困扰，朱朴同意了。但是，作为帮助他们重刊《宇宙风月刊》的交换，1942年3月，他请他们创办一个新的杂志——《古今》。在朱朴的资助下，周黎庵和陶亢德都在中央储备银行里挂了一个闲差。^{〔88〕}按照《论语》的老传统，新杂志信奉古茂、温柔、冲淡雍容的文学品格，特别热衷于历史掌故和小品文。

正如卜立德（David Pollard）所指出的，小品文是一种类似于闲谈的文体，在寻常生活题材中自由徜徉。它重视真诚，忽视技巧，是一个无拘无束展示自我的载体，而无须诗歌的雕琢和限制。^{〔89〕}小品文源于魏晋名士文学和晚明公安派文人奇谲的风度，在20世纪20年代经周作人之手得到繁荣，旨在使文学与政治保持距离。与鲁迅热烈的、投身革命的杂文相反，小品文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提供了发泄个人疏离感和罪恶感的渠道。小品文的作者似乎要为自己的保守辩护，就像魏晋时代的

〔87〕 周黎庵，《一年来的编辑杂记》，《古今》，19期（1943年3月），61—64页；《华发集》，上海，1940，i—iv页。关于陶亢德，见他的《检讨自己》，《宇宙风》，80期（1939年6月），350页；张继英，《记文奸陶亢德》，《读者》，第2期（1945年12月），72页。关于陶亢德参与汪政府，见钱俊瑞等，《汪派在上海各界活动真相》，《抗战三日刊》，8期（1937年9月）。据说，他安排位于福煦路的上海最大的两家出版社之一的科学公司出版《时代文学》，该刊由朱朴编辑，1930年起，他就与陶亢德和周黎庵相识，当时正是“改组派”在上海积极组建文化网络的时期。根据朱朴和其他为陶亢德的《宇宙风》写稿的汪集团高级成员的散文来看，在1938年陶亢德去香港旅行之后，这种联络似乎重新开始了。关于陶亢德对周黎庵的攻击，见《悼木斋》，《宇宙风月刊》，第51期（1941年10月），2—3页。

〔88〕 朱朴，《满城风雨话古今》，32页。

〔89〕 David Pollard, *A Chinese Look at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Values of Chou Tsojen in Relation to the Tradition*, London, 1973, 121—138页。

先辈那样讽刺道德教条，认为这些教条以社会的名义否定了人性的基本需求。相反地，他们更崇尚自然，通过平凡人性的永恒主题来为惬意、平静的生活寻求“私人空间”，用周作人的名言来说，就是“人情物用”，也就是食物、愉悦、风土民情和童年回忆。因此，大多数小品文都展现出如话家常的风格，又带有一丝悔恨、苦中有甜和受虐的放纵滋味，使得这种次文类带有强烈的忏悔基调。

由于周黎庵擅长抒情散文，又是明清掌故的爱好者，因此他接手了主编的工作。编委中也包括朱朴（出版商）和陶亢德，但陶不久后就去编辑南京政府的机关报《中华周报》了。周黎庵起初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作者，在1942年初的几个月，他只能让一个急于挣钱的工程学学生使用多个笔名来写稿。^{〔90〕}比如在第一期中总共有十一篇散文，内容都是有关个人回忆、明清掌故的，其中七篇出自周黎庵、朱朴和那个青年学生之手。^{〔91〕}

1941年12月日军完全占领上海之后，上海的文学界陷入了全面的停滞，用一句恰当的话来概括当时由日本人控制的《申报》，完全被“和平八股”和“报销文学”所主导。^{〔92〕}因此，不论是《古今》的隐遁基调和怀旧的学术编辑取向，还是周佛海的资助，都有益于周黎庵编辑组稿。尽管朱朴坚称他的杂志是一个“私人刊物”，但实际上《古今》的确承担了缓解上海“文化停滞”的官方使命。在朱朴的影响力（自1942年

〔90〕 周黎庵，《一年来的编辑杂记》。

〔91〕 同上书，61—62页。其余四篇，包括梁鸿志的连载笔记，他是南京维新政府的前任首脑和朱朴未来的岳父。一篇早先投给《宇宙风月刊》的未刊稿，和汪精卫的一篇重刊的1910年的散文。

〔92〕 《申报社评》，第2期：105页。关于1942年文学界的描述，另见苏青，《涛》，上海，1945，150页。

初他就请周佛海为《古今》撰稿）和周黎庵的编辑能力的共同推动下，围绕着这本杂志创造出一个文学网络。^{〔93〕}从第9期杂志出版（1942年10月16日）开始，他们已经在沦陷区和南北方找来了足够的稿源，使得杂志由月刊转变为双周刊。值得注意的是，在撰稿人中有一些旧文人，他们是自1895年来历次政治动荡中的幸存者，包括龚心耕（清初官员龚鼎孳的后人，本人也是清朝的翰林）、林灏深（清代进士，禁烟大臣林则徐的曾孙）和著名的古文家冒鹤亭（著名的清代忠臣冒襄的后裔，抗战剧作家冒舒諲的父亲）。这些旧文人从内地逃往上海之后，在怀旧中寻找慰藉，他们在与周黎庵的频繁交往和回忆录的出版中，找到了一种价值感。^{〔94〕}但是，由上海和南京的中青年散文家所组成的松散群体是《古今》的核心作者，他们推崇并认同“《论语》派”的不问政治的唯美风格。

由于缺乏传记资料，很难定义附逆文人的特点，但却可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些共同的特质。这些作家大部分都是三十岁上下，脆弱、胆怯、平庸，从事学术，精通古典文本，而且最近才从内地来到上海。由于远离政治并且封闭在个人所关心的世界中，除了陶亢德以外，这些人在战前政治化的中国文坛上没有什么名声。他们可能像周黎庵、小说家潘予且，以及在1940年代因大胆性描写而闻名的女作家苏青一样，经常向《宇宙风》或其他小型刊物供稿，但他们都是上海主流文学界的局外人。

〔93〕 周黎庵素以热情、优雅和渊博的历史知识而闻名，他坚持《古今》和《宇宙风》风格一致，因此，来稿的政治色彩不浓。见文载道，《借“古”话“今”》，《古今》，19期（1944年3月），39—45页。

〔94〕 许多老学者自1937年起附逆投敌，并在汪政府中任职，其中包括曾劝说周作人加入日本控制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著名历史学家瞿兑之，以及著名的编辑和戏剧批评家徐一士。

然而在战争爆发之后，这些作家中的一些人以充满激情的抗日杂文突然吸引了上海文坛。然而，上海的全部沦陷使他们面临另一种现实，以笔名文载道而闻名的金性尧——《古今》的头号作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16年，文载道出生在浙江定海的一个富商家庭。1930年，他来到上海为一个亲戚工作，但真正的兴趣是文学。所以，他辞职后向一位私塾先生学习古文，并开始涉猎进步文化。虽然他处于上海文化界的边缘，但是他为一个小出版商注释了一些晚明诗文集，并与共产主义者阿英交往密切，他的古典学识给阿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他就和比自己年龄稍长的进步作家武桂芳结婚了，他们第一个孩子在战争爆发时期出生。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妻子和阿英的影响，文载道卷入了抗日运动。因为与父母一起住在法租界里，他不需要工作，可以用大量时间来写作。他的杂文风格激情四溢，擅用历史典故，很快就在主要的洋商报上刊出了。1939年，他和巴人、柯灵等其他左翼人士出版了刊物《鲁迅风》，但一年之后因内部分歧关闭，这一分歧主要是由文载道把陶亢德拉进这个团体而引起的，而周黎庵则是他和陶亢德之间的引介人。这个插曲在文载道的同志中引起了很大的敌意，他们甚至更加恨他了。^{〔95〕}

1941年12月，文载道和他的妻子都被捕了。为了逃脱刑罚，从犬牙下救出妻子的性命，他向“76号”供出了名单。他被释放后，又哄骗柯灵等友人改变立场。为了活下来，他付出了背叛朋友和国家的代价，这种罪恶感在整个沦陷时期一直萦绕在他心中。为什么他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忍受刑罚？为什么

〔95〕 见文载道，《风土小记》，上海，1944，189—260页。另见《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第1卷：117—130页，389—402页；第2卷：154—155页。《宇宙风月刊》，51期（1941年10月），4—12页。

他这么快、这么现实地就屈服了？1941年后，他为自己的妥协而感到羞耻，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辱斋”。^{〔96〕}而且，1943年当《春秋》杂志编辑陈蝶衣向他索稿时，他不无自惭地写道：“弟因无状，未能有裨于士林，清宵自问，似对初衷尚未泯灭……目下除埋头故纸堆里，写无关大计之外，对于任何集会座谈，苟非攸关切身厉害者，已一一谢绝，而终不能见谅于清流。”^{〔97〕}

如果文载道的妥协是不情愿的话，那么一些知识分子的附逆似乎在意料之中。与文载道不同，他们并非在迫不得已或暧昧的状态下做出选择；他们在汪政府里扮演积极的角色。1943年，周黎庵成为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柳雨生（存仁），广东人，1941年香港沦陷后返回上海（他曾是港英政府的文化检察官，回沪后编辑杂志，并曾在30年代与《宇宙风》派有交往），加入了南京政府的宣传部。他也是中日文化协会的理事长，主要负责为高中学生组织公开演讲。1943年柳雨生和《中华周报》的编辑陶亢德建立了由日本军方支持的太平书局。

和文载道一样，周黎庵和柳雨生也为他们的妥协行为感到苦闷。比如，周黎庵在回忆祖母的文章中对自己错误的选择表达出悔恨之情：“我现在自己是处在一个无可奈何的境地。为了自己生活，或者因为另外一个人（很可能是他未来的妻子穆丽娟，她是穆时英的姐姐——作者注），我已牺牲我所有的一

〔96〕 文载道，《风土小记》，69页。

〔97〕 关于文载道的附逆，见我与钱今昔教授的通信，1987年2月8日。关于柯灵对文载道的施压，见他与柯灵的通信，1987年6月21日。引文出自文载道给通俗杂志《春秋》的编辑陈蝶衣的信；见《作家书简》，《春秋》，2卷，1期（1944年12月），99页。

切。但我无愧于人。只有死去者（祖母——作者注）在天之灵，我对她虔诚地祷告，愿她肯原谅我，愿她能祝福我。”他也和文载道一样，把自己书房的名字改做“疚斋”。〔98〕

但大多数作家在附逆之后“更加软弱”。他们都是被勉强的，都不想“伤害”别人，他们的附逆只是为了活命。谭正壁和潘予且都是高中老师，七个孩子的父亲，而包天笑和秦瘦鸥都是多产的通俗作家，为了养家糊口才被迫在1941年后为汉奸杂志撰稿。在这一充满了矛盾和混乱暧昧的境况下，他们试图把自己仅仅看作像邮差和小职员一样的普通人，只是为了维持日常生活而保住一个饭碗。但是，他们时常为自己不能坚持道德操守而感到羞耻。散文家何之为这些作家感到惋惜：“免不了的原因，是谁都想活命；但谁都在宛转挣扎中苟活。苟活是堕落的具体反映。”〔99〕

〔98〕 关于柳雨生，见《文汇报》，1946年5月17日；《古今》，10期（1942年11月），16页。建立于1940年7月的“中日文化协会”以汪精卫为会长，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在上海是最重要的官方文化机构，负责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事宜，其总部设在南京。上海分会于1941年9月建立，并在1943年3月重组。陈公博和褚民谊负责咨询部，除周黎庵之外的其他成员还包括傅石说（杭州大学校长）、樊仲云（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叔雍、金雄白、陶亢德，1943年后柳雨生也加入进来。比如，柳雨生曾经安排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和其他人谈论日本文学并解读他们自己的作品。关于周黎庵的说法，见《铭心的纪念》，《风雨谈》1卷1期（1943年4月），41—45页。当1943年周黎庵和穆丽娟结婚的时候，许多汪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包括陈公博、梁鸿志、樊仲云和朱朴）以及一些《古今》的重要作者，如文载道、柳雨生和陶亢德都参加了他们的婚宴。见《杂志》2卷1期（1943年4月），96—97页。

〔99〕 “软弱的附逆”（soft collaboration）这一概念是从Paul Jankowski的*Communism and Collaboration: Simon Sabiani and Politics in Marseille, 1919-1944*（New Haven, 1989）的第6—9章中发展出来的。关于谭正壁，见他的《悼一个无知的灵魂》，《杂志》2卷3期（1943年6月），64—69页。关于包天笑和秦瘦鸥，见他们在《风雨谈》上发表的散文，1943—1944。有关这些为金钱而投敌的作家的情况，来自我对郑逸梅的采访（上海，1986年1月23日）。当他们

正是上述两类作家的道德罪恶感引发了深刻的忏悔意识和赎罪的焦虑感，因而他们不断地为自己辩护。文载道仍然靠自家的财产为生，尽管他说：“一个人（被羞辱之后）最好最聪明的方法——我在这里诚意地说，无过于什么话都不说！……人究竟还是无往而不矛盾，也便是无往而不可怜的东西，我们终于还不能保持沉默的始终。”但他仍有写作的强烈冲动。实际上，在拜访周黎庵之后，周向他透露要出版一份风格类似于

（接上页）被迫妥协之后，这些“软弱”的附逆者在行为上存在一些差异。谭正壁和包天笑的合作，仅限于写作，而且他们主要写的是一些几乎与现实无关的历史的和通俗的作品。而潘予且则很享受被归类为附逆者之后与周佛海和朱朴所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因为潘予且精通手相和风水，而周和朱又对此有浓厚的兴趣。潘予且除了加入中日文化协会，担任理事之外，还因其短篇小说选深刻地描写了上海的中低阶层而获得了大东亚文学奖。见潘予且，《我与古今》，《古今》第19期（1944年3月），49—50页。苏青，离婚后开始专职写作，成为以性别经历闻名的最畅销的小说家。她因为《古今》撰稿而结识了陶亢德和柳雨生，通过陶亢德和柳雨生的出版社，她结识了周佛海和陈公博，并且凭借她的外交技巧，她向上爬得很快。在周佛海和陈公博的帮助下，她在上海市政府里谋得了一个闲差，1944年她以《古今》为楷模，也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天地》。苏青最著名的作品是《结婚十年》。关于她的生活，见欧阳慧，《苏逆青离婚始末》，《读者》，2期（1945年12月）。

更难以分类的是共产党的作家。比如，女小说家关露就是由共产党渗透进汪政府文化部门的间谍，她是《女声》杂志的编辑。而另一位共产党员鲁风编辑通俗杂志《杂志》，该刊由袁殊出版，他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地下特工。据说，袁殊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但他也为国民党上海的情报部门工作，在1940年加入汪政权以前，还积极为日本宪兵队服务。1942年，他担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张爱玲，可以说是当时最著名、也是最有意思的女作家，1942年自港返沪后开始写作。她写作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自我表达，而且也可能是为了出名。除了曾经和汪政府富有才华的宣传官僚胡兰成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外，张爱玲还为《古今》、《杂志》等刊物撰稿。当时她必定明白这些刊物的汉奸背景，但是她的文学成就和不同凡响已经超越了这一道德瑕疵。关于张爱玲战时生活的生动记述，见柯灵，《剧场偶记》，149—164页。关于她和胡兰成的生活，见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1976）；另见Edward Gunn,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1982, 第5章，有关于她作品的总体讨论。

《论语》的杂志，他就寄了一篇文章给《古今》。^[100]因此《古今》为这些被罪恶所驱遣的文人提供了一个发表看法的园地，也为他们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这就像那些退隐者和抵抗者一样，附逆文人也有自己的群体，以满足情感上互相支持的需要。与其说这一群体是为了强化他们的叛变意志，不如说是和开明书局或抗日戏剧家一样，通过杂志来寻求自我辩解、谋求同情以减轻他们的罪恶感。

朱朴的家（名为“朴园”）位于极司菲尔路，而周黎庵的家（名为“周庄”）和《古今》的办公地就在安静的亚尔培路上的一座巨大的西班牙风格的别墅中（这里靠近文载道和柳雨生在静安路的家）。对这些附逆文人来说，这一聚会场所中所举行的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净化”活动。^[101]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穿长衫（而不是西装），留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山羊胡子，仿佛是为了表现对中国的深厚感情。^[102]他们为其高雅的人文趣味感到自豪和自赏，文载道沾沾自喜地把他们的聚会称为“自由、轻松但又严肃”的“雅集”。这些文人头发凌乱，手拿燃烧不完的烟袋，沉浸在闲聊之中，或探讨古典艺术和文学，或鉴定珍贵的书籍字画，或交流明清的历史掌故，或享用当地的美酒佳肴，或用传统和现代名士的故事来互相安慰，他们常谈及的例子是清代散文家李慈铭（1830—1894）和“五四”造反者陈独秀（1897—1942）。这两个人的一生充满了怪

[100] 文载道，《借“古”话“今”》，《古今》，19期（1943年3月）。

[101] 亚尔培路上的这座带有十英亩土地的大宅属于金雄白。这里最初用作他的南京兴业银行的上海办公室，后来作为他的私人俱乐部。许多重要的文学事件都在这里发生，如1945年与张爱玲和《杂志》的编辑们的圆桌会谈就在这里举行。见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香港，1977，126页。

[102] 包括周佛海和朱朴在内的《古今》作家集体照片，见《古今》，25期（1943年6月）的封二。

诞的行为，还都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此外引人注意的是，《古今》的一些聚会经常是为纪念历史人物举办的，比如在端午节纪念屈原（约前 340—约前 278 年）——这位因耿直忠贞而被逐出朝廷，而后自沉的政治家和诗人。^[103]而这些聚会中，周佛海和亲信官员大都会参加。

《古今》建立起一种通过对传统文化认同来进行心理补偿的表达方式。虽然他们无法挽回过去，也无法完全把自己从侵略势力中脱离出来，但是《古今》文人集团急于为他们的妥协行径做辩解，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尽可能远离政治的安全距离。换言之，他们实际上是承认了日本统治的这一现实，但又试图避免让这一高压政权合法化。《古今》致力于小品文的创作，这种文学形式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恰当的、以非政治的姿态来赎罪的渠道。因此，与那些政治汉奸不同，这些作家以“遗民”自居，并在“朝隐”的想象中寻求庇护，以彰显其爱国的“真我”。

对《古今》的作家来说，“遗民”就是活在政治和社会动乱时期的“名士”，他们或者选择游离的生存（如杜浚，1611—1687），或者辞去官职，追求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晋代文人张翰）。^[104]这也就无怪乎他们会对魏晋、晚明和晚清时期文学人物格外着迷。《古今》派与上海的抵抗者不同，抵抗者把自己看作为忠诚而战的英雄，而他们则把感情投射到那些完全不合时宜的古怪人物身上。《古今》派与李健吾、阿英、柯灵的道德反抗和王统照、耿济之、郑振铎的伦理坚守不同，他们只求沉浸于回忆，在回忆中哀叹逝去的纯真。因此，怀旧夹杂着

[103] 见文载道，《朴园雅集》，《古今》，25 期（1943 年 6 月），8—10 页。

[104] 见沈尔乔，《明末诗人杜茶村》，《古今》，43/44 期（1944 年 4 月），15 页。
文载道，《风土小记》，1—8 页。

强烈的悔意与净化的心理，成为这些附逆文人作品中的主旋律。^[105]

在汉奸的世界中，生活是由一些无法改变的选择和偶然的事件形成的，一切都是在无意义地兜圈子，米兰·昆德拉的警句——“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恰当地概括了他们的感受。人生是没有锚的漂泊，轻飘飘的，却很奇怪地感到压抑。人们被无助和无望的矛盾感所折磨。正如一位作者所悲叹的那样：“这个时代，叫做非常时代，打来打去、封锁、炸弹、囤积，（我虽）自甘淡泊……连菜汤都喝不着的时候，可也不免有些嗟叹忿恨……又没有力量，可以旋转乾坤，化戾气为祥和，能渴求用乞怜的话来请求寄生虫放松一下压迫……”^[106]

在有形的和物质的感觉下，除了生存本身之外，什么都不可靠。理想或者抽象的东西被斥为虚无，道德不过是可耻的伪善，而现在毫无意义。因此，与批评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试图“解构”他作为附逆者的过去不同，德曼的方法是通过“诗学语言”（poetic language）消减物质的存在，并将历史贬低为“文本”，以否认客观“阅读”（readings），^[107]而《古今》的散文家却在过去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着安慰。正如何

[105] 关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回忆和怀旧主题的出色研究，见 Stephen Owen,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1986, 80—141 页。

[106] 潜之，《常与非常》，《天地》，5 期（1944 年 2 月），2—3 页。相关语句，见 Milan Kundera,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Michael Heim 英译，New York, 1984。

[107] 有关保罗·德曼这一主题的相关作品，见他的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Minneapolis, 1983) 和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1986)。有关德曼的结构理论的解释，出自新近在比利时发现的杂志文章 *Le Soir*，见 Hamacher、Hertz 和 Keenan 编，*Responses*。

之所说：“将来既渺茫，现在，没法把握，都空了。在空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抓着过去，何尝不聊胜于无。”^{〔108〕}过去既是对死亡的否定，又是对自我的界定。回忆个人的过去，回忆往昔的文化，并把这些回忆在艺术中传达出来，他紧紧抱着这些存在不放，他却发现不了价值。文载道描述了这种感觉，他写道：

然一面亦有感于胜会不再，与时序的代谢，诚有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民之感。有时一个人在孤灯相对，或午夜梦回时，默想起已逝的流光，多难的万方，更加显出情绪的波澜万端。于是又陡然地将思绪驰骋于儿时的一刹了……人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中，往往有一种欲语还休的无言之恸，觉得俯仰啼笑，仿佛一无是处。^{〔109〕}

纪果庵是一位南京的教育家和文化官员，也是《古今》散文家中的另一位领导者。他说：“我几年以来，因为感伤人事，渐知注意历史，觉得一切学问，皆是虚空，只有历史可以告诉人一点信而有征的事迹。”^{〔110〕}

《古今》中的确充满了那种有助于缓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焦虑回忆。《古今》的作家们在回忆过去时给予忠诚和“真”以过度的强调，依据弗洛伊德的反向作用理论（Freudian reaction formation），这很可能是在无意识反对自己妥协行为的一种表现。事实上，他们所有的记忆都被注入了自贬

〔108〕 何之，《废话而已》，《天地》，9期（1944年1月），4—7页。

〔109〕 文载道，《风土小记》，1页。他用另一句话简明地表达了这一意思：“世上也惟有‘过去’才值得咀嚼与追求，纵然往者已矣，但它毕竟是件件真实，不能再用什么力量可以加减，不像未来那样的缥缈无据。”（《风土小记》，17页）

〔110〕 纪果庵，《古今与我》，33页。

与自怜的老调，这些调子都来自周作人的抒情辞章，他是《古今》的守护神。虽然他住在北京，周作人仍然经常给《古今》投稿（经常占据头条的位置），以其高雅的格调、政治的模糊性和宁静的智慧给予这个由上海的附逆文人所组成的文学流派以灵感。其影响之大，恰如鲁迅给予抵抗者的一样。所有《古今》的作者都声言或者试图成为他的门徒。^[111]

和周作人一样，这些作家编织他们的过去或者寄情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将其写成一曲怀旧的挽歌。他们的童年羞涩懦弱，经常受人欺凌，但仍旧被他们用牧歌般的笔调描绘出来。正如文载道所回忆的：

当夏秋的薄暮，正是书房放暑假的当口，我们迎着一抹锦片似的落日，让晚风清凉地飞向寂寞的郊野，而一些吱吱地翱翔着的野鸟——斑鸠、鹌鹑、黄雀，以及普天下同样漆黑的老鸦们，则在急促的归途中，送给我们以细碎的乐曲。于是我们先脱下衣服，搁在石桥的栏杆上，然后看着四厢无人，才跳向喁喁地弹着细语的小溪中。然而我们也有像英雄们一样扎硬的地方，无论负伤或受辱，绝对不向大人们控诉，甚至还关照同行的佣人：“不许在老太太面前说！”……不过说到区区自己，在这种场合，往往“自维身心衰惫”，情愿暗暗吃亏，却不敢加入这种“斗争”，

[111] 当1943年周作人来到南京和苏州旅行之际，包括柳雨生和陶亢德在内的许多上海作家和编辑都去看望和款待他，并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和报告，因而他的旅行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见纪果庵，《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古今》，20/21期（1943），5—8页。关于周作人附逆的讨论，以及他战时作品的重要的分析，见楼适夷等编，《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资料汇编》，《鲁迅研究动态》，1期（1987），2—53页。另见李景彬，《周作人评析》，西安，1986。

同时更劝别人“息事宁人”，有时还要掉着文袋，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呀，什么“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呀，这种杀风景的办法，结果自然是换来轻蔑和讥讽：“你自己没有志气，还要打断别人的威风！”——而这就是构成我此生的懦怯、动摇的来由吧？〔112〕

这些记忆唤起了苦乐相伴的悲哀，随即变成怀旧和自我辩解的情绪：如果有人太胆小，以至于不敢保护自己，甚至是在和平时期也不敢，那么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除了妥协之外，他又能做什么呢？难道仅仅因为他太懦弱，无法承受压力就应该责怪他吗？这种想象也表达出对平静生活的向往。在战时，《古今》的作家们为生存的压力而悲叹，他们声称自己完全不适合这个“热与血”的时代。“我愿处‘常’，极怕应‘变’，我可以处一辈子‘常’，……可是不能应付一朝之‘变’，……这正是应当活在天下承平，民不知兵的年月，又偏偏弄得生不逢辰，老实讲，对于‘适者生存’一句话，是个很大的矛盾。我是应当被淘汰的。”〔113〕

因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他们因此向往宁静快乐的乡村生活。实际上，这是《古今》派的陈词滥调，对朱朴和纪果庵来说尤其如此。在他们回忆录的前言中有这样的话：“我是生长在无锡县景云乡全旺镇上的，所以我是个十十足的乡下人。”“我辈原无大志，不过希望有几亩田，四五间茅舍，长

〔112〕 文载道，《风土小记》，79—80页。

〔113〕 纪果庵，《知己篇》，《天地》，13期（1944年10月），15—17页。《天地》模仿《古今》的风格，在1943年10月由苏青出版，并得到了其传说中的情人上海市长陈公博的赞助。1944年10月，当《古今》停刊之后，在遗民作家的积极支持下，《天地》成为它的后继者。

作太平的庄稼人罢了。”^{〔114〕}他们抱怨战争引起的管制和上海高昂的生活费让那田园梦无法实现。正如一位作家化用陶渊明的诗句：“恨今日米价，要想采菊东篱下也不可能。”^{〔115〕}然而，他们以旅行演讲、搜集当地风俗掌故、画山水画和写隐逸诗来寻求心理上的安慰。他们用这些流于感伤的小趣味来缓解生存的苦痛。

由于“生活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古今》的作家们把他们这种疏离的感情转向对“遗民”身份的认同。陈旭轮以前是一位大学教授，现在隐居在无锡附近，引用三国时魏国皇子曹植（192—232）的诗句来解释这一身份机制：“学士大夫，生丁季世，出处进退，周章狼狈，明清鼎革之际，尤多时士逸民可歌可泣之事。吾辈今日诵其诗，读其书，大有一往情深之慨，曹子恒有言：‘既伤逝者，行自念也。’”^{〔116〕}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对《古今》集团特别有吸引力的是魏晋时期的遗民（尤其是“竹林七贤”）和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例如吴伟业（1609—1672）、钱谦益（1582—1664）和张岱（1597—1679）。在《古今》作家的追忆和描绘中，这些文人浸淫于因抵抗失败而引起的痛苦与绝望之中，却仍然在社会与政治的动乱时代忧愤地坚持生存。特别是张岱的《陶庵梦忆》被誉为遗民悲情——不合时宜（anachronisms）——的概括：对生的贪念

〔114〕 见朱朴，《朴园随谈》，《古今》，29期（1943年5月），1—4页；纪果庵，《海上纪行》，《古今》，19期（1943年3月），23—27页。

〔115〕 纪果庵，《论设身处地》，《古今》，38期（1942年2月），18—20页。当时，陶渊明的诗歌被频繁引用，此诗被Burton Watson译为“Dring Wine No. 5”，收入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New York, 1984），1：135页。另见蕊公，《谈明末山人》，《古今》，40期（1944年2月），17—19页；周楞伽，《谈山居》，《天地》，5期（1944年2月），2页。

〔116〕 陈旭轮，《吴梅村与晦山和尚》，《古今》，50期（1944年6月），25—29页。

所唤起的罪恶和羞耻。当文载道伤感地谈起张岱的作品时（回应朱朴对周佛海的评论），认为张岱揭示了“孤臣孽子”的痛苦：“《梦忆》中所记载的一切陈迹，似乎皆足以令人感到沉痛悱恻，感到低徊反覆而不能自己，如他自己所说，如‘刳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再说得迂旧一点，则世上最可悲矜的，也惟有‘孤臣孽子’之心！”好像是为自己的情况辩护，他继续说道：“含垢图存，忍辱偷生，恋恋于一息之存者，也未妨曲予哀矜。”〔117〕

和魏晋、晚明的名士一样，这些自称为“遗民”的作家把自己视为极端理性的、无党派的和愤世嫉俗的离经叛道者。他们把乱世中儒家的忠贞教义讥讽为“乡愿”和“媚”。〔118〕隐隐然间对立于通过不合作和自我牺牲彰显气节的抵抗者，《古今》派倾向于将道德和人类生存的本性对立起来，用求生的本能来质疑道德。他们宣称，人性的意志就是活下来，而不是为什么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呆板意志。政治是肮脏的交易，任何道德的宣言都只是谎话，是野蛮行径的伪装。“在这儿我又想到史书里面的义烈义民诸传之无理”，纪果庵说，“（我同意作家苏青对于道德的看法）封疆大吏可以卷款逃走，而老百姓却尽着为国捐躯的义务，暑日挥汗读《宇宙风》冯和仪君《论道德》一文，说道德乃是少数人为了自己利益使多数人由之路，此亦显例之一，唯少数人并不由之，只是让多数人来跳下陷阱以衬托自己的功绩耳。”〔119〕

〔117〕 文载道，《风土小记》，26、80页。关于《陶庵梦忆》的学术研究，见Stephen Owen，134—141页。

〔118〕 见纪果庵，《论从容就死》，《古今》，7期（1942年9月），20—24页；刘平，《明末人物》，《古今》，6期（1942年8月），19—22页。另见周楞伽，《清高不易》，《文友》，4卷1期（1944年11月）；文载道《风土小记》，117页。

〔119〕 纪果庵，《论从容就死》，22页。

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正派教义不过是政治的虚构，道家自由与退隐才是真实的人生。另一位作家写道，“我们感到只有君子最危险，如前所云，忠呢，十九是被杀，不忠或逢迎，更不免乎罪，说去说来，路子是很窄的。所以许多人只好作了不说话不作事的隐士，儒家思想表面上作为中国主干思想几千年，而一遇事实，就会想到天地不仁以及大道废有仁义的话上面去，我之所以说道家思想易于为人瓣香，绝不是矫情的话。”^[120]但《古今》的作家们却从没有兴起对道家哲学的探讨，而是通过历史的投射来表达他们的思想。

文载道特别喜欢寻求魏晋时期与沦陷上海文人间的相似之处。他小品文中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肆意漫笔，传达出附逆文人不安的心理。他们的怀旧艺术只不过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方法，他们自怜和自我放纵的倾向实则是逃避附逆重压的途径。生活在外国的统治下，他们试图不被牵扯进去，不必承担使高压政权合法化的职责，还能从政治危险中全身而退。因此，文载道把自己看作与晋代名士嵇康（223—262）和张翰（他以为追求自由，放弃高官而闻名）一样的人，他悲叹道：

可是反过来说，所以有如此反常的行为者，政治的压迫实为一重要因素。其次则是庄老虚无哲学的启发，而庄老是主张归真返朴的。他们看到政治的黑暗混乱，一面篡夺窃攘，一面却又有各式巧妙的藉口，什么“禅让”，什么“任贤”，什么“亲民”，而实际不过是兵强马壮者的好自为之耳，不过窃国者侯，窃钩者诛耳。……但是那时政治的黑暗，做人的艰苦，也实在令人哭笑不得，进退两

[120] 纪果庵，《论设身处地》，18—20页。

难。特别是对于负有才望的士大夫，非逼着你投入政治的夹缝中不可。因此，倘要跳出漩涡，洁身自好，就只有佯狂玩世，或在药石与酒食中作自我的麻醉、寄托。我们如果设身处地代他们想一想，恐怕也得稍微宽容一点。人总得有一个着落，要不弹琴赋酒，“败坏礼法”，那末反过来武就得持剑戟，文就得舞刀笔，为礼法撑腰，为纲常说教。而这所谓礼法纲常，也已经过当时的权力者的调和，失去原来的光泽，换一句话，就等于替有权有势者特定的礼法效命驰驱罢了。而这又非“直性狭中”的人所能忍。正如看见自己所憎厌的人患着疮毒，你如果对他面前大声的呵责他臭秽，说是“有碍公共卫生”，他听了一面固要勃然作色，对你不利；但一面也许闻而憬然，亟思治疗，万一治复常态，大家都觉得他缺点消除了，那岂非正是便宜了他吗？而自己反受足他的损害。所以，唯一策略还是对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说“今天天气……哈哈”，或者手指着黄浦江的清风明月，而自己也庶几可以保持平安。〔121〕

作为对清代名士画家郑板桥（1693—1765）的回应，他劝告读者应该“糊涂”。〔122〕

而且，通过对过去理想化的、去语境化的描述，比如称赞

〔121〕 文载道，《魏晋人物记》，《古今》，39期（1944年1月），14—19页。张翰的故事出自《世说新语》，是文载道和其他《古今》作家非常喜欢的典故，在这里全文引用：“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诗人皆谓见机。”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北京，1984），7章，10行，317页。Liu I-ch'ing, *Shih-shuo hsin-yu: A New Accounts of Tales of the World*, Richard Mather 英译（Minneapolis, 1976），201页。

〔122〕 文载道，《风土小记》，36页。

以前食物便宜，文人的收入也很高，从而突现现在的贫困、灾难和痛苦。经济的生存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没有物质的支持，任何道德理想主义的讨论都是空虚的、浅薄的。因此，作家堯公抨击女性的贞操观（因为这是新儒家常见的关于气节的隐喻），它和忠臣概念一起构成抵抗文学的有力主题，堯公还捍卫再婚：“夫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古来不知凡几，其合乎人情者，可以为天下后世法，其过乎人情者，虽大可敬，而不可以为天下后世法。……我亦以为饿死事小的话，恐程老夫子还没有尝到饿的威胁与不能忍受，每与朋友谈论，均认为饿死究非小事也。……有地位的妇人应当守节，普通妇女，须倚赖男子生活，自然听其再嫁三嫁，毫无所谓。”^[123] 此处，再婚和政治妥协间的相似性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何之的话更为明显，他说：“能够做隐士的大概总有几亩田，能够做高人的大概总有几个钱，否则高人隐士便不成其为高人隐士了。对快饿死的人谈廉洁，对卖淫的妓女谈贞操，理论虽有一大套，其如实际何？”^[124] 显然，这些话是暗指像王统照、耿济之一类在 1941 年后为坚持爱国理想而退隐的消极抵抗者，他们把自己类比为“节妇”。

与英雄之死的主题相反，一些附逆文人试图在动荡当中重新定义爱国主义话语，进一步阐释生存的主题。他们把自己的妥协视为一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行为，以求自我辩解。^[125] 抵

[123] 堯公，《妇人七出与再嫁》，《古今》，40 期（1943 年 2 月）。

[124] 见何之，《废话而已》。

[125] 20 世纪 20 年代，“国粹派”曾赞同这一观点。相对于“五四”所推崇的文化启蒙观来说，这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回应。文化民族主义是指以传统文化作为个人与群体的身份认同，也就是把中国文化的特质和单纯性想象为国族的共同身份（即所谓“中国性”）。见 Laurence Schneiderz, “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New Intelligentsia”, 收入 *Limits of Change*, Charlotte Furth 编, Cambridge, Mass., 1976, 57—89 页。

抗者把妥协视为通敌叛国，与他们不同，《古今》作家群将爱国主义重新解释为在战争和外国入侵的情况下保存消亡的中华文化。因此这些作家并不以建立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为荣，而是以中国“旧道统”的维护者而自豪。换言之，他们是文化上的爱国者。

例如，为了回应朱朴的历史循环观，周黎庵认为文字追忆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见证现在来连接过去和未来。^{〔126〕}实际上，记住的都是值得被记住的，生存成为延续中国文明的方式。周黎庵声称，“战乱之际，旧社会所有善良根基，尽遭推翻，须知此项根基，决非一蹴而几，乃经无数先哲心血所浇灌而成。读者识之，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种悲天悯人之怀抱，正今日吾辈之应所践行者也。”^{〔127〕}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执教的龙沐勋正在编辑一本词学杂志，他试图借助生物的相似性来将个人生存与国家生存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我们既然投生在这个世界上，投生在这个国家里，就应该有绵续民族生命的任务。人的寿命是很短促的，而人类的生命，和民族的生命，是需要绵续不断的。禽兽都负着这绵续种子的任务，难道生而为人，反而可以连禽兽都不如，坐视种族生命之将斩，而犹在醉生梦死中糊里糊涂地混过一世吗？……因为人类的生命，民族的生命都寄托在它的文化上，而文化的发展，是靠人类的不断努力，积累而成的。一点一滴地尽着一个人的责任，就是为这人种这民族绵续一分的生命。”^{〔128〕}

〔126〕 见清代小说《孽海花》的注释，由于《古今》认为这部小说是晚清志怪的诗学的兴起，因而得到重版，周黎庵写道：“余于古今编后记，尝谓今日之视同光，犹同光人物之视乾嘉朝士，而流风遗韵，邈不可复得，为之掷笔三叹！”（《孽海花人物记》，《古今》，37期，1943年12月）。

〔127〕 周黎庵，《编辑后记》，《古今》，54期（1944年9月），12页。

〔128〕 龙沐勋，《复李耕青书》，《古今》，34期（1943年11月），31—32页。

当时,《古今》为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言论的平台。借用文载道的话来说,在这种“保存中国身份”的努力下,[129]刊物中的作品引经据典,使用阴历纪年,栏目也依照传统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来排列。此努力得到了周作人的赞赏,他称赞《古今》是一本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保持沉默的时候,“吃苦忍辱,为希求中国文化复活而努力”的杂志。[130]

周作人批评那些为了维护爱国理想而躲藏起来的抵抗者,这一观点在《古今》作家群的自我辩护中得到了响应。陶亢德就宣称,消极抵抗是一种自私和自以为是的表现,而继续写作才能体现文化的忠诚。“（消极抵抗者的）这种说法诚然振振有词,然而错是错在把著作的目的误会了。我们不应该不知获文人学士产品之惠者,是国家民族而非当国秉政的张三李四,我们对张三李四的主义政策无须三呼万岁,但我们说不出在张三李四统治下就决不著述的理由。”[131]但是,陶亢德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只有他们而不是抵抗者才会选择承认中国的沦陷,并承认日本的统治。只有在这样的假设之下,他们才能宣布文化的民族主义。

上海附逆行为的暧昧性并没有到此为止。《古今》作家群显然都在享受附逆行为带来的特权和名声,少数人在为《古今》写稿之余,还在南京政府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的作品曾引起沦陷区所有编辑的注意,除了苏青和潘予且之外,这些一跃成为文坛名流的文人不过是昙花一现,在今天他们早已湮

[129] 文载道,《风土小记》,37页。纪果庵说他钟爱周作人长篇大段引用古典作品的风格,以确信沦陷区没有人“忘记中国”。见他的《我与两都集》,《天地》,15期(1945年1月),19—22页。

[130] 周作人,《文钞序》,《古今》,12期(1944年9月),14—15页。

[131] 陶亢德,《论出版文化的人与物》,《申报月刊》,1卷3期(1943年3月),80—81页。

灭无名。他们为自己的文学修养能得到周佛海、陈公博和朱朴等南京高官的赏识而喜出望外，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被邀参加重要聚会，并在社交活动中得到礼遇，因此不少人表现出明显的自得，甚至是谄媚的态度。文载道就是其中之一，在抱怨黑暗的政治驱使知识分子装作“糊涂”的同时，他在文章中津津有味地谈论《古今》的“雅集”，并赞美周佛海和朱朴是体现“魏晋风流”的“率真”和“洒脱”精神的典范。^[132]

《古今》的政治暧昧性、遗民主题和自我辩护的笔调占据了沦陷的上海。对战前生活的怀旧、严肃杂志的缺乏，以及知识分子的赎罪愿望，造就了《古今》的成功；^[133]多期杂志重版多次，每次印数约为 1000 到 2000 份。《古今》的声望有助于刺激上海的文化世界。

1943 年被称为“杂志年”，从这年伊始，许多模仿《古今》小品文风格的出版社涌现了出来。在 1943 年到 1944 年间，也就是出版业由于纸张短缺和政治压迫而破产的时候，出现了二十多家杂志，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撰写个人回忆和历史掌故的文学刊物。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苏青的《天地》和柳雨生的《风雨谈》，该杂志也吸引了《古今》的作者。

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资助出版的期刊和报纸（除了官方报纸《中华周报》和《中华日报》外）一个接一个的关闭（平均寿命只有三个月），上海的商业报纸把版面都给了抒情散文、回忆录和言情小说，以期在竞争中提高占有市场的先机。不仅如此，在 1943 年还成立了一些出版社——像古今出版社、柳雨生和陶亢德的太平书局、潘予且的知行出版社——主要致力

[132] 见文载道，《朴园雅集》。

[133] 甚至郑振铎也渴望读到《古今》，见他 1944 年 4 月 1 日的日记。陈福康，《郑振铎一九四四年日记》，《新文学史料》，2 期（1990）。

于出版个人回忆录、随笔、历史掌故或传略（包括畅销书周佛海的《往矣集》和陈公博的《寒风集》），占据当时所有出版物的60%。^[134]

尽管《古今》对沦陷上海的文化界做出了贡献，但是这种回顾过去、自我辩护的主题逐渐遭到南京政府的攻击。因为汪精卫的忠实拥护者林柏生与周佛海有派系矛盾，在林的领导下，中央宣传部努力宣传汪精卫的个人理想，加强并整合国民政府的统治力。^[135]因此，在1942年和1944年间，通过一系列群众运动，汪精卫被描绘成“新中国”的绝对领袖。比如，“新国民运动”就推动了一种以儒家“忠”“礼”美德与西方科学主义混合的新展望。虽然从未清楚地厘清，这种思想的目的就是促成中国的精神革新，使中国度过战争的“关键时刻”，和日本一起实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之梦。宣传机器特别重视与“利己主义、虚无主义和颓废的英美文化”作斗争，创造一种自我牺牲的、合作的新文化。所有的这些努力都被囊括在“大东亚文艺复兴”的理想之下。^[136]

[134] 这些出版社中包括《古今》公司、《天地》出版社和太平书局在内。他们都属于日本控制的中国联合出版公司，该公司也包括大型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局（后者只出版像《二十四史》一类的参考书和中国历史书）。杨寿清，387页。

[135] 在汉奸中，宣传部被称为“广东帮”，因为其领导人大多是来自广东的林柏生的同学。甚至该组织的日本顾问，也就是代表日本远征军司令部出版局的著名诗人野草心平也毕业于广东岭南大学，并是林柏生的好友。此外，宣传部负责沦陷区所有的新闻审查，并对南京政府的政策进行理论的文饰工作。见张润三，《南京汪伪几个组织及其派系活动》，《文史资料选辑》，40辑（1981），1—81页。

[136] 见周化人，《东亚文艺复兴运动》，《文协》2卷2期（1944年3月），2—5页。《〈文协〉发刊词》，《文协》1卷1期（1943年11月）：1—2页。冯节，《建立东方本位文化》，1—2页。另见高桥良三，《建立中国新文化的基本问题》，《文协》2卷1期（1944年1月）。关于宣传文本的大纲，见《申报年鉴》，上海，1943。另见余子道等编，368—408页。

然而上海文学发展却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势。汪政府的理论家们既反感沦陷文学的“逃避现实”与“个人主义”，也对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如郭沫若和成仿吾等人所代表的遵命文学的时代表示惋惜（讽刺的是，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颓废的作家，他们没有意识形态，不关心人生，也不尊重集体的目标，仅仅为了名利而写作。^[137]比如，一位名叫乐秀良的青年宣传者就曾像保罗·德曼斥责罗伯特·巴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缺乏政治意识一样，用毫不宽容的语言责备小品文的流行：“上海的文化界如此令人失望！全是沉郁、烦恼和花鸟怡情之类遁世文学的题材……新文学是应该属于大众的，现在新文学（却）是士大夫阶级咏风吟月，钻进牛角尖……（我们应该）教育和启示大众……文学是神圣的使命。”^[138]这些批评显然是针对《古今》作家群的。

柳雨生既是文化官员，也是《古今》的成员，他为他所主持的与日本文化交流项目的失败而感到相当的遗憾：“中日邦交越是敦睦，中国出版界极贫弱，介绍日本作品之缺乏，又以今日为最甚，现在在日本翻译上远比不上清末，更遑论事变前了。”他继而责备这种萧条的状况是因为沦陷区缺少精通日本文化的作家，甚至连对日本文化有兴趣的也不多。^[139]

实际上，少数上海的文学刊物从事日文翻译，其中比较引

[137] 见何干，《文坛四疵》，《文友》，3卷11期（1944年10月15日），21页。杨一鸣编，《文坛史料》，大连，1944。

[138] 乐秀良，《我们需要有血有肉的文艺》，《申报月刊》，1卷8期（1943年8月），144—146页。另见《说悲哀》，《杂志》，3卷2期（1944年5月），27—29页。关于Paul de Man有关Robert Brasillach的论文（Le Soir，1941年8月12日），见Werner Hamacher、Neil Hertz和Thomas Keenan编Paul de Man's *Wartime Journalism, 1939—1943*, Lincoln, Neb., 1989, 130—131页。有关节译本，见Responses, 22—24页。

[139] 柳雨生，《怀乡记》，《风雨谈》，6期（1943年10月），157页。

人注意的是柳雨生自己的《风雨谈》和陶亢德的《东西》，这些杂志主要发表一些非政治的作家，如川端康成的短篇小说和谷崎润一郎的随笔，这些激发美感的、令人感动的作品长久以来为中国读者所熟悉。^[140]甚至一些被送往日本从事交流项目的上海编辑和作家（如陶亢德、柳雨生和以大量收藏春宫图而著称的英文教授周越然）并不懂日文，其日本经历的报告读来更像旅行指南而非政治宣传。他们都以个人回忆的方式写下了一些关于艺妓、清酒、寿司吧或神社的印象式短文。要么，就和陶亢德、柳雨生一样，通过采访文学名流来体现自己的重要。^[141]

令南京政府更加不安的是缺乏作家的积极参与。从1943年开始，林柏生领导的中央宣传部试图采用日本文学报国会的3100强模式^[142]在“和平地区”逐步建立一种统一的文学运动，帮助将来的宣传工作。然而这些努力都未能奏效。在沦陷期间，上海作家（与北京的作家不同）连一个全城范围的正式协会都没有组织起来。^[143]

[140] 关于这些卓越的日本作家的战时文学活动的记录，见 Donald Keene, “Japanese Writers and the Greater East Asian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 卷 2 期 (1984 年 2 月), 209—215 页; “The Barren Years: Japanese War Literature,” *Monumenta Nipponica*, 33 卷 1 期 (1978 年春), 67—112 页。

[141] 见周越人,《在日本所见》,《大众》1 卷 11 期 (1943 年 11 月), 129—131 页; 陶亢德,《西行日记》,《大众》2 卷 2 期 (1944 年 2 月), 132—135 页;《东行日记》,《古今》,34 期 (1943 年 11 月), 14 页。另见柳雨生,《怀乡记》。

[142] 日本文学爱国会由日本情报厅发起,于 1942 年成立,其官员包括菊池宽等多位著名作家。关于日本在战时的宣传工作和文化活动,见 Ben-Ami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1981, 110—156 页。

[143] 柳雨生,《大东亚战争与中国文学的动向》,《文学》,1 卷 2 期 (1942 年 12 月), 12—16 页。关于北京的文学状况这一有待观察的课题立即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见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地下文学》,台北,1985; 另见 Gunn, *Unwelcom Muse*, 1 章。在北京还有一个称为“中国联谊作家会”

更有甚者，1944年11月，汪政府为筹备即将在南京召开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组织了一个国民文学会议，区区40人出席中仅有三分之一是作家。来自上海的委员中，一位是说日语比说中文更流利的小作家陶晶孙，另一位是编辑周雨人。更糟糕的是，这一会议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为支持文学和教育而恳求更多政府资助和财政帮助的论坛。^[144]一位官员抱怨当时的政治和文学背道而驰，并指责那些借助魏晋隐喻而沉浸在遗民感伤中的作家们是一群颓废、自私、热衷清谈的人。正如那些魏晋先辈也曾被儒家士大夫指责为清谈误国一样，《古今》的作家们也必须为困扰汪政府的问题负责。^[145]

日军也不满上海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非政治悲观情绪。从1942年开始，当日本屡次在太平洋遭到同盟国重挫，日军开始转向了“新中国战略”（New China Strategy），其本质就是“强化南京政府”。为了从中国战区释放更多的人力和资源到南海，这一新政帮助傀儡政权获得自主。因此，当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1942年和1943年访华，他反复劝诫日本政府应更为敏锐地感受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在上海的出版界到处都是日本人关于“日本的反省”谈话。而且1942年到1944年间，除了支持汪政府为巩固其在中原地区的军事统治而发动的清乡运动之外，日本还对南京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做出了小小的让步，

（接上页）的“民族”文学组织，但只有一些小作家参加，如李健吾以前的戏剧辅导陈大悲、丁丁、周越人和林徽音。这个团体在沦陷时期的文学界影响不大。

[144] 《文协》2卷12期（1944年12月）：10—11页。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战时举办了三次会议：1942年11月和1943年8月在东京、1944年11月在南京。南京会议致力于讨论中国、日本、满洲国、蒙古和台湾的文化合作。

[145] 顾凤城，《文化界消沉的原因》，《申报月刊》，1卷3期（1943年3月），97页。另见纪果庵，《谈清谈》，《天地》，2期（1943年11月），18—22页。

包括在 1943 年 8 月将以前的租界还给汪政府，并用其名义来管制。^[146]

然而，这些亲善表现来的太少，也来的太迟。到 1944 年，上海的日本当局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界对于大东亚战争将会把亚洲从英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说辞既不热心也不相信。作家大川周明承认日本在扭转中国思想方面的失败，他谴责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世界公民”，抛弃了他们的亚洲义务。在他看来，许多作家拒绝写作，而在写作的则是一群文丐，他们的作品与“解放东亚”毫无关系。另一位批评家吉田东祐甚至更加沮丧，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不爱中国的。^[147]

在另一方面，大多数日本官员将矛头转向汪政府的“独裁统治”和它在减少通胀方面的无能表现。他们指责政府疏远上海民众，知识分子的不满只是政治腐败的表征。“国府还都三四年来，不但抗战区的人民尚未归心，拥护国府，即和平区内亦不免有人心涣散，民心沸腾的现象。”一位中国批评家也赞同此意见，他说，“所有政府宣传无不与现象脱节，又不许人民批评政府……（正如）守垣大将所说的，目前把握民心第一”。^[148]

讽刺的是，许多《古今》作家使用日本当局的话来为自己

[146] 见 John Boyle，第 15 章。袁愈佳，1 期，82—85 页。关于“日本的自我检查”的谈话实例，见《卷头语》，《文友》，3 卷 1 期（1944 年 5 月）：1 页。关于“清乡运动”，见余子道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

[147] 第一段引文出自陶晶孙，《提携上需要的基础见解》，《杂志》13 卷 2 期（1944 年 5 月），9—10 页。第二段出自吉田东祐，《日本对华政策与中国知识界》，《申报月刊》，1 卷 3 期（1943 年 3 月），73—79 页。另见他的《日本的正义》，《文友》2 卷 17 期（1944 年 1 月）：8—10 页。

[148] 见《卷头语》，1 页。《文友》由日本中国远征军的新闻课编辑出版。《申报》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该报也由新闻办公室直接控制。引文出自《把握民心第一》，《申报月刊》，1 卷 3 期（1944 年 11 月），7—9 页。

的作品辩护，回应这些批评。他们把上海的文化衰落（大多数流行杂志的销量低，比如《杂志》只有1500份）归咎于政治压迫和经济艰难。他们怨恨地指责政府的审查制度，这一制度把社会评论等同于政治攻击。他们同样尖锐地批评收入与通货膨胀之间成反比的状况。比如，陶亢德在1943年的文学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与战前相比，米价上涨了超过百分之十万，稿费只涨了百分之一万二千。因此大多数作家不得不放弃了写作，少数能够继续写作的也没有多少时间能创作严肃的作品。他们被迫为赚钱而写作，而且为了养家糊口，还得做教员和职员等额外的工作。陶亢德质问道，“伟大”的文学“理想”和“光辉”怎么可能在不停地为生计而担忧的状况中被创作出来呢？实际上，政府应该用放松审查制度和提高经济待遇的方式争取招募更多的作家。^[149]纪果庵甚至使用了批评他的人所用的比喻，激烈地为怀旧的随笔辩护。“唯千古只要有人，就要有人性，人情又是东海西海，往古来今，如初一揆的，那么便不能废去说真话的人物与肯说真话的文章……我们今日所要的清谈，乃是说几句老实话，却不是玄旨妙义之谓……然我之要谈清谈，却另有一种感触，盖一个人而没有几个朋友可以谈谈，

[149] 陶亢德，《论出版文化的人与物》，81页。除了（与周黎庵）在中央储备银行任职之外，陶亢德自己还编辑多个杂志，并为之撰稿。像龙沐勋、谭正璧等散文家也大量写作，并在不同的大学或多所中学校任课，赚取课酬，以维持收支平衡。见江春，《出版文化之问题》，《杂志》2卷5期（1943年8月），24—28页。举几个例子来说明1943年的大学课酬，交通大学10元中储券，圣约翰大学22.5元，上海医学院是60元。见《上海高等教育概况》，《文协》，2卷2期，41—48页。在著名的日本文学爱国会第三次会议上，小说家大川周明号召伟大的文学应该为“解放亚洲”而努力，并对琐碎的自传小说提出了批评。见Donald Keene, “Japanese Writers and the Greater East Asian War”, 308页。上海的许多文化官员都提出了这一提议，题目呼吁“浪漫的”文学应为亚洲和平的实现而努力，见《中国文学之现状》，初版于《大陆新报》，《杂志》12卷2期（1944年5月）译为中文，172—176页。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谈谈，没有一个时间可以谈谈，我认为是生趣丧尽的事，虽在那里衣食住行，也不过一架机器一般。……近代行为派心理学家，由实验证明一切生物之活动动机皆是为了吃饭，吾人之为吃饭而鞠躬尽瘁，固亦无疚于祖先神明，但既难遂池鱼林鸟之愿，则随便叫唤几声，以鸣心曲，殊亦不能责为罪大恶极。”〔150〕

所有这些批评加重了南京政府的挫败感，也加深了它对上海知识界的敌意。《古今》变成了一个现成的靶子，在日本军方和宣传部的共同压力下，周佛海常常对朱朴施加压力，告诫他冲淡《古今》的怀旧味道。他劝告应该在更多讨论时事的同时，发表一些日文的译作。但他的建议是徒劳的。〔151〕在1944年10月，也就是汪精卫在日本接受两次手术后死亡的同时，汉奸政府倒台之前的十个月，《古今》在日本海军（与林柏生关系密切）的压力下被迫停刊。〔152〕朱朴不无自嘲地向他的读者告别，《古今》作为一本“新老遗民”杂志，在“大东亚文化的新时代”，除了不合时宜外，一无是处。〔153〕

不用说，这个新时代是永远也无法到来了。占领军的日子屈指可数。日本投降前十个月，在陈公博接手领导南京政府之后，派系斗争日益剧烈，加上日本的失败即将到来，南京政府面临瘫痪。许多高级汉奸正忙着找“重庆关系”，以求“将功赎罪”。周佛海就是其中的著名一例，他得到戴笠的任命，为国民党接收长江下游地区做准备。〔154〕在美国轰炸和同盟国登

〔150〕 纪果庵，《谈清谈》，18—22页，《天地》，第2期（1943年11月）。

〔151〕 书生，《综论文化记》，《古今》，11期（1942年11月）。

〔152〕 朱朴，《后记》，收入《周佛海日记》（香港，出版项不详）。

〔153〕 朱朴，《小休辞》，《古今》，57期（1944年10月），1页。

〔154〕 金雄白，《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2册：59—94页。袁愈佳，《经历者的回忆》。

陆的谣言四起之际，上海的经济彻底崩溃了。政治压制变得更加严酷。由于检查制度的升级和纸张短缺的问题，包括《风雨谈》和《天地》在内的大多数新闻和杂志都被关闭（二者都是在1945年初被关闭的）。那些继续出版的报刊则经常遇到开天窗的状况，而且不得不为每令配给纸支付超过10000元中储券的费用（在1936年，每令纸3元，即1.5元中储券），从而被迫减少超过三分之二的报纸篇幅。比如，受欢迎的《申报》只有两页，每周只印三次；《中华日报》的文学副刊也从每日一期变为每月一期。^{〔155〕}

1944年中期，在《古今》结束之后，朱朴去往北京，周黎庵归于沉寂。《古今》作家群消失了，但它的历史掌故性的随笔风格却仍然主导着沦陷上海的文学形式和趣味。当上海解放到来之际，温和的赎罪愿望变成了日益强烈的对宽恕的渴求。柳雨生的《风雨谈》和苏青的《天地》被视作得到陈公博和周佛海妻子杨淑惠资助的杂志，因此，为他们的忏悔提供了一个论坛。纪果庵和文载道再一次把自己看作因“堕落”而拼命争取宽恕的代言人，他们谴责战争的“乱世”，认为这个时代迫使“凡人”“苟活”，为了给自己的妥协寻求开脱，他们指出自己曾仅仅沉溺于无关痛痒的怀旧来假装“糊涂”。因此，文载道辩称：“各以缺点与优点来构成生命的整体……我们知人论世，最好能将尺度稍稍放得宽一点；尤其是三代以下无完人，（三代以上有——敢问？）我们不能以某一缺点来抹杀全体。”^{〔156〕}

这种遗民姿态激起了一场战后的争论，这一争论超出了叛

〔155〕 见苏青，《涛》，67—151页。

〔156〕 文载道，《知人论世》，《风雨谈》，1卷1期（1943年8月）。

国的讨论范围。1945年8月上海解放后不久，甄别和惩治汉奸的辩论爆发了。在道德主义的中国民族复兴观的影响下，左倾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除了极力赞美许广平、柯灵、王统照、李健吾、郑振铎等抗日知识分子，把他们推为“爱国气节”的楷模之外，把所有与汪精卫政府有关的作家都归入“附逆文人”。它还号召大众孤立这些汉奸，并恳求光复的国民政府把他们都投入监狱。^[157]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认定文化汉奸的做法是不公平的，他们提议制定一个更妥善地甄别方法，要把自愿为敌人服务的作家与只为了活命而合作、写了一些没什么政治重要性的文章的文章的作家区别开来，这显然是指《古今》的散文家。因此“作品”应该是判断的基本标准。^[158]

这样，尽可能保全了大部分文人。为了集中资源应付即将开始的内战，以及受到党内普遍腐败的影响，国民政府乐于对汉奸采取温和的“赦免”政策。与此原则一致，在处理《古今》的编辑和作家的问题上，也采用了类似的宽容方式，只有柳雨生和陶亢德两人因在汪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分别被判处了两年和三年的徒刑，^[159]其他人都被赦免了。虽然他们的遗

[157] 《文汇报》，1945年10月1日。

[158] 例如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和蔡楚生讨论“问题不在于是否投敌，而在于是否邪恶”（《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159] 有关柳雨生和陶亢德的审问，见《文汇报》1946年5月17日和6月1日。该二人的被捕是在他们以前的被保护者苏青的自愿帮助下实现的。1945年10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特使宣称：“除了一些‘甘愿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会被法律制裁外，大多数因生活所迫加入‘伪政府’的人都会得到赦免。”（《文汇报》，1945年10月15日）因此，只有在伪政府中任职（如宣传官员戴英夫和浙江省长傅式说）或编辑重要政治报刊的知识分子才会被起诉。与《古今》交往不多的龙沐勋，由于与汪精卫关系密切，而且还在汪政府的文化教育界中任职，而被关押。见琦君，《我的笔名》，《世界日报》，1992年1月5日。事实上，起诉这些附逆者的政策相当复杂，包括起

民姿态使其免于叛国罪的审判，但是他们在沦陷期间的妥协行为并非诬蔑之词。他们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暧昧性导致了他们永久的遗民命运。

和那些为逃避惩罚而远渡重洋，至死都保持沉默的高级汉奸一样，所有《古今》作家在1945年之后都被中国的文化界所放逐。尽管如此，从1987年开始，文载道在沉默了四十二年之后（用新的笔名“道载文”）又开始为《大成》杂志撰写志怪随笔了。《大成》是一份在南下上海人经营的专发怀旧和回忆录等历史掌故的香港杂志。^[160]

（接上页）诉谁、怎样起诉、何时起诉，该问题与内战的关系等，都有待于研究。1946年汪政权中被处决的高官有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梅思平和林柏生。周佛海因为帮助过国民党在华中的游击队，蒋介石减免了他的死刑，但他1946年因心脏病突发死在狱中。一些著名的汉奸，如由日本控制的《申报》的出版商陈彬龢逃往香港，朱朴也奇迹般地在战后来香港避难，而赵叔雍则前往东南亚教书。至于金雄白则蹲了两年国民党监狱，然后去往香港和日本靠卖文为生，后来死在日本。1977年，在他去世前不久，他的讲话依然充满了《古今》的语调和风格：“任何一个团体，都必有其黑暗的一面，这二十年来，宣传上对汪政权的如何如何，已经给宣传得够绘影绘声了。如其在我笔下每个人都是至善的，每件事都是完美的，我忍心骗读者，而读者能因我的隐饰的相信吗？政治上的是非功罪，尚且是一篇糊涂账，用以赚票的写作上臧否褒贬，我自更无介意的必要了。”（《记者生涯五十年》，135页）柳雨生在上海监狱中服刑两年后，前往香港教书，现在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教授。

[160] 见道载文（金性尧），《杨度翰墨及其有关人物》，《大成》，168期，1987年11月。

结 语

在詹姆士·威尔金森 (James Wilkinson) 看来，纳粹欧洲的知识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道德被简化到两种，其他的都被排除在外……（抵抗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好像简单至极的二选一，你只能选择支持和反对”。^{〔1〕}沦陷的上海就仿佛这种非此即彼的摩尼教世界。

在日本的恐怖主义面前，上海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战争带给他们的是私德与公德的道德困境：要么选择活命，要么选择爱国的责任。羞耻感加剧了他们道德上的焦虑。德国完全占领了法国巴黎和挪威奥斯陆，而上海是一座孤岛，它与广大的未沦陷地区切断了联系（但在感觉上仍然是中国的重要部分）。1937年11月大上海沦陷后，知识分子大批逃往内地，留下的人则在良心上陷入了不安。与其在外国统治下苟活，不如参加民族抵抗运动，在这样的情绪下，他们愈发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他们倾向于把正义等同于爱国主义，把人的尊严等同于国家的认同（在30年代中期这一潮流特别明显）。因此，人性的考验（人与兽）构成了沦陷时期上海文学话语的主题。文学就变成了自我肯定和非难“他者”的霸权领域。

〔1〕 James Wilkinson, *The Intellectual Resistance in Europe*, Cambridge, Mass., 1981, 264页。

在摩尼教非此即彼的辞令下，知识分子在道德困境中的不同反应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沦陷的上海，他们的抉择充满了道德和政治的暧昧性。在这里，尽管有日本人的频繁空袭，有国民党的无处不在的腐败和镇压，但是抗日的呼声仍然是一种文化生活的方式，^{〔2〕}可是，与中国控制区民族主义的自由表达相反，沦陷区存在道德上的不确定性。爱国抵抗会招致死亡的危险；妥协似乎在所难免，但又会遭到道德的非议，将二者截然分开的解决办法并不存在。在这一情况下，历史需要一个意义结构来界定和还原这些上海文人的姿态。在对过去的津津乐道中，他们既是在培养民族自豪感，同时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从而创造反抗压迫的“隐藏文本”。

在中国历史中充满了类似的道德政治危机。在改朝换代（如魏晋和明清时期）和外族入侵之际（如元代和清代），传统文人的经历具有某种文化意义，他们在有关公与私的抉择困境中的反应被分为“隐”、“忠”、“降”三种原型，这一分类源自儒家的社会责任话语。但是，正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最近所发现的，投降者都以个人情感的“浪漫”升华而著称。而“隐”（也许类似于欧洲的“内在流亡者”的概念），以其禁欲主义的韧性来抵抗投降，这种做法自周代（前11世纪—前221年，伯夷和叔齐）起就被公认为一条合法且值得钦佩的道德抵抗之途。^{〔3〕}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指出的，在社会中，文化是一个评价和排斥的象征系统，（中立地说）它为社会提供秩序和普遍价值。换言之，社会行为是

〔2〕 见 John Israel, “Random Notes on Wartime Chinese Intellectuals,” 收入 *Republican China* 9, 第3期（1984年4月）。

〔3〕 Frederic Wakeman, “Stoics, Romantics, and Marty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y*, 18卷, 第4期（1984年8月），631—666页。

由文化所决定的。^{〔4〕}因此，这三种道德与政治选择的文化原型构成了上海知识分子思想和灵魂。

对于大多数上海沦陷区的文人知识分子来说，在面对道德困境时，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文化行为方式：消极抵抗、积极反抗、附逆合作。王统照是消极抵抗者的典型代表，此类人把退隐山林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抵抗，以求将“公”与“私”两种矛盾加以调和。他所希望的，就是能够不失气节地生存下来。反抗者，如李健吾，通过创作不屈不挠的、藐视强敌的戏剧语言来反抗妥协的威胁。正如李健吾在他的剧本《青春》的扉页所引用的孔子的名言：“是知其不可为而为者耶；是不知其可为而为者耶。”而《古今》的散文家们由于心中时常萦绕着背叛的罪恶感，他们以怀旧的方式制造出一种疏离的感伤情绪。他们对过去的依恋，是一种缓解内心不安、并重新发现人性的方式，而他们的不安是由于人格受损的生活所引起的。文载道写道，他曾向其他与他一样“落水”的朋友倾诉：“感到胜会不再，与时序的代谢，诚有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民之感……此身缺少了安排的所在……无可奈何，欲语还休。”^{〔5〕}

然而，简单地以过去来解读现在是一个错误。与此相反，这个文化行为的三分法并非一种简单地比附，它只是在策略上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使上海作家的道德政治处境在其中得到定义和澄清。他们的种种反应与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现实情况息息相关。实质上，在日据上海期间，对已有文学文本的批评性阅读揭示了在历史与当下现实之间，在集体义务和个人顾虑之间意味深长的多重张力。而战时上海知识分子

〔4〕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1983, 5—16 页。

〔5〕 文载道，《风土小记》，上海，1944，1 页。

选择的模糊性就在这些张力之中。

“五四”运动之后，对理性、个人自由、人道主义的博爱论展开了新一轮的批判，这些观点逐渐统一为一个强有力的思想结构，它导致已被知识精英视为过时之物的新儒家忠顺观的复兴。正如世界上的其他战争一样，抗战激发了有助于独裁统治发展的、激进民族主义的产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袖都试图利用这一情况，并在各自的运动中称赞集体主义伦理道德的传统美德，以达到反对政治异见的目的。积极抵抗与附逆合作之间的思想分界变成了两个政治阵营强加给 1937 年逃往内地知识分子们的正统教条。正如李欧梵所指出的，其结果使压制和保守的气氛占领了未沦陷中国地区的爱国主义文学。“抗战八股”——也就是一种以严重的模式化观念和公式化的方式来刻画爱国英雄主义的风格——广为流行。而个人主义的风气——这一“五四”话语的主流部分——却消退了。^{〔6〕}

吊诡的是，离开了中国政府的保护，上海的作家们却享有更多的创作选择权和主导的自由（但并不必然取得更大的成功）。特别是在 1941 年后，上海文学由于取向、风格和主题的多样性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生活在未沦陷地区的作家相反，生活在外国统治的危险和耻辱下，这些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关注自我的计划和内在的资源，并且被迫抓住私德与公德的困境来进行写作。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文化所激发的三种知识分子反应模式形成了。

〔6〕 李欧梵，“Literary Trends: The Road to Revolution, 1927—1949,” 收入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John King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编。13 卷，下篇。无论在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因为爱国的英雄主义的影响，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反抗的文化模式的隐退主义也被谴责为卖国的逃跑主义。见蒋星煜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1944。

王统照在努力调和爱国主义理想和保全自我的矛盾需求的同时，也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存在于集体主义道德观和“五四”的个人自主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他用奇异的、理想主义的语言所描述的“抵抗的启蒙观”，实际上是艰难时代个人主义的微小抵抗。从这个角度看，他在1941年后的隐退，既是关心个人安危的结果，也是在战争中道德情操的觉醒。中国抗日运动所具有的复仇暴力、专制倾向和理想主义的正统观念，使得王统照意识到，自我修养也许是留给启蒙抵抗者的唯一的选择。关注私人，成为他的羞耻之源，但与此同时，也是社会挑战的一个合法领域。因此，王统照超出了传统隐士自保尽忠的愿望，他为消极抵抗赋予了知识分子自主的象征意义。不过，这种独立是以社会的无能为代价的，而且，消极抵抗在面对敌人强大而残酷的镇压时则有道德懦弱的味道。他对于个人理性的笃信是出于真正的信仰呢，还是为了害怕威胁而找借口的不老实自欺呢，抑或二者都是？他的隐退，是一种现代批评理性的行为呢，或仅仅是传统逃避现实主义的继续呢？

在这些问题中包含着存在主义的讽刺，解释了王统照的战时作品中之所以流露出一种由于道德理想失败而引起的深刻挫折感和不确定性的原因。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私人领域的，还是公共领域的，都是他的理想的投射，他们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无法化解的矛盾的迷宫之中。例如，他在沦陷状况下所写的长篇小说《双清》描写的就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一个纯洁妓女寻求启蒙的故事，小说的叙事在一种恐惧和焦虑的情绪下突然中断了。女主人公笑倩在拒绝以革命的暴力作为统一国家的手段，又被军阀逐出了田园诗般的隐居生活之后，她发现她在天主教孤儿院的工作，虽然在精神上是完成了，但是在这个政治动荡的时代却是徒劳无益的。这个未完成的文本仅仅说明内在于王统照的消极姿态之中的道德模糊性。

而李健吾的抗战剧则体现了另一种个人自由与民族解放的调和方式。日本的侵略导致了上海成为“孤岛”，或一种临界关头的出现，这里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恐怖和饥饿的情况下面临忠诚考验。妥协的诱惑是压倒性的。正如萨特（Sartre）和其他巴黎沦陷时期的抵抗作家们一样，李健吾把自己想象成道德精英的一员，誓言要将在自私和胆怯的“铁屋”中沉睡的市民唤醒，使之奋起抵抗。对他而言，参与政治也是一种道德选择。而这种与不公正战斗的勇气是以内在的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因此，个人道德的自信和团队精神一样，对中国解放至关重要。

由于大多数“左”或“右”的抗日剧作家都赞同借助历史符号来表达忠于国家的集体主义伦理，但是李健吾与他们不同，他坚持个人气节的价值。他公开为自由主义辩护，并把自由主义重新解释为包括社会正义和道德责任在内的一套人文价值，以反对狭隘集体主义的正统派。正如他所言，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是像鲁迅和巴尔扎克那样的人，“拒绝向任何权威妥协”。他们会为其所信仰的（而非被告知的）对社会有益的事业奋斗到死。^{〔7〕}

出于对信仰的忠诚，在抗战的问题上，李健吾和王统照都存在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沦陷期间，李健吾既没有参加政治性的组织（甚至在他曾帮助建立的上海剧艺社中也处于活动的边缘）；也没有写纪念忠臣烈女的历史剧。相反，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孤独斗士，他们以决不妥协的热诚和强烈的自我反抗精神来追求理想（浪漫的或政治的）。因此，在他最成功的战时戏剧《青春》中，主人公田喜儿吸引观众的，不是为人所熟悉的

〔7〕 李健吾著，《个人主义》，收入《李健吾文学评论选》，220—222页。

封建语境下的爱情苦恼的主题，而是为了他所爱的姑娘香草的献身精神，他令人振奋的自信、韧性和大胆反抗现有秩序的勇气。这一浪漫行动（原本是一出情节剧）最终强调了历史和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道德良心超越了历史的局限；而且在此意义上民族解放是由人的内在自由所决定的。因此，李健吾不同于王统照，他通过一种独立的、为正义而战的个人献身方式，同时对外国的恐怖统治和组织化了的抗日运动进行反抗。（尽管他曾为了活命，参加了一些政治背景暧昧的剧团——虽然他自己也许并不知情——并且编排了不少纯粹商业性的戏剧。这在某种程度上有损他的道德理想。）而这种个人的使命感正是源自他的道德观。他试图采用正邪对立或敌我对立的道德定义的方式来安排并编织政治的情节，由此形成道德明确的政治观念。因此，当爱国主义在战后的中国不再是统一的力量，当腐败和个人利益变成新国家首先考虑的问题之际，他失去了“中国重生”的希望。鉴于靠一己之力无法改变战后的世界，李健吾只能拥抱（并自愿地服务于）1949 年后的新政权，从而被认为具有相对的“忠诚度”，加上他的反帝经历人所共知，所以直到 1982 年去世，他一直过着安静的学者生活（除了政治运动中不时的冲击之外）。而这也正是李健吾的“个人主义”人文伦理的局限性之所在。

与王统照和李健吾相反，《古今》作家群在为其附逆行为的辩解中消除了两难道德困境。尽管他们不断重复人的生存是人性的基础、道德是社会压迫的欺诈这一论点，但是这些内疚的散文家仍然感到他们的存在是一种不幸、贬低和无意义。他们用传统的“遗民”一词来看待和表达自我，这个词带有忠于前朝的遗留者的意思。但是在沦陷期间，《古今》作家群赋予“遗民”这一传统概念以新的言外之意。他们倾向于将“遗民”等同于魏晋乱世和明清易代之际的隐士。出于对他们所失

去的清白的惋惜，他们以一种深刻的疏离态度来看待他们的生存。过去永远过去了，顺应时代也是另谋他图的机会。上海的经济危机和汪精卫政府的无能使他们加倍悔恨自己的投敌行为。对他们而言，现在变成了一种暂时的、绝望的负担。人生似乎没有一点儿救赎的希望，而在浮生的追忆中也许还能寻求到些许安慰。

毋庸置疑，《古今》作家群的作品充满了怀旧的意象和主题。在这些散文家的笔下，他们的童年浸淫在温柔的感伤情绪之中。而中国，正如所描绘的景色和不变的风俗，被凝固在一个田园罗曼司的时代，在那里人人都过着平静而知足的生活。这种对于符号的迷恋并非是政治性的，过去泄露出这些文学汉奸自视为“遗民”的时代落伍者的取向。他们并非是任何一个具体中国（或外国）政权的遗存者，也并不忠于任何一个具体中国（或外国）的政权；相反，他们只对一个抽象的文化中国的概念负责，而这个文化中国现在已经被日本的铁蹄摧毁了。与消极抵抗者或积极抵抗者不同，对他们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败给了日本。

当中国“亡国”之后，《古今》作家群将其肉体的生存视为一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行为。他们经常回顾过去，而不是按日本人的鼓吹去展望“大东亚秩序”的未来。对他们来说，这些文学回忆录就是中国身份的活生生的证明。但是与抗战所信奉的儒家节操文化观相反，他们发现遗民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异端思想和自我放纵的体现。这些散文家对新儒家所褒扬的公共道德百般奚落，哀叹它是一种非人性的、不合理的压抑私欲的方式。因此，要修复文化中国就必须要以非正统的遗民文化为基础，他们把这种文化定义为是对人欲的礼赞，是对人性弱点的认同。这也正是《古今》作家群道德模糊性之所在。对他们来说，内心的罪恶感超过了妥协带给他们的折磨。他们接受外

国的统治，他们与南京领导人把酒言欢，而且他们也陶醉在名声带给他们的特权中。但是，他们在沦陷时期的作品却很少流露出亲日的情感或宣传的色彩。他们也许对侵略者有用，因为侵略者急于利用他们的“文学才华”为上海粉饰太平，而他们却使自己与侵略合法性的斗争无关。就此而言，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怀古既是为了逃避附逆合作所带来的生存痛苦，也是为了免于卷入政治。

在私德与公德的两难处境中的三种反应模式向我们揭示了上海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的复杂性。王统照消极抵抗的道德模糊性，李健吾非正统的“个人主义”的抗战剧，以及《古今》作家群附逆合作的遗民遁世主义，共同构成了一幅历史的拼图，与重庆或延安对抗战时期的人生和思想描述相比，它具有更多的微妙差异和模糊性。在这一研究之后，任何有关战时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学状况的普遍研究，都应该考虑到道德困境的问题，这是萦绕在沦陷区人民心中的政治良知。（上海和其他沦陷区，如北京、广州、香港或乡村也都需要一个系统的比较。）^{〔8〕}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发现历史的话，在有关日本侵略的问题上，模糊性和复杂性一定会从虚假的清晰思维中得以恢复。

同样的，任何将人类在外国统治下的状况进行理论化的努力（这些研究主要以纳粹欧洲的历史为基础），都应该将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亚洲国家知识分子）的经历纳入其中。上海

〔8〕 有关沦陷区的研究，见 Sophia Lee, “Social Order in Beiji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Peter Seybolt, “Patriotic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45: A Case Study of Neihuang County, Henan Province”（两篇论文在第43届东亚研究会上发表，1991年8月）。

沦陷的“暧昧状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巴黎、布鲁塞尔或者奥斯陆相似？在面临道德和政治的困境之际，中国人和欧洲人有何不同？欧洲经历的戏剧和随笔的繁荣与中国有何相似？在外国统治下的政治化的世界中，文学和知识分子的最佳角色是什么？我们能否以这三合一的反应模式为参照点进行比较？^{〔9〕}总之，任何对于沦陷经历的普遍问题的探求都应超越目前的欧洲中心取向。

回顾过去，从上海史的角度阅读八年抗战，沦陷标志着上海衰落的开始。自1840年西方人首先在那里建造小市镇开始，伴随着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和帝国主义者的滥权，上海已经在世纪之交成长为一座控制中国商品经济的繁大会。而且，借助国际化的生活方式和西方人所宣布的治外法权，租界变成了中国反主流文化的避风港。特别是在1927年“白色恐怖”之后，进步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寻求言论自由和新的信息资源。他们利用“借来的”自由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批评之声，否则，中国政府决不会忍受意识形态的反抗。由于异议的存在，文化活力才会出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战前的上海展现出了有限的“社会空间”，这正是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另一个中国”（other China）和进步文化得以生存的条件。^{〔10〕}

1937年8月日本的入侵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最终改变了一切。孤岛上的政治恐怖主义、犯罪暴政和经济困难严重地危及

〔9〕 类似的有关观点，见 Roderick [H. R.] Kedwar 和 Roger Austin 编，*Vichy France and the Resistance: Culture & Ideology*, London, 1985, 1—10 页。但 Kedward 呼吁对外国侵略进行比较研究，其主旨在于深化理解法国经验。

〔10〕 见 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Other Shanghai’: Shanghai from 1919 to 1949,” 收入 *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 Metropolis*, Christopher Howe 编, Cambridge, 1981。

租界政府的自主权。当 1941 年日军占领租界之后，连这点被限定的自主权也被破坏了，全城被置于汪精卫政府名义上的统治之下。没有了西方的“保护”，上海很快就陷入了飞速的通货膨胀，政治压迫也变得更加野蛮。但是，正如研究所表明的，在沦陷期间仍然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紧握着有限的“社会空间”不放，坚持为国家和个人的自由而战。因此，在 1943 年和 1944 年，西方列强承认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贡献，撤销了他们在上海的条约权利。

因此，当战争结束之后，国民政府重掌上海，并取消了租界。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胜利。然而，国民党的无能和腐败很快将饱受战争蹂躏的城市经济推向了全面崩溃，而且随着内战的激化，政治局势也趋向于残酷镇压，建立了多层次的审查制度，而且学校和大学中充斥着间谍。这就导致了像柯灵的《周报》和储安平《观察》等自由出版物的被查禁，以及年轻的共产党人被屠杀的状况。所有的这些手段击碎了以理性方式创建一个人道、民主的战后中国的希望。唯一不变的就是西方的影响力和国民党效率低下、且不得人心的野蛮镇压。上海不仅失去了自由和活力，连那“借来的”特许权和充满活力的战前经济也一起消失了。上海只是一座曾经辉煌的城市，它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剩下的，仅仅是稀奇古怪、贪婪、极度贫困和半生不熟的西化的旧上海。那反主流文化的避难所已经不见了。

当共产党接管之后，这座城市往日的繁华只能在记忆中找寻。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在于建立独立的中国，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文化的多样性为代价的。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对民族主义的解释曾经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多样化的不同政见，但新政府凭借着将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业绩，收回了民族主义的解释权。而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特权重要象征

物的上海，现在不仅丧失了“借来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对世界文化的“被迫”开放性。尽管知识分子们在沦陷期间曾经担负民族主义的救亡责任，但他们（包括巴金和柯灵在内）与旧上海的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过从甚密，因此遭到惩戒，而这座城市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一度成为反对西方的“激进主义”首都。在这一点上，上海与共产党控制下的其他现代城市并无不同。正如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所描述的那样，“根本的解决办法似乎是销毁这座现代都市业已存在的一切：拆毁林荫大道，关掉明亮的灯光，遣散和重新安置人民，扼杀美丽与欢乐的源头”。〔11〕

在多年被孤立和被忽视之后，这座城市仍然笼罩在过去的辉煌之中，虽然它到处都变得衰败、污秽、荒废和褴褛不堪。老上海渴望回到辉煌过去——周璇、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哈同（Silas Hardoon），鲁迅、杜月笙、内山书店和百乐门夜总会，玉佛寺和徐家汇天主堂，孤军和血腥星期六——那似幻似真的过去已不可能复活（除非，也许在香港还能找到）。〔12〕而人们似乎已经忘却的老上海的自由和经济的活力，却在日本侵略时期，在动荡的背景和借来的时间里得以存在。民国上海的经历与现代性一起充满了暧昧性：一方面，它所代表的新商业文明为个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又代表着帝国主义的恐怖政体和剥削制度。而这里所讨论的抗日知识分子不顾一切地为了廓清那些历史的迷离吊诡、释放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力量

〔11〕 见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1988, 154—155 页。

〔12〕 关于典型的怀旧作品，见《上海仍在否？》，《世界日报》，1991 年 5 月 8—9 日。

而不断地抗争。因此，不仅是为了复原战前时代那个消失了的世界，更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创建一个在政治上真正现代、自由和世界性的上海，它更是独立、民主中国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 阿英,《碧血花》,北京,1962
——《海国英雄》,福建,1985
艾思奇,《文化在抗战中》,《抗战三日刊》,1937年9月6日
巴金,《给山川先生》,《烽火》,4期(1937年9月)
——《控诉书》,福建,1985
巴人,《巴人杂文集》,北京,1985
——《论投机家》,《上海周报》,1卷16期(1940年2月)
包明叔,《抗日时期东南敌后》,台北,1974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1986
《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1987
蔡楚生,《战后的中国电影动态及目前的改进运动》,《文献》4卷,(1939年1月)
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1988
——编,《周佛海日记》,2册,上海,1986
沧海,《论战时国民生活》,《文友》,2卷4期(1944年1月)
曹禺,《蜕变》,上海,1948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香港,出版时间不详;另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陈福康编,《郑振铎一九四四年日记》,《新文学史料》,第2期,1990
陈公博,《上海的市长》,《古今》,第11期(1942年11月)

- 《怎样才得到中日永久和平》，《时代文选》，2卷1期（1940年2月）
-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奸活动》，台北，1986
- 陈旭轮，《吴梅村与晦山和尚》，《古今》，50期（1944年6月）
- 程中原，《记革命戏剧家于伶》，《新文学史料》，第12期（1983年5月）
- 道载文（金性尧），《杨度翰墨及其有关人物》，《大成》，168期（1987年11月）
- 东方曦（孔另境），《论孤岛文艺的发展》，《鲁迅风》，第15期（1939年6月）
- 《东亚新闻记者大会实录》，南京，1941
- 杜云之，《回忆抗战时期上海的话剧》，《大成》3期，1973年2月
- 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研究资料》，宁夏，1983
- 冯节，《建立东方本位文化》，《东方文化》，1卷6期（1942年11月）
- 奉圣，《每月华中经济》，《中国经济》2卷8期（1944年8月）
- 高翔，《把握民心第一》，《申报月刊》，1卷3期（1944年11月）
- 葛自振编，《民国二十九年之上海的经济与商业》，上海，1941
- 龚明道，《上海通讯》，《宇宙风》，91期（1940年1月）
- 顾凤城，《文化界消沉的原因》，《申报月刊》，1卷3期（1943年3月）
- 《现阶段中国的经济问题》，《文友》，2卷4期（1941年1月）
- 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收入洪深编，《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上海，1948
- 郭鹏，《孤岛风景线》，《宇宙风》，第110期（1940年12月）
- 郭秀峰，《汪伪时期的〈中华日报〉》，收入《文史资料》，第5期（1980年8月）
- 何干，《文坛四疵》，《文友》，3卷11期（1944年10月15日）
- 何之，《废话而已》，《天地》，9期（1944年1月）
- 胡绳，《抗战时期的文化》，《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29日
- 胡松青，《谈孤岛表演艺术》，《剧场艺术》，第4/5期（1939年3月）
- 胡子婴，《在火线的后面》，《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29日
- 怀玖，《忆陆蠡》，收入《陆蠡散文集》，秦贤次编，台北，1979
- 黄美真、石源华、姜义华著，《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上海，1984
- 黄美真编，《汪伪十汉奸》，上海，1986
-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1984
-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河南，1987
- 《回忆苏商时代出版社》，收入《中国出版史料》，卷4，北京，1958
- 毁堂，《历史与现实》，《上海周报》，1卷2期（1939年10月）

- 纪果庵,《古今与我》,《古今》,19期(1943年3月)
- 《海上纪行》,《古今》,19期(1943年3月)
- 《论从容就死》,《古今》,7期(1942年9月)
- 《论设身处地》,《古今》,38期(1942年2月)
- 《谈清谈》,《天地》,2期(1943年11月)
- 《我与两都集》,《天地》,15期(1945年1月)
- 《知己篇》,《天地》,13期(1944年10月)
- 江春,《出版文化之问题》,《杂志》,2卷5期(1943年8月)
- 江枫编,《教育座谈》,《申报月刊》,1卷3期(1943年5月)
- 江亢虎,《失节是大》,《中华日报》,1941年5月5日
- 《失节事更大》,《中华日报》,1941年5月5日
- 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1944
- 《讲和与汉奸》,《时代文选》,3/4期(1939年6月)
-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香港,1977
-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6册),香港,1984
- 靳以,《我的话》,《烽火》,1期(1937年8月)
- 《剧团往来》,《万象》,4卷5期(1944年11月)
- 《抗日风云录》(上下),上海,1985
- 《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上下),台北,1985
- 《抗战中的文化界》,《时代文选》,3/4期(1939年6月)
- 柯灵,《恨海》,上海,1947
- 《剧场偶记》,天津,1983
- 《柯灵杂文集》,北京,1985
- 《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1982年4月)
- 《市楼独唱》(1940年初版),上海,1984年重印
- 《“洋报”辩》,收入《边鼓集》,上海,1938
- 《煮字生涯》,陕西,1986
- 柯灵、任嘉尧,《记洋商报的兴衰》,《人民政协报》,1月1日—2月1日,1984
- 柯灵等,《回忆苦干》,收入《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上下),北京,1985

- 克伦,《每月华中经济大事》,《中国经济》2卷10期(1944年10月)
 孔另境编,《横眉集》,上海,1939
 孔远之,《黄浦滩头》,《大风》,15期(1938年8月)
 ——《五月的上海》,《大风》,10期(1938年6月)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山东,1984
 李达,《上海近期经济的动态》,《申报月刊》,2卷8期(1944年8月)
 李健吾,《〈爱与死的搏斗〉在孤岛时期的正式演出》,《山西师院学报》,第4期(1981年)
 ——《风流债》,上海,1946
 ——《花信风》,上海,1947
 ——《咀华二集》,上海,1942
 ——《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北京,1984
 ——《李健吾剧作选》,北京,1985
 ——《李健吾文学评论选》,银川,1983
 ——《李健吾自传》,《山西师院学报》,第4期(1981)
 ——《梁允达》,上海,1934
 ——《切梦刀》,上海,1948
 ——《十三年》,上海,1939
 ——《挽三哥》,《文汇报》,1945年11月29日
 ——《王德明》,《文章》,1—2期(1946年1—2月)
 ——《我为什么要重译〈爱与死的搏斗〉》,《申报》,10月27日,1938年
 ——《忆郑振铎》,《收获》,1981年第4期
 ——《与友人书》,《上海文化》,第6期(1946年7月)
 ——《这不过是春天》,上海,1937
 ——《自传》,收入《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1981
 李秋生,《上海孤岛报业斗争史》,《传记文学》,45卷2期(1984年8月)
 李石峤,《一二·八后之上海物价》,《中国经济》,2卷6期(1944年6月)
 李宗绍,《一年来孤岛剧运的回顾》,《戏剧与文学》,卷1第1期(1940)
 《两月来华中经济大事》,《中国经济》,1卷2期(1944年1月)
 林则民,《感情决定理智》,《上海周报》,1卷10期(1940年1月)
 刘平,《明末人物》,《古今》,6期(1942年8月)
 刘铁孙,《从统计数据上观察上海物价》,《日用经济月刊》,3卷6期(1941

年6月)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第1期(1979年11月)

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地下文学》,台北,1985

柳雨生,《大东亚战争与中国文学的动向》,《文学》,1卷2期(1942年12月)

——《怀乡记》,《风雨谈》,6期(1943年10月)

龙沐勋,《复李耕青书》,《古今》,34期(1943年11月)

——《苜蓿生涯过廿年》,《古今》,19—23合期(1943年3—5月)

——《由纪念孔子道我们和平主义者的责任》,《中央导报》,1卷6期(1940年11月)

楼适夷等编,《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资料汇编》,《鲁迅研究动态》,1期(1987)

陆宝千著,《论汪兆铭之叛国事件》,载《抗战救国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5

洛川,《戏剧一年》,《新东方》,9期(1944年9月)

罗洪,《孤岛时代》,上海,1947

茅盾,《烽火连天的日子》,《新文学史料》,4期(1983年11月)

——《站上各自的岗位》,《烽火》,1期(1937年8月)

毛旬生,《华中经济病态之考察》,《申报月刊》,3卷1期(1945年1月)

铭人,《民众动员问题》,《文化战线》,第4期(1937年10月)

《宁不主义》,《时代文选》,3/4期(1939年6月)

欧阳慧,《苏逆青离婚始末》,《读者》,2期(1945年12月)

潘汉年,《从辛亥以来的抗日运动到今天的全民抗战》,《救亡日报》,1937年10月10日

潘予且,《我与古今》,《古今》,第19期(1944年3月)

潘再新,《谈谈上海的市米问题》,《中国经济两月刊》,1卷2期(1943年9月)

钱俊瑞,《还乡工作运动》,《抗战》三日刊,第8期(1937年9月)

钱君涛,《留下纪念的痕迹》,《文艺春秋》,第5期(1945年9月)

潜之,《常与非常》,《天地》,5期(1944年2月)

任用梁编,《上海剧艺社与〈人之初〉的演出》,《文献》(1938年10月)

《日伪上海市政府》,上海,1986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北京,1983

《上海地下党支援华中抗日根据地》,上海,1987

- 《上海孤岛文学报刊编目》，上海，1986
- 《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第2卷，北京，1984
- 《上海孤岛文学作品选编》，第3卷，北京，1987
-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1958
- 《上海人民与新四军》，上海，1989
- 《上海生活》，上海，1937—1941
- 《上海物品配给概况》，《新闻月刊》，1卷3期（1945年7月）
- 《〈申报〉社评选》，《申报》，1943
- 沈澄，《新情势下物价问题再提出》，《申报月刊》，1卷9期（1943年9月）
- 沈逸凡，《和平文艺的建立与新近作家》，《中央导报》，1卷30期（1940年2月）
- 师陀，《记一位外圆内方的老友》，《新文学史料》，第2期，（1987年5月）
——《上海手札》，上海，1941
- 施英，《试论佩服吴佩孚的心理》，《上海周报》，1卷7期（1939年12月）
- 史奥，《论防止通货膨胀政策》，《中国经济》，2卷10期（1944年10月）
- 书生，《综论文化记》，《古今》，11期（1943年11月）
- 舒諲，《董小宛》，上海，1947
——《岳飞的遭遇》，《读书》，1期（1980年1月）
- 叔超，《内地通讯》，《上海周报》1卷，19期（1940年3月）
- 思维，《每月华中经济大事》，《中国经济》，2卷4期（1944年8月）
——《一年来之华中经济》，《中国经济》，2卷2期（1944年4月）
- 司徒宗，《血债》，福州，1985
- 《四年来上海市民生活》，《上海周报》，4卷9期（1941年8月）
- 松青，《这一月》，《剧场艺术》，10期（1939年8月）
- 苏青，《涛》，上海，1945
- 苏珊，《沪西毒窟巡礼》，《华美周报》，1期（1938年6月）
- 高桥良三，《建立中国新文化的基本问题》，《文协》，2卷1期（1944年1月）
- 谭正壁，《悼一个无知的灵魂》，《杂志》，2卷3期（1943年6月）
- 唐纳，《陈圆圆》，《杂志》，2卷2期（1943年6月）
- 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政权的经过》，《文史资料》，第40辑，1980
- 唐弢（默然），《沉默篇》，《春秋》，1卷3期（1943年10月）
——《唐弢杂文集》，北京，1984
——《我和象贤》，《新文学史料》，1期（1985年1月）

- 汤心仪编,《战时上海经济》,上海,1946
- 唐振常编,《上海史》,上海,1989
- 陶晶孙,《提携上需要的基础见解》,《杂志》,13卷2期(1944年5月)
- 陶晶孙等编,《中国文学之现状》,《杂志》,12卷2期(1944年5月)
- 陶菊隐,《孤岛见闻》,上海,1979
- 《记者生活三十年》,北京,1984
- 《天亮前的孤岛》,上海,1947
- 陶亢德,《东行日记》,《古今》,34期(1943年11月)
- 《检讨自己》,《宇宙风》,80期(1939年6月)
- 《论出版文化的人与物》,《申报月刊》,1卷3期(1943年3月)
- 《西行日记》,《大众》,2卷2期(1944年2月)
- 田间,《我诅咒》,《烽火》,3期(1937年9月)
- 屠光启,《孤岛时期的话剧界》,《大成》,第6期(1974年5月)
- 屠诗聘,《上海春秋》,香港,1968
- 《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上海,1987
- 王俊,《一年来上海剧团的变迁和演出》,《太平洋周报》(1942年12月)
- 汪曼云,《汪伪特工内幕》,河南,1986年
- 王统照,《冲动与镇定》,《烽火》,2期(1937年8月)
- 《繁辞》,上海,1939
- 《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收入《“五四”运动回忆录》,2卷本,北京,1979
- 《欧游散记》,上海,1947
- 《丐尊先生故后追忆》,《文汇报》,1946年7月5日
- 《去来今》,上海,1940
- 《王统照短篇小说集》,上海,1940
- 《王统照诗选》,北京,1958
- 《王统照文集》,六卷本,山东,1981
- 《夜深沉》,《烽火》,1期(1937年8月)
- 《忆金丝娘桥》,《烽火》,11期(1937年11月)
- 王卫国、祁忠,《他在骄阳与巨浪间——李健吾的戏剧生涯》,收入《中国话剧艺术家传》,第3辑
- 王尧山,《关于地下党重建的经过》,《党史资料丛刊》,第1期(1979年11月)

- 望云,《两年来的国内文化界》,《时代文选》,第8/9期(1939年11月)
- 微言,《周年的话》,《古今》,19期(1943年3月)
- 维正,《道德与抗战》,《宇宙风》,82期(1939年7月)
- 《为孤军送粮》,《上海一日》,上海,1939
- 闻少华,《汪精卫传》,吉林,1988
- 《文艺作家应有的认识 and 任务》,《救亡日报》,1937年9月12日
- 文载道(金性尧),《风土小记》,上海,1944
- 《借“古”论“今”》,《古今》,19期(1943年3月)
- 《朴园雅集》,《古今》,25期(1943年6月)
- 《扫除遗民气》,《横眉集》,孔另境编,上海,1939
- 《拾荒》,《天地》,17期(1945年2月)
- 《魏晋人物记》,《古今》,39期(1944年1月)
- 《知人论世》,《风雨谈》,1卷1期(1943年8月)
- 文载道等编,《边鼓集》,上海,1938
- 《我与开明》,上海,1985
- 吴开先,《抗战时期的杜月笙》,《大成》,167期(1973年10月)
- 吴绍澍,《记上海统一委员会》,《文史资料选集》,卷9
- 《夏丐尊羊毛婚唱和诗》,《万象》,3卷3期(1943年9月)
- 夏衍,《愁城》,上海,1940
- 《记〈救亡日报〉》,《新闻研究》,3卷(1980年5月)
- 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北京,1957
- 徐耻痕,《文汇报创刊初期史料》,《新闻研究资料》3(1981年11月)
- 许广平,《遭难前后》,上海,1950
- 徐开垒,《怀念王统照同志》,《人物》,3期(1981年5月)
- 《〈世纪风〉副刊回忆录》,《上海“孤岛”时期文学史料》,12期(1986年12月)
- 徐士瑚,《李健吾的一生》,《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 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1981
- 许竹园,《和平文艺建设论》,《中央导报》,1卷11期(1940年11月)
- 杨东莼,《纪念辛亥革命与当前的抗战》,《文化战线》,第5期(1937年10月)
- 杨绛,《喜剧二种》,福州,1982
- 杨寿清,《两年来的出版界》,《文艺春秋》,第1期(1944年10月)

- 杨一鸣编,《文坛史料》,大连,1944
- 杨幼生,《回忆柯灵同志编万象》,《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期(1981年1月)
- 尧公,《妇人七出与再嫁》,《古今》,40期(1944年2月)
- 《谈明末山人》,《古今》,15期(1943年1月)
- 姚苏凤等人,《作家离沪琐记》,《大风》,1卷1期(1938年3月)
- 以礼,《陆文龙》,《剧场艺术》,第4/5期(1939年3月)
- 伊人,《八·一三以来上海报章杂志的统计》,《上海周报》,1卷5期(1940年6月)
- 《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集》,上海,1987
- 吉田东祐(Yoshida Tosuke),《日本对华政策与中国知识界》,《申报月刊》,1卷3期(1943年3月)
- 于伶,《默对遗篇吊阿英》,载《阿英文集》,第1卷,香港,1979
- 《一年读剧记》,《戏剧与文学》,卷1,第1期(1940)
- 余子道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1985
- 袁愈佳,《日寇加强掠夺华中战略物资炮制商通会》,《档案与历史》,1—2合期(1987年5—6月)
- 乐秀良,《我们需要有血有肉的文艺》,《申报月刊》,1卷8期(1943年8月)
- 张继英,《记文奸陶亢德》,《读者》,第2期(1945年12月)
-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1940,上海,1984年重印
- 张静庐编,《中国出版史料》,6卷本,上海,1953—1959
- 张润三,《南京汪伪几个组织及其派系活动》,《文史资料选辑》,40辑(1981)
- 张我舟,《战时的文化工作》,上海,1937
- 张一望,《沦陷前后的上海》,汉口,1938
- 张志寒,《追忆抗日战争中上海新闻一幕斗争史》,《大人》,31期(1972年11月)
- 赵景深,《忆上海文协成立大会》,《文艺复兴》,卷1,第1期(1946年1月)
- 《文坛忆旧》,上海,1948
- 赵君豪,《上海报人的奋斗》,上海,1945
- 郑定文,《大姐》,福建,1983
- 郑振铎,《大时代文艺丛书序》,孔另境编,《横眉集》,上海,1939
- 《劫中得书记》,上海,1956

- 《蛰居散记》，上海，1946
- 郑振铎、王统照和耿济之，《蕴华集》，福建，1985
- 《中国话剧艺术家传》，4卷本，北京，1988
- 《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2卷本，北京，1985
- 周佛海，《良药忠言》，《时代文选》，2卷1期（1940年2月）
- 《盛衰阅尽话沧桑》，《古今》，第3期（1943年5月）
- 周化人，《上海的改造》，上海，1943
- 《东亚文艺复兴运动》，《文协》，2卷2期，1944年3月
- 周楞伽，《谈山居》，《天地》，5期（1944年2月）
- 《清高不易》，《文友》，4卷1期（1944年11月）
- 周黎庵，《华发集》，上海，1940
- 《铭心的纪念》，《风雨谈》，1卷1期（1943年4月）
- 《孽海花人物记》，《古今》，37期（1943年12月）
- 《清明节题记》，《人世间》，1卷2期（1939年8月）
- 《一年来的编辑杂记》，《古今》，19期（1943年3月）
- 《宇宙风与我》，《宇宙风》，100期（1940年6月）
- 周雨人，《中国剧运近况》，《申报月刊》4，第4期（1945年4月）
- 周越人，《在日本所见》，《大众》，1卷11期（1943年11月）
- 周震，《怎样解决上海的米市问题》，《申报月刊》，1卷9期（1943年9月）
- 周作人，《苦口甘口》，上海，1944
- 《文钞序》，《古今》，12期（1944年9月）
- 《知堂回想录》，香港，1970
- 朱金元、陈祖恩编，《汪伪受审纪实》，杭州，1988
- 朱梦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上海的暴行》，《上海地方史资料》，第1期（1982年12月）
- 朱朴，《〈古今〉两年》，《古今》，43/44期（1944年4月）
- 《〈古今〉一年》，《古今》，19期（1943年3月）
- 《满城风雨话古今》，《古今》，第9期（1942年10月）
- 《漫谈〈古今〉》，《古今》，第2期（1942年4月）
- 《朴园随谈》，《古今》，29期（1943年5月）
- 《四十自述》，《古今》，第1期（1942年3月）
- 《往矣集序》，《古今》，第15期（1943年1月）

——《小休辞》，《古今》，57期（1944年10月）

朱雯，《烽鼓集》，福州，1983

朱延龄，《今日之民生问题》，《申报月刊》，2卷1期（1944年1月）

朱竹君，《和平运动与心理的改造》，《中央导报》，1卷23期（1941年1月）

邹韬奋，《一连串的问题》，《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26日

——《短笺》，《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29日

左笔，《记周佛海先生》，《古今》，第1期（1942年3月）

外文文献

Amery, Jean. (吉恩·艾莫里) *At the Mind's Limits: Contemplations of a Survivor on Auschwitz and Its Realities*, Trans. Sidney and Stella Rosenfeld. Bloomington, Ind., 1980

Anderson, Marston. "The Morality of Form: Lu Xun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y," In *Lu Xun and His Legacy*, ed. Leo Ou-fan Lee (李欧梵), Berkeley, 1985

Azuma Hideo. (东英明) *Shanghai wa tachi agaru* (《上海的兴起》), Tokyo, 1943

Ballard, J. G. *Empire of the Sun*. New York, 1984

Barnett, Robert. *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 1937-1941*, New York, 1941

Barthes, Roland. (罗兰·巴特) *Writing Degree Zero*, Trans. A. Lavers and C. Smith. New York, 1980

Bauer, Wolfgang. (鲍吾刚) "The Hidden Hero: Cre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Ideal of Eremitism," In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ed. Donald Munro. Ann Arbor, Mich., 1985

Baum, Vicki. *Shanghai* 37, 1939, Reprint, Hong Kong, 1986

Becker, Ernest. *The Denial of Death*, New York, 1973

Bentley, Eric. (艾里克·本特利) *Playwrights as Thinkers*. San Diego, 1987

——*Thinking About Playwrights*, Evanston, Ill., 1987

Bergère, Marie-Claire. (白吉尔) " 'The Other Shanghai': Shanghai from 1919 to 1949," In *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ed. Christopher Howe. Cambridge, 1981

Berman, Marshall. (马歇尔·伯曼)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1988

Boyle, John.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1972

Bruce, George. (乔治·布鲁斯) *Shanghai's Undeclared War*, Shanghai, 1937

Bullock, Alan. *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 London, 1985

Calvocoressi, Peter, and Guy Wint. *The Total War*, London, 1985

Camus, Albert. *The Rebel*, Trans. A. Bower. New York, 1956

Carey, Arch. *The War Years at Shanghai: 1941-45-48*, New York, 1967

Carroll, John. *Guilt: The Grey Eminence Behind Character,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1985

Chou Ch'ih-ping. (周质平) *Yuan Hung-tao and Kung-an School*, Cambridge, 1988

Chow, Rey. (周蕾)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Minneapolis, 1991

Coble, Parks, Jr.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 Cambridge, Mass., 1991

Cohen-Solal, Annie. *Sartre: A Life*, Trans. Anna Cancogni, New York, 1987

Collar, Hugh. *Captive in Shanghai: a Story of Internment in World War II*, Hong Kong, 1990

Confidential U. S. State Department Reports. Microfilm reproduction, 1937-41

Confucius. *The Analects* (《论语》), Trans. D. C. Lau. London, 1979

Des Pres, Terrence. *The Survivor: An Anatomy of Life in the Death Camps*, New York, 1980

Dower, John.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1986

Eberhard, Wolfram. *Guilt and Sin in Traditional China*, Berkeley, 1967

Farmer, Rhodes. (罗德斯·法莫) *Shanghai Harvest: A Diary of Three Years in the China War*, London, 1945

Ferguson, Suzanne. (苏珊·佛格森) "Defining the Short Story: Impressionism and Form," In *Essentials of The Theory of Fiction*, ed. M. Hoffmann and P. Murphey. Durham, N. C., 1988

Fink, Carole.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Cambridge, 1989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1957

Furuyama, Tadao. "Nitchū sensō to Shanhai minzoku shihon"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national capitalism of Shanghai). In *Dentō-teki keizai shakai no rekishi to tenkai*, ed. Hayama Teisaku, vol. 2. Tokyo, 1983

Fussell, Paul. (保罗·福塞尔)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New York, 1977

Gert, Bernard. *Morality: A New Justification of the Moral Rules*, New York, 1988

Gould, Randall. (高尔德) Randall Gould Papers, Box 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Gunn, Edward. (耿德华) "Shanghai's Orphan Isl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rama." In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Bonnie McDougall, Berkeley, 1984

———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1982

Hamacher, Werner, Neil Hertz, and Thomas Keenan, eds. *Paul de Man's Wartime Journalism, 1939-1943*, Lincoln, Neb., 1989.

——— *Responses: On Paul de Man's Wartime Journalism*, Lincoln, Neb., 1989

Henriot, Christian, "Lone Island: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1937-1945),"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Citi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Geneva, 1989

Hinder, Eleanor. *Life and Labor in Shanghai: A Decade of Labor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New York, 1944

Holm, David. "Lu Xun in the Period of 1936-1949: The Making of China's Gorki," In *Lu Xun and His Legacy*, ed. Leo Ou-fan Lee. (李欧梵) Berkeley, 1985

——— "The Literary Rectification in Yenan," In *Essay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d. Wolfgang Kubin. Bochum, 1982

Honig, Emily.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1986

Howard, Michael. *War and the Liberal Conscience*, New Brunswick, N. J., 1977

Hung, Chang-tai. "Female Symbols of Resistance in Chinese Wartime Spoken Drama," *Modern China* 15, no. 2 (1989)

Huters, Theodore. "Critical Groun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y Fourth Era," In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Bonnie McDougall. Berkeley, 1984

Ienaga, Saburō. *The Pacific War: World War II and the Japanese, 1931-1945*, New York, 1978

Israel, John. "Random Notes on Wartime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publican China* 9, no. 3 (Apr. 1984)

———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1966

Jameson, Frederic.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 Y., 1981

Jankowski, Paul. *Communism and Collaboration: Simon Sabiani and Politics in Marseille, 1919-1944*, New Haven, 1989

Jones, F. C. *Shanghai and Tientsin*, San Francisco, 1940

Kaplan, Alice Yaeger. *Reproductions of Banality: Fascism, Literature, and French Intellectual Life*, Minneapolis, 1986

Kedward, H. R. *Occupied France: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1940-1944*, Oxford, 1985

——— *Resistance in Vichy France: A Study of Ideas and Motivation in the Southern Zone, 1940-1942*, Oxford, 1978

Kedward, Roderick [H. R.], and Roger Austin, eds. *Vichy France and the Resistance: Culture & Ideology*, London, 1985

Keene, Donald. "Japanese Writers and the Greater East Asian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 no. 2 (Feb. 1964)

——— "The Barren Years: Japanese War Literature," *Monumenta Nipponica* 33, no. 1 (Spring 1978)

Kirchheimer, Otto. *Political Justice: The Use of Legal Procedure for Political Ends*, Princeton, 1961

Kisaka Junichiro. (木坂潤一郎) *Taiheiyō sensō* (《太平洋战争》), Tokyo, 1982

Kranzler, David. *Japan, Naz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New York, 1976

Kubota Chiseki. (窪田知績) *Shanghai Kempeitai* (《上海宪兵队》), Tokyo, 1956

Kundera, Milan.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Trans. Michael Heim, New York, 1984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1980

Lee, Leo Ou-fan. "Literary Trends: The Road to Revolution, 1927-1949,"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ed. John King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vol. 13, pt. 2. Cambridge, 1981

—— “Romantic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ome General Explorations,” In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ed. Donald Munro. Ann Arbor, Mich., 1985

Levenson, Joseph R.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1958-65, Reprint. Berkeley, 1968

Levi, Primo.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Trans. Raymond Rosenthal, New York, 1989

Li Jianwu. (李健吾) *It's Only Spring and Thirteen Years* (《〈这不过是春天〉和〈十三年〉》), Trans. Tony Hyder. Oxford, 1989

Mackerras, Colin. *The Chinese Theatre in Modern Times*, Amherst, Mass., 1975

Mann, Susan. “Widows in the Kinship, Class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of Qing Dynast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 no. 1 (Feb. 1987)

Marsh, Patrick. “The Paris Theatre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Rev. d'hist. du theatre* 33, no. 3 (1981)

Marsh, Susan. “Chou Fo-hai: The Making of a Collaborator,” In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d. Akira Iriye. Princeton, 1980

Masui Koichi. *Sabakareru O-seiken* (The Wang regime on trial). Tokyo, 1948

Mather, Richard. “Individualist Expression of the Outsider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In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ed. Donald Munro. Ann Arbor, Mich., 1985

Matsuzaki Keiji (松崎岩次). *Shanghai jinbun-ki* (《上海人文记》), Tokyo, 1941

Metzger, Thomas A.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1977

Min Ren. “Minzhong dongyuan wenti” (The problem of mass mobilization), *Wenhua zhanxian*, no. 4 (Oct. 1, 1937)

Mote, Frederick.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In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ed. Arthur Wright. Stanford, 1964

Myrsiades, Linda. “Greek Resistance in World War II,” *Drama Review* 2, no. 1 (1977)

Owen, Stephen.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 1986

Pal, John. *Shanghai Saga*. London, 1963

Pan Ling. *Old Shanghai: Gangster in Paradise*, Hong Kong, 1984

Paxton, Robert O. *Vichy France: Old Guard and New Order, 1940-44*, New York, 1972

Pepper, Suzanne. (胡素珊)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Berkeley, 1978

Pollard, David. (卜立德) *A Chinese Look at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Values of Chou Tso-jen in Relation to the Tradition*. London, 1973

—— “Li Chien-wu and Modern Chinese Dram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4, no. 2 (1976)

——trans. “Springtim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Drama: An Anthology*, ed. Edward Gunn. Bloomington, Ind. , 1983

Poster, Mark.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structuralism: In Search of a Context*. Ithaca, N. Y. , 1989

Powell, John.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1942

Pryce-Jones, David. *Paris in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Occupation, 1940-44*, New York, 1981

Rings, Werner. *Life with the Enemy: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Hitler's Europe, 1939-1945*, Trans. J. Maxwell Brownjohn, New York, 1982

Said, Edward. (爱德华·萨义德)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 1983

Sartre, Jean-Paul. (萨特) *Sartre on Theatre*, Trans, Frank Jelinek, New York, 1976

——*Literature and Existentialism*. Trans. Bernard Frechtman, Secaucus, N. J. , 1980

Schwarcz, Vera.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1986

Schwartz, Benjamin.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1985

Scott, James C. (詹姆士·司各特)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1990

Sergeant, Harriet. *Shanghai: Collision Point of Cultures, 1918-1939*, London, 1991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Annual Report (《上海工部局年报》), Chinese edition,

Shanghai, 1937-1941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 Microfilm reproduction, Shanghai, 1937-1943

Shanghai yoran (《上海略览》), Shanghai, 1939

Shillony, Ben-Ami.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1981

Struve, Lynn. "Some Frustrated Scholars of the K'ang-hsi Period," In *From Ming to Ch'ing*, ed. Jonathan Spence and John Wills. New Haven, 1979

Takeda Taijun. (武田泰淳) "Bi Kengo no kigeki ni tsuite: Chugoku no chisei" (On Li Jianwu's comedies: Intellect in Chinese literature) (《论李健吾的喜剧: 中国文学中的知性》), *Chūgoku bungakugeppō*, no. 40 (《中國文學月報》) (July, 1938)

Tanaka Issei. (田仲一成)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Ming-Ch'ing Local Drama,"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D. Johnson, A. Nathan, and E. Rawski. Berkeley, 1985

Van Slyke, Lyman.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1967

Wakeman, Frederic, Jr. (魏斐德) "Stoics, Romantics, and Marty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 no. 4 (Aug. 1984)

———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洪业》) 2 vols, Berkeley, 1985

Walzer, Michael.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New York, 1977

Wang, Ke-wen. "Collaborators and Capitalist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ontrol in Wartime Shanghai," Unpublished paper

Watson, Burton, trans. *Chuang Tzu: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1964

Wilkinson, James. (詹姆士·威尔金森) *The Intellectual Resistance in Europe*, Cambridge, Mass., 1981

Wright, Gordon. *The Ordeal of Total War, 1939-1945*, New York, 1968

Wylie, Raymond.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1980

Yeh, Wen-hsin. (叶文心) "Dai Li and the Liu Geqing Affair: Heroism in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8, no. 3 (Aug. 1989)

Yoshida Tosuke. (吉田东祐) *Nikka mondai no zenmen-teki kaiketsu no tame ni* (《中国问题的总体解决》), Tokyo, 1944

Zbikowski, Tadeusz. *Early Nan-hsi Plays of the Southern Sung Period*, Warsaw, 1974

Zhu Xi (朱熹) *Reflections of Things at Hand* (《近思录》) Trans. Wing-tsit Chan (陈荣捷), New York, 1967

译后记

这本《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是傅葆石教授的成名作，最初于199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印行。傅教授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以及采访资料，重建了1937年到1945年间日据上海的知识分子图景，对他们或隐退、或反抗、或合作等不同的选择及其心态做了入木三分的勾勒。该书出版后，影响深远。仅就有限的所知，Paul G. Pickowicz 在1994年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第53卷第3期、Nancy E. Chapman 在1994年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第1卷第1期、Parks M. Coble 在1994—1995年 *Pacific Affairs* 第67卷第4期、Peterson Glen 在1995年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Christian Henriot 在1995年的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100卷第1期、Timothy Brook 在1996年的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第39卷第1期上都有书评。此书对随后的现代文学研究、沦陷区研究、汪伪政权研究、上海研究等各个领域的影响也随处可见。

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兴趣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与政治之关系。两年前，香港科技大学陈建华教授嘱我翻译傅葆石教授的这本名著。当我深入阅读本书时，才深感自己学力不足，因我对于孤岛时期上海文坛，特别是本书

中所研究的王统照、李健吾以及《古今》派文人的关注较少，深恐无法完成任务，心中不免忐忑。但我知道，翻译此书，是难得的向傅教授学习和致敬的过程，于是利用空暇时间，勉力从事翻译。可是两年多来，因为教学、科研两忙，加上出国工作一年，译稿始终不能杀青。傅教授给予勉励的同时，总是很宽容我进展的缓慢。最近终于利用一段时间，将译稿完成。自知译笔孱弱，不能呈现原著的精彩。好在得到刘辉博士的大力协助，对拙译加以校订；南京大学中文系王维同学帮助核查了《古今》等资料。借此机会，对傅葆石教授、陈建华教授、刘辉博士、王维同学致以诚挚的感谢。

张 霖

2011 年元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此书开学术研究“上海热”之先声。细腻、复杂而生动地描画了上海日占时期作家的道德、政治及生存形态，体现了作者对史料扎实而富于灼见的把握，对于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史、文学史及文化史皆足资参考。

——陈建华（香港科技大学）

这是一部和《上海摩登》既形成对话又构成补充的重要作品。《灰色上海》把三四十年代上海最英雄最曲折最难堪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开启了上海研究新面向。

——毛尖（华东师范大学）

傅葆石的这部作品研究细致入微，论证令人信服。书中有关战时上海生活所面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道德困境的讨论堪称权威，作者笔调生动，令读者对上海文人不得不在个人生存与民族大义的道德雷区间做出抉择的境况感同身受。

——《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本书不仅会受到关心上海沦陷时期的学者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值得那些对暴虐环境下的道德抉择有兴趣的读者来仔细阅读……这一富有洞见的作品提供给我们一套理解框架来解释知识分子在异族统治下复杂且非常人性化的道德行为。

——《亚洲研究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ISBN 978-7-108-04082-4



9 787108 040824 >

定价：35.00 元